

中国社会科学院 历史虚无主义批判文选

中国社会科学院 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 历史虚无主义批判文选

中国社会科学院 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虚无主义批判文选 / 中国社会科学院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 - 7 - 5161 - 7476 - 0

I. ①中… II. ①中… III. ①虚无主义—史学—批判—中国—现代—文集 IV. ①K092.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312009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刘志兵等
责任校对 李 科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296 千字
定 价 5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始终高度重视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辨析、研究和批判，积极向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展开坚决的斗争。我院党组每年都围绕批判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主动设置议题，组织优势科研力量，敢于发声、善于发声，在中央媒体上，同时利用院属一切理论学术传播平台，院属报纸、期刊、网络，以及研讨会、座谈会等，持续推出系列理论批判文章，仅今年一年就达上百篇，开展声势浩大的舆论斗争，旗帜鲜明地对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进行深入批判、系统揭露，深刻剖析历史虚无主义的本质、危害和表现形式，倡导树立正确的历史观，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理论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动权、管理权和话语权，在理论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引起了广泛共鸣，产生了强烈共振，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肯定和好评。

在与历史虚无主义等各种错误思潮的斗争中，我院党组高度重视领导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素质的提高，全院科研人员和工作人员的政治学习和思想理论教育。每年举办所局领导干部理论读书班、处室以上干部千人理论大培训和全院各类人员的理论学习，组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写作组、意识形态研究智库和马克思主义网军，初步形成了一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意识形态工作骨干队伍。

这次编人文选的文章，一部分是我院负责同志和院属单位专家学者撰写发表的文章，一部分是我院组织院外专家学者撰写发表的文章。编辑出版本文选的目的在于帮助干部群众进一步强化唯物史观理念，认清历史虚

2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虚无主义批判文选

无主义思潮的本质和危害，达到解疑释惑、正本清源、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的目的。

是为序。

王伟光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

2015年12月8日

目 录

一 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坚守意识形态阵地

- 坚持唯物史观 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王伟光 (3)
- 历史虚无主义的破产 钟社文 (8)
- 应当澄清意识形态领域一些混乱观念 逢先知 (14)
- 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作斗争是当今马克思主义
史学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任务 朱佳木 (16)
- 同错误思潮斗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 田居俭 (25)
- 网络意识形态的属性及其应对 侯惠勤 (29)
- 2016 年意识形态热点领域与对策建议 尹韵公 (32)
- 高举唯物史观旗帜 向历史虚无主义亮剑
——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首届唯物史观
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论坛 唐红丽 (34)

二 历史虚无主义的实质与危害

-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泛起、特点及其主要表现 梁 柱 (41)
-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一个新特点 樊建新 (51)
- 历史虚无主义重新泛起的透视 梅荣政 杨 军 (53)
- 历史虚无主义是政治思潮 王 广 (63)
- 理清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三条主线 刘书林 (68)
- 历史虚无主义“重写历史”有何诉求?
——访北京大学教授梁柱 耿 雪 (71)

不能任由历史虚无主义虚无我们的历史根基

- 访国防大学教授李殿仁…………… 霍文琦 (77)
- 从“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谈开去…………… 何秉孟 (83)
- 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琐谈…………… 卜宪群 (86)
- 历史虚无主义既诬古人又误今人…………… 郑师渠 (94)
- 虚拟空间是虚无主义的乐园吗…………… 楷 杰 (97)
- 我们应当怎样拾取历史的“碎片”…………… 钟社文 (101)
- 严明党纪,抵制历史虚无主义…………… 李方祥 (108)
- 谁是真正的历史虚无主义者…………… 龚 云 (111)
- 不能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采取历史虚无主义态度
- 与左凤荣教授商榷…《居安思危》课题组(执笔人:周新城) (124)

三 抗战历史不容歪曲

- 中国抗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起点和终点…………… 柳千岸 (139)
- 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是中国共产党思想上
政治上的路线正确
- 兼论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两条路线、
两个战场的关系…………… 李慎明 张顺洪 (146)
- 正确认识东方主战场的伟大作用…………… 陈谦平 (157)
- 东方主战场的不朽丰碑…………… 曹大臣 (160)
- 正视历史事实 深化抗战研究
- 访中央党校教授李东朗…………… 唐红丽 (164)
- 中国抗战史真的需要重写吗
- 评《中国需要重写抗战史》…………… 荣维木 (172)

四 反对毛泽东研究中的 历史虚无主义

- 毛泽东对中华民族至少有五大贡献…………… 李 捷 (177)
- 改革开放时代毛泽东研究要警惕历史虚无主义…………… 吴克明 (181)
- 毛泽东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评析…………… 刘 仓 (187)

毛泽东是否说过“死 3 亿人没关系”	谢加书 (190)
毛泽东没有阻碍民法典的编纂和颁布	迟方旭 (193)
毛泽东不是独裁者	金 仁 (196)
海外毛泽东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	韦 磊 (200)
妖魔化毛泽东可休矣	杨 军 (209)

五 其他

文学不能“虚无”历史	张 江 (215)
延安窑洞真是“特权染缸”吗?	郝 琦 (220)
解放战争不是悲剧	宋月红 (223)
抗美援朝的意义不容低估	张顺洪 (226)
英烈岂可被“虚无”	侯西安 (229)
“饿死三千万”的来龙去脉	孙经先 (232)
“五朵金花”成就不容否定	张 越 (243)
李鸿章卖国还用质疑吗?	彭秋归 (249)
为民国学术热降降温、消消毒	苏全有 (252)

附录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虚无主义批判

部分文章目录(2005—2015)	(255)
-------------------------	-------

一 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坚守意识形态阵地

坚持唯物史观 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王伟光

唯物史观是迄今为止对人类社会进行认识的唯一科学的历史观。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历史认识理论体系，在科学地认识人类历史，推翻和改造旧世界、建设新世界，推进世界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

在今天新的形势下，坚持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和科学方法，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是党在思想战线上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主流是向好的，但也存在着一些较为严重的问题，尤为突出的是历史虚无主义泛滥。历史虚无主义的某些鼓吹手们不断利用某些讲坛、论坛、文坛、网坛，散布极其错误的历史观和价值观，歪曲并攻击主流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观，裹挟民意，影响民众，毒害青少年，严重威胁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如：有的宣扬错误的历史观、价值观，肆意解构历史、曲解历史；有的打着“重新评价”“重写历史”的幌子，做翻案文章，设置“理论陷阱”，为一切反面、错误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翻盘；有的以“学术研究”的面目出现，违背史学研究实事求是的原则，在理论逻辑上以个别替代一般，以细节否定整体，以所谓“反思”和“创新”歪曲历史事实；有的丢掉了20世纪以来几代人不懈努力创建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鹦鹉学舌西方话语体系或全盘复古，贬损科学的史学理论，不仅使史学研究脱离了历史实际，也远离了党、国家和人民的要求；更有甚之的是，有的肆意颠倒历史事实，抹黑中国共产党，抹黑中国革命史和共和国史，抹黑社会主义制度，抹黑英雄、抹黑领袖、抹黑人民……值得注意的是，这股思潮仍有愈演愈烈之势，绝不可低估。

所谓历史虚无主义，就是虚无自己对立面的历史功绩，放大或聚焦

自己对立面的失误，夸大或美化自己的历史、现在和未来，以达到自己的某种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即打着“反思历史”“还历史以真实”“将真相告诉人”“告别革命”的旗号，行否定中国历史和中国共产党历史、否定中国革命、否定中国共产党、否定社会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抹黑党的领袖、抹黑英雄人物、抹黑人民群众之实，用以消解主流意识形态、主流价值观，适应敌对势力分化、西化、“和平演变”我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战略图谋，从根本上改变社会主义中国的立国之本和强国之路，以达到颠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历史虚无主义并不虚无，只是虚无工人阶级的、人民大众的、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英雄的、革命领袖的和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历史虚无主义并不虚无，它只是无限放大敌对势力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反社会主义的、反中国共产党的、反人民民主专政的反历史之实。历史虚无主义直接反对的就是唯物史观，挑战的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底线。历史虚无主义实质上就是反动的唯心史观。历史虚无主义是唯心史观在今天的典型表现，是一剂置入社会主义中国腹内的剧毒剂。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是当前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任务，必须拿起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一场反击历史虚无主义的舆论争夺战。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是当前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所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从历史观上讲，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出现和蔓延的理论根源就在于放弃了唯物史观指导，陷入唯心史观的窠臼。阶级观点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是唯物史观的核心观点。历史虚无主义攻击唯物史观的一个集中表现，就是否定阶级观点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否定人类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否定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大作用，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和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指出：“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①如果把阶级的观点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从唯物史观中割裂出去，实质上也就阉割了唯物史观，唯物史观也就不成其为唯物史观的历史观，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了。

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运用到对社会历史的观察和分析就是阶级

^① 《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2页。

分析方法。唯物史观要求，观察阶级社会的历史和各种现象，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立场和阶级分析方法。所谓阶级立场，就是工人阶级及广大劳动人民的政治立场，就是代表工人阶级及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站在工人阶级及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上，一切从工人阶级及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出发，一切为了工人阶级及广大劳动人民，一切依靠工人阶级及广大劳动人民，这就是唯物史观主张的阶级立场。所谓阶级分析方法，就是站在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上，运用唯物史观阶级的观点观察、分析、认识阶级社会的社会现象，全面地分析各阶级在社会政治经济中所处的地位，主要是占有生产资料和支配劳动成果的情况，以及对于国家政权的影响力；分析各阶级的政治态度和思想观念；分析各阶级中不同阶层的区别和矛盾，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不同政治倾向；分析各阶级之间的阶级关系，以及阶级力量对比的历史性和变动性；揭示政治事变中的阶级关系和各阶级的经济利益，看到围绕着经济利益进行的阶级斗争必然具有政治的形式，以维护或夺取政治权力为集中表现；严格区分有阶级性和不带阶级性的社会矛盾的差别。阶级分析方法是分析阶级社会现象的钥匙。丢掉这把钥匙，就不能抓住问题的本质，不能在看来迷离混沌的状态中发现支配阶级社会历史进程的一般规律，就会得出一些肤浅、错误甚至反动的结论。如果否定、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立场、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面对阶级社会历史上的种种复杂的阶级斗争现象，就无法把握历史的真实和本质，在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评价上，对社会现实的分析判断上，就会造成许多混乱的认识。坚持阶级观点、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坚持阶级立场和阶级分析方法，就是坚持唯物史观。

其实早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法国复辟时代就出现了这样一些历史学家（梯叶里、基佐、米涅、梯也尔），他们在总结当时的事变时，不能不承认阶级斗争是了解整个法国历史的锁钥”^①。历史虚无主义者对历史的认知水平还不如几百年前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列宁早就指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只有研究某一社会或某几个社会的全体成员的意向的总和，才能科学地确定这些意向的结

^① 《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页。

果。其所以有各种矛盾的意向，是因为每个社会所分成的各阶级的地位和生活条件不同。”^①

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是具体地分析具体的问题。对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的实际运用，应针对不同的历史条件具体的问题作具体的分析，得出符合具体实际的结论，而不能一概而论。

在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已经确立，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了，大规模的、疾风骤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在人际关系上，人民内部矛盾成为我国社会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如果再“以阶级斗争为纲”去处理我国社会的人民内部各种矛盾和各类社会问题，显然是错误的，在实践上会造成重大的损失，“文化大革命”失误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就此否定阶级差别、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存在，认为“阶级斗争完全熄灭”，进而否定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也是不对的。党章明文判断：“在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但已经不是主要矛盾。”我国宪法也清楚断言：“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是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中国人民对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必须进行斗争。”习近平总书记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首先就是阶级立场，进行阶级分析。有人说这已经落后时代了，这种观点是不对的。阶级斗争已经不再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并不是说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不存在了，在国际大范围中也不存在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一直是明确的。因此，既要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观点，又要反对“阶级斗争完全熄灭”的错误认识，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实事求是地运用于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这才是正确的态度，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毛泽东同志1961年秋赋诗《七绝·屈原》曾曰：“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掌握了唯物史观及其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就握有了战胜历史虚无主义的匕首与投枪。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

^① 《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页。

阶级分析方法，是唯物史观的精要，掌握了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并运用这一立场观点方法认识历史、分析历史，认识现实、分析现实，也就掌握了克敌制胜的思想武器，掌握了战胜历史虚无主义的理论投枪，直接投向历史虚无主义的心脏。

批判、遏制、反击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战斗，这场斗争的核心问题就是要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始终坚持唯物史观，捍卫唯物史观，发展唯物史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和记述历史，把历史结论建立在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的基础之上。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唯物史观，坚持不懈地以唯物史观为武器，大力开展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斗争，在斗争中坚持、发展和创新唯物史观，让唯物史观在党员干部中间，在党员中间，在人民中间深深地扎下根来。只有这样，即彻底注入抗击历史虚无主义的唯物史观抗生素，才能从根本上取得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斗争的胜利。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节选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动态》2015年第113期）

历史虚无主义的破产

钟社文

近年来，有一股思潮，在社会上广为流行，它以“获取了新资料”“还原历史真相”“违背生理常识”等为理由，对历史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和建设的历史进行任意的歪曲和解释，对已被历史盖棺论定的中华民族的败类极力进行翻案、美化，而对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英勇牺牲的英烈却百般地挑刺、丑化，以此迷惑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人。这就是时下泛滥的历史虚无主义。

历史虚无主义的突出表现是：

1. 拿出放大镜“消解历史”，专挑革命英烈下手，找出甚至捏造犄角旮旯里所谓的细节材料，力图榨出英雄们“皮包下的小”来。于是乎，雷锋因为戴了块手表、穿了件皮夹克照相，就变成了爱慕虚荣的人。刘胡兰牺牲的原因则成了反动派让共产党员站出来，乡亲们往后退一步，结果刘胡兰脑子反应慢，没有及时后退而遇害，似乎她的无畏精神，像是精神病人所为。董存瑞因为艺术作品高于生活的一句“为了新中国，冲啊！”就失去了英雄的光辉，甚至炸碉堡时的最后一句话也被戏说成了：“同志们，河南人是个骗子！”还有，黄继光用身体堵得住机枪子弹吗？邱少云趴在火里一动不动不违背生理常识吗？……对于他们来说，人性皆有弱点，生理都有极限，如果能够找到这些英雄人物的弱点或者被“设定”的极限，就可以消解英雄背后的光环，使他们“告别崇高”。

2. 立起哈哈镜“重评历史”，揪住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不放，旨在还原出“历史的真相”来。于是乎，“共产党抗战中只杀敌851人”，20世纪60年代大饥荒中却饿死了数千万人。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不但抄袭了蒋百里的《国防论》，而且其游击战术不过是“土匪战术”，如何抵得过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狼牙山五壮士”是跳崖还是“溜崖”尚且纠缠不清

的时候，为什么不看看更为悲壮的国军“中条山八百壮士跳黄河”呢？……这样的历史“重评”（实为歪曲）多了，势必会搞乱人们对许多既有的历史事件的定论和历史人物的定性，从而使他们“告别神坛”。

3. 戴上有色眼镜“假说历史”，在“蝴蝶效应”和“混沌理论”的指导下，历史常常被玩转在风云人物的股掌间，或者翻滚在历史细节的阴沟里。如果张学良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坚定“剿共”而非“兵谏”，则不致使共产党在抗战期间做大。如果蒋介石在“重庆谈判”后不发动内战而迅即推动土地改革，则不致使国民党丢掉政权退守一隅。如果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之后，不再奉行列宁主义和暴力革命学说，而延续新民主主义政策，则不致使中国现代化进程在不断的阶级斗争和社会内耗中被一再拖延和阻断……如此多的“如果”加起来，可以使人类社会的演变和历史的发展由科学变为玄学，由规律变为随机。如果就这样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如果”掉，就可以使他们“告别革命”。

这些虽然只是虚无主义表现的点滴例子，但还是能折射出其“重评”的目的性。

对于历史虚无主义的危害，很长一段时间内，许多人看不清楚，一些人模模糊糊，甚至更有人为虎作伥。虚无主义者一方面丑化毛泽东等开国领袖和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雷锋等英雄模范人物；另一方面为早有定论的汉奸、反动派、卖国贼等中华民族的败类翻案。其言论不仅在互联网上流传甚广，有的甚至在报刊上公开发表，掀起了一股否定中国革命的正确性、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合法性、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逆流。如果任其发展，今天的中国就会变成昨天的苏联，今天的中共就会变成昨天的苏共。苏联之所以解体、苏共之所以垮台，就是从赫鲁晓夫“重评”斯大林（实质上是否定斯大林和苏共的历史功绩）开始，之后历任党的最高领导人没有对赫鲁晓夫等虚无主义进行批判与纠正，以致到了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推行所谓的“改革”“新思维”，整个意识形态领域被历史虚无主义所占领，否定苏共和苏联英雄成为风气。曾经被视为“苏联英雄”的卓娅，被说成是苏联政府为了唤醒群众意识人为制造出来的“神话”和“圣徒”，甚至其一度被怀疑未能与同学搞好关系而患上了“精神病”^①。

^① 参见赵嫣、胡晓光《女英雄卓娅痛斥德军：你们无法绞死1.7亿苏联人》，《参考消息》2015年5月5日。

同样地，人们不太关心斯大林被德军俘虏的儿子雅科夫是被杀还是自杀的史实，只要能够证明斯大林置至亲于不救，是一个多么冷酷的人就够了^①。这种长时间的“重评”“还原真相”，彻底搞乱了人们的思想，颠覆了人们长久建立的是非观。最后，导致苏联亡党亡国。可见，“重评”并不是要“还原历史真相”，而是要颠覆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

无独有偶，今天在中国掀起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其目的与当年苏联的历史虚无主义者如出一辙。就拿“超越生理极限”来说，汶川地震时的母亲可以超越生理极限将孩子护在身下这个事实可以被人理解，为什么邱少云超越生理极限就不可理解呢？至于艺术本可以高于生活的文艺作品，董存瑞只是喊出“为了新中国，冲啊！”的口号就是有违史实的，那么希特勒并没有和犹太人互换的史实，为什么却没有人质疑卓别林在《大独裁者》中的夸张“丑化”呢？如果艺术作品中的夸张表演都要“还原历史真相”的话，那么，所有战争题材的电影、电视剧中反面人物被一枪毙命，而正面人物几枪不死（甚至不倒），不是都要在“还原历史真相”的声浪中被否定吗？

可见，历史虚无主义者的政治目的非常明确。它从根本上来讲就不是一种学术思潮，而是一种反动的政治思潮。其所反映的也不是历史问题或文化问题，而是地地道道的政治问题。

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种抗战武装力量，在敌后战场不仅牵制了日军很大的兵力，而且消灭了敌人大量的有生力量；不仅大大减轻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压力，而且使得日寇始终无法腾出兵力支持希特勒法西斯对苏联的占领。侵华日军是这样描述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战场的作用的：“此次袭击（指八路军发动的百团大战——引者注），完全出乎我军意料之外，损失甚大，需要长时期和巨款方能恢复。”“共军对我占领区的进犯越来越频繁，已成为今后肃正工作上最严重的问题”，“共军无论在质量上、数量上均已形成抗日游击战的主力”，“蒋系军队一直处于颓势……据此，方面军将工作重点置于对共施策上”。1943年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在年度综合战报中详细公布：“敌大半为中共军，与蒋军相反，在本年交战一万五千次中，和中共的作战占七成五。在交战的二百万敌军中，半数以上也都是中共军……只有对于为华北致命伤的中共军的绝灭作战，才是华北

^① 参见绍鸿雁《斯大林儿子的真正死因》，《今晚报》2000年8月1日。

皇军今后的重要使命。”^①如此明显的事实，历史虚无主义者不仅视而不见，而且信口雌黄：中共在敌后“游而不击”，“共产党抗战中只杀敌851人”。如此贬低敌后战场的地位与作用，可见其险恶用心。侵华日军的记载和虚无主义者的“事实”，何为真、何为假，不是一目了然吗？原来言之凿凿的“还原历史真相”，实为地地道道的歪曲真相。好在历史的真相是不会被埋没的。随着中国人民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中国作为反法西斯东方主战场的作用越来越被世界所公认，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所起的中流砥柱作用也越来越为国人所肯定。

我们知道，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是非正义战争，不仅激起了全体中国人民（少数汉奸除外）的反抗，而且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的反对，更有许多国际友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帮助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日本侵略者最终被打败。而历史虚无主义者面对日本的侵略，不是主张“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却于民族大义于不顾，说什么如果张学良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坚定“剿共”而非“兵谏”，则不致使共产党在抗战期间做大。可见，历史虚无主义者对国共联合抗日是多么反对，对“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是多么推崇。从历史虚无主义者的言行看，他们连中国老百姓的觉悟都不如，更是与国际主义者的品质相差十万八千里。如果不是共产党在敌后发动人民群众建立并巩固根据地，如果不是共产党的力量一天天在壮大，如果不是共产党领导的各路武装对日寇有生力量的大量消灭，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日子不知在何时。而日本侵略者多在中国待一天，中国人民就要多遭殃一天。历史虚无主义者不从民族大义出发，只考虑党派和小团体利益的狭隘意识，注定不被广大人民所认可。

我们知道，新中国成立初期，共产党面临的是“一穷二白”“疮痍满目”的现状，在短短的几年恢复后，全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之后开创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前无古人的事业，虽然在其进行中有过这样那样的失误，但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已在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方面取得了令世人称赞的成绩，就连美国的《新闻周刊》都曾给予毛泽东很高的评价：20世纪的中国历史是毛泽东一手铸成的。而那一个世纪的历史如果没有毛泽东，也必将会是完全不同的另一面貌。他唤起了整个东方和新兴世界的

① 参见《侵华日军眼中的中共抗战》，《参考消息》2015年8月28日第10版。

崛起。美国军事作家拉瑞斯·约本·海默也给出极高的评价：是谁能让一个贫瘠的国家，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迅速崛起于世界强国的行列？是谁让一个贫弱无力的中国从此站起来了？——是毛泽东。而历史虚无主义者却只看到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错误，而无视其对中华民族的独立（抗日战争）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作出的历史功绩，诬蔑共产党（主要是毛泽东）的政策拖延和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说什么：如果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之后，不再奉行列宁主义和暴力革命学说，而延续新民主主义政策，则不致使中国现代化进程在不断的阶级斗争和社会内耗中被一再拖延和阻断。这种用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和社会历史条件去分析、评价历史人物（包括政党）的做法是唯心史观的典型表现。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革命领袖是人不是神……不能因为他们伟大就把他们像神那样顶礼膜拜，不容许提出并纠正他们的失误和错误；也不能因为他们有失误和错误就全盘否定，抹杀他们的历史功绩，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潭。”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

历史虚无主义的反人民、反正义性、反真理性注定了它的破产。

我们正在进行的斗争昭示了历史虚无主义正在破产！党的十八大以来，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乃至广大人民群众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危害逐步有了清醒而深刻的认识，不做历史的罪人，不做祸国殃民的害虫，实事求是成为广大人民群众遵循的原则。习近平总书记更是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这就告诫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决不做历史虚无主义者，也决不能放任历史虚无主义蔓延甚至泛滥。目前一场围歼历史虚无主义的行动已在全国展开，很多历史虚无主义的言行受到批驳；一些长期宣扬历史虚无主义的网站、微博、微信公众号等被人民看透本质，遭到唾弃；不少批驳历史虚无主义的言论，揭露历史虚无主义的本质，宣扬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文章在报刊、电台、电视台和互联网上广为传播；越来越多的党员、干部、群众自觉加入到与历史虚无主义进行坚决斗争的行列中来，那些表面上看起来依然嚣张的历史虚无主

义言行其实已是强弩之末，一些曾经被迷惑而宣扬历史虚无主义的人也开始醒悟、悔改……这一切使我们有理由作出判断：历史虚无主义正在破产！

正是历史虚无主义的唯心本质，决定了它走向破产的必然。历史虚无主义必将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功的实践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9月21日）

应当澄清意识形态领域 一些混乱观念

逢先知

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情况非常复杂，相当严峻。“文化大革命”中是宁“左”毋右，改革开放以后又出现了一种宁右勿左的倾向。有这种趋势，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势头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在增强。右的势力越来越猖狂，矛头直指共产党、党的领袖和社会主义制度，肆无忌惮。“新西山会议”公开发表反对共产党领导的露骨言论，有的刊物专门同共产党对着干，影响极坏。高校的问题也应当引起高度注意。对于那些公然反党又坚持不改的，必须作出相应处理。

上述情况是长期形成的。党的十八大以来出现了重大转机，情况开始扭转。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重要讲话和批示，使广大党员干部、马克思主义者受到鼓舞，增强了信心。有一些混乱的观念应当予以澄清。

1. 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阶级分析方法同“阶级斗争为纲”混淆起来。既要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又要反对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这是上了宪法和党章的，写进了第二个《历史决议》。从邓小平同志到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也一直是这样讲的。

2. 把人民民主专政同依法治国对立起来。任何国家都实行专政，问题在于谁专谁的政。美国对于“占领华尔街”的广大穷人毫无顾忌地武力清场，这就是专政。人民民主专政是我们的国体，依法治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内在要求。两者相辅相成，并行不悖。

3. 把真左和假左（即“左”、极左）混淆起来。左是革命的、进步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左”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现在是左、“左”不分，左派在一些人那里成为贬义词。谁讲马克思主义，

讲革命传统，就说你“左”，让你抬不起头来。

4. 把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不争论”扩大化、绝对化，歪曲了邓小平的思想。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不争论”是针对具体问题而说的，在大是大非面前他非常坚定，一点也不含糊。有人大讲“不争论”，结果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手脚被捆住，右的错误言论大行其道。

意识形态归根到底决定于经济基础。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现在各种错误思潮泛滥，固然同我们的思想工作不力有关，但更重要的是经济基础发生了重大变化。拿国有经济来说，它的总产量只占经济总量的25%，只占出口贸易额的11%，非国有企业反成为外贸出口的主力军。国有经济是不是处于主导地位都成问题，怎能保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现在我们国家的国企经济所占比例，还不如有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些人还在极力鼓吹“民进国退”，拼命抹黑国有企业，这是别有用心。邓小平同志从实行改革开放那天起，就一直强调必须以公有制为主体。这是非常重要的，必须坚持。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思想理论动态》2015年第13期）

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作斗争 是当今马克思主义史学 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任务*

朱佳木

马克思主义有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而这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无一不是建立在历史研究基础之上的。无论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费尔巴哈的机械唯物主义，还是亚当·斯密、李嘉图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傅立叶、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都是历史研究的成果。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能对它们进行革命性改造，创造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也缘于对历史的大量考察和深入研究。他们还写出过许多传世的史学名著，如《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德国农民战争》《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马克思甚至留下过一部按编年顺序摘录世界历史事件的历史学笔记。

马克思主义的创立离不开历史研究，发展也离不开历史研究。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所以能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和历史研究同样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毛泽东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也是伟大的史学家，不仅开辟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道路，而且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奠定了坚实基础。他的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及其主要矛盾的学说，关于中国革命历史规律的学说，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学说，关于重视继承和批判地总结历史遗产并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分析历史现象的学说，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

* 本文是2015年8月13日第三届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论坛上的开幕词（节选）。

色社会主义理论中那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体现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内容——例如，关于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关于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关于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等，也都是我们党运用马克思主义总结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经验而得出的结论，并且在实践的历史过程中对它们反复进行检验，不断加以完善。

马克思主义一经创立，便在历史研究领域引起了自史学产生以来从未有过的革命性变革。它对人类历史发展所作出的科学解释，让以往的天命史观、循环论史观、英雄史观、进化史观等形形色色的唯心史观相形见绌，使“过去在历史观和政治观方面占支配地位的那种混乱和随意性，被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①。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指导和影响下，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推动社会形态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人的社会意识，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历史发展变化的直接动力，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杰出人物只有顺应人民群众的要求才能发挥积极作用，等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正是运用这一历史观，逐渐把唯心史观指导下被颠倒了的历史，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颠倒了过来；并且在这一过程中涌现出许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产生出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成果，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和史学学派。在这一过程中也出现过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机械、片面的理解，以及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为某种政治阴谋服务的所谓史学研究、史学理论，例如影射史学、史实服从政治等。对此，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在党

①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11页。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已经给予过批判，今后仍然要警惕和反对这类现象的出现。

然而，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来说，当前更需要引起重视的是，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历史学家、历史研究受到来自唯心史观阵营的前所未有的挑战、质疑、非难和攻击，以及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甚嚣尘上，呈现前所未有的泛滥态势。正是在这股思潮的影响下，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几乎没有一个事件不遭到攻击和否定；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始人到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从为人民解放流血牺牲的烈士到新中国建立后各条战线涌现出的英雄模范，从封建和半封建时代率领被压迫人民反抗地主阶级压迫的农民起义领袖和资产阶级革命家到抵抗异族侵略的民族英雄，几乎没有一人不遭到污蔑、诽谤、丑化、调侃、戏弄；反过来，从镇压人民革命的刽子手到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大汉奸，从阻挡历史前进的封建统治者到没落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从在中国土地上建立“租借”“开拓地”的殖民主义势力到帮助帝国主义实行经济侵略的买办，几乎无一人不被美化、歌颂、辩护、翻案。这一切，有的以学术面目亮相，有的以文艺形式出现；有的在报刊和讲堂上发表，有的在网络上“流窜”；有的出自境外特定机构的炮制和境内少数“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的人之口，有的出自受蒙蔽者的人云亦云、鹦鹉学舌。上述情况无论哪一种，都是唯心史观在思想界、理论界、学术界、文艺界的表现，都是阶级斗争在当今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

党的十八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学习和掌握历史唯物主义，同时高度重视警惕和反击历史虚无主义。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底主持中央政治局就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进行的集体学习，他强调：“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系统、具体、历史地分析中国社会运动及其发展规律，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不断把握规律、积极运用规律，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我们才能不断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① 针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本质和危害，他在

^① 《人民日报》2013年12月5日。

2013年初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研讨班上旗帜鲜明地指出：“古人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国内外敌对势力往往就是拿中国革命史、新中国历史来做文章，竭尽攻击、丑化、污蔑之能事，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最后，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就作鸟兽散了，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这是前车之鉴啊！”^① 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论述清楚地告诉我们，所谓历史虚无主义绝不是历史学领域里的学术思潮，更不是什么学派，而是由国内外敌对势力制造和鼓动，以推翻共产党领导和改变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以否定和“告别”革命为核心，以伪造、篡改、歪曲、恶搞历史或将历史碎片化、片面化为手段，借助网络、报刊、书籍、讲堂、舞台、荧屏等媒介加以流传的政治思潮。同这股思潮的斗争也绝不是学术争论，不属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范畴。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要服务于党的“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要为“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贡献，就要把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论述作为自己的重要指导思想。

历史研究固然是学术、学科、学问，但由于它同时具有向公众叙述历史和解释历史的功能，所以直接关系到政权存在的历史合理性和正当性，不能不带有强烈的政治性。无论维护一个政权或是推翻一个政权，斗争的双方都要争夺对历史的叙述权、解释权。革命的阶级如此，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区别在于，革命的阶级顺应历史前进的方向，所以叙述和解释历史时更尊重和正视历史，叙述和解释的历史更符合或接近事实；而反革命的阶级逆历史潮流而动，所以叙述和解释历史时往往要掩盖和歪曲历史。当前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之所以泛滥，就是因为被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的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残余势力不甘心失败，联合新形势下的各种反革命力量卷土重来，妄图否定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由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政权。这股思潮的表现形式尽管多种多样，但拿历史做文

^①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13页。

章、拿历史说事往往是它们的共同特点，唯心史观指导下的历史研究和史学理论往往是它们的源头、上游和依据。因此，面对这股思潮的泛滥，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决不能袖手旁观、视而不见，而应挺身而出、积极战斗、敢于担当、敢于亮剑，用科学研究同它们进行坚决斗争。在此，我提出三点意见，供大家参考。

第一，进一步认清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增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当前的泛滥，和新自由主义思潮、社会民主主义思潮，以及普世价值、西方宪政民主等主张的兴起一样，都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表现，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扑。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告诉我们，人类社会形态由低级向高级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当今时代无论具有什么样的特征，其本质都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都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既共处又斗争的时代。因此，代表国际资本利益对抗社会主义力量的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尽管表面凶恶猖狂，但从历史的长河看，只能是暂时的现象。江河曲折毕竟流向海洋，乌云满天终究遮不住太阳。中国革命历史上也曾有过低潮，但革命并没有因此消亡，最终还是迎来了高潮，取得了胜利。当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虽然处于低潮，但总有高潮到来的一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虽然还受到一些人的质疑，但一定会受到越来越多人们的理解和拥护。

最近几年，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革命理想高于天”。我理解，其深刻用意就在于告诉全党，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开启的革命事业，至今还没有取得最后成功；当前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仍是这个事业的组成部分；共产党人能否坚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革命理想，是能否把这个事业进行到底的关键。他说：“事实一再告诉我们，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没有过时，关于资本主义必然消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也没有过时。”^①“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②就在最近纪念陈云诞辰110周年的

①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17页。

② 同上书，第115页。

座谈会上，他还特意引用了陈云的一段话，用以说明共产主义绝不是乌托邦。他说：“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陈云同志高度重视对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他反对‘共产主义遥遥无期’的观点，明确指出，这个观点是不对的，应当说，共产主义遥遥有期，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① 习近平总书记一再指出：“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我们的制度必将越来越成熟，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将进一步显现，我们的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我国发展道路对世界的影响必将越来越大。我们就是要有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真正做到‘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② 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要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作斗争，同样必须首先树立这种自信。股市上有一句话，叫做“信心比金子还宝贵”。在对待国家未来走势的判断上，情况更是如此。

第二，进一步认清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复杂性、长期性，增强同历史虚无主义斗争的韧性。

资本主义必然消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也是漫长的。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要深刻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调节能力，充分估计到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方面长期占据优势的客观现实，认真做好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合作和斗争的各方面准备。在相当长时期内，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还必须同生产力更发达的资本主义长期合作和斗争，还必须认真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创造的有益文明成果，甚至必须面对被人们用西方发达国家的长处来比较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不足并加以指责的现实。我们必须有很强大的战略定力，坚决抵制抛弃社会主义的各种错误主张，自觉纠正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③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由于有国际资本的撑腰打气，所以同样是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的。我们要同这股思潮作坚决斗争，但不要期望通过一两个回合就“得胜回朝”，更不要奢望“毕其功于一役”，而要有长期斗争的打算，准备打一场持久战，甚至做好局部牺牲的思想准备。毛泽东说过，要斗争就会有牺牲。现在虽然一般不会有革命战争年代那种流血、掉脑袋的牺牲，但被反共反华的邪恶势力搞造谣、污蔑、人身攻击、网上围攻，以及影响学位

① 《人民日报》2015年6月13日第1版。

②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11页。

③ 同上书，第117页。

和职称评定、文章发表等现象，造成个人名誉和正当权益牺牲等情况，还是会有有的。斗争尖锐的时候，也不排除被暴力袭击、流血牺牲的可能。

早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83年，邓小平就在中央全会上指出：理论界、文艺界对错误倾向虽然进行过一些马克思主义批评，但效果不够显著。“一则批评本身的质量和分量不够，二则抵抗批评的气势很盛。批评不多，却常被称为‘围攻’，被说成是‘打棍子’。其实倒是批评者被围攻，而被批评者却往往受到同情和保护。”^①他说：“有些同志对精神污染不闻不问，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甚至认为是生动活泼，是‘双百’方针的体现。有些同志明知不对，但是不愿或不敢进行批评，怕伤了和气。”^②他要求对那些公然挑战马克思主义的言行，“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站出来讲话。思想战线的共产党员，特别是这方面担负领导责任的和有影响的共产党员，必须站在斗争的前列”^③。三十年过去了，邓小平所说的挑战马克思主义、抵抗批评的力量，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借助国际资本明里暗里的支持和网络平台的支撑，打着“普世价值”和言论自由的幌子，显得气势更盛。这充分说明，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低潮状况下的意识形态斗争，的确是复杂的、长期的。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应当学习鲁迅的精神，锻炼和增强斗争的韧性，适应对方那些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偷换概念、胡搅蛮缠，谩骂、污蔑、诽谤等无所不用其极的卑劣战术，不被这一套所吓住。鲁迅在《战士和苍蝇》一文中写道：“战士战死了的时候，苍蝇们所首先发见的是他的缺点和伤痕，嘬着，营营地叫着，以为得意，以为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的确的，谁也没有发见过苍蝇们的缺点和创伤。然而，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去罢，苍蝇们！虽然生着翅子，还能营营，总不会超过战士的。”^④让那些吡必中国、反共反华的“苍蝇”们去营营吧。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从来没有被辱骂所吓倒，相反，从来是伴随辱骂声成长壮大的，今后也一定会在辱骂声中走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第三，进一步认清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肩上的责任，增强用马克思主义辨析错误、回答问题、说服群众的能力。

当前正在进行的这场马克思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的斗争，从本质上说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页。

② 同上书，第45页。

③ 同上书，第46页。

④ 《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0页。

是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颜色革命”与反“颜色革命”、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斗争的组成部分，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和平演变是帝国主义政治家发明的用于对付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杜勒斯说：“人的脑子、人的意识，是会改变的。只要把脑子搞乱，我们就能不知不觉地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并迫使他们相信经过偷换的价值观念。”^①艾森豪威尔说：“在宣传上花1美元，等于在国防上花5美元。”尼克松说：“最终对历史起决定作用的是思想，而不是‘武器’。”“我们播下思想的种子，这些种子有朝一日会结成和平演变的花蕾。”^②出于这一战略考虑，他们数十年来不惜工本，依托资金、技术、人才优势，办电台、拍电影、出书刊、搞交流、给资助、评奖项，近些年又利用跑到海外的民运分子建网站、编信息，向社会主义国家输送包括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内的意识形态。与此同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了严重曲折，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历史中也有过严重错误，年轻一代对老一代为什么要革命以及革命的艰难越来越缺少感性认识，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仍然有很强的自我调节能力。另外，互联网中的微信、微博技术为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扩散提供了新的便利条件，而我们一些有关机构对网络意识形态斗争的形势还缺少足够的认识和必要的应对能力。由于这一切，使防止和平演变、“颜色革命”、渗透、颠覆的工作，比过去更加困难。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更应当发扬我国史学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自觉担负起阻击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责任；同时，通过斗争提高自身分析问题、辨析真伪、阐释道理的能力，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在群众中的影响力、说服力、感召力。

马克思说过：“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③比如，在对待新中国历史的认识上，如何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是问题的根本。要说服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年正确认识新中国的历史，就要抓住这个根本。在这方面，习近平总书记为我们作出了示范。他指出：这两个历史时期“是两个相互联系

① 《大国悲剧》，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② 《苏联演变的原因与教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9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10页。

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① 由于这一论述抓住了正确认识新中国历史的根本，所以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所以能掌握广大群众，所以为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力量转变成广大群众团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物质力量发挥了作用，也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增强理论的说服力树立了榜样。

当前全党全国人民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努力推进“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而奋斗，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离我们如此之近。国内外敌对势力散布历史虚无主义，目的就是使中国人民丧失对自己历史的自信心，从思想上被搞乱，从精神上被打垮，从而迟滞中华民族前进的步伐，阻挡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车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成果决不能丢失，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决不能否定，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决不能动摇。这是党和人民在当今世界安身立命、风雨前行的资格。”^② 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当前的重要责任，就是要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在史学领域指导作用的发挥，用历史研究说明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是巨大的；说明中国人民反抗封建压迫和抗击外来侵略的斗争是正义的，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的革命、建设、改革对于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成功的，使中国人民更加增强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使全体中华儿女更加紧密地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之下。只要这样做了，我们就可以说为推进党的“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作出了自己的努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尽了自己的力量。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动态》2015年第105期）

①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11—112页。

② 《人民日报》2014年8月21日。

同错误思潮斗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

田居俭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大潮的汹涌澎湃，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趁机沉渣泛起，卷土重来。这种貌似学术争论的思潮，打着“反思历史”“还原历史”等旗号，歪曲和否定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歪曲和否定中国人民近代以来一百七十多年的革命史，歪曲和否定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的奋斗史，歪曲和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多年的发展史。从历史虚无主义的矛头所指，可以断定它是一种错误的社会思潮，是一种对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意识形态进行挑战的政治思潮。尽管其在意识形态领域处于支流位置，但它释放的负能量影响不可小视。围绕这种思潮交锋的笔墨官司，关乎当代中国要不要捍卫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成果、要不要捍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要不要捍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方向等大是大非问题，必须针锋相对地予以回应。

一 历史虚无主义虚无历史的方法并不新鲜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总是寻机顽固地表现自己，又挥之不去、去还复来，原因在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近三十多年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动了当代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巨大进步。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然而，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等日益多样化，以及市场经济活动存在的弱点和消极影响，人民内部矛盾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发生的变化，不可避免地要引起人们思想意识的变化，使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相互交织，进步观念与落后观念相互影响。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在意识形态领域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弘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的、正确的、进步的思想观念，反对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的、错误的、落后的思想观念，就显得格外重要。如果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容忍指导思想多元化，势必会破坏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化形态、政治形态和社会形态，导致人心大乱、天下大乱，便于国内外敌对势力施展西化、分化中国，促使中国改旗易帜的图谋。

历史虚无主义虚无历史，理论并不高深，方法也不新鲜，都是老调重弹、故技重演。虚者，模糊、歪曲之谓也；无者，抹杀、消除之谓也。一言以蔽之，只要能虚无历史，他们就不择手段，或随意剪裁和拼凑史料，或以点代面、以偏概全，甚至指鹿为马、混淆黑白。

历史虚无主义虚无历史，大都聚焦于中国革命史和新中国发展史，又多以近代中国人民革命为突破口。他们断言，太平天国“绝无进步的历史意义可言”，辛亥革命“给社会造成的破坏大于建设”，“自辛亥革命以后，就是不断革命：‘二次革命’、‘护国护法’、‘大革命’、最后是49年的革命”，“‘革命’在中国并不一定是好事情”。他们罔顾历史，不愿也不敢承认：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是现代化建设的推进器。中国近代历史也反复证明革命是“好事情”。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领导中国人民完成的三大伟业，无不与革命休戚相关。一是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二是创造性地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三是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革命，开创、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这三大伟业，不可逆转地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不可逆转地开启和推进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二 选择社会主义道路不是“误入歧途”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否定中国革命，重点否定的是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人民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他们贬损这种选择是“误入歧途”，主张用“现代化范式”取代“革命范式”，扬言“如果当时中国执行一条‘孙子’战略，随便搭上哪一条顺风船，或许现在的中国会强盛得多。比如追随美国，可能我们今天就是日本”。这种荒唐的“如果”逻辑，怎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清政府，可谓“孙子”相十足矣！从鸦片

战争开始，这个“洋人的朝廷”就“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乞求搭乘西方列强的“顺风船”，谋求“强盛得多”的处境。结果怎样呢？美国没有让清政府搭乘“顺风船”，中国也没有成为日本，反而落了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下场。

与历史虚无主义者的愿望相反，新中国的历史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不是“误入歧途”，而是走上了凯歌行进的光明坦途。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旧中国留下的经济“烂摊子”只有16万吨钢，外加西方市场滞销的“洋货”。60多年后，中国的钢产量超过5亿吨，各种新兴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形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尖端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中国制造”日新月异，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新中国成立之初，城乡居民生活贫困，大多数人衣不蔽体、食不果腹。60多年后，总体上实现了从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人均GDP从1949年的35美元增至2011年的5400美元，人均寿命从1949年的35岁延长到2012年的74岁。

三 正确区分政治是非和学术是非

1957年，毛泽东在阐述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斗争时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有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也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马克思主义仍然必须在斗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仍然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须是这样；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时隔多年，重温这篇著作，仍如醍醐灌顶，深感任重道远。

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的实践和历史也证明：同错误思潮斗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马克思主义是真理，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战斗力，在每次理论交锋中都能经得住锻炼和考验，都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巩固和扩大阵地，都能挫败任何错误思潮的挑战和攻击。据此，人们有充分理由相信：按照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发展”的规律，眼下与历史虚无主义的这场较量，结局也必然如此。

以马克思主义两大理论基石之一的唯物史观为研究指南的哲学社会科学家，特别是历史学家，在同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的斗争中，应当发挥自身优势，增强阵地意识，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正确

区分政治是非和学术是非，摆事实、讲道理，拨乱反正、解疑释惑，用历史的、实践的、辩证的思维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认清历史趋势，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进方向，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月16日）

网络意识形态的属性及其应对

侯惠勤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草案）》的公布，使得我们在防止网络入侵、信息泄露和非法信息传播等方面有法可依，赢得主动。但是，从意识形态阵地的争夺和斗争来看，仅有技术的、行政的和法律的手段还不够，最重要的是要有话语权。正是在这方面，我们的认识和应对还不到位。

一 我们在互联网舆论斗争中处在不利位置

第一，西方通过网络实现其对我意识形态的渗透。西方政要为什么把中国几亿网民视为亲西方的、颠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依靠力量，为什么公然声称，有了网络就有了制服中国的武器？为什么存在网络舆论在出现正面的声音时往往会遭遇围攻甚至封杀的现象？这不仅因为西方在今天还拥有网络技术上、管理上和设备上的巨大优势，而且拥有网络上的舆论引导力和话语权，能够通过网络实现其意识形态的渗透。

第二，西方的思想仍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说到底，今天就世界范围而言，西方的思想仍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的一大优势是可以历史地积淀在人们的内心，以“自发性”“本能”的方式发挥作用。

第三，我在互联网舆论斗争中处于下风的原因。网络言论特点是外在约束最小、在最短时间内用最能抢风头的话语表达、拒斥深思熟虑和理论思维，这是自发性完全压倒自觉性、崇拜自发性和嘲弄自觉性的场所，因而最能展现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占优势地位的统治思想的力量。只有看到并承认我们在网络舆论斗争中的劣势，才有可能正确应对，化不利为有利。

二 网络言论背后的西方“普世价值观”

许多网络“自发性”言论背后都是西方“普世价值观”的扩散。在网络言论中能够“抢眼球”的话语大致分为三个方面：

第一是展示任性的“人的自由”，以及反潮流的“人格独立”。不难看出，这种所谓的“自由”正是西方价值观的那种“自发自由”，与马克思主义的“自觉自由”格格不入。第二是宣扬个人本位，“权利高于权力”，“个人生存最重要”，“个人利益最根本”。这种个人主义的政治导向，就是西方政治制度的价值基础，与社会主义的人民本体格格不入。第三是把我们前进中的缺点、问题和矛盾片面放大，加上无中生有的捏造。所有这些误导背后的参照物，就是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现代化模式。

三 应对互联网舆论斗争的对策建议

我们在网络的舆论斗争中并非无所作为，而是有可能化被动为主动，获得话语权。从根本上说，尽管在世界范围内还是西强我弱，但在中国，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思想，我们可以通过努力，有效抵御西方思想渗透，把国家意志贯彻到社会各个领域，包括网络。要从制度上扭转网络舆论易受情绪化、非理性控制的格局，让理性的认识和真理的光辉主导网络舆论。

第一，加强对网络发言的管理。（1）建议实行网络发言扣分制、后台实名制、网络平台责任追究制等，加大网络舆论参与者的社会责任感和理性思考分量，克服那种“不假思索”的起哄式发言；（2）建议建立和完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荣誉制度，对于在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方面作出重大贡献的人，在荣誉上给予鼓励，在研究上给予支持；（3）建议采取技术过滤等方法净化网络话语，使网民在网上不但能说话，而且会说话、说“好”话，从而确保国家文化安全。

第二，提高网络反渗透能力。建议多渠道、多层次、多方位培养网络“红军”，提高反渗透能力。（1）要发现、支持、培育和造就一批导向好、功力深、有影响力、善于运用网络语言和形式的网评专家，形成网络舆论的引领力量；（2）要大力鼓励和支持各高校、研究机构、学术团体（各种

学会、研究会、专业委员会等) 组建有影响的网络论坛, 有计划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成果, 根据网络宣传的特点加以推广, 同时针对网络舆论的突发热点进行疏导和引领; (3) 要把对网络舆论的掌控和宣传能力作为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指标, 落实责任制和建设规划, 纳入对于各级党委及其负责人的考核。

第三, 要抓住反面典型做足文章, 在震慑中加强引领。当前一部分体制内的人, 包括一部分领导干部、学者、高校教师公然通过微博、微信等各种方式挑战我国主流意识形态, 而未受到任何处理。建议对该现象高度重视和警惕, 通过严肃查处几起典型案例, 深挖其行为动机和思想根源, 对广大体制内的人员进行警示教育。

第四, 在坚守根本性话语的同时, 进行话语表达的创新。当前思潮多样、价值多元, 思想共识度低。西方宪政、普世价值、公民社会等思潮在话语形式上极具迷惑性而受到追捧, 这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不清晰、不透彻有关。因此, 要善于创新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表达。既要用简明易懂的方式说清楚“自由”“民主”“公正”“法治”这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主义实质, 更要提炼出可以与“宪政”“普世价值”“公民社会”相区别的, 易于从字面上就被老百姓接受的话语形式。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专供信息》2015年10月8日第673期)

2016 年意识形态热点领域 与对策建议

尹韵公

中央近期关于加强党委（党组）意识形态责任制的文件和中央领导同志的相关讲话，在组织架构上为开展意识形态工作提供了保证，在行政手段上为落实意识形态工作提供了抓手。同时，它还为做好 2016 年意识形态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国际上看，明年是美国大选之年，其中与中国相关的话题必将再度成为关注热点。从国内看，若经济继续下行，其所带来的压力势必激化社会矛盾，引发社会负面情绪。上述因素的相互叠加会加剧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性，使我国的意识形态工作更具挑战性和艰巨性。

要围绕“文化大革命”相关话题、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等意识形态领域的热点话题，抓紧研究对策建议。

1. 坚决贯彻中央关于党委（党组）意识形态责任制的文件精神。对中央和地方任何单位，只要意识形态工作出了问题，就坚决依纪办事、依规处置，决不手软。只要坚决按中央文件指示办事，增强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2016 年的意识形态工作就不会出现大问题，即使出现小风小浪，也能迅速平复下去，不致危及基本稳定局面，从而为经济建设营造良好而健康的舆论环境。

2. 严格遵守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以社会稳定为根本，积极、准确地应对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争论。一是对于“文化大革命”争论采取“疏”的策略，或以疏为主、以堵为辅。二是允许相关党史研究部门举办小规模学术论坛，正面引导舆论，释放负面压力，给国际学术界塑造一个积极、开朗的健康国家形象。三是对涉及“文化大革命”的言论加以管控。

3. 借力发力，变坏为好，反思现实，引导社会情绪。目前，社会上有人对“文化大革命”心存怀念，这源于他们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如社会风气下滑、贫富差距拉大、公平正义欠缺等。对此，应通过对历史与现实的比较和反思，将坏事变为好事，有效疏导不满情绪。

4. 运用辩证思维，借鉴别国经验，实事求是地看待“文化大革命”中的具体事件与具体人物。美国也曾发生过类似“文化大革命”的事件，即横行于美国20世纪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整体错误不等于个体错误，个体错误也不等于整体错误。对待“文化大革命”，该否定的必须坚决否定，但有一些可以肯定的，也不妨肯定，如八个样板戏的艺术成就、赤脚医生的推广等，这将有利于引导舆论和安抚社会情绪。

5. 总览全局，顶层定调，因势利导，团结向前。2016年的舆论生态与意识形态关联极大。尤其是“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话题，涉及面广，牵动着亿万百姓的神经，必须慎重对待。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大框架下，可能需要中央高层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发声，以平息各方争论，避免无休止的争论从而影响社会稳定。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专供信息》2015年11月10日第774期）

高举唯物史观旗帜 向历史虚无主义亮剑

——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首届唯物史观
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论坛

唐红丽

2015年9月18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联合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承办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届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论坛在京举行。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学部主席团主席王伟光作主旨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秘书长、党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总编辑高翔主持开幕式。中央编译局局长贾高建，天津市社科联主席、南开大学党委书记薛进文在开幕式上致辞。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李慎明，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沙健孙等学者作大会发言。

王伟光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对论坛的召开表示祝贺。他说，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在纪念九一八事变爆发84周年的日子，举办首届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论坛，对进一步推动史学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高举唯物史观旗帜，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把中国社会科学院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加强史学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史学研究，都将产生积极作用。

王伟光指出，唯物史观的创立，是人类思想史上一场伟大的革命，赋予人类正确认识社会及其发展历史的唯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如果没有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人们对社会生活及其历史的认识还会在黑暗中摸索。

王伟光指出，唯物史观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断取得胜利的最锐利的思想武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同样是中国共产党人成功运用唯物史观指导的产物，是唯物史观与当代时代特征、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准确把握国情，顺应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势，遵循历史发展规律，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就是运用唯物史观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问题的典范。

王伟光指出，唯物史观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是指引史学研究的可靠指南，必须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和科学方法，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王伟光对与会学者提出三点希望。第一，要高度重视学习和运用唯物史观，以指导史学研究。开展史学研究，就要观察历史、分析历史、认识历史、总结历史，而这一切又是为今天的现实服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第二，要把唯物史观当作研究的指南，决不能当作现成的公式或教条套用。第三，要加强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史学研究，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为丰富、发展和创新唯物史观作贡献。

王伟光希望论坛每年举办一次，形成惯例，办成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坚持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精品论坛。

高翔在主持开幕式及参加小组讨论时指出，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伟大发现，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革命意义，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灵魂和旗帜。中国的现代学术，特别是历史科学，是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近百年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们，按照唯物史观指引的方向，以严谨求实的学风，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角度，以宏大的学术气派考察了人类社会变迁的内在逻辑与规律，比较准确地揭示了人类社会演变的一般规律，特别是揭示了中国社会既遵循人类社会演变的一般规律，又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的独特历史发展道路。

高翔说，最近几十年，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迁，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得到发扬光大，但也要看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目前面临着新的、严峻的挑战。尤其是历史虚无主义，出于否定党的领导、否定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别有用心政治目的，用精心挑选的历史碎片歪曲、篡改和伪造历

史，不但背叛了历史学的科学精神、科学原则，而且误导民众、毒害社会，需要高度警惕。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教科书必须呈现真实的历史。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旗帜鲜明地继承和弘扬马克思主义学术的优良传统，对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敢于发声、敢于亮剑。

高翔提出，历史研究要有三个眼光：长时段的眼光，全面的眼光，发展的眼光。真正的历史学家一定是深谙哲学的思想家。不能简单地讲实证，实证不等于历史学，实证只是历史研究的手段。求真、求是、经世才是中国史学的传统。要站在人民的立场，把历史还给人民。

高翔表示，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起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论坛，意在共商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的百年大计，共同探索当代中国史学面临的时代课题，对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辨析原理，明得失、定是非，在重大理论和原则问题上，清晰而响亮地发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声音。

贾高建在致辞中表示，唯物史观揭示了社会历史领域的客观规律，为解开历史之谜、认识社会历史领域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具有普遍的真理性和真理性，虽然一个多世纪以来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社会历史领域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但这些基本原理并不过时；无论是史学研究还是当代实践中的重大现实问题研究，都应该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为指导。但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所谓绝对真理的封闭体系，而是一种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生长着的活的学说；要不断深化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自身的研究，使之始终保持内在的生机和活力。

薛进文在致辞中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唯物史观对于认识历史、创造未来的极端重要性，要求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和记述历史，强调只有坚持正确的历史观，牢记历史的启迪和教训，才能更好地把握今天、开创明天。深化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必须始终坚持唯物史观的科学指导，把历史结论建立在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的基础之上，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服务，为弘扬中国精神、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撑和精神动力。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历史研究必须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在当下，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问题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批判和摒弃历史虚无主

义，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出当代中国史学工作者的贡献。

来自全国各地高校和研究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及一些基层单位的105位学者与会交流。学者们就“当今历史虚无主义及其危害性”“阶级和阶级斗争再认识：历史与现实”“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社会形态演进的多样性和统一性”四个议题，共提交97篇论文，其中既有宏观的理论探讨，又有实证性的具体研究，体现了新时期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繁荣发展的基本状况。特别是青年史学工作者的论文，体现出深厚的理论思维功底与高超的研究水平，受到与会老专家们肯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及史专业的上百名研究生与会旁听。同学们表示，参加论坛旁听与研讨，具有课堂学习不能替代的好效果，对于了解学术前沿动态，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学习、研究和应用，树立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具有积极引导和激励作用。本届论坛的详细成果，本报将陆续刊发。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报》）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9月21日）

二 历史虚无主义的 实质与危害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泛起、特点 及其主要表现

梁 柱

在新的历史时期，随着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在我国社会出现了各式各样的社会思潮，其中，以对自己国家的历史、民族的文化采取轻蔑的、否定的态度，甚至把历史特别是把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说得一无是处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泛起，为害甚烈，引起了一切关心党和国家命运的人们的关注和忧虑。

一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泛起及其特点

在近代中国，历史虚无主义是作为同“全盘西化”论相呼应而出现的一种错误思潮。持“全盘西化”论者往往对民族文化、历史遗产采取轻蔑、虚无的态度，表现为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首先提出“全盘西化”主张的陈序经就声称：“西洋文化无论在思想上，艺术上，政治上，教育上，宗教上，哲学上，文学上，都比中国的好。就是在衣、食、住、行的生活上，我们也不及西洋人的讲究。”他提出：“今后中国文化的出路，唯有努力去跑彻底西化的途径。”^①胡适同样主张以“西方化”作为中国文化的出路，而他的具体方案则是要求仿照“美国模式”。这种“全盘西化”论、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同文化复古主义一样，都不能正确反映近代中国文化发展的要求，是同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相违背的，因而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抵制和批判。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特

^① 《中国文化之出路》，载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63—364页。

别是人民革命的胜利，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得到极大增强，因而在一个长时期内，这种错误思潮受到了抑制。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在我们党拨乱反正、转入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历史虚无主义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开始在中国泛起。一些人以“反思历史”为名，歪曲“解放思想”的真意，从纠正“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走到“纠正”社会主义，认为我国不该过早地搞社会主义，而应该让资本主义充分地发展；从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走到全盘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从诋毁新中国的伟大成就，发展到否定中国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从丑化、妖魔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发展到贬损和否定近代中国一切进步的、革命的运动；从刻意渲染中国人的落后性，发展到否定五千年中华文明，等等。改革开放30多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时隐时现，但从未止息和退落，特别是每当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一贯的时候，它就会以极端的、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

应当看到，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泛起，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在低潮、西强东弱态势明显的形势下出现的一种历史现象。以苏东剧变为标志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急剧转入低潮，这不能不深刻地影响人们的思想走向。应当肯定，苏联解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综合的，但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中央推行一条自我否定、自我丑化的机会主义路线。它的发展有一个过程，而否定十月革命的道路、抹杀苏联社会主义的历史成就则起了先行的作用。前有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后有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新思维”，使得颠倒历史、混淆是非的种种歪理邪说大行其道。他们制造了所谓十月革命不如二月革命，二月革命不如斯托雷平改革，使革命不如改良、苏联不如沙俄、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谬说，甚嚣尘上。历史被糟蹋到如此地步，现实的社会制度也就失去了它的依据。这样，整个党和社会的理想信念就动摇了。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一路否定下去，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完全搞乱了。最后“城头变幻大王旗”只是一夜之间。这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层中叛徒集团自上而下掀起的一场否定苏共和苏联的革命历史的恶浪，导致人心涣散、信念破碎，最终使雄居世界的第二强国、为人类进步作出重大贡献的社会主义苏联毁于一旦。历史虚无主义在中国重新泛起，正是同这样的国际背景相关联的。

正是在这样的国际大背景下，有些人利用我国改革开放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要把中国引向适合西方需要的资本主义发展方向。他们在“反思历史”的名义下，利用我们党经历的曲折，任意夸大党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蓄意歪曲历史，制造思想混乱。改革开放以来，从北京“西单墙事件”到1989年的政治风波，以及这些年来出现的“告别革命”思潮，可以说都贯穿着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改革要求。其基本主张是：在经济上根本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要求全面彻底地实行私有化；在政治上鼓吹多元化，要求实行多党制、议会制；在意识形态上要求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很显然，这种改革观的实质，就是资本主义化，就是与国际反共势力的“和平演变”战略相呼应，并按照西方的模式和价值观，把中国纳入西方资本主义体系。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泛起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也带有自身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它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竭力贬损和否定革命，诋毁和嘲弄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诋毁和否定我国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取向及其伟大成就。而所谓“告别革命”论，既是这种思潮的集中表现，又是它不加隐讳的真实目的。在他们看来，革命只起破坏性作用，没有任何建设性意义。一些人拼命渲染革命的“弊病”和“祸害”，在一本名为《告别革命》的书中，对革命作了这样的描述：“革命容易使人发疯发狂，丧失理性”，“革命残忍、黑暗、肮脏的一面，我们注意得很不够”。“革命是一种能量的消耗，而改良则是一种能量积累。”“改良可能成功，革命则一定失败。”“中国在20世纪选择革命的方式，是令人叹息的百年疯狂与幼稚。”在反对所谓“激进主义”、推崇保守主义的名义下，否定革命，颂扬改良。他们把近代中国凡是追求变革进步的都斥为“激进”而加以否定，而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则被称为“稳健”而加以肯定，断言是“激进主义”祸害了中国，阻碍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他们否定近现代中国历史上农民运动的进步性，认为“每次农民革命都造成社会生产大规模的破坏”，“很难得出农民运动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这个普遍的结论”。继而，抬高洋务运动，贬低戊戌变法，抬高清廷的“新政”，贬抑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有些人则对近现代史下了这样的断语：“谭嗣同是近代激进主义的开头”，“现在看来，它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也相当大。这一效应影响到革命派，甚至可以说一直影响

到现在”。“辛亥革命是搞糟了，是激进主义思潮的结果。清朝的确是腐朽的王朝，但是这个形式存在仍有很大意义。宁可慢慢来，通过当时立宪派所主张的改良来逼着它迈上现代化和‘救亡’的道路；而一下子痛快地把它改掉，反而糟了，必然军阀混战。”正是经过这样的“重新评价”，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09年历史，因革命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并获得伟大成就的历史，就从根本上被否定了。这里也可以使我们看到，历史虚无主义把“重新评价”的重点放在近现代史的原因，就是为了否定革命，为了否定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

第二，它以“学术研究”的面目出现，在“重新评价”“重写历史”的名义下，作翻案文章，设置“理论陷阱”。他们有的是通过赤裸裸的谩骂、恶毒攻击的方式，来丑化和否定革命历史和革命领袖，相对地说，这比较容易被人们识破，因而他们更多地是在学术的幌子下，贩卖他们的私货。比如，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有的论者否定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生造了一个所谓“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提法，来取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科学判断。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学术问题，实际上这是一个“理论陷阱”。因为对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定位，是中国革命，包括孙中山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和同社会主义相联系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提，如果这个前提被否定了，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和进步性也就不存在了，有关近代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一系列结论也都要被改写，与此相关的重要历史人物的评价标准也就完全不同了。事实上这种提法，不但违背了判定社会形态的常识，否认“半殖民地半封建”是相互统一、不可分割的，是中国社会的二重性质交互作用的结果所决定的，而且把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科学判断看作产生“左”的错误的重要根源。在有的论者看来，近代中国应当用大力发展资本主义来取代“半封建”，而不应该采取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这样就把纠正“左”的错误变成了“纠正”社会主义。又如，历史虚无主义在糟蹋、歪曲历史的时候，却声称自己是在进行“理性的思考”，是要实现所谓“研究范式”的转换，似乎只要戴上这种理性的光环，他们就会名正言顺地占据史坛的话语权了。实际上，历史虚无主义同理性思考是完全背道而驰的。他们为了否定革命的正义性和必要性，就竭力美化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他们把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政党、领袖和革命的群众运动边缘化，甚至加以丑化，而对阻碍历史前进的反动势力及其代表人物则加以颂扬，把他们放到了历史舞台的

中心位置。这从根本上歪曲、颠倒历史的做法，是不折不扣的反理性思考。

第三，它有着明确的政治诉求。改革开放以来相继出现了危害社会的各式各样的错误思潮，如新自由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儒化中国思潮和普世价值观，等等，虽然它们主张各异，表现形式不同，但却有共同的政治诉求，这主要表现在：反对四项基本原则这一立国之本，力图扭转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发展方向，把中国纳入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中去。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则以它自身的特点来表达这一共同的政治诉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998年有学者为《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一书所写的序言，竭力否定近代中国特别是五四以来的爱国的、革命的传统，而把自由主义说成最好的、当今中国应当继承发扬的五四传统，并要求把它作为一种政治学说、经济思想和社会政治制度加以实现，这样才“会把一个自由的中国带入一个全球化的世界”。这就不加遮掩地把自由主义作为今天中国要加以实现的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制度提了出来。事实上，持自由主义传统论者有着明确的政治诉求。他们认为，这种自由主义，“曾有九十年是中国社会上的主流思潮之一”，只是“一九四九年后”，被“持续地、彻底地、大规模‘肃清’”了，现在的任务就是使之“在今天的中国复兴”，使“中国由此而开始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走向全球化”。后来此人又明确地说“全球化就是美国化”。明白无误地把矛头指向了人民革命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而他们所要求的自由主义，正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和全球化。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自由主义的说教，今天又加上了一层“普世价值”的包装，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清醒的认识。

二 历史虚无主义的主要表现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不仅表现在史学研究中，而且也表现在涉及历史和历史人物的某些文学、艺术和影视等领域的作品中，影响面大，危害至深。现就它的主要表现，作一点分析。

其一，颂扬改良，否定革命的历史进步性。这个问题前面已经谈到。现就其所谓“研究范式”转换，用“理论创新”的名义，来达到否定革命、颂扬改良的目的，作一些分析。所谓“范式转换”，就是用所谓的

“现代化史观”取代“革命史观”，把革命同现代化对立起来，借以否定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斗争。当然，从理论和实践上探讨中国现代化的源流、曲折和发展，不失为近代史研究的一种角度，但问题在于，持“现代化史观”论者往往是以否定争取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这一近代中国主旋律为前提的，这就从根本上违背了近代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首要的历史要求。正因为这样，经过上述历史“研究范式”的转换，现代化就成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唯一要求和唯一主题，而革命便成了破坏社会稳定、制造社会动荡、阻碍现代化的消极力量。事实上，革命绝不是同现代化相矛盾、相对立的，革命是现代化最重要、最强劲的推动力量；如果没有革命为现代化创造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这个前提条件，中国的现代化就永无实现之日。

这种所谓“研究范式”的转换，是违背近代中国历史事实的，是按照他们的主观愿望和政治诉求来剪裁历史的。这其实是他们设置的一种“理论陷阱”。正是在这样“研究范式”转换的基础上，和这种“现代化史观”相呼应的，就是有些学者所认为的，近代中国的主要问题，是“救亡压倒了启蒙”，所以现代化被耽误了。这成了他们诉说的革命的一大罪状，也是某些人鼓吹“告别革命”的一个主要依据。毫无疑问，救亡是近代中国的主题；救亡需要思想启蒙，而救亡本身也是一场具有极大威力的思想启蒙，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革命，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使中国人民觉醒并由此而组织起来，是前所未有的。这说明所谓“救亡压倒了启蒙”，只不过是某些人为了否定和反对革命而制造出来的一个伪命题。

其二，轻蔑黄土文明、颂扬海洋文明（蓝色文明），把西方的政治思想、政治制度、价值观念作为普世价值，反对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表现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规律性的现象，这就是历史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论仍然如同难兄难弟一样，二者如影随形。这里要指出，历史虚无主义必然导致民族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一些人不但歪曲近现代中国的历史，而且对我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中华源远流长的灿烂文化也恣意抹杀。在一些人的笔下，我们的民族不仅“愚昧”“丑陋”，而且充满“奴性”、安于现状、逃避现实，如此等等；而把中国优秀的文化和文化传统说成走向没落的“黄色文明”，要现代化只有乞灵于西方的“蓝色文明”。

其三，颂扬侵略有功，否定中国人民反侵略的救亡斗争。历史虚无主义的一些鼓吹者丧失了起码的民族良知，他们不但渲染民族失败主义情

绪，而且公开走上称颂帝国主义侵略，称颂殖民统治的道路上去。在他们看来，像琦善、李鸿章这样主张妥协投降的人物，是实事求是的、明智的，是负责任的态度，是真正的爱国，而主张抵抗的林则徐等人则成了不负责任的蛮干。颠倒是非到如此地步，连起码的爱国之心、民族大义，都化为乌有。这种不可思议的言论，要在过去将会被看作可耻的卖国言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而今天却成为某些人的“思想解放”的时髦话语。试举数例说明之。

有人说，鸦片战争后“资本主义终于打入了封建主义禁锢着的神圣天国”，是好事，应当“大恨其晚”，如果再早一点，“我们中国就远不是如此的面貌了”。还有文章说，“从根本意义上来说，是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近代文明”^①。

有人认为，无论是清王朝的抵抗，还是农民自发的三元里抗英斗争和义和团运动，“在形式上都是民族自己的斗争，而在实质上，都是站在维护本民族封建传统的保守立场上，对世界资本主义历史趋势进行本能的反抗，是以落后对先进，保守对进步，封建闭关自守孤立的传统对世界资本主义‘自由贸易’经济变革的抗拒”^②。

还有人认为，过去“只是更多地从‘侵略与反侵略’‘压迫与被压迫’‘奴役与被奴役’这个正义与非正义的道德立场出发去审视，因此，见到的只是血与火的悲惨场面，想到了爱国保家，维护的是独立与尊严，表现的是愤怒与声讨，最终便是对‘世界走向中国’这一历史做出消极的、片面的、情绪化的彻底否定”^③。

看了这些高论，真是“侵略有功，反抗有罪”了。连自己的脊梁骨都被抽掉了，还有什么民族气节可言？从这里不难看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实质究竟是什么。这使我们更深切理解邓小平的预言：如果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就只能成为某个大国的附庸。有那么一些人就是要心甘情愿地做别人的“附庸”，当“孙子”！这里还用得着一句老话：就是不能依了他们，若依了他们，就会亡党亡国。

其四，致力于做“翻案文章”，颠倒对历史人物功过是非的评价。历

① 郑炎：《打破束缚，更新观念》，《学术研究》1994年第4期。

② 周清泉：《中国近代史应当提到世界史的历史范围内研究》，《成都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

③ 胡波：《走向世界：中国近代历史不可忽视的主题》，《学术研究》1994年第4期。

史虚无主义对待历史的态度，有哗众取宠之心，无实事求是之意。一些人越过了学术研究应有的底线，却在“学术研究”的名义下，不尊重历史事实，片面引用史料，根据他们的政治诉求，任意打扮历史、假设历史，胡乱改变对近现代历史中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和重要问题的科学结论；有的则以“客观”“公正”的面貌出现，崇尚“坏人不坏”“好人不好”的模式，要求按照人性论的原则治史，否则就是“脸谱化”“扣帽子”；一些人还以“思想解放”“理论创新”的名义糟蹋、歪曲历史。在一定意义上说，他们确是一种“研究范式”的转换，不过是转换到旧史学中常常能够看到的，维护封建正统，蔑视人民群众的力量，为统治阶级辩护的老路上去。这绝不是什么“创新”，而是历史观上的复旧。公正地说，他们比旧史学还不如，因为他们不是研究历史，而是玩弄历史。正因为这样，已经被历史判明属于反动的一些历史人物，像慈禧、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这样一些人，都被描述成为有功于现代化的、忧国忧时的“悲剧英雄”，甚至成了“改革的先驱者”；而对林则徐、洪秀全、谭嗣同、孙中山则加以非难、贬低。

近年来，有的论者仅仅根据蒋介石个人的日记，就武断地得出“可以改写中国近代史”，说我们对国共两党的斗争，对中国革命历史的阐述，诸如把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说成是“大地主、大买办、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等等，都是根据“土匪史观”和“内战思维”得出的“荒唐、谬误的观点”，要求人们彻底摆脱这种“土匪史观”和“内战思维”，要“重写中国近代史”，声明“我的任务，找寻并告诉读者一个真实的蒋介石”。这就是说，我们史书上的蒋介石，人民群众所认识的蒋介石，都是不真实的，只有蒋介石日记中的蒋介石，才是真实的。这就自觉地站到了为蒋介石辩护的立场上去，这显然是很不严肃的，为一个正直的史学工作者所不取的轻浮的学风。当然，在历史研究中，个人的日记、信件和回忆录等，都是有价值的史料，是值得研究的。但同任何史料一样，都需要进行辨伪求真的考证，都要放到一定的历史背景下加以分析，特别是对于个人自己的言论，更要如此。中国是一个史学很发达的社会，而在史学研究中考据学又受到了高度重视，对史料采取什么态度，往往是对史学家史识、史德的一个评价标准。像蒋介石这样纵横捭阖于政治舞台，善于以权术消灭异己的人，又怎么能够把他自己的言论作为历史的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依据呢？如果历史可以这样来写的话，那么，从秦桧到李鸿章、袁世凯、汪

精卫，都可以被描绘成高大的爱国者形象。当下一些人做翻案文章不正是用这种手法吗？他们仅仅根据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了自己的隐私，就断定所记述的内容是真实的，就以此为根据来评判历史事件，而不必去考察全部历史事实，无须考察中国社会性质和阶级关系的特点，无须考察蒋介石国民党的全部政策及其社会后果，以为经过这样轻轻一笔，就可以抹杀中国革命斗争的性质，就可以为蒋介石“脱帽加冕”了。这是对极其严肃的史学研究工作的亵渎。

其五，否定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成就，竭力搞所谓的“非毛”“反毛”。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他的伟大的历史功绩、思想理论和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望，成为国内外反共势力企图西化、分化中国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因而诋毁、诬蔑、攻击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就成为历史虚无主义的“重中之重”。他们任意夸大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把毛泽东领导时期说得一无是处，企图以此打开缺口，全面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新近流行的一本论述经济改革的畅销书，其中涉及党的历史问题的论断，把改革开放前30年的历史说成是“1949年以后的多次政治运动和‘大跃进’使普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受难”，“是一种‘国将不国’的深重危机”^①，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荒谬论断。对此，我们要依照历史的本来面目，给予有力的回答。

三 要充分认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严重危害

应当说，历史虚无主义只是史学研究中的支流，但尽管是支流，我们也必须认真对待，因为持历史虚无主义态度的一些人，是有很强的现实目的性的，是按照他们对现实的要求，来“改造”历史的。这种错误思潮的流传和泛滥，会造成人们思想的混乱，甚至导致严重后果，这是值得我们高度警惕和重视的。

首先，历史虚无主义起到消解主流意识形态，搞乱人们思想的恶劣作用。历史虚无主义所散布的种种言论，不仅涉及史学领域的大是大非问题，而且还直接关系到做人立国的根本问题。这主要是：是维护历史本来

^① 吴敬琏、马国川：《重启改革议程》，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2页。

面目，还是歪曲历史真相；是高扬民族精神，还是鼓吹妥协投降；是从历史主流中吸取精神力量，还是在历史支流中寻找负面影响；是坚持唯物史观，还是回到唯心史观。如果这些原则问题被颠倒、被消解，就会从根本上搞乱人们的思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会失去自己的凝聚力和艰苦奋斗、发愤图强的精神动力，就会失去立足和发展的思想基础。

其次，历史虚无主义是从根本上动摇社会主义中国的立国之本和强国之路。这种思潮攻击的主要方向，就是竭力贬损和否定革命，诋毁和嘲弄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诋毁和否定我国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取向，而新中国的诞生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革命的产物，如果人民革命这个前提被否定了，社会主义制度也就失掉了存在的基础。在历史虚无主义者那里，把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说成“杀人食人”的历史，他们否定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散布社会主义失败论，颠倒是非、混淆视听，如果听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动摇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摧毁近代中国所苦苦追求的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伟大事业，陷国家于万劫不复的境地。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终极目的，就是要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把中国历史拉向倒退。这不但会摧毁社会主义中国的立国之本，而且也会在实际上使强国之路归于破灭。这是历史虚无主义和其他错误思潮相配合，对我们国家和民族将会造成的严重危害，我们对此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历史是一面镜子。从苏联解体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乱史灭国的轨迹，看到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所造成的严重危害。我们要认真记取这一沉痛的历史教训。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

（节选自《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年第10期）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 一个新特点

樊建新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是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国内出现的一种政治思潮。这种思潮否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形成的全部历史认识体系，否定中国人民的进步史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史，其突出表现是：主张“告别革命”，否定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革命；美化中国近代统治阶级，为近代中国统治阶级翻案；借中国共产党的错误而否定其全部历史；借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而否定毛泽东的一生；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错误和苏联模式的缺陷，全盘否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和苏联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等等。

在这股思潮泛滥的这些年里，虽然思潮的宣扬者们多表现为对我们党已有明确定论的一个个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结论进行颠覆性评价，但却很少聚焦于“历史虚无主义”这个概念，很少对“历史虚无主义”这个反映这股思潮实质和性质的总概括进行理论梳理和系统言说。然而，这股思潮在 2014 年出现了一种新的动向。

《炎黄春秋》杂志 2014 年第 5 期刊发了一组“历史虚无主义”笔谈，笔谈的三篇文章分别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来龙去脉》《要警惕什么样的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的实与虚》。笔谈从理论上“重新解释”了历史虚无主义的内涵，“系统梳理”了历史虚无主义的来龙去脉和表现。其核心观点是：把马克思主义称为历史虚无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认识体系称为教条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把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者称之为最大的历史虚无主义者。笔谈的一位作者说：“马克思的历史图式与基督教历史图式十分相似。他虽然肯定了资本主义的成就，但他最终还是以一个设想中的未来社会阶段把资本主义的历史否定了。资本主义无论取得了怎样的

成就也是异化的，它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组织与道德观念等等都将要被彻底抛弃。这显然脱离了启蒙的思想路线，陷入历史虚无主义。”“在这个理论体系中，它把一个不存在的、仅仅是想象中的共产主义作为评判事物的唯一标准，不仅否定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这个漫长的人类历史，也否定了现实世界中的文明榜样。”接着，他以苏共垮台、苏联解体为例分析了马克思主义这种“教条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在实践中“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他说，教条主义历史虚无主义“从一开始就与政治行动结合在一起，一开始就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而不是简单的学术倾向或认识偏差。由于这个原因，它的社会影响和后果也是任何其他的历史虚无主义所不能比拟的”，“它严重地扭曲了社会历史观，使人们不能对历史和现实作出恰当的理解和判断，从而构成改革开放和社会进步的巨大思想阻力”^①。另一位作者还说，在我国，那些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人具有某种“强力意志”，“但这种强力并非来自批判者本身，而是来自只允许一种声音存在的举国宣传体制的支撑”^②，等等。

上述笔谈的这种“重新解释”，“颠覆”了人们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明确界定，他们“超越”了对具体历史事实的选择性虚无，直接将马克思主义及其指导下的历史认识体系扣上“历史虚无主义”的帽子，欲图从“理论制高点上”夺取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旗帜和话语权，以彻底挣脱加在他们身上的这个“魔咒”。然而，事与愿违，这样做的结果使得这股思潮的政治实质更加显露。《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9期发表的《谁是真正的历史虚无主义者》一文，将笔谈作者的假面具撕得粉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宣扬者主动接过“历史虚无主义”的概念，将其反过来扣向他们的批评者的做法，是当前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一个新特点。它意味着我们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理论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摘自《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年第2期）

① 尹保云：《要警惕什么样的历史虚无主义》，《炎黄春秋》2014年第5期。

② 郭世佑：《历史虚无主义的实与虚》，《炎黄春秋》2014年第5期。

历史虚无主义重新泛起的透视

梅荣政 杨 军

一段时间以来，历史虚无主义在我国思想文化界重新泛起，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为什么历史虚无主义会在这个时期泛起，它有什么突出表现及特点，其错误何在？本文拟就这些问题做些分析，以供讨论。

一 历史虚无主义的突出表现及特点

社会思潮是社会意识的一种，是社会经济、政治状况的思想反映。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有共同的反马克思主义政治基础，这使它们具有相通性，在理论观点上能够相互转化和统一，在一定的形势下相互呼应。在这种转化和统一中，历史虚无主义的作用在于否定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直接质疑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选择和发展道路，质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与合理性，这更带有根本性质。它既弥补了新自由主义侧重于经济和政治领域、从现实的角度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而在文化领域、历史维度上的相对不足，又改变了新文化保守主义曲折隐晦的表达和难以对社会产生影响的尴尬，成为在意识形态领域攻击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一支重要力量。

重新泛起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竭力张扬自己的主张。集中起来说，就是四个观点：一是否定革命。否认 20 世纪中国发生革命的必然性，认为中国选择革命的方式实现社会变革，是疯狂和幼稚的表现，革命就是杀人流血，是一种单纯破坏的力量，其结果只是实现了“专制复辟”，没有任何建设性的意义。因此，应当“告别革命”，反对革命的一切后果。二是否定五四运动。认为五四运动造成了历史的断裂，即从所谓“以英美为师”的“近代文明的主流”走上了“以俄为师的歧路”，中国因此耽误了

60年的发展，“至少虚掷了三代人的血泪精华”。三是否定社会主义改造。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实质的问题是根本搞早、搞错了，阻滞、破坏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1978年之前3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只是一部荒唐史”。赞扬改革开放20多年的实践是对社会主义的否定和对“以英美为师”的“近代文明主流”的回归，把改革开放的历史与前30年的历史割裂和对立起来。四是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一系列错误的延续，影响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通过这四个观点，可见其要害在于否定四项基本原则。

这些观点散布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多个领域。比如，在史学界，历史虚无主义论者质疑并淡化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历史，认为唯物史观是机械的历史决定论，反对阶级斗争学说、社会形态学说、历史发展客观性理论等，主张用历史选择论取代唯物史观，以超然的客观主义态度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推崇和照搬国外史学流派的观点。在20世纪史学批评中，否定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的研究成果，否定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学术地位，妄言“中国史学无大师”。以学术创新为由，把创新当成简单的翻版，颠倒前人运用唯物史观得出的结论。如太平天国运动是“一个笑话”，“绝无进步的历史意义可言”。“辛亥革命搞糟了”，“完全是近代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革命志士鼓吹、争取的结果”，“给社会造成的破坏大于建设”。五四运动“把民族传统文化赖以生存的东西截断了，一切民族虚无主义，一切政治灾难都是从五四运动来的”。赞扬西方国家入侵是帮助中国发展，中法战争、抗日战争都没有什么必要。推断让清政府慢慢搞新政，中国今天也能实现现代化。在历史人物的评价上，褒扬曾国藩、李鸿章、慈禧、袁世凯、徐世昌等，同时贬抑洪秀全、孙中山等。

又如，在文学领域，某些描写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作品，漠视，甚至消解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变革的巨大作用；在近代历史剧的创作中，置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于不顾，把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归结为各种离奇因素，归结为个人的心血来潮；高扬所谓人性的大旗，对革命的暴力大肆讨伐；对先烈们为追求进步、独立、自由而艰苦奋斗的悲壮历程，以曲解的态度，用调侃、讥笑、揶揄的语言进行描写，对封建统治者和卖国贼却极尽美化之能事；在文艺评论中，对支持、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用作品反映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当代作家，如鲁迅、郭沫若、茅

盾、巴金、叶圣陶、丁玲，等等，进行贬损和否定，并宣告要与中国现代文学传统“断裂”，全盘否定五四以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的进步文学、革命文学。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上述种种表现，显示了它的以下特点：第一，在内容上，不是一般地全盘否定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而是否定某一阶段或几个阶段的历史，具体地说就是否定中国近代历史，特别是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取得民族独立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概括地讲，就是两个否定：否定中国革命的必然性，否定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步性；反对暴力革命，鼓吹改良，集过去历史虚无主义之大成，主张中国现代化以英美为师，全盘西化。第二，在方法上，一是以历史选择论为指导，以假设为前提，不对历史事实进行全面深入的了解，不认真分析历史事件展开过程的实际联系，把现象当本质，根据历史现象的表面特征进行主观臆想、推断历史的发展和可能的结局，新瓶装旧酒，得出所谓“新结论”；二是把支流当主流，以点概面、以偏概全，随意放大一些历史事实，以达到论者既定的目的。第三，在思维方式上，无论是在史学界还是文学界，对凡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所得出的结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取得的胜利和成绩，都统统发难，动辄全盘否定、要“断裂”，非此即彼，形而上学猖獗。第四，在表达方式和传播途径上，一是以学术研究的面貌出现，在学术刊物、研讨会上和学术著作中发表意见，以显示论者的观点是科学研究、理性思考的产物，是理论创新的成果；二是以文学、艺术作品特别是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等形式，利用电视、电影和网络等途径，影响社会舆论，诱使人们“重新认识”某段历史或某个人物。

历史虚无主义是在西方各种以唯心主义历史观为哲学基础的思潮的影响下，适应西方国家对我实施和平演变战略的政治需要和国内反社会主义势力的策略变化，重新泛起的一种政治思潮。它所反映的不仅是文化问题，更是政治问题，不仅是对待历史的态度问题，更是对待现实的态度问题；历史虚无主义在历史观上是唯心主义的。它脱离客观历史事实，以自己的主观价值尺度，尤其是政治的价值尺度对历史进行剪裁、重塑，背离了最起码的客观性标准，是典型的实用主义。

二 历史虚无主义的“历史选择论”的错误

“历史选择论”是历史虚无主义的基本观点。这种观点是同唯物史观根本对立的，是非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并不简单地、一概地否认历史选择，但是它强调历史选择是以历史决定论为前提的。

从唯物史观的观点看来，科学认识、研究历史的目的之一，就是探索历史真实。所谓历史真实，是历史本质的真实，历史规律性的真实，而不仅仅是历史事件、历史细节的真实。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立足于“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①通过探寻人类社会“现实的联系”，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并把它当作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到生产力的高度，这样推翻了他们之前的所有的思想家把历史看作是某种观念的逐渐实现的观点，把唯心主义从它最后的避难所——历史观驱逐出去，创立了唯物史观。“现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作人类的发展过程，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②它是指导我们获得对于历史真实正确认识的唯一科学的理论指南。

唯物史观认为，历史本质上是人类社会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③。社会生产活动的客观性决定了历史的本质是客观的，这一客观性本质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历史是由人类自身创造出来的发展过程，是人类已经发生的活动。人类这种创造活动一旦产生，就是既成的客观事实。因此，尊重客观事实，是人们认识、把握历史的必要的基本前提和科学态度。对待历史，只能实事求是，而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或根据后人所处的时代环境去修改、裁剪、编造，也不能对它进行假设、推理，以期产生另外的历史结果。以假设为前提，对历史进行主观臆断，既不符合历史研究的思维逻辑，对探求历史真实也毫无意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5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9页。

义。第二，历史发展遵循一定的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正确认识历史运动，首先应将人类社会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历史以近乎自然的方式发展着，具有自然性特征，即历史的进化像自然的进化一样，有其内在规律。这些规律是“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①。历史发展必然遵循一定的客观规律，这是由人类创造历史的客观物质基础决定的。马克思指出，生产物质生活本身是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依赖一定的生产力和结成相应关系进行满足其生存需要的物质资料生产、开始对历史的创造，其他一切活动都起源于并最终依赖于这个创造的存在和继续。

当然，唯物史观仅是在相似性的意义上肯定历史发展的自然性特征，它在强调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同时，也强调了历史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历史是人的历史，历史发展的规律不是外在于人类而存在的自在之物，它形成、存在并实现于人的活动之中，表现为一种最终决定人类行为结局的力量，本质上是“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②。离开了人类社会，离开了人的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社会规律就不可能存在并发挥作用，社会规律所揭示的历史必然性也就无法实现。这是历史规律区别于自然规律的特殊性。因此，历史发展具有不能独立于人和人的活动之外的主体性特征。由于人是受到需要和利益的驱使，带着一定的观念和目的进行活动的，所以，社会历史领域“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③。在历史活动中，人们既是剧作者，也是剧中人。

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与作为历史主体的能动性是有机结合的。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与人们的自觉能动活动二者之间具有统一性。一方面，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目的为转移，决定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并决定着人们的意志、目的。另一方面，人们的自觉实践活动本身存在于客观规律之中，不能超越客观规律的制约。但人在社会历史进程中能动地发生重要作用，能够认识、运用和驾驭历史规律。既坚持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决定性作用，又肯定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能动作用，这正是唯物史观科学之所在，也是马克思主义与机械决定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7页。

论、宿命论和主观唯心主义的根本差别。

历史虚无主义者以历史选择论来研究近现代历史，是无法把握历史真实的。的确，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由于种种客观、主观条件不同，往往存在着多种可能性，人作为历史的主体，当然有选择的权力。但是，不同的选择会导致不同的结果。那么，什么样的选择才是正确的、能够达到主体的目的呢？这正如列宁所说：“在什么条件下可以保证这种活动获得成功？有什么保证能使这种活动不致成为孤立的行动而沉没在相反行动的汪洋大海里？”^①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人们要想自己的愿望成为现实，获得希望的结果，首先必须使自己的愿望符合历史发展规律，所做的选择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要求。这样的选择，不是取决于主体的意识和意志，而是取决于社会物质条件，取决于客观社会现实。历史活动的主体只有从客观社会现实出发，做出合乎客观规律的选择，才能最终实现自己的目的。相反，不符合历史发展客观规律要求的选择，即使在个别历史时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或改变历史的进程，但最终必将被历史的必然性所抛弃。因此，所谓选择，绝不是纯粹的主观行为，它不能脱离历史必然性和客观现实条件的制约。历史选择论存在的合理性仅在于它蕴含于历史必然性之中。没有历史必然性，历史选择论就没有其存在的基础，历史必然性是历史选择论的理论前提。如果仅仅用历史选择论来分析、认识历史，只看到历史主体以一定的方式进行历史活动，无视历史活动背后的客观规律的决定性作用，必然陷入主观唯心主义的泥潭。历史虚无主义者随心所欲地“选择”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进程和面貌，其根源正在于此。这种违背历史真实的“选择”终将被历史抛弃。

三 中国近现代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真实历程

与历史虚无主义者对中国近现代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的描绘截然不同，马克思主义者运用唯物史观，科学认识中国近现代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清楚地看到历史的真实图景。

1. 近现代中国历史的主旋律是革命，这是历史的选择。

^①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页。

近代以来，中国农民选择了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派选择了革命，无产阶级选择了革命，这不是洪秀全、孙中山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心血来潮、鼓吹煽动和随意选择。恩格斯曾指出：“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那种迷信的时代，是早已过去了。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任何地方发生革命动荡，其背后必然有某种社会要求，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①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构成了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这些矛盾的斗争及其尖锐化，就不能不造成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伟大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之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②。同时，中国“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③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和残酷的社会现实，决定了革命是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状况下的必然选择。许多中国革命的先驱者曾设想用温和的改良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孙中山早年上书李鸿章建议变法，李大钊一度认为人们对北洋政府统治下的民国应取补台的态度，毛泽东在五四运动中曾主张“无血革命”“呼声革命”，而残酷的现实击碎了他们善良的愿望，迫使他们认识到，不革命，中国就没有出路，社会就不能进步，于是他们毅然举起了革命的大旗。

2. 近代中国的社会现实不仅决定了解决中国出路的手段，而且还决定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

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用事实说明，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相勾结，组成强大反革命势力的旧中国，农民革命是不能成功的。辛亥革命胜利后建立了中华民国，孙中山颁布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临时约法，随后开国会、兴政党、建内阁，但最终被北洋军阀弄得面目全非。抗战胜利前后，资产阶级中间派再度活跃，他们纷纷组党，发表政见，希望中国走国共两党以外的第三条道路，建立英美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但也遭到了彻底的失败。1947年10月，国民党宣布民主党派中最大的组织民盟为“非法组织”，民盟总部被迫“自行解散”，各民主党派也不得不转入地下活动。这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1页。

③ 同上书，第542页。

就宣告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的破产，也说明在强大的反动势力面前，先天软弱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能为中国争得资本主义的前途。而五四运动后，十月革命炮火把马克思主义送到中国。“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① 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领导人民经过 28 年的艰苦奋斗，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终于获得了推动现代化、走向国强民富的最重要的前提——民族独立。这难道不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最大的进步吗？这个伟大进步的取得，充分说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符合中国近代国情的，也是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

3. 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实现现代化、走向繁荣富强的唯一道路。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一切必要的经济政治条件。“当时中国有了先进的无产阶级的政党，有了初步的资本主义经济，加上国际条件，所以在一个很不发达的中国能搞社会主义。”^② 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本身的脆弱，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经济将不能摆脱像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那样对外国资本的依赖，这就是邓小平所指出的，“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③。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就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事实证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中国的现代化进入迅速发展阶段。在改革开放前的 30 年里，虽然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过种种失误，包括“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那样大的失误，但主流是好的。我国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经济发展相当快。从 1953 年到 1978 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率为 8.2%。其中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率为 11.4%，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 2.7%，并在教育、社会福利和人民健康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对此，邓小平在 1981 年总结说：“国际、国内都把这三十一年的成

①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471 页。

② 《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7 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11 页。

绩估计低了。总的说来，三十一年，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情，成绩不少，虽然也犯了一些错误，但不是一片漆黑。”^① 美国最权威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赞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仅用30多年时间，就将一个人口庞大、起点很低、混乱贫穷的中国引领向工业化。他还说，在这现代化过程中，中国不仅几乎无外援，反而还对外援助70多亿美元。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与日本的池田大作谈论中国时认为，在所有追求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中，共产党中国成效卓越。汤因比为此分析说：共产党中国具有很高的组织才能，他们将广大领土上庞大的人有效地动员起来，为追赶现代化而进行了一场“急行军”。“急行军”要有严厉的纪律，从思想到行动都不允许掉队，而共产主义思想恰能提供这种作用。这些评价表明，一些不带偏见、具有远见卓识的资产阶级学者不仅不否认，而且充分肯定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这无疑是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进步性与合理性的佐证。

4. 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本质和主流是推动社会发展，谋求人民幸福。

中国共产党是在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逐步走向成熟的党。历史上，由于党自身思想理论和组织建设处于成长阶段，也由于国际国内环境的复杂、斗争形势的险恶，还由于事物的矛盾及对它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党在认识社会矛盾和阶级关系、确定战略方针、实施政策措施等等方面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有时甚至是全局性的问题。但是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以来，就以追求民族的独立、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为己任，不谋求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以外的利益，所以它总能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不断完善自己。即使犯了错误，也能勇敢地面对、自觉地加以纠正。要求一个政党从诞生以来，就没有任何过失，不犯任何错误，显然是唯心主义的。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为中华民族争得的独立和统一，领导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巨大成就，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华民族的复兴，就没有中国人民的幸福。这正是事物的本质。对于党犯过的错误、经历的曲折，在科学的研究中当然不能回避，但是不能因此掩盖和否定党的历史本质和主流。

邓小平曾指出：“已经客观存在着的历史，除了不断地加深对于它的

^① 《邓小平年谱》（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07页。

认识、理解之外，是谁也改变不了的。”^① 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是真实的客观存在，中国革命的必然性，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步性源于历史固有规律的作用，源于人民群众的创造，不是可以在“假设”中更改的，也不是可以信口雌黄、妄加评说的。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节选自《马克思主义研究》2005年第5期）

^① 《邓小平年谱》（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14页。

历史虚无主义是政治思潮

王 广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教科书必须呈现真实的历史。然而，近些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正在学界和社会各界蔓延泛滥。这股思潮辱先烈、骂英雄，攻党史、咒国是，去本质、反规律，为卖国贼、反动派涂脂抹粉，对洋大人、民国范儿歌功颂德，在大是大非问题上颠倒黑白，在涉及党和国家根本的重大问题上混淆视听，严重干扰了人民群众的历史认知。

从根本上看，历史虚无主义抱有明确的政治意图，反对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本质上是一种反动的政治思潮。尽管历史虚无主义打着学术的，尤其是历史学的旗号，但在研究方法上是根本错误和极其混乱的，它不是任何一种学术思潮，而是伪科学。当前，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同历史虚无主义进行坚决彻底的斗争，深刻揭露其错误和荒谬。

第一，历史虚无主义有明确的政治目的，本质上是一种政治思潮。

对一种事物的认识，要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把握其本质特征。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为了博取关注，不断变换手法、翻新花样，但不管其形态如何变化，都指向一种共同的政治意图。这就决定了历史虚无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政治思潮。历史虚无主义政治目的的要 points 有二。

一是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历史虚无主义惯用的手法就是，借助一些精心挑选的历史细节来篡改历史，尤其是狂妄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国革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其目的在于否定中国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合法性，从而达到推翻共产党领导的目的。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直到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进程，几乎在每一段历史中都有历史虚无主义挑选甚至伪造历史细节的表演。这些精心

设置的陷阱虽然打着学术的，尤其是历史学的旗号，但在所谓“获取了新资料”“还原历史真相”“重评历史”的外衣下，都掩盖着一个隐秘的、深层的逻辑，这就是抹黑共产党，尤其是诋毁党的领袖，借此取消党的领导。除此以外，历史虚无主义还极力为慈禧太后、李鸿章、袁世凯、汪精卫等反动派、卖国贼、汉奸洗地，以“重新评价历史人物”为名漂白他们的历史。历史虚无主义或攻或捧，看似为二，其实质一也，说到底就是互为表里，妄图推翻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

二是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历史虚无主义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发动意识形态攻势和“颜色革命”的桥头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从来没有放弃西化、分化我国的战略目的，军事进攻无法奏效，转而寻求“和平演变”，妄图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颠覆社会主义制度。事实上，这一图谋在苏联解体中已经得手。苏联解体之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目标转向中国，一方面，大肆传播西方资产阶级的“宪政民主”、经济模式、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宣扬“资本主义制度优越”，另一方面，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和现实进行各种丑化、矮化、妖魔化，把任何问题都拔高到制度层面，以实现搞垮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这是一条规律。正基于此，历史虚无主义与新自由主义、西方“宪政民主”论、“普世价值”等错误思潮互相勾连，各有侧重，试图共同实现瓦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图谋。

看清了这两个要点，就不难把握历史虚无主义的本质。毛泽东同志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历史虚无主义正是站在反革命的阶级立场上，在“造成舆论”，“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因此，历史虚无主义绝非单纯的学术讨论，而是一种政治思潮，企图从根本上颠覆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改变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

第二，历史虚无主义尽管打着学术旗号，尤其是历史学旗号，但不是学术思潮。

做学问讲求“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学术流派和学术思潮是推动学术进步的题中应有之义。然而，历史虚无主义在研究方法上是根本错误的，其所得出的结论也是荒谬的，它同历史科学根本对立，绝不是任何一种意义上的学术思潮，而是伪科学。

习近平总书记在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中指出，历史

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真正的历史研究，是实证科学，靠证据和事实说话，讲求言必有据、言必有证，不尚空谈。这种证据和事实绝不是出于某种目的而刻意挑选出来的，而是来源于对历史的整体把握和高度的理论概括，是为了从历史中发现规律，把握本质，启迪未来。真正科学的历史研究，离不开三个眼光：一是长时段的眼光。观察问题，不能局限于一时一事，不能基于个别时段的历史现象轻率作出长时段的历史结论，要坚持将研究对象置于较长的历史时期冷静观察、深入分析。二是全面的眼光。不能见孤木以为森林，不能用局部的考察代替整体的把握，更不能用个别案例的结论代替对全局的认识。三是发展的眼光。不能把研究对象静止化，要善于从纷繁变幻的社会现象中探索变化原因、发现变化规律、把握变化本质。历史研究要成为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它本身必须是科学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

而历史虚无主义刚好与此相反，它出于否定党的领导、否定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别有用心政治目的，用精心挑选的历史碎片歪曲、篡改和伪造历史，不但背叛了历史学的科学精神、科学原则，而且误导民众、毒害社会。从整体看，历史虚无主义妄图通过否定中华五千年的历史优秀文化，否定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传统；通过否定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否定共产党执政的历史合法性；通过否定新中国成立以来取得的伟大成就，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现实合法性、理论和实践的合法性。由于研究意图的扭曲和研究方法的错误，历史虚无主义也就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不遵循学术规范，肆意歪曲历史事实，否认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以戏说恶搞的方式解构历史，鼓吹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成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典型特征。因此，无论从研究的方法、原则来看，还是从研究的初衷、结论来看，历史虚无主义都是与历史科学根本对立的，是彻头彻尾的伪科学。

市场上的小贩，叫卖声越高，越有可能兜售的是假货。历史虚无主义不管如何标榜自己是学术，不管怎样拼命往脸上贴金，都上不了学术的台面，登不上学术的大雅之堂。

第三，我们和历史虚无主义的分歧，本质上是政治分歧，是中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分歧。

包括历史科学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学术同历史虚无主义的分歧，不是一

般学术层面上的争鸣商榷，本质上是政治分歧，是中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重大政治分歧。

在发展道路问题上，必须坚持历史的联系论和发展论观点，不能割裂历史。对于中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这一根本问题，历史早已作出了结论，这就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历史的道路充满艰辛曲折，但历史所展示的真理却是清晰的，所呈现的规律也是客观的。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矢志不移地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百折不挠地追寻实现民族复兴的梦想。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完成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各项历史任务而奋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承载着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和探索，寄托着无数仁人志士的意愿和期盼，凝聚着千千万万革命先烈的奋斗和牺牲，凝聚着全国各族人民的奋斗和实践，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在今后的前进道路上，必须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学术的政治信仰，也是时代赋予马克思主义学术的政治使命。

旗帜关乎人心向背，道路关乎党的生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然而，正是在这一根本问题上，历史虚无主义毫不犹豫地背叛了历史，否定历史规律，诋毁历史评价，篡改历史结论。历史虚无主义所希图的，恰恰是中国被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西化、分化、同化，让偌大的中国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和国际垄断资本的利益场与享乐园。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把一切都变成商品，对历史学也是如此。资产阶级的本性，它生存的条件，就是要伪造一切商品，因而也要伪造历史。伪造得最符合于资产阶级利益的历史著作，所获得的报酬也最多。历史虚无主义正是在按照资产阶级的利益伪造历史，并在这种伪造中获得“报酬”。

马克思主义学术与历史虚无主义的分歧是不可调和的，“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必须与历史虚无主义展开长期、坚决、彻底的斗争。反对历史虚无主义，需要锻造好我们自己的武器。这个武器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唯物史观是人类正确认识社会及其历史发展的唯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指引史学研究和其他学术研究的可靠指南。当前，我们必须以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信念和理论斗争精

神，旗帜鲜明地同历史虚无主义挥剑战斗，以振聋发聩的声音续写马克思主义学术的当代篇章。

历史是一面镜子，从中可以发现过去，映照现在，启迪未来。然而，历史虚无主义却是一面扭曲的镜子，从中只能看到其荒谬的历史观、错误的方法论和险恶的政治目的。对于这样一面“魔镜”，结论只能是彻底打碎。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研究室）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0月22日）

理清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 三条主线

刘书林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已经成为扭曲和破坏人们科学历史观的重要因素。揭露和分析这股思潮的表现和本质，应是有关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综观它在中国的表演，可以梳理出其三条主线。

第一，反对和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革命，甚至反对和否定近代以来的一切革命。

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大众的眼里，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历史，就其主流和本质来说，是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人民群众和仁人志士为救亡图存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是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伟大而艰苦的斗争，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是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把一个极度贫弱的旧中国逐步变成一个初步繁荣昌盛、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但是在历史虚无主义者的眼里，这种历史全被颠倒了。他们以西方资产阶级和社会党的世界观、方法论为圭臬，以颠覆性的政治疯狂为动力，提出否定革命、“告别革命”的主张，认为革命只起破坏性作用，没有任何建设性意义。他们批评所谓“救亡压倒了启蒙”，否定五四爱国运动。他们甚至抛出了奇怪的逻辑：“挖掘”慈禧太后、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胡适等人的所谓进步意义，颠倒黑白，为之翻案、贴金，甚至把他们奉为英雄豪杰。相反，对林则徐的爱国行动、洪秀全的革命、康梁变法、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毛泽东的伟大历史地位、鲁迅的神圣地位，大加否定，说他们带来了今日所说的“错误”。有的文章说，如果没有康梁的维新变法和孙中山的革命，“中国早就实现现代化了”。有人甚至主张把毛泽东、鲁迅的著作，从中学语文

课本中清除出去，换上胡适、周作人的文章。更有甚者，有人根据藏在美国胡佛研究所的蒋介石日记，虽然不敢抹杀蒋介石的流氓行为，但要“还一个真实的蒋介石”，吹捧蒋介石，妄图重新写中国近现代史。在某些历史虚无主义者的眼里，推动历史进步的人民大众及其领袖人物，浑身充满了错误和罪过，应该被打倒；昔日革命对象的身上倒是具有值得挖掘的闪光的东西。

美国杜克大学德里克教授曾对美国汉学家的政治“转向”做了这样的描述：“先前一直被描述为解放史诗的革命史，现在却变成了衰落与失败的故事”，“革命带来的可能并不仅仅是失败，它还可能打断了清末以前一直在进行的朝着现代化方向的发展过程”，“革命使潜存于中国文化中的恶劣习性与态度泛滥成灾”，“中国如果没有革命，其境况会较好些”。看来，中国国内的历史虚无主义，还有点西洋“舶来品”的嫌疑。

这些历史虚无主义的表演虽然引起了极大思想混乱，但人们对这些荒诞的东西还是比较好辨别；危险的是个别党员、干部及其掌握的报刊，也跟着起哄，甚至为这种思潮推波助澜、提供各种条件，极大地增加了这种思潮的危害性。

第二，反对和否定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的一切建设的实践和成就。

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大众的眼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无论是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还是后三十年，都是走向辉煌的实践探索。这段历史虽然不是一条直线，出现过曲折和失误，但是比起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曲折和动荡，简直算不了什么。经过短短几十年的发展，到今天，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新中国已经看到了更加光明的现代化强国前景，激发了全国人民的中国梦，在全世界看来也是“风景这边独好”。

但是在历史虚无主义者的眼里，这种历史全被否定了。他们否定指导新中国实践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个别人甚至把他们都打成所谓“极左教条”，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从根本上就错了”。有的宣称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没有资格搞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以后搞的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什么“民粹主义”。他们还采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手法，歪曲和丑化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无视它的本质和主流，硬是把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说成是一系列错误的延续。他们利用我们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契机，以批判“文化大革命”为名，把党和新中国的历史说成是一系列“左”的

错误叠加和延续的历史，并借此不断扩大否定新中国历史的范围。他们把发生在新中国历史上的个别事件加以丑化，罗列起来，以个别事件和“细节”，否定历史进步的洪流，以某些个人的所谓“口述”和“回忆”，推翻人民翻身得解放的伟大历史变革，等等，不一而足。

在这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潮泛滥下，中国共产党人在历史上获得的执政合法性与合理性，就受到了极大的威胁和挑战。

第三，反对和否定共产党的领袖和代表人物。

苏联解体之前，苏联的历史虚无主义者为了掩人耳目，曾经把攻击的矛头集中对准斯大林，宣扬“批判坏的斯大林是为了保护好的列宁”。然而，随着背叛浪潮的高涨，很快就从否定斯大林转向了全面否定列宁。在批判斯大林的浪潮中，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矛头很快转向了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民主纲领派”的头目阿法纳西耶夫宣扬：“斯大林主义的实质在于列宁主义。”苏联发生过的教训，值得警惕。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企图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他们通过否定毛泽东，试图达到否定新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否定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目的。在极端的历史虚无主义者眼里，对毛泽东的评价是“功高盖世、罪恶滔天”。他们虽然不得不承认毛泽东在历史的主流、主线、主题方面具有“功高盖世”的地位，但即使这样，他们还是要抓住他的一些错误，破口大骂其“罪恶滔天”。这是目前最极端的历史虚无主义的言辞，反映了他们在历史评价方面的精神分裂症。

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说过：“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这些话有力地说明了能否科学评价历史关乎国家治乱兴亡的道理，可以帮助认清历史虚无主义的本质。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高校德育研究中心）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5月23日）

历史虚无主义“重写历史” 有何诉求？

——访北京大学教授梁柱

耿 雪

每每谈及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人们往往认为这是过于理论性的话题。而实际上，这一思潮不只存在于史学研究之中，它更以不同形式存在于我们生活所及的诸多领域。历史虚无主义早已算不上是新鲜事物，今天这一思潮时常装扮成一位粉墨登场的“真相帝”，挥舞着所谓“揭秘”的笔触，描绘出一幅幅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试图博取眼球、引发轰动效应。

时下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有哪些新的表现形式？这一思潮又会带来怎样的危害？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教授梁柱就相关问题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一 为何“翻案”“重评”之风大行其道？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来很多学者都关注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泛滥的问题。实际上，历史虚无主义不是今天才有的思潮，在旧中国就有过。当下，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有哪些新的表现形式？

梁柱：我看过一幅画，画中表现的是毛泽东和饥饿的人群在一起。饥饿的人群被铁笼圈起来，像在监狱里面一样。有些人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抹黑毛泽东时代的新中国历史。利用我们工作中的失误，将之加以无限夸大、丑化，这就是当前历史虚无主义的具体表现。

事实上，历史虚无主义在不同时期的表现有很大不同。旧中国时期，它主要表现为对民族文化采取轻蔑、否定的态度，认为中国什么都不如西

方。历史虚无主义在当前的表现形式可谓多种多样，它更多地集中在史学领域，而影视、小说、美术等领域也或多或少受其影响。可以说，但凡我们肯定的历史，它就统统颠覆。

例如，当前“翻案”“重评”之风大行其道。有人提起抗战，认为只有国民党在抗战，而共产党在平型关战役中只歼灭日军53人，这些数字是他到日本靖国神社里面数出来的，以所谓的真实细节来否定敌后战场的存在及其重大作用。还有学者在美国看到了蒋介石日记，就认为可以据此认识一个真实的蒋介石，甚至据此可以重写中国近代史。我们知道，个人日记、信件、回忆录虽然是历史研究很好的资料，但这些主观资料能否作为史料使用，还需要结合整个历史背景、其他史料来证实。这位学者认为蒋介石在日记中说了很多不光彩的事情，就可以证明日记所载内容是真实的、不公开的。但当年蒋介石因中山舰事件受到指责时说，你们二十年后看我的日记好了。这表示他的日记是给别人看的。如果仅仅通过日记就推翻他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的结论，就改写整个中国近代史，那么这不是严肃的历史研究方法。汪精卫投降日本后，曾在诗中哭天抹泪表示忧国，这能说明他爱国吗？这样的研究连唯心主义的旧史学都不如，旧史学至少是以史料为依据的严肃研究。

再比如，有学者说，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对外国入侵的一切抵抗都是用落后的、保守的、情绪化的东西来抗拒世界文明，中国不应该抗拒，既然落后就应该欢迎人家来侵略。还有人认为，近代以来中国只有一个要求——现代化，而现代化的要求被革命压倒了。这些观点很有迷惑性。实际上，近代中国有两大要求：一是民族独立，二是民族富强。现代化只是近代中国的历史要求之一，而在民族和阶级的压迫下，不通过革命实现解放、解决制度问题，不实现民族独立，现代化是没有办法实现的。西方侵略我们的同时，的确带来了现代技术，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有没有因此把中国带上现代化道路呢？完全没有！所以我们首先要实现的是民族独立，没有民族独立就不可能有现代化，国家也就不可能富强，这都是基本常识。诸如此类颂扬侵略有功，否定中国人民反侵略救亡斗争的论调，也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一种表现。

对毛泽东的诬蔑、抹黑和歪曲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一个重点。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开国领袖，特别是像毛泽东这样的民族英雄遭到如此的谩骂、诬蔑、抹黑。有人甚至诬蔑说《毛泽东选集》中仅有12篇文章是毛泽东自

己写的，其他都是别人代写的。毛泽东所作的诗词也都是胡乔木改的。这些是不是事实呢？当然不是，有档案文件为证。现在胡乔木的女儿有机会就声明，说我爸爸怎么能写出毛泽东那样的诗词，相反，我爸爸的诗词有些还是请毛泽东改的。

我们不能把史学理论和史学观点上的错误都说成历史虚无主义。学术问题可以讨论，但其中有些人背离学术研究的严肃性，而带有明确的政治目的，这一点必须警惕。

二 “好人不好，坏人不坏”，抽象人性论背后的诉求是什么？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们讲热爱祖国，历史虚无主义者诘难“这是谁的土地”；我们弘扬中华民族优良品德，历史虚无主义者讲中华民族的“劣根性”；我们感怀革命烈士流血牺牲，历史虚无主义者讲这是“被忽悠死的炮灰”……这些对立观点背后深层的分歧是什么？

梁柱：这些认识上的分歧其实是价值观的分歧。价值观对立的背后是不同的利益在起作用，更是一种同利益相关的政治诉求在起作用，这就是历史虚无主义背后强烈的现实目的。

利益关系决定政治诉求。旧中国，广东地主和黑龙江地主对一件事情的看法几乎是一样的；现在，福建工人和湖北工人对一件事的观点也几乎是一样的，其原因就是相同的经济利益必然产生相似的观点。这就是客观存在的阶级立场所决定的。现在有人以抽象的人性论代替阶级论，认为“好人不好，坏人不坏”，试图掩盖他们为旧事物辩护的错误立场。这种观点虽然迷惑性很大，但只要稍加分析就可以看到，在背后起作用的还是与经济利益相关的政治诉求。

正如邓小平曾经说过的，“他们想要走另一条道路”。这些人的改革是资本主义改革，他们的现代化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而我们坚持的是社会主义方向、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制度。新中国是革命的产物，是革命最大的成果。所以他们首先要否定革命，就是为了否定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依据，否定今天的现实。

《中国社会科学报》：这些历史虚无主义的观点对青年、民族、国家和未来有哪些负面影响？

梁柱：在中国共产党拨乱反正、将工作重心转入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一些人以“反思历史”为名，歪曲“解放思想”的真意，从纠正“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走到“纠正”社会主义；从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走到全盘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从诋毁新中国的伟大成就，发展到否定中国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从丑化、妖魔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发展到贬损和否定近代中国一切进步的、革命的运动；从刻意渲染中国人的落后性，发展到否定五千年中华文明，等等。

如果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这些观点，就会开始怀疑历史，进而怀疑现实，就会削弱民族认同，产生对党、对社会主义制度的隔膜。思想乱了，理想信念失掉了，高尚的追求没有了，整个民族就会变得疯狂、可怕和危险。

历史虚无主义所散布的种种言论，不仅涉及学术领域的是非，更关系到立党立国的根本立场。我们是要维护历史的本来面目，还是歪曲历史真相？是高扬民族精神，还是鼓吹妥协投降？是从历史主流中汲取精神力量，还是在历史支流中寻找负面影响？是坚持唯物史观，还是回到唯心史观？如果这些原则问题被颠倒、被消解，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会失去立足和发展的思想基础。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历史被否定、被抹杀，也就失去了现实存在的立足点。苏联解体的惨痛历史教训值得我们认真吸取。

“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历史虚无主义虽然是社会思潮的支流，但必须认真对待。这种持历史虚无主义观点的人，从根本上讲是要搞乱人心，妄图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需要我们高度警惕和认真对待。

三 新中国带给人民的是福利，不是灾难

《中国社会科学报》：面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我们应当如何回应？

梁柱：首先，学术问题允许讨论、允许观点不同。在历史研究中，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不同，这是正常的。真正的、严肃的学术研究，允许犯错误。但诸如“中国如果做三百年殖民地，中国就现代化了”之类的看法不是学术研究。这种带有目的、随意编造历史、歪曲历史的“研究”和科学的学术研究背道而驰。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要敢于坚持真理，通过严肃

的学术研究，有针对性地对历史虚无主义观点逐条进行批驳。

其次，在认识层面，要坚持正确的评价标准。历史虚无主义者以一些材料为依据，来否定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否定新中国前30年的成就。我们有过“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失误，但是能不能从中得出新中国的建设，特别是毛泽东时代的建设，带给人民的是灾难而不是福利，带给国家的是落后而不是进步？当然不能。

如何认识这些问题，就涉及评价标准的问题。判断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政策的效果应该坚持统一的标准。这个标准是什么？我认为有三点：看它能不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看它能不能够促进社会进步，看它能不能够给人民带来幸福安康。我觉得，这些是很具体的标准，对哪个制度、哪个社会、哪个国家都适用。

不能评价毛泽东时代用一个标准，评价改革开放用另一个标准；不能评价封建社会用一个标准，评价社会主义的社会政策又是一个标准。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从总体上说带给人民的是福利，而不是灾难。我们有严重失误，这是总结经验的问题。我们对这些问题要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和定位。

陈云曾说过：“三年恢复，赶上蒋介石二十二年。”记得1964年我们国家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远在美国的原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对友人感慨：我们不能不服气，我们搞了20多年连一辆像样的单车（自行车）都造不出来，不能不服气呀！再比如，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我们是在经历20年的战争后，在短短3年时间内，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大多数超过新中国成立前最高年份（1936年），创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医治长期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和社会稳定的一个奇迹。1953—1978年，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8.2%，其中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11.4%，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2.7%。这个增长速度不但是旧中国无法比拟的，而且与当时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也是不低的。这期间我们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填补了我国工业的许多空白，工业布局有了明显改善，内地和边疆地区都建起了不同规模的现代工业和现代交通运输业，基本上改变了旧中国工业畸形发展的局面；农田建设效果明显，其间依靠农村集体力量修建了84000多座水库，至今仍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灌溉、发电、拦洪等方面的重要作用；科学技术水平有了明显提高，现已进入世界先进行列的我国航天技术就是从1956年起步的……这些成

就都为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是任何人都否定不了的历史事实。

再次，教育部门和实际宣传部门应该做好工作。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最有生命力，要掌握其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践相结合，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教条。当前，我们在思想教育中还存在过于简单、太枯燥的情况。在宣传教育中，应该注意坚持“双百”方针，摆事实、讲道理。只要你掌握真理，又会表达，那么真理就一定能说服人。如果能够讲得既有气势又有例子，效果就会好很多。

最后，共产党要把自己的党管理好。有些抹黑共产党、诋毁共产主义的人恰恰就是共产党员。不相信共产主义，可以请他出党。对我们党来说，最可怕的就是理想信念的丧失。理想信念和党的组织纪律不要求公民做到，但是共产党员必须做到。共产党人要敢于坚持真理，勇于修正错误。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报》）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4月23日）

不能任由历史虚无主义 虚无我们的历史根基

——访国防大学教授李殿仁

霍文琦

中国社会科学报“学海观潮”版曾于4月23日刊发《历史虚无主义“重写历史”有何诉求?》一文，专访北京大学教授梁柱，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实质、政治诉求等从学理上进行了剖析。本期我们专访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李殿仁中将，从该思潮的传播特点、历史上的经验教训等角度，作进一步分析。

一 当前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

《中国社会科学报》：一般地说，历史虚无主义总是以“历史揭秘”为噱头，以“反思历史”“还原真相”为名扩散传播的，那么当前它有哪些新表现？

李殿仁：一个时期以来，一些人以“反思历史”为名，歪曲“解放思想”的真意，从纠正“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发展到“纠正”社会主义；从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发展到全盘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从诋毁新中国的伟大成就，发展到否定中国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从丑化、妖魔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发展到贬损和否定近代中国一切进步的、革命的运动；从刻意渲染中国人的落后性，发展到否定五千年中华文明，等等。可以说，他们极尽一切手段，肆意歪曲、捏造历史，企图否定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历史，否定革命、否定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否定已有定论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

一是用所谓的“现代化史观”取代“革命史观”，把革命同现代化对立起来，借以否定革命、“告别革命”。有的竭力渲染革命的“弊病”，公开判定“20世纪的革命方式确实带给中国很深的灾难”，宣扬新中国的历史是“苦难史”；有的宣称革命的结果只是实现了“专制复辟”；还有人认为，如果没有革命，“中国早就实现现代化了”。

二是把“五四”以来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视为离开所谓的“以英美为师”的“近代文明的主流”而误入了歧路，宣称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没有资格搞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以后搞的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或者把改革说成是对社会主义的否定和对资本主义的“补课”。有的还否定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生造了一个所谓“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提法。在他们看来，近代中国应当用大力发展资本主义来取代“半封建”，而不应该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这样就把纠正“左”的错误变成了“纠正”社会主义。

三是质疑“两个不能否定”，故意放大问题、夸大失误和挫折，把改革开放前后的两个历史时期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或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或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虚无”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进而否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四是用攻其一点、以偏概全的方法歪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否定或掩盖其本质和主流，将其说成是一系列错误的延续。如指责1949年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犯了很多错误，对中国的发展进步没有贡献；抗美援朝、社会主义改造等都不应该进行；特别是集中攻击、诬蔑、抹黑毛泽东，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丑化党的领导人和革命前辈。

《中国社会科学报》：互联网的兴起，使得信息传播的速度加快、成本变低，各种思潮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在微信、微博朋友圈上经常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揭秘”“党史真相”等字眼，其所谓的“真相”往往令人咋舌。据您了解，全媒体时代这种思潮的传播形式有什么新特点？

李殿仁：充分利用全媒体时代的各种传播手段，是这一错误思潮泛滥的一大新特点。现在，体现历史虚无主义论调、主张的言论和作品，可见于专业研究成果、通俗历史读物和讲座、互联网及文学、影视、美术、音乐作品等各种媒介之中，可以说是无孔不入、无所不在。其特点是：

传播内容分散化。分门别类、化整为零，通过不同的途径渠道在不同

的媒介上传播扩散，使貌似缺乏系统理论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分散的表述中躲过监管而得以广泛传播。

传播形式隐蔽化。常常戴着学术研究、理论创新的面具，粉饰它的政治意图和意识形态色彩；利用符合大众心理和娱乐习惯的文化消费形式，把核心观点转化为感性的影视形象和夺人眼球的通俗文字，通过互联网、影视作品和通俗读物等向社会大众传播，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受到影响。

二 不只是学术是非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报》：一个时期以来，相继出现了一些错误思潮，如西方宪政民主、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等，历史虚无主义和这些思潮相关吗？

李殿仁：可以说，虽然花样不同，但出于某种共同的背景，在基本的价值取向上它们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只不过历史虚无主义者重在通过否定和歪曲历史事件或人物，来宣传一定的价值观念，反映一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当前流行的历史虚无主义与其说是一种学术思潮，不如说是一种政治思潮，它把西方的政治思想、政治制度、价值观念作为“普世价值”，作为研究历史的“标准”，以“还原历史”或“重新审视历史”为幌子，无视历史事实，随意解读历史现象，恣意歪曲历史的本来面目，颠倒是非黑白，甚至不惜散布谣言、伪造历史。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些人不但歪曲近现代中国的历史，而且对我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中华源远流长的灿烂文化也恣意抹杀的深层次原因。

《中国社会科学报》：也就是说，历史虚无主义不仅仅是学术领域的的是非问题。

李殿仁：对。历史虚无主义所散布的种种言论，不仅涉及史学领域的大是大非问题，而且还直接关系到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问题。历史虚无主义始终是敌对势力消解我们党长期执政合法性的舆论工具。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现在看来，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传播和扩散，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产生这样的影响：其一，它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随意剪裁和解释，误导大众建

构符合其核心观点的历史认知，造成人们在历史知识方面的错乱、价值观方面的混乱和对待中国近现代史的不严肃态度。

其二，它向社会大众提供一套完全不同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话语体系，引导大众怀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从而消解大众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认同。

其三，它否定当代中国基本政治制度的历史根基，否定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发展的历史贡献，抹黑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放大中国共产党在实践探索中出现的失误，逐步瓦解大众对我国政治制度的认同和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

其四，它歪曲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对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精神、对源远流长的灿烂民族文化也一笔抹杀。在一些人的笔下，我们的民族不仅“愚昧”“丑陋”，而且充满“奴性”、缺乏创造力、安于现状、逃避现实，如此等等。这样一些荒唐的言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部分群众的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各种媒介都要警惕历史虚无主义。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苏联解体过程中，随处可以看到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危害。您认为当前我们该如何汲取这一沉痛的历史教训？

李殿仁：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最后，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就作鸟兽散了，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这是前车之鉴啊！”

确实如此！现在对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解体原因和教训的研究和争论仍在继续。尽管存在诸多不同观点，但总的看来，戈尔巴乔夫等人利用历史虚无主义，推行违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路线，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

当时，在历史虚无主义泛滥的过程中，一些带有官方背景的文学作品、新闻媒体和出版单位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当时《忏悔》这部电影，描写了上百万人在斯大林执政时期失踪的悲剧，它是在时任格鲁吉亚党委书记谢瓦尔德纳泽支持下摄制完成的，雅科夫列夫曾说，《忏悔》的公映是苏共“意识形态崩溃的开始”。结果，人民的思想被搞乱了，社会主义的形象被玷污了，西方“民主”制度被美化成世界历史的最终归宿。

随着思想的崩溃，苏联解体成为无法逆转的事实。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苏联的惨痛教训警示我们：境内外反华势力从未放松西化、分化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图谋。分析历史虚无主义，要看到这样一种背景！毁灭民族的历史记忆，动摇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最后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善良的人们应该深长思之。

三 历史研究是一个大工程

《中国社会科学报》：对历史虚无主义这样一种唯心主义思想，一种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该如何应对？

李殿仁：面对当前形势，我们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实事求是，揭穿和拨开历史虚无主义制造的种种谎言和迷雾，引导广大群众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

研究历史只能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首先是对已经发生的历史事实进行分析判断，而不能以尚未发生的想象作为依据。历史是不承认“假如”的。

其次，对已经发生的历史事件要采取唯物主义态度认真分析事件发生的背景、过程、作用和影响，从中把握它的本质和主流。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这100多年时间，中国人在苦难中觉醒和奋斗，积极探索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朝什么样的方向发展这个根本问题。人们进行了很多尝试，君主立宪制、多党制、总统制都试过了，结果都行不通。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才找到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正确道路，这是已经被历史证明了的事实，也是被事实证明了的历史。今天的中国同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相比，是天壤之别，这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共识，是包括我们的对手也不得不承认的历史事实。个别人抓住我们探索过程中的某些失误大做文章，企图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的革命史、建设史和改革史，这是不得人心的。

再次，判断事物的功过是非只能放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分析判断，不能用今天的形势和条件去衡量过去的事件和决策。比如说对外开放，新中国成立初期并不具备全面开放的条件。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根本不承认我们的新政权，我们在联合国连合法席位都没有，许多国家都不同

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它们在政治上歧视我们，经济上封锁我们，军事上围堵我们，一直想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中，甚至到现在还对我们实行方方面面的封锁和限制。当时那种条件下你怎么对它们开放呢?!就是在这种困难的环境下，我们同当时的苏联、东欧，还有承认我们合法地位的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上展开了全面的交流，有力地促进了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建设。以“假设”“如果”代替已发生的历史事实，以个别事件否定全部历史，以现在的观点看待当时的条件，甚至编造历史、肢解历史、碎片化历史，这样的手法，令人不齿。

《中国社会科学报》：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做哪些工作？

李殿仁：唯物史观是识别和应对历史虚无主义最锐利的思想武器。一方面是普及，要在文化教育事业的繁荣发展中注重唯物史观的学习宣传和普及工作；另一方面是创新，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发挥优势，不断进行研究和创新工作，使这一理论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征程中，始终注重存史、研史、学史和用史。一是要继续把历史的研究作为一个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工程抓紧抓实，抓出成效，不断推出精品力作，以正视听。二是要扎实推进形式多样的、全民性的正史普及，特别是要认真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系统学习中国近现代史、党史军史和世界近现代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不断增强理论自信和实践自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弘扬这个优良传统，把学史、用史提到全局高度，多次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最好的营养剂。我们应把这些号召切实贯彻到工作学习之中。

要主动作为，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在当前文化多元、意识形态领域斗争错综复杂的形势下，要有针对性地加强学理研究，通过理论阐释、史料分析、实证研究、文本分析等进行全面的透视，以生动多样的方法和手段向社会传达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批判研究的成果，以去弊解惑，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进而不断赢得人心，巩固阵地，牢牢把握住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主动权。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报》）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6月25日）

从“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谈开去

何秉孟

“历史是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一论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构建时期，史学界就曾进行过讨论。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一论题反映的不是一个简单的历史学治学方法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是坚持用唯物史观还是唯心史观指导历史研究的问题。

一 历史虚无主义隐藏政治目的

1955年，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曾在《哲学研究》上发表文章，批评胡适所认为的历史是可以随意摆弄的“千依百顺的女孩子”，可以随便装扮涂抹的观点。也有人为胡适鸣不平，认为胡适没有说过“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只说过“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这一桩公案到底孰是孰非，可以继续考证、争鸣。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不论批评方还是辩驳方，均不认同“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一主张；对于我国史学界大多数严谨学者而言，“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尊重历史事实，忠于历史真相，是史学工作者必须遵循的学术道德。可以说，这是我国史学界的一个优良传统。

然而，这一传承了60多年的学术道德底线，今天竟然面临历史虚无主义者的挑战与颠覆。他们从其历史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出发，将历史尤其是我国近现代历史，当作可以任人随意打扮的小姑娘，按照他们的价值取向和价值标准，恣意否定历史的客观性和真实性，或者恶意裁剪历史，甚至按照他们的价值标准和价值诉求，编造谎言，填充到已被他们恶

意否定了客观性、真实性的空白历史中。他们通过篡改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历史，篡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英勇奋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和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历史，以达到他们在中国改旗易帜的目的。所谓历史虚无主义，绝不仅仅是一个纯学术问题，在其背后，隐藏着我们万万不可掉以轻心的政治目的。

二 警惕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渗透

标榜为“资深媒体人”的杨继绳先生在《墓碑》一书中，编造我国三年困难时期“饿死3600万人”这一耸人听闻的弥天大谎，是这方面最为典型的例子。江苏师范大学非线性泛函分析专家、特聘教授孙经先通过缜密分析和研究，从数理统计学这一专业角度，对此进行了证伪。孙经先教授用大量铁证揭示，这一谎言是通过精心篡改文献数据、凭空捏造和编造文献数据、无限夸大文献数据，或以偏概全、以点代面地推断数据，以及张冠李戴等手段炮制出来的。其目的，在于抹黑中国共产党，抹黑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为在我国搞“颜色革命”造舆论！我们这样说，绝对不是危言耸听，杨继绳先生对于他的这一企图也是毫不隐讳的。

杨继绳的《墓碑》写成以后，2009年由美国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2013年由美国曼哈顿研究所授予以极端仇视、疯狂反对社会主义的新自由主义鼻祖哈耶克命名的“哈耶克图书奖”。2013年5月29日晚，杨继绳在纽约参加颁奖活动和座谈，并在座谈会上发言。他说，之所以将这本书取名“墓碑”，用意不仅是纪念死去的3600万人，也希望埋葬造成悲剧的这个制度。其实，在《墓碑》的前言中，他的这一价值追求表达得分外清楚：“以《墓碑》为题有四重意思：一是为1959年饿死的父亲立碑（请注意，有读者著文说：杨继绳的父亲根本不是饿死的，而是患病去世的——引者注）；二是为3600万饿死的中国人立碑；第三，为造成大饥荒的制度立下一个墓碑；第四，写此书有很大的政治风险，如因此书而遭不测，也算是为理想而献身，它自然也就成了自己的一个墓碑。”这些充满杀气的语言、文字，全都是杨继绳先生亲口说、亲手写的，绝不是我的推论或臆断。

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往往是国内与国外相呼应，并由国外金融垄断资产阶级推动的。以杨继绳的《墓碑》出笼为例：他的《墓碑》完稿

后，由中国香港的出版社出版发行，然后由美国曼哈顿研究所授予“哈耶克图书奖”，最后由海内外媒体联手大肆炒作，铺天盖地地推向国内。这里清晰呈现出来的“三部曲”，可能反映了当代西方资产阶级对我们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一般规律。对于这一点，也是我们必须予以高度重视的。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月16日）

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琐谈

卜宪群

今天，我们无论是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解决所面临的许多重大现实问题，都离不开从历史的角度加以审视，离不开对许多重大历史问题的认识。因此，如果不能正确地阐释历史，就不能科学而合理地认识现在、引领未来。2014年10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怎样对待本国历史？怎样对待本国传统文化？这是任何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都必须解决好的问题”，“我们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不能数典忘祖、妄自菲薄”。^①但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程中，在中国史学发展欣逢前所未有的良机之际，却有某些人不断秉持历史虚无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历史领域入手，以“反思”“解放思想”“重新评价”“理性思考”“范式转换”“还原真相”等为名头，肢解、曲解中国传统文化，否定、歪曲近现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发展道路。一段时间以来，这股思潮不仅在史学领域弥漫，向文学、影视、网络传媒流传，而且打着反历史虚无主义的旗号，以“理论化”“学术化”的新姿态出现，指向也更加明确。正确的历史认识是现实的起点，是否能够正确看待历史特别是本民族历史，更是一个民族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因此，辨析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实质，还原其本来面目，既是关系到中国史学健康发展的问题，也是关系到如何正确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近现代以来历史发展道路的问题，更是关系到国家和民族未来发展方向的大问题。

^①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牢记历史经验历史教训历史警示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人民日报》2014年10月14日。

一 历史虚无主义的历史观

当前我们应当关注的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观，是一种以主观、孤立、片面、曲解的态度与方法来分析、解读中华传统文化，解读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历史发展道路，进而宣扬并传播错误历史知识和历史观的思潮。这种历史观简单粗暴、主观臆断、东拼西凑、凌乱不堪，既无严谨的内在逻辑，更谈不上科学的研究态度，至多是一个个如何虚无历史的“主意”，还够不上一个“主义”的学术理论标准。因而，他们的历史观与绝大多数严谨的史学工作者、理论工作者、文学创作者的研究探索，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观全盘否定中华传统文化的渊源、内涵及其存在价值，否定传统文化在中华文明传承中的历史意义，否定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创造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伟大历史进程和民族精神。当然，其结论最后还是放在当代：由于我们的传统文化是“卑鄙”的文化，是“病态”的精神，所以中国两千多年的治理也好不了；我们老祖宗的“头”没有开好，因此，今天的中国政治、文化也不可能比得上西方；要赶上别人，必须彻底消灭中国传统文化，追随西方，全盘西化。

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观在如何看待近现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发展道路上，全盘否定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的革命运动的合法性，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取得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成就。某些论著肆意贬低、攻击、丑化近代以来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做出杰出贡献的历史人物，竭力歌颂、美化那些已有历史定论的腐朽人物、阻碍历史进步的人物甚至外来侵略势力。^①

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观正在向大众媒体传播。在某些历史题材的文学、影视作品中，“否认历史的客观存在”，“虚无和歪曲历史，不能公正地分析和认识历史，不能客观地描述和表现历史，任意践踏、随意评说、肆意消费历史”等现象不一而足。^② 由于缺乏科学历史观的支撑，缺乏对基本

① 参见梁柱、龚书铎主编《警惕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② 张江：《文学“虚无”历史的本质》，《光明日报》2014年4月4日。

历史知识的尊重，在某些历史题材的文学、影视作品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荡然无存，中华民族历史被随意曲解，作为历史创造者的广大人民群众被拒于视野之外，使广大读者和观众对许多重大历史问题、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性质产生严重误解。旧的甚至封建的历史观复活，帝王将相的历史作用与人格魅力被无限夸大。某些历史上阶级矛盾相对缓和的时期，被无限放大了了不起的“和谐”“盛世”。封建意识形态中腐朽、消极、落后的思想观念沉渣泛起，观众不但不能从中受到正面、正确的历史教育，反而获取错误的历史观。这些作品支离、曲解、胡乱编造本来很清楚的历史，将最基本的历史知识张冠李戴，致使虚假错伪贯穿其中，观众不能从其所传递的历史信息中获得起码的历史真实。结果是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影视作品层出不穷，“历史热”一浪高过一浪，反而使读者和观众数典忘祖，淡漠传统。^①

这些已经被学者们批驳得很彻底的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观，显然已经难有市场。于是，某些人不得不更换方式，使其以新的面目出现。近来，他们以“探讨”历史虚无主义的“学术”源流为名，以“批判”“教条主义历史虚无主义”为题，以对历史虚无主义作“类型上的区分”为手段，从虚无中华传统文化、虚无近现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历史观，直接走向了虚无马克思主义、虚无20世纪以来的社会主义道路、虚无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历史观。他们虽然以“批判”历史虚无主义为名，表面上看将历史虚无主义的“理论化”“学术化”层次“提升”了，但实际上不仅没有什么新的内涵，而且其本质目的也更加一目了然。不过，这也提醒我们应当关注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新动向。

二 历史虚无主义的基本方法与立场

历史虚无主义分析、观察历史的基本方法是孤立、片面和曲解。这种方法无论是化实为虚、化虚为实、化有为无、化无为有，还是化零为整、化整为零，所得出的结论既不尊重历史发展规律，也不符合客观历史事实，只能是其主观意志与客观立场的真实反映。

^① 参见卜宪群《历史题材文艺作品的创作与传播：敬惜历史文化资源》，《人民日报》2014年1月14日。

首先，历史虚无主义采取孤立、片面的方法观察分析中华传统文化。什么是传统文化？一般来说，是指从祖先传承下来的物质文化、精神和制度文化的总和。任何一种传统文化都有精华和糟粕的区分，中华传统文化也不例外。传统文化又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在历史变化中形成的。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进程中，都不可能抛弃或离开传统文化，这是一个基本常识。历史证明，取代原始社会的奴隶制社会里，仍有原始信仰和原始制度等遗存。取代奴隶社会的封建社会也吸取了旧制度中的很多因素，例如，主张“克己复礼”的旧秩序维护者孔子，不仅在封建社会里获得崇高地位，而且奴隶制下国家治理的核心概念“礼”，也在封建社会得以改造、继承，礼法合治、德主刑辅，构成了秦汉至明清封建政治文化的显著特征。渊源于先秦的诸子百家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在封建社会得到发扬光大。物质文化的前后继承自不待言，精神文化的继承也没有停止。在出土的秦汉文献中，广泛存在先秦文化典籍，就是一个证明。在汉儒那里，“五帝”“三王”“万世不易法，古今同纪纲”的表述，更形成了尧舜禹汤以降的道统意识。唐宋明清时期，治统与道统结合，政治秩序与文化秩序、社会秩序相统一，成为统治阶级倡导的主流意识形态。可见，文化的继承性非常清楚。中华民族正是在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的代代传承中创造了一次次的文明高峰，这是古今中外严谨治史者的共识。在我国历史上社会形态的更迭时期，在某些王朝的交替之际，在近现代社会变革进程中，的确出现过一些对历史文化过激、片面甚至错误的看法与行为，但绝不是某些学者所说的那样，几乎所有王朝都带着政治目的将前朝“虚无化”“否定前朝的历史”，特别是否定“慈爱、友善、诚实、守信、好学、勤奋”等原则。这一点，简单翻翻史书就可知道，真不知这些人从何处能拿出证据！即便像秦始皇这种历史上曾被视为“暴君”的人，其所创立的制度不仅为后朝所继承，也被历代有为有识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所肯定。即便像汉初那样激烈的“过秦”思潮也没能阻碍“汉承秦制”的历史事实发生。当然，如何对待传统文化，是一个大课题，是一切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和民族都曾经遇到的问题，并不限于中国。我们承认历史上在这方面出现过问题，今天也还存在着不少有待解决的问题，但这只是一个认识程度的问题，与某些人对传统文化完全持否定态度的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观完全不同。

其次，历史虚无主义采取孤立、片面的方法观察分析中国近现代历

史。分析具体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探讨历史发展进程，揭示历史发展规律，必须建立在掌握或尽可能掌握全部历史资料的基础之上，必须从当时的全部历史实际出发，必须坚持科学的历史观，而决不能主观臆断，任意肢解、曲解。鸦片战争及其后的一系列战争、列强瓜分中国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重大事件，构成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要内容。对这些事件及活动于其中的人物如何分析、如何评判，甚至包括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近代中国究竟走革命还是改良道路等问题，学者们都可以从学术层面进行研究。但历史虚无主义者的“研究”范式并不是这样。他们不顾历史事实，将坚持近代中国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学者的成果，以及坚持中国近代的历史任务是反帝反封建、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学者的成果，都视为从属于政治意识形态需要的产物，是以“政治”解释历史的没有科学理性的方法。他们不顾近代中国已经发生的客观历史事实，将历史建立在完全“假设”的基础上，给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设计出了另外一条“光明大道”。他们甚至不惜否定中华数千年来爱国主义精神传统，将爱国主义视为一个“伪问题”，将爱国主义“虚无”掉，从而为那些已经被历史定论的近代反动人物涂脂抹粉、摇旗呐喊、翻案招魂。他们故意混淆严谨历史学家的辛勤劳动成果与普通人对历史看法之间的关系，以人人都有历史“解释权”为借口，为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观的存在寻找理由。

历史虚无主义孤立、片面、曲解历史的观点是由其立场决定的。因此，无论其花样如何翻新，观点如何“新奇”，读起来多么隐晦艰涩，最后矛头都必然要指向马克思主义，指向20世纪以来的社会主义道路，指向当代中国政治体制、主流意识形态。其手法一是借批判“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为名，将马克思主义与启蒙思想、基督教、儒家（他们称之为“儒教”）相提并论，通过粗糙不堪、逻辑混乱的“比较”后认为，只有启蒙思想才最符合人类文明的“实际进程”；马克思主义将历史“终结”在共产主义，是与基督教、“儒教”相重合的历史图式，因而马克思主义就是历史虚无主义。二是将指导20世纪以来社会主义实践的马克思主义指责为“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与政治相结合的产物，是极端的历史虚无主义，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由于这种意识形态只能与“原始”“愚昧”的群体结合，形成破坏人类文明的巨大力量，其结果必然带来严重的“现实灾难”，其代表就是苏联和中国。三是认为当前应当“警惕”

“批判”的不是那些否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孤立、片面、曲解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道路，丑化攻击代表近现代以来进步力量的领袖人物等这些“虚的”“未必存在”的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观，而是应当批判“教条主义意识形态”“庸俗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赤裸裸地提出要让“管理者”调整心态，变革体制，让那些“尊重历史、实事求是”，“还原”了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抗日战争、“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历史事件和诸多历史人物“真相”的所谓“新的研究”，为改革开放提供“理论支持”和“决策参考”。历史虚无主义者的以上表述，不仅清晰地将其与严谨的学术研究区别开来，也将其立场、态度暴露无遗。

三 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

从表面上看，历史虚无主义也在研究“史实”，也在探讨历史发展的“规律”，也在关注“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但它与历史唯物主义是背道而驰的。只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来辨识，历史虚无主义的本质就会暴露出来。

首先，唯物史观认为，历史事实是历史研究最基本的出发点，历史研究必须充分、准确地占有资料，必须严谨、客观地对待自己所运用的资料。“在自然界和历史的每一科学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① 这些历史事实不是片面的、孤立的，而必须是“与所研究的问题有关的全部事实，而不是抽取个别的事实”^②。历史虚无主义则不是这样，其“研究”的出发点服从于其立场，或根本不顾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优秀传统文化，不顾近现代以来中国人民的伟大历史创造，或只截取他们所需要的“史料”，或断章取义，孤立解读。他们将历史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之上，对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作出假设的判断，再将他们假设出来的“历史”视为应当真实发生的“历史”，并从中寻找“内在联系”。于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不该发生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不该发生抵抗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革命运动，更不该发生马克思主义传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40页。

② 《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65页。

人中国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产生的社会主义道路；近现代中国人民应该对外向列强俯首称臣，对内向代表腐朽、落后生产关系的旧势力妥协。那样，中国就会有一条比今天更加“辉煌”的“光明大道”。于是，凡是与他们假设出来的历史相违背的发展道路、历史人物、思想观念，必然受到种种丑化、歪曲、攻击、指责。

其次，唯物史观认为，“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①。唯物史观的创立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们所生活时代的历史学资料和成果作了尽可能全面的搜集整理和分析研究，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重要历史基础与思想根源之一。在运用翔实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唯物史观还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必然性和偶然性、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等重大问题，作了精辟的具体分析和抽象分析。历史虚无主义则是将历史资料及其所“研究”的对象建立在选择的基础上，并不是从所有的历史资料出发，更不是“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来分析历史发展的形式及其内在联系，而是以既定的“原则”作为“研究”出发点，反过来将其“研究”结论强加于客观历史之上。^②例如，他们选择否定的只是中国历史上人民大众反抗暴政压迫的农民革命、近代以来争取民族独立反抗外来侵略的革命以及社会主义革命，但却不否定其他革命。在历史研究中，他们把一个人的“实际人品和实际行动”与“一个人对自己的想法和品评”不加区别，将阶级和各个党派的言辞和幻想与其“本来面目”“实际利益”和“真实本质”混为一谈。^③ 所欲溢美者，曲为之辞，所欲攻伐者，罔顾事实，甚至伪造史料，完全脱离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和实际发展过程，将历史的“内在联系”建立在主观唯心之上。

再次，历史虚无主义者不仅虚无客观的历史事实，虚无唯物史观所揭示的历史发展科学规律，就连发生在不远处的、最基本的史学常识也不顾。例如，20世纪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从没有否定传统史学、近代实证史学优秀成果的历史意义和价值，没有否定人类文明诞生以来一切优秀文化的历史进步意义和价值。时至今日，国外各种严谨史学流派理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0页。

与方法已广泛被中国史学家所吸纳，并成为学科发展新的增长点。当代中国史学绝非如某些人所说的那样，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替代一切具体历史研究，用革命史观和阶级斗争史观解释一切历史，将唯物史观以外的其他方法简单抛弃而“只允许一种声音存在”，更没有将历史虚无主义与正常学术研究中的不同学术观点相混淆。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史学研究当然不等同于时事政治，但这并不意味着史学研究可以脱离现实。如果今天连“爱国”和“卖国”这些基本价值观都被“虚无”了，还不应该引起史学工作者重视吗？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原载《历史研究》2015年第3期）

历史虚无主义既诬古人 又误今人

郑师渠

所谓历史虚无主义，是指借口历史认知中存在相对性，而肆意歪曲历史真相和抹杀历史认知中既有的真理性的非理性倾向。近年来，此种倾向有愈演愈烈之势。少数人为吸引“眼球”，在“去宏大叙事”“解构历史”“重写近代史”等名义下，热衷于做“翻案”文章，先是否定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乃至改良，极力抬高清政府，进而一味抹黑我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历史。如此等等，无不反映了这一点。这一貌似创新实则倒退的非理性倾向，不容轻忽。

一 反帝反封建斗争是中国近代史主线

古人云：“自古有天下国家者，行事见于当时，是非公于后世。”“行事”业已定格为史实或真相，是唯一的；“是非”的评判则属价值判断。历史无法重现，后世绵绵，人们的认知也不免见智见仁。尽管如此，人们对历史的认知仍具有客观的真理性的，不能陷入相对主义或随意颠倒历史。列宁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无疑地包含着相对主义，可是它并不归结为相对主义，这就是说，它不是在否定客观真理的意义上，而是在我们的知识向客观真理接近的界限受历史条件制约的意义上，承认我们一切知识的相对性。”陈寅恪也指出，在史料大致完备的条件下，人们对于历史的解释，不能不受限制，“非可人执一说，无从判决其当否也”。

唯其如此，人们尽可以对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诸多面相见智见仁，但却不应也不可能否定反帝反封建斗争是近代历史主线这一基本历史认知。同样，人们尽可以对汪精卫晚节不保表示惋惜，但提出“英雄乎？汉奸乎？”

这种模棱两可的问题，试图抹杀其最终堕落成汉奸的历史事实，却不足取。现在，有人固执地否定国共斗争最终的胜负具有历史必然性，而将问题归结为所谓中共“不光彩”的“权诈”。这也是一种不愿直面历史的自欺欺人。

早在1935年，蒋廷黻便撰文提醒国民党政府：在苏区几乎一无所有的红军，却能坚挺不倒，端在于它与农民合作，“共党为农民作了什么好事呢？只作了一件事：干脆的，彻底的消灭了地主阶级，实行了耕者有其地”，“农民所以乐为其用就是为这一点”；他还提醒说：国民党要想剿灭红军，也必须行同样的政策，以争取农民的合作。1949年败退台湾后，蒋介石曾问叶青：国民党何以败？叶青的回答是：因为没有实施孙中山先生之民生主义，实行耕者有其田。从蒋廷黻到叶青，先后指出了国民党的致命伤在于得不到广大农民的支持。最近，台湾一位资深学者在学术讨论会上指出：国民党到台湾后，之所以能成功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是因为高官们的土地都在大陆，现在是革别人的命。国民党几代学人，也都承认国共成败有其内在必然性，再次证明了历史真相与历史认知所具有的客观真理性，从来都容不得随意篡改。

二 历史虚无主义的泛起有多种原因

当下，历史虚无主义的泛起固然有多种原因，但其倡言者，除了极少数人别有政治企图，欲借歪曲历史否定我党执政的合法性之外，多数人就其主观因素而言，主要有两个认识上的原因。

一是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一些人看问题，不是将之置于特定历史条件下做综合的、长时段的考察，而是以偏概全、以今况古，便难免得出有失偏颇的结论来。例如，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党和国家的工作确实出现了一些失误，包括反右斗争的扩大化和“文化大革命”的劫难等，都造成了不必要的严重损失。但是，因之便将这一时期说得一无是处、一片漆黑，加以全盘否定，却是不客观的。我们应当看到，这些失误是我党在探索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发生的偏差，事后也由它自身做出了纠正。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剧变，从一穷二白的旧中国变成举世瞩目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在各方面取得包括“两弹一星”在内的伟大成就，为后30年改革开放和新的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看不到失误，就得出教训。但是，仅看到失误而看不到成就，见木不见

林，并不足言客观的历史真相，相反却易误入历史虚无主义的迷津。

二是囿于个人情感，难以保持清醒的理性。超越情感因素，保持客观的态度，是从事历史研究的基本要求。上述种种失误，伤害了许多人，时光虽逝，往事并不如烟。一些曾不同程度受到伤害的人，心理阴影往往长期存在。他们中的一些人，对待历史问题，未能超越个人恩怨，自然会影射其知人论世的客观性。极少数人千方百计诋毁毛泽东，很大程度上正缘于此。在这一点上，梁漱溟却显得难能可贵。他与毛泽东曾经发生人所共知的冲突，事后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按道理说，他最易受情感驱使而贬抑毛泽东，但事实却相反。晚年，他在回答外国记者关于怎样评价毛泽东的提问时，说：毛泽东晚年虽有错误，但他在中国和世界的历史上，都是仅见的伟大人物，“没有毛泽东不能有共产党，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这个是百分之百的事实”。如何超越个人恩怨，客观对待历史，梁漱溟为人们提供了绝好的范例。

三 历史虚无主义颠覆正确的历史观和价值观

胡适曾指出，历史研究需要坚持两个基本点：一是还其“本来面目”，即求历史的真相；二是评其“是非”，即要有正确的价值判断，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如果不能做到前者，“则多诬古人”；不能做到后者，“则多误今人”。所谓“诬古人”，就是歪曲历史，有辱前贤；所谓“误今人”，就是误导当下，尤其是天真的青年人。这是十分深刻的见解。历史虚无主义既“诬古人”，又“误今人”，但其为害之烈，远远超出了学术研究的范围。龚自珍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道尽了国人对国史的珍重及国史与国之兴衰间的依存关系。

历史虚无主义随意抹杀历史真相，颠覆正确的历史观、价值观。若任其蔓延，势必在社会上尤其是在青年中，造成是非不分的思想混乱，瓦解人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信念与目标，从而危及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这是需要深长思之的。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月16日）

虚拟空间是虚无主义的乐园吗

楷 杰

近日，北大原副校长梁柱教授被网络“大V”围攻引发舆论关注。起因是他在《红旗文稿》杂志发表的一篇长文《怎样才能做到真正的历史清醒》，被一家网站转载并将标题恶意篡改为“北大副校长：追求真相不讲立场是历史虚无主义”，立即引来“大V”们的围攻。转眼间，微博上恶评、辱骂泛滥，唾沫星子铺天盖地，一位学界宿儒遭受如此对待，令人错愕不已。

尽管有评论将此次事件归因于“标题党”的再次作恶，并谴责“大V”们不负责任的造谣跟风。但笔者认为，“标题党”“大V”们固然应该批判，更值得深思的是，此事反映出网络虚拟空间日益成为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场所、同情场域和增量空间。历史虚无主义不断利用其网络传播力，散布错误的历史观念，裹挟民意，歪曲并攻击主流历史价值观，这才是造成梁柱教授此番遭遇的根本原因。

所谓历史虚无主义，即以“反思历史”为幌子，旨在消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解构历史主体，否定中国革命，否定主流价值，为歪曲历史进行理论和实践的准备。虽名为“虚无主义”，实则毫不含糊，其矛头直指中国革命史和历史唯物主义史学观。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除通过期刊、报纸等传统媒体宣传外，还运用网站，微博、微信账号以及网络社区等新媒体形式宣传，传播扩散其不同于主流历史学界的知识和价值体系，对意识形态安全构成了压力和挑战。与在期刊、报纸等传统媒介的影响力相比，历史虚无主义在网络虚拟空间形成了更活跃、更广泛的扩散能力，十分值得警惕。笔者总结起来，历史虚无主义的网络传播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一是借助网络阅读碎片化歪曲历史。麦克卢汉认为“媒介即讯息”，

即传播媒介对内容有着严格的规定性和制约性。网络传播的文本碎片化与历史知识的碎片化，是高度关联的。过去传播历史知识主要依靠的是学术论文、专著、纪录片等，这类形式有着较为系统而完整的历史叙事框架，传统阅读者也有着较为完整的时间和专注力。而随着网络的兴起，微博、微信、帖子等形式被广泛采用，历史知识往往被揉碎了以新的逻辑进行再加工，更换新标题和关键词进行传播，阅读者的时间也被碎片化了。当前网络上主流历史观所依赖的整体性叙事的“原本”正在不断被弱化、拆解甚至篡改。当原有历史的整体性知识被网络碎片化之后，再次组合的可能性就变得多元化，这就为历史虚无主义者夹带私货、偷梁换柱、逻辑重构提供了掩护和可乘之机。现在，一些具有虚无化倾向的历史研究者往往在所谓发掘历史真相、还原历史细节的幌子下，渲染其所谓反思、揭秘、新解的历史主张，本质目的是要利用网络碎片化阅读“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盲点，巧妙放置意识形态的“特洛伊木马”，由点及面地给历史翻案，以达到其“重写历史”特别是改写中国革命史的目的。此次梁柱教授被围攻，源于标题党又一次对文章标题恶意篡改，只因表演极其拙劣，被公众一眼识破，是非曲直明白无误，谣言才得以中止。但更需要警惕的是历史虚无主义对历史事实、叙事逻辑和价值观念的深度篡改，具有极大的隐蔽性和欺骗性。

二是搭乘文化消费主义的便车将历史庸俗化。在网络时代，阅读呈现出猎奇性、趣味化、快餐化的趋势，体现出一种消费主义的旨趣。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浅阅读”替代了传统的深度阅读——时评人马伯庸感叹“在微博时代，‘理解并阅读全文’真是一项稀缺的技能”。浅尝辄止，排斥深度、重视“指尖传递”，这些要素已然形成当代的网络快餐文化、围观心态、娱乐精神和窥窃集体无意识。在这种阅读旨趣的引导下，阅读者的嗅觉集中在对历史细节、人物隐私、八卦逸事的关注上，以往严肃的历史题材也逐渐被娱乐化、庸俗化，对历史的评价也不再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由于这种阅读旨趣有着将历史庸俗化的强烈动力，进一步助长了历史虚无主义所谓的发掘历史细节、以个体叙事演绎历史整体的行为，甚至将其视为一种创造性的文化生产而加以赞赏。这就为历史虚无主义打着还原历史真相的幌子贩卖其错误价值观提供了温床。如今，历史虚无主义与文化消费主义汇流、合谋，在意识形态和文化市场两个领域形成一股不可小觑的解构力量。例如，网络上兴起的对慈禧、李鸿章、袁世凯、蒋

介石等人物的大量翻案，对国民党将领张灵甫等八卦新闻的兴趣，就表现出一种娱乐主义加历史虚无主义的倾向。应该看到，在新的承平时代，“告别革命”、拒绝崇高、娱乐为王的消费意识形态获得了不少的拥趸，他们反感和排斥官方主流意识形态，并对严肃的政治类题材进行嘲讽、挖苦。

三是动员新兴互联网力量形成不对称的舆论优势。由于历史虚无主义无法在传统的期刊、报纸领域形成大的气候，他们转向利用互联网这个自由而强大的传播工具形成局部的、不对称的舆论优势。主要体现在，一方面，涉及历史虚无主义的内容以网页、视频、图片的形式大量发布，以海量的信息稀释主流历史价值观，企图将主流历史价值观边缘化，使其成为网络上孤立无援的少数派。另一方面，历史虚无主义注重通过微博、微信和论坛等自媒体扩大自己的声音，特别是部分网络“大V”，以所谓公共知识分子和舆论领袖身份自居，裹挟着众多粉丝拥趸，制造舆论热点和浩大声势压制不同声音，个别甚至不惜歪曲、抹黑论争对手，用网络暴力替代理性争鸣，其恶劣行径败坏了网络舆论风气。近年来网络上流传的所谓“以现代化的叙事代替革命的叙事”“反思历史”“重写中国近现代史”等错误观点，无一不反映出历史虚无主义试图借助网络媒体推波助澜、形成不对称优势的图谋。网络舆论论争此起彼伏，暗流涌动，诡谲莫测，北大原副校长梁柱被无端辱骂产生的舆论热点和社会关切，倒是反映了这些“大V”们确实蛮拼的，不管是自愿还是盲从，他们的加入，使得一时之间舆论几乎呈现一边倒的态势，坚持主流价值观的言论反而成为被围观、被审判、被围剿的少数派。网络思想意识领域出现的“主流与非主流倒置”“价值观黑白颠倒”“多数人的暴政”等非正常现象，暴露出了历史虚无主义者试图利用网络攫取话语权的伎俩和企图。

网络虚拟空间是社会公共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成为高扬历史唯物主义旗帜的重要阵地，成为建设社会伦理道德和法制秩序的高地，而不是任由历史虚无主义泛滥为患、无良“大V”沆瀣一气的乐园。梁柱教授被围攻一事，反映了当前历史虚无主义在网络上有扩大影响的趋势，值得警惕。究其原因，有历史文本碎片化的技术背景、消费主义文化观流行等客观因素，也有历史虚无主义者竭力夺取网络话语权的主观动力因素。但归根到底，与我国主流历史界精英对网络理论话语权的不够重视有密切关系。今后，面对复杂的舆情斗争，主流历史学界应该重视学习和运用网络

传播规律，重视对网络舆论的参与，重视学术自媒体的表达，积极发出学术理论界的声音，扩大网络传播力和影响力，形成舆论优势，弘扬网络正能量，最终让虚无主义无法在虚拟空间中藏身，还网络世界一片净土。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9月8日）

我们应当怎样拾取历史的“碎片”

钟社文

所谓历史的“碎片”，是指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个别事物、事件。历史留给我们的，往往是不完整的残迹和“碎片”。历史研究离不开这些“碎片”，历史认识就是把片断、零星的“碎片”联结起来，从而复原历史过程，从中探寻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方法。但历史虚无主义却不是这样，他们打着“还原历史”“重评历史”的旗号，来摘取他们主观选择的“碎片”，作为他们假设历史的依据，引导人们形成错误的历史观，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因此，如何对待历史的“碎片”，不仅是一个方法论问题，也是一个历史观问题。

一 历史虚无主义如何拾取历史“碎片”

历史虚无主义拾取历史“碎片”是建立在主观唯心主义的基础之上。

第一，历史虚无主义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将历史看作是可以任意打扮的对象。

我们知道，具体的历史现象、事件、人物等，都是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它们所构成的历史联系决定历史的独特面貌，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历史认识不能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但历史虚无主义却不是这样，历史虚无主义借鉴后现代主义“解构”历史的叙事方式，先预设出符合自己意图的结论，对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作出假设的判断，再将他们假设出来的“历史”视为“客观”发生的“历史”，并从中寻找其“内在联系”。在历史虚无主义者看来，历史是可以任意打扮的对象，需要装扮成什么身份，就去挑选什么。经过他们的打扮，复辟帝制、开历史倒车的袁世凯成了中国现代化的开拓者，“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慈禧太后成了推动中国

近代化的英明领袖，“我自横刀向天笑”的变法先驱谭嗣同成了“近代激进主义的开头”，民族英雄林则徐的虎门销烟成了不识时务、不负责任的蛮干。他们还以所谓的“范式转换”来曲解历史，从根本上违背近代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首要的历史任务，改变近代中国所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科学结论，将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说成是以落后对先进，以保守对进步。他们甚至宣扬“侵略有功”，散播“中国要富强康乐，先得被殖民一百五十年”等谬论。于是，在这种历史观下，辛亥革命被断言为“纯属错误”，新民主主义革命被强加上“破坏文明进程”的罪名。

第二，历史虚无主义否定历史发展的客观存在，将客观的历史过程任意切割。

历史是众多因素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有机过程，它既不是各个因素的混乱堆积，也不是各个部分的简单机械相加，而是多样性的有机统一的整体。历史中的事件、人物、制度、文化、科技、思想、环境等，只是这个整体的组成部分，要认识某一历史现象、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必须将与其相联系的各种因素结合起来综合考察，才能够科学、准确、全面、深刻。历史虚无主义却不是这样，他们惯用的手段是抓住片面和细节，随意切割历史，否定全面和整体，或是选取无关大要、无关宏旨、支离破碎的细节标榜认识了整体的历史。他们将其“研究”的出发点服从于其立场，根本不顾中华民族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不顾近现代以来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自由独立、国家富强的伟大历史创造，只是截取他们所需要的“史料”，以偏概全，断章取义，孤立解读。他们宣扬的“告别革命”论，就是一种典型的切割历史的表现，他们否定中国近代以来追求变革进步的史实，赞美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保守和妥协，断言“中国在20世纪选择革命的方式，是令人叹息的百年疯狂与幼稚”等言论，无不是这种割裂史观的真实写照。

第三，历史虚无主义随意否定历史，否定包括爱国主义在内的民族精神，意图从精神上击垮民众。

历史就是过去，但从另外一种意义来说，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将来的历史。历史犹如长河，过去、现在和未来不可分割。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但这种创新永远离不开特定的历史前提。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

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历史构成了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点，每一代人的生活，都建立在前一代留下的历史遗产之上。否定历史，也就否定了我们创造现实的根基。刻意否定历史，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主要表现。他们为了自己的“立场”，无视中华民族悠久文明和灿烂的文化，公然篡改中国文明起源，全盘否定中国历史文化的优秀传统。经过“重新评价”，抹杀先辈的革命史；抹杀我们民族独立斗争的历史，抹杀伟人领袖的历史功绩，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史。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形成的基本世界观、基本历史结论和国家发展道路遭到了刻意的攻击和诋毁。近年来，随着历史虚无主义者对慈禧、琦善、李鸿章、袁世凯等这样一些历史人物的翻案和“重评”，雷锋、刘胡兰、黄继光、邱少云、狼牙山五壮士，这些我们心目中的当代英雄人物也一个个遭到质疑和诋毁，各种“解密”“揭秘”“历史真相”在互联网上暗潮汹涌：雷锋日记全是造假，刘胡兰被乡亲所杀，狼牙山五壮士其实是土匪，黄继光堵枪眼不可能完成，邱少云烈火焚身不合生理……这些否定，指向的是英雄人物个人，目的却是颠覆和虚无我们民众的价值观念，摧毁我们民族的精神和脊梁。

从历史虚无主义拾取历史“碎片”的表现，我们不难看出，历史虚无主义的实质就是用唯心主义历史观来认识、分析和解释历史现象，是对历史事实完全不讲原则和方法的虚无。他们不仅将客观历史任意“碎片化”，甚至不惜编造历史、伪造史料，用以转换历史主题、假设历史事实。应当说，历史虚无主义的历史观称不上是一种“主义”，他们拾取历史“碎片”的目的，不外乎是为了实现一个个不可告人的“主意”罢了。

二 历史虚无主义拾取历史 “碎片”的动机和目的

历史虚无主义拾取历史“碎片”不是为了研究历史，而是为了达到其政治目的。

首先，历史虚无主义不是不懂得应当如何拾取历史的“碎片”，而是出于政治的需要。

在当代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不断遭遇到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挑战。20世纪90年代初，历史虚无主义打起“还原历史”“重评中国近代史”的

旗号；进入 21 世纪，历史虚无主义又以“学术研究”“理论创新”的面目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由于打着“学术研究”的幌子，当前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更具隐蔽性、迷惑性和渗透性。一些历史虚无主义的文章，体系非常完整，逻辑结构也很清晰，似乎也在摆事实、讲道理，看起来好像有思想、有内容，也有条理。但是，历史虚无主义真的是要“研究”历史吗？答案是否定的。历史虚无主义不是不懂得应当如何拾取历史的“碎片”，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不是真正要进行“学术研究”，在历史研究领域建立起新的理论，进行“理论创新”，而是政治需要，所以历史虚无主义根本不在乎“历史的真实”是什么样子。在历史事实上，历史虚无主义通过对近代史、党史、国史的“解构”，否定近代中国革命，歪曲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新中国的历史进程，最终的指向是诋毁历史和人民选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理论逻辑上，历史虚无主义以质疑和淡化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历史研究的指导地位为突出的表现，从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阶级斗争学说，否定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的成就，甚至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直接攻击，指责马克思主义就是“历史虚无主义”。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历史虚无主义刻意歪曲和否定历史，其政治目的也昭然若揭。

其次，历史虚无主义任意打扮、切割、假设、否定历史的动机和目的是全盘西化，否定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进步道路。

认识历史，是要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历史虚无主义却并不在乎历史的真实，他们任意打扮、切割、假设、否定历史的动机和目的是全盘西化，否定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进步道路。从他们打出的“重构中国近代史”旗号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个思路。一部中国近代历史，是近代世界历史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历史综合发展变化的结果。鸦片战争及其后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重大事件，构成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要内容。历史虚无主义者却将帝国主义侵略与“近代文明”相等同，声称“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近代文明”。他们指责太平天国运动“绝无进步的历史意义可言”，认为辛亥革命“搞糟了”，就不该发生，是激进主义的结果。他们假设洋务运动的“改良”、清

政府的“新政”会造就“明主”，创出“盛世”，所以不该发生抵抗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革命运动，更不该产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社会主义道路。近现代中国人民应该外向列强俯首称臣，内向代表腐朽落后生产关系的旧势力妥协，“以英美为师”，迈向“近代文明的主流”，走出一条“光明大道”。沿此而进，他们虚无党史、国史中的定论，否定新中国成立后取得的各项成就，否定改革开放的成就。他们这种反理性思考所得出的结论是：只有全盘西化，中国才有出路。

再次，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今天，历史虚无主义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逆流。

列宁曾经指出：“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挑选任何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有纯粹消极的意义。”他还说：“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①历史虚无主义对历史的任意打扮、切割、假设和否定确实连“儿戏”都不如，但它带来的消极影响和危害却是巨大的。历史虚无主义“假设”出来的历史认识脱离了具体、客观的历史条件，他们的历史认识是对历史的虚构、篡改和臆断。他们的认识虽然以“学术研究”的面目出现，但却是将“科学的历史学”变成了“假设的历史学”，没有了学术含量和认识的价值。这种刻意打扮的“历史”，是一种先验的历史认识，正如恩格斯所说，如果它有某种历史观的话，“本质上也是实用主义的”。历史虚无主义者将这种认识称为“解放思想”和“理论创新”，其实质却是为了达到其目的的一个又一个“主意”，是他们为了维护其“立场”，实现其动机，对历史肆意曲解和践踏的手段。

历史虚无主义这样拾取历史的“碎片”，带来的结果只能是数典忘祖，最终的走向便是反历史性，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今天，历史虚无主义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逆流。

^① 《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64页。

三 历史唯物主义拾取历史 “碎片”的正确方法

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研究也要从一个个“碎片”入手来收集史料，但其历史观和方法论与历史虚无主义有着本质区别。

第一，承认历史的客观性，历史研究建立在全面占有史料的基础上拾取“碎片”。

唯物史观认为，历史并不是作为“产生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识”中而告终，“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它将历史区分为自然史和社会史，将人类历史的本质看作是物质的客观实在，历史上已经发生的事物是独立于人们意识之外的定局，我们无法做出丝毫的改变，“不能照原样再做它们”。我们所能改变的，是我们认识到的历史，而不是历史本身，历史的这种客观性意味着它绝非任人打扮。认识历史，有着根本的原则和方法。

列宁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①。这是要求从客观存在的历史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某种观念出发去认识历史，“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的形态”^②。从历史实际出发，以史实为依据，全面占有史料，实事求是，是认识历史的根本原则和根本方法。

第二，承认人类历史发展道路的客观性、普遍性和特殊性。

恩格斯指出，历史学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起作用的一般规律”。唯物史观认为，历史事物的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人类社会矛盾形成历史运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贯穿于人类社会的始终。社会的生产力发生变动，社会的政治、法律、伦理、文学、艺术等，也会随之变动，以求适应发生变动的新的经济生活。这是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性。历史发展的规律与自然界的规律不完全相同，有其特殊性。历史规律或社会规律表示的是一种过去发展的趋势，并且是要通过人们的实践活动才能实现的。

①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4页。

尊重客观历史，尊重人类伟大实践活动所创造的历史，是唯物史观观察历史的最基本出发点。

唯物史观认为，历史发展的规律有一般性，也有特殊性。相对于适用于人类社会历史始终的普遍规律而言，特殊的规律则只是适应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区域、民族和国家，如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发展道路，支配不同民族的历史发展的法则也不相同，所以“一个民族的特性，可以造成一个民族的特殊历史”。“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具体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历史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强大和振兴。”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知灼见。

第三，当代中国的复兴和崛起需要正确的历史观。

当代中国的复兴和崛起，需要以科学的历史观为指导，即唯物史观的指导。正确认识历史、解释历史不仅是一个学术上的问题，也是关乎国家和民族前途与命运的问题。历史虚无主义的最大危害，是传递错误的历史观，带来价值观的混乱，造成民众国家观念、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情感的丧失。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唯物史观视域下批判历史虚无主义，需要我们从历史的辩证运动中来进行理论阐释，运用历史的现象与本质，历史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理论进行辨析，用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原则、历史研究的整体性原则来衡量，分析历史虚无主义的理论渊源和认识渊源，揭示其无视历史、割裂历史、假设历史、否定历史导致的认识歧途和价值观混乱，揭露其意图从历史根据和逻辑前提下否定中国的根本制度和前进道路的政治目的。

结合现实进行史学研究，探讨当代社会伟大变革历史进程中所出现的问题，普及科学的历史知识，传播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用正确的历史观引导社会，形成正确的历史认识，是当代史学工作者应尽的责任，但是，我们首先应当清除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这是我们当前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0月19日）

严明党纪，抵制历史虚无主义

李方祥

近日，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明确把“诋毁、诬蔑党和国家领导人”“歪曲党史、军史”作为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并视情节给予相应纪律处分。这一重要修改，体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严明党的纪律的重大战略部署，从党规党纪的刚性约束层面对于有力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将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沉渣泛起，一些人颠倒历史事实，搅乱历史是非，制造思想混乱，瓦解对党的信任，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历史虚无主义在一个时期比较活跃甚至猖獗，与党内极个别人推波助澜甚至带头散布虚无主义错误观点，向党史、军史和国史发难有一定的关系。这些人丧失党的理想信念和人民立场，无视党的纪律，有的毫无忌讳地抹黑、侮辱革命先烈，有的放肆地攻击、丑化党的领袖人物，有的在公众场合“正义凛然”而在私密场合却嘲讽戏谑革命前辈，有的还把虚无党史、军史的谬论夹杂在学术研究之中，公然利用报刊、网络、讲坛等平台发表一些错误观点。他们头顶着共产党员的神圣称号却以丑化党史为荣，博取“开明”的美名，其行为不仅败坏了党的形象，而且践踏了党严肃的政治纪律。

九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经受过无数历史风浪的考验，关键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这两条。在党的纪律当中，最根本的是政治纪律，这是党的团结统一的根本保证，是党的战斗力和先进性的重要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如果党的政治纪律成了摆设，就会形成‘破窗效应’，使党的章程、原则、制度、部署丧失严肃性和权威性，党就会沦为各取所需、自行其是的‘私人俱乐部’。”在共产党内部由于放纵个别党员肆意丑化党的

领袖、抹黑革命先烈而导致“破窗效应”，并非没有前车之鉴。从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开始直至苏联剧变前夕，苏联社会弥漫着一股虚无苏共、丑化苏联历史的逆流，一些苏共党员甚至党的领导干部公然违背党的政治纪律，带头在党报党刊上公开谩骂、丑化、诬蔑苏共及其党的领袖，煽动对党不信任的情绪，但是这些党员没有受到应有的党纪处理，反而逍遥于党纪之外。最终在毁掉自己的同时，苏共也埋葬了自己。

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重视对全体党员进行党史、国史的教育，早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就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党史的新发展都作出了郑重的总结，这为我们研究和宣传党史提供了根本依据。党中央这次新修订的《条例》，把“诋毁、诬蔑党和国家领导人”“歪曲党史、军史”列入“对违反政治纪律行为的处分”，这是我们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有力武器，对那些惯于信口开河、随心所欲散布不负责任观点的人，毫无疑问将是一种巨大的威慑。

《条例》的修订再一次说明，历史虚无主义不是一般性的社会思潮，它实质上是一股政治思潮。毛泽东曾经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根本上是为敌对势力推翻政权制造舆论服务的，他们最常使用的伎俩之一就是通过丑化共产党的历史特别是丑化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来达到这个目的。

历史虚无主义的破坏作用绝不限于对过去历史的歪曲，更在于影响现实的选择和对未来的引导。正因如此，历史虚无主义的传播总是与政治极端主义如影随形、密不可分，思想上的历史虚无主义，必然表现为政治上的极端主义，他们在实践上否定四项基本原则、颠覆现行制度。在当前历史虚无主义的各种表现形态中，有一种形态更需要引起我们高度警惕，这就是近年来以学术研究为包装的历史虚无主义。从表面上看，它似乎远离现实社会和政治，对社会的影响并不如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等思潮那么直接，有时甚至以一种客观公正、中立的面貌出现，因而其传播和扩散往往未能引起人们的警惕，而误把它当作学术思潮中的不同观点加以“包容”。

大量事实表明，历史虚无主义并不满足于纯理论的研究，不甘心在书斋中坐而论道，一方面他们在历史研究领域否定革命，立足于舆论造势，

与马克思主义争夺话语权，消解马克思主义在历史研究中的指导地位；另一方面，他们又热衷于在现实政治问题上发表自己的观点，通过对正确历史结论的根本性颠覆，来阐述他们对中国改革和发展道路的基本立场和观点。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来，一些人为了避免与现行制度和主流意识形态直接对立与冲突，转而寻求在主流意识形态和国家政策允许范围内进行活动，以“讲真话”“两头真”“独立思考”等为幌子，依托其所控制的某些舆论阵地，或举行各种名目的纪念、集会等活动，或发表文章、举行演讲等，来影响和改变未来中国的发展方向。

总之，抵制社会上各种历史虚无主义，需要首先从全面从严治党入手，严明党的政治纪律，用党规党纪守护党的历史，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为等方面自觉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带头弘扬正气、抵制丑化党史的歪风邪气。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1月5日）

谁是真正的历史虚无主义者

龚 云

历史虚无主义是一种借否定人民革命历史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而否定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主义道路和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思潮。这种思潮否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所形成的全部历史认识体系，否定中国人民的进步史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从而达到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目的，进而实现乱史灭国。笔者就历史虚无主义者提出的观点进行商榷。

一

1. 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替中国近代统治阶级翻案、否定革命才是真正的历史虚无主义。

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基调。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有学者提出“告别革命”论以后，否定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美化中国近代统治阶级成为一种时髦。一些学者把近代历史上人民群众的斗争视为“暴乱”，对敢于反抗的人民英雄、爱国志士一味地苛求，甚至用今天的标准来要求。相反，对待统治阶级的著名人物，却采取“善待先人”的态度，对统治阶级的行为给予“同情式理解”，把统治阶级对人民的镇压视为维护社会秩序之举。在他们眼里，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内乱”，洪秀全创立的“拜上帝教”成为“邪教”，曾国藩成为代表“历史进步”的人物。有些学者提出要摆脱“革命史观”：“愚意以为，妨碍我们如实认识百年历史的，是中国人尚未彻底摆脱革命史观或党派史观。”“革命史观的核心内容是制造革命对象，神化革命力量，遗忘革命变革的根本目的是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和新的人际关系，从而为国家、社会 and 人的发展提供牢固的制度保障。这种思潮在思想文化领域流

毒很广。”^①

革命是人为制造出来的吗？革命仅仅等于暴力吗？革命的对象是革命者制造出来的吗？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革命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产物。恩格斯曾经指出：“革命不能故意地、随心所欲地制造，革命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完全不以单个政党和整个阶级的意志和领导为转移的各种情况的必然结果。”^② 列宁针对考茨基指责左派“制造革命”的谬论指出：“革命是不能‘制造出来’的，革命是从客观上（即不以政党和阶级的意志为转移）已经成熟了的危机和历史转折中发展起来的。”^③ 革命不仅仅等于破坏，破坏是为了更好的建设。诚如一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指出的：“革命应该包括人道主义，但没有人道主义的革命。革命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有流血，会发生一些所谓违背人道的行为。但我总以为，真正的革命者对待反革命远比反革命对待革命者要宽容得多。只要稍有历史知识就会明白这一点，应该具有历史唯物主义的眼界，不加分析地用‘人道’、‘暴行’作为套语套在革命的头上，会遮蔽人们对历史过程的正确认识。”^④ 这些持“革命是人为制造出来的”观点的“学者”，是真的没有历史常识吗？恐怕不是。如果是，那就谈不上是一个真正的学者；如果不是，那又是为什么呢？

一些学者之所以竭力贬损和否定革命，诋毁和嘲弄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其目的就是从历史根据上诋毁和否定我国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取向。新中国的诞生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的产物，如果人民革命这个前提被否定了，社会主义制度也就失掉了存在的基础。这些学者否定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对革命者过分苛求，对统治阶级一味美化，对统治阶级的暴行视而不见。当他们把曾国藩美化为“道德完人”时，却对曾国藩一天杀死一百多个农民、纵容湘军焚烧天京避而不提，这是对历史的客观评价吗？这不是历史虚无主义又是什么？

2. 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的错误。借中国共产党的错误而否定其全部历

① 袁伟时：《辛亥革命研究中的意识形态陷阱》，《炎黄春秋》2012年第2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9页。

③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7页。

④ 本刊记者：《谈谈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问题——访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陈先达》，《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6期。

史是真正的历史虚无主义。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有 90 余年历史的老党、大党。由于主客观的原因，我们党在历史上犯了不少错误，特别是在个别时期犯过严重的错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国共产党对自己包括领袖人物的失误和错误历来采取郑重的态度：一是敢于承认，二是正确分析，三是坚决纠正，从而使失误和错误连同党的成功经验一起成为宝贵的历史教材。但是，一些学者不分析党的历史的本质与主流，不区分成就与失误谁占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主导，热衷于暴露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犯的一些错误，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开放前 30 年的一些错误和失误，以反思的名义暴露这一时期的错误和失误。在这些学者笔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简直就是错误的堆积，给人总的印象是中国共产党什么好事都没有做。

某位学者对改革开放前 30 年的历史采取了简单否定的态度。他认为：“中国进步靠什么？中国为什么倒退，走了弯路？二战后中国走的歪路我认为跟苏联关系很大，公有制、计划经济、斯大林式专制统治、党内党外的斗争，把我们害苦了。”^① 改革开放前 30 年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把这段历史情绪化地称为“歪路”，这是一个严肃的学者应有的态度吗？这不是历史虚无主义又是什么？

仅仅从暴露错误的角度去写其在革命和建设中的一些失误，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很容易的。诚如列宁指出的：“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挑选任何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有纯粹消极的意义，因为问题完全在于，每一个别情况都有其具体的历史环境。如果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顽强的东西’，而且是绝对确凿的证据。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②

中国共产党的失误并不是不能说，但一定要进行系统、具体、历史的分析。当事后诸葛亮是容易的，苛求前人也是容易的。历史地看，中国共产党与其领导人所犯的 error，主要是由于经验不足和历史的局限而造成

① 茅于軾：《在国际关系史中确认自身定位》，《炎黄春秋》2014 年第 4 期。

② 《列宁全集》第 28 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364 页。

的，而不是党的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本身造成的。中国共产党所经历的曲折和犯过的错误，并不是党的本质和主流。总的来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是光辉的历史。作为一个对人民负责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从来都是正视自己的错误，并且注意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习并吸取教训的。

对于中国共产党在一定时期内犯的错误，不能以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去认识。离开具体的历史环境的分析，把我们党所进行的艰苦探索、把那些先驱者说得一无是处，这种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从根本上说，是反历史、反科学的。更何况错误和挫折并不是纯粹消极的东西，其中也可能孕育着成功的因素。中国共产党所犯的历史错误，也是一笔历史财富。正如恩格斯说过的：“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①从历史上看，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总结成功的历史经验和错误的教训，不断把党的事业推向前进的。“所以，我们不应当只是静止地、孤立地去暴露党犯过的错误，而是应当在正视错误的同时阐述党认识错误、总结经验、纠正错误，从而把党的事业向前推进的过程。因为历史事实表明，中国共产党是具有自我净化和自我发展的能力的。”只有对中国共产党的错误进行历史的分析，“我们才不至于在纠正错误的时候否定应当维护的正确的东西，不至于损害党的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使我们丧失作为前进所必须坚持的阵地；也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对错误本身做出冷静的恰如其分的分析，从中引出应有的历史教训。”^②这样才能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划清界限，才能不但不损害党的形象，而且能够进一步增强人们对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

我们研究中国共产党的错误，一定要有正确的出发点，是站在推进党的事业的角度，还是持否定立场，其结论是大不一样的，其效果也是大相径庭的。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能任意选择，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一个政党的历史是一个政党持续前进的基石。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我们总结和吸取历史教训，目的是以史为鉴、更好地前进。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2页。

^② 沙健孙：《科学地研究、宣传党和人民光辉的斗争历史》，载梁柱、龚书铎主编《警惕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53页。

少数学者把中国共产党的错误当作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全部，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说成错误的堆积，让人看后对中国共产党丧失信心乃至产生恶感。这种混淆主次、颠倒历史的做法，不是历史虚无主义又是什么？

3. 如何看待毛泽东的错误，特别是晚年的失误。借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而否定毛泽东的一生是真正的历史虚无主义。

从一定程度上讲，毛泽东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象征。在一些人看来，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就必须先彻底否定毛泽东。因此，一些学者将自己的笔墨聚焦在毛泽东一生的错误上，不仅连篇累牍、反反复复地诉说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错误，而且肆意放大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错误，把毛泽东妖魔化。在一些学者看来，毛泽东一生，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没有做一件好事，因此，他们要彻底否定毛泽东。

有的否定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认为“1949年以后的新民主主义不是民主主义，而是专制主义。1949年以后，新民主主义的逻辑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的改革目标是市场经济、宪政民主”^①。

有的否定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和我们党提出的知识分子政策，认为“从精神上消灭知识分子，这就是所谓‘团结，教育，改造’的知识分子政策的真谛。它与对工商业和工商业者‘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精神，并无二致。知识分子在几十年间历经的磨难，正是这一基本政策派生的，并非所谓‘经是好经，让歪嘴和尚给念歪了’。来自各级干部对知识分子的歧视、打击、迫害，其源盖出于此”^②。

有的否定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改造，认为“夺取政权以后，毛泽东同志放弃了他正确的新民主主义论。他马上幻想在中国搞个‘乌托邦’，急急忙忙地要进入社会主义，比斯大林模式还要斯大林模式，所以发生了一系列‘左’的错误”^③。“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只能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相通，历史已经证明，他搞的社会主义给中国造成了灾难。”^④

有的否定毛泽东的个人品质，认为邓拓自杀现象浅层的因素很多，其中一个毛泽东同志性格上的、个性上的、人品上的若干问题。

有的借为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犯过错误的领导人，如陈独秀、瞿秋

① 杨继绳：《追忆朱厚泽》，《炎黄春秋》2012年第5期。

② 邵燕祥：《对“团结，教育，改造”的反思》，《炎黄春秋》2012年第3期。

③ 杜导正：《深层次探讨邓拓自杀现象》，《炎黄春秋》2012年第4期。

④ 杨继绳：《追忆朱厚泽》，《炎黄春秋》2012年第5期。

白、李立三、王明等“平反”，批判毛泽东，说是毛泽东制造了这些领导人的“冤案”，要还原历史的真相，揭露毛泽东的真实面目，把毛泽东描绘成一个权力斗争者。

虽然毛泽东一生犯了一些错误，特别是晚年犯了严重错误，但这与他对中国人民的贡献相比，功绩永远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而且他的失误，是在探索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道路过程中的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马克思主义者犯的错误。从其犯错误的动机来看，目的也是为了中国人民的幸福。而且他的错误，更多的属于历史的局限。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任何杰出人物都是时代的产物，不可能超越历史和时代的限制。因此，我们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必须把他们放在一定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下来评论他们的功过是非。

在中国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先例，犹如攀登一座人迹未至的高山，一切攀登者都要披荆斩棘、开辟道路。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有其主观因素和个人责任，还在于复杂的国内国际的社会历史原因，应该全面、历史、辩证地看待和分析。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革命领袖是人不是神。尽管他们拥有很高的理论水平、丰富的斗争经验、卓越的领导才能，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认识和行动可以不受时代条件限制。不能因为他们伟大就把他们像神那样顶礼膜拜，不容许提出并纠正他们的失误和错误；也不能因为他们有失误和错误就全盘否定，抹杀他们的历史功绩，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潭。”^①

一些学者始终抓住毛泽东晚年的失误不放，对毛泽东的错误，缺乏历史的分析，归罪于毛泽东个人的道德品质。邓小平在谈到如何认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时明确指出：“在分析他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只有这样，我

^①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2月27日。

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①

借毛泽东的错误，特别是晚年的错误，而否定毛泽东的一生的观点，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吗？是合乎历史事实本身吗？不是历史虚无主义又是什么？

4. 如何看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苏联模式。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错误和苏联模式的缺陷，全盘否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和苏联模式，认为苏东剧变是回归“人类文明”正途的观点，是真正的历史虚无主义。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苏东剧变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出现了一股否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否定苏联模式，否定列宁、斯大林的逆流。国内的一些学者迎合这股逆流，不仅否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而且站在自由主义立场评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的错误来否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进而否定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

有的否定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认为列宁默许接受德国津贴，列宁、布尔什维克党接受德皇政府的大量资助，“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为了保持苏维埃政权，不顾人民群众的反对，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②。

有的全盘否定苏联模式，认为“教条主义虚无主义则与苏联模式的政治权力结合，形成了一种‘政教合一’的铁板结构。苏联模式利用政治高压而把极端虚无主义的历史观贯彻到社会各个领域。在政治上，它否定了人类探索和实践了几百年的宪政民主制度的价值；在经济上，它否定了历史更加悠久的自由经济制度，否定了人的自由财产权利和行之有效的市场经济秩序；在文化上，它否定了以往的一切文化创造，从宗教到文学艺术。总之，利用政治强权所控制的宣传机器，苏联模式把人类的从古代文明到眼前资本主义文明的漫长历史完全地虚无化，将其贬低为没有任何价值的一堆垃圾”^③。

有的充分肯定苏东剧变。说什么“苏东剧变原因看起来很复杂，其实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2页。

② 李凌：《从普京怒斥“布尔什维克卖国”说起》，《炎黄春秋》2014年第7期。

③ 尹保云：《要警惕什么样的历史虚无主义》，《炎黄春秋》2014年第5期。

很简单，就两个字：‘偏离’，或者说‘背离’。也就是说，苏联东欧的所谓社会主义偏离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当然是不能长久的。”“总之，这种经济上统制、政治上专制、思想上控制的所谓社会主义背离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侵害了人民群众的民主自由权利，不符合人类进步的方向，人民群众抛弃这样的社会主义是一种理所当然的选择。”

对于否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后果，毛泽东在1956年，在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时候就敏锐地看到了它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在他看来，这绝不只是一个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而是涉及如何看待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的历史问题；如果历史被否定了，现实的社会制度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他说，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这把刀子不是借出去的，是丢出去的。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赫鲁晓夫的错误做法，实际上把列宁也丢得差不多了。^①后来事态的发展，充分证明了毛泽东的历史预见。苏联解体就是从否定历史开始的。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是人类追求进步的历史，在推动人类走向社会进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当英法美等国对希特勒搞绥靖政策的时候，正是共产党人率先举起反法西斯斗争的旗帜。苏联历史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中重要的一环。苏联模式尽管存在严重的问题，但在本质上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一种探索，在遏制资本主义劫掠方面起过重要作用。没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资本主义的负面作用将会更加严重。没有苏联的卫国战争，人类极有可能遭受法西斯主义的蹂躏。苏东剧变以后，国际进步势力无法制约美国，美国一再违背国际法，发起一次又一次战争，让世界动乱不已。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当然存在过严重失误，苏联模式也确实存在严重问题，列宁、斯大林都犯过错误，特别是斯大林更是犯过十分严重的错误。总结这些教训有利于更好地推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但一些学者却热衷于暴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失误，从所谓世界经验上证明马克思主

^① 转引自林泰主编《问道——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思潮与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36页。

义、社会主义是错误的，这是他们的用心所在。避而不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苏联模式的积极作用，一味全盘否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否定苏联模式，否定列宁、斯大林，这符合历史事实吗？这种做法，不是历史虚无主义又是什么？

5. 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历史认识体系。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历史虚无主义，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体系是教条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是真正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最新表现。

列宁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①他强调，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在我们还没有看见另一种科学地解释某种社会形态的活动和发展的尝试以前，它始终是社会科学同义词。^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地研究历史的必由之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历史认识体系，实现了历史认识的革命，使人类可以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真相，科学地探究历史的规律。

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历史虚无主义，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历史认识体系称为教条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提出“教条主义的历史虚无主义是迄今为止最大的历史虚无主义”^③。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在理论上源远流长。自19世纪末以降，一百多年来它以庸俗社会学为理论根基，穿着‘革命’的外衣，在理论上以‘马克思主义’的面目出现，实际上却是一种小资产阶级左倾幼稚病的根源之一。”^④“马克思的历史图式与基督教历史图式的确十分相似。他虽然肯定了资本主义的成就，也认为资本主义是目前世界文明高峰，但他最终还是以一个设想中的未来社会阶段把资本主义的历史否定了。在他的历史观中，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都是‘阶级社会’，是人的本性的堕落；资本主义无论取得了怎样的成就也是异化的，它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组织与道德观念等等都将要被彻底抛弃。这显然脱离了启蒙的思想路线，陷入历史虚无主义了。”^⑤

这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历史认识体系是教条主义历史虚无

① 《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页。

② 《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3页。

③ 尹保云：《要警惕什么样的历史虚无主义》，《炎黄春秋》2014年第5期。

④ 马龙闪：《历史虚无主义的来龙去脉》，《炎黄春秋》2014年第5期。

⑤ 尹保云：《要警惕什么样的历史虚无主义》，《炎黄春秋》2014年第5期。

主义。“教条主义是从马克思的思想中摘出一些教条并加以极端化发展。”^①“教条主义把上述马克思历史观进一步片面化、极端化，从而走向极端的历史虚无主义。”“在这个理论体系中，它把一个不存在的、仅仅是想象中的共产主义作为评判事物的唯一标准，不仅否定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这个漫长的人类历史，也否定了现实世界中的文明榜样……这就把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完全解释成为基督教神学的历史观，堕入极端的历史虚无主义。”^②“在我们国家，某些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人，很像尼采式的虚无主义者，在存在论与价值论上滑向虚无主义，因为他们一般不从存在的本体论意义上下工夫，只是否定其他所有的史观/价值，确立和维护自己的史观/价值，当作唯一的存在。他们虽然貌似尼采的那种强力意志，但这种强力并非来自批判者本身，而是来自只允许一种声音存在的举国宣传体制的支撑。”^③

他们认为，教条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说什么教条主义历史虚无主义“一开始就与政治行动结合在一起，一开始就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而不是简单的学术倾向或认识偏差。由于这个原因，它的社会影响和后果也是任何其他的历史虚无主义所不能比拟的。”^④“这种极端的历史虚无主义必然带来严重的现实灾难。在搞了70多年之后，苏联模式突然全面崩溃。非但没有实现它所宣传的伟大历史目标，反倒成了世界现代化历史之树上的一个巨大疤痕。国内有些学者从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不断地强调原苏联时期的经济与科学成就，据此认为那些批评苏联模式的观点是‘历史虚无主义’。这实际上是在颠倒黑白。恰恰是这些学者陷入教条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的泥坑而不能自拔。”^⑤

他们还认为，“中国目前需要引起重视的历史虚无主义，仍然是教条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它严重地扭曲了社会历史观，使人们不能对历史和现实作出恰当的理解和判断，从而构成改革开放和社会进步的巨大思想阻力。”^⑥“教条主义的本质特征就是不顾事实，不容许科学探讨。只要它存

① 尹保云：《要警惕什么样的历史虚无主义》，《炎黄春秋》2014年第5期。

② 同上。

③ 郭世佑：《历史虚无主义的实与虚》，《炎黄春秋》2014年第5期。

④ 尹保云：《要警惕什么样的历史虚无主义》，《炎黄春秋》2014年第5期。

⑤ 同上。

⑥ 同上。

在，它就是最大的历史虚无主义。”^①

马克思主义没有终结历史。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把历史终结在未来的共产主义阶段”^②，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严重歪曲。马克思主义通过探究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认为人类社会是在不断发展进步的，是在否定之否定中不断向前螺旋式发展的。人类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还是要不断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不同于历史进化论，也不同于历史循环论。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历史螺旋性前进的理论既包括历史进步的客观必然性，又包括历史仿佛复归的辩证现象。”“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进步的观念是充满辩证法的历史进步的观念，社会发展从社会形态演变看是进步的上升的过程，而不是循环运动。”^③

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是要发展的。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的特点。“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应该发展。当代现实并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单纯试金石，不是仅仅用以验证、说明历史唯物主义正确性的新例证，而是使历史唯物主义更加锋锐的磨刀石。当代现实既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和原则的实践检验，又是推动历史唯物主义发展的动力。”^④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在坚持其基本原理基础上的发展，任何推倒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所谓重建、重构，不是发展，而是修正，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虚无。

马克思主义是迄今为止对人类社会进行认识的唯一科学，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和方向，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解放的思想武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历史认识，使历史研究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科学地认识了人类历史，在推动世界进步和中国人民翻身解放中发挥了理论指导作用。对于马克思主义在历史理论上的贡献，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在他的书中有极高的评价。^⑤

历史唯物主义是人类历史观的伟大变革，但不会是结束变革的变革。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也不会停滞。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停滞，就是其生命的终结。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历史认识体系在实践过程中虽然存在过

① 尹保云：《要警惕什么样的历史虚无主义》，《炎黄春秋》2014年第5期。

② 同上。

③ 本刊记者：《谈谈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问题——访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陈先达》，《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6期。

④ 同上。

⑤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7页。

公式主义、简单化的不足，但其主流却是在不断发展，也会不断丰富发展。对马克思主义及其指导下的历史认识体系扣上“历史虚无主义”的帽子，恰恰是最大的历史虚无主义。

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历史认识也是要发展的。随着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发展，随着史料的丰富，随着人们对现实认识更加清楚，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体系也要不断发展。这种发展不是否定过去的基本认识，不是简单的“翻案”，而是在坚持基本认识基础上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认识，揭示了历史的本质和主流，是需要坚持的。否则，就是历史虚无主义。

二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是一种政治思潮。因此，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评说，就不单纯是一项学理探讨。在当前，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有着特殊的紧迫的现实政治意义，要高度重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蔓延和变种。

我们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并不是反对学者对历史进行新的探讨，并没有把学者通过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严肃的历史研究而改变过去的一些认识都认为是历史虚无主义。我们反对的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近现代中国历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的本质、主流进行不顾当时历史条件和客观事实的否定。

毋庸讳言，一些学者特别是一些历史亲历者发表的文章，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过去的历史，特别是走过的弯路，有利于总结历史教训。但是一些学者把自己亲历的某一过程当作历史的全部，并试图用这些细节去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新中国历史的主流。须知，细节的历史并不等于真实的历史，更不能代表历史的全部和本质。特别一些过去在某一个阶段或某一场运动中受过冲击的人，借回忆事件而歪曲历史，就更不是真正客观的历史。

一些学者脱离客观历史事实，以自己的价值尺度，尤其是政治的价值尺度对历史进行剪裁甚至重塑，背离了最起码的客观性，是典型的实用主义和唯心主义，是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根本对立的。他们以“价值中立”相标榜，强调史学应该与政治保持距离，漫骂马克思主义史学是政治史学，攻击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御用文人”，是“学阀”^①。实际上，自

① 资中筠：《革新中国传统历史观》，《炎黄春秋》2014年第7期。

古以来哪里有离开政治的史学呢？历史虚无主义自己也并不客观，并不中立。他们的爱憎分明，本身就彰显了他们的政治立场、政治诉求。他们的政治诉求就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这一立国之本，力图扭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发展方向，把中国的发展道路纳入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中。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以它自身的特点来表达这一政治诉求。历史虚无主义归根结底，就在于站错了立场，背离了人民的立场，站在了替历史上的统治阶级说话的立场。他们的观点，实际上成为现实中国的一些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舆论前奏。

历史虚无主义并不是对所有历史都采取虚无的态度。而是从他们的政治需要出发，随意否定扭曲他们想否定的历史。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否定中国历史上，特别是近代史上的一切进步事物和正面人物，把历史统统颠倒过来。因为中国近现代历史与现实息息相关，特别是革命史、党史，更是直接关系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依据。显然，直接否定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绝对不允许的。所以他们就采取了从与现实密切相关的中国近现代历史着手，以此为突破口，来颠覆四项基本原则。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假借客观公正、还原历史真相之名，对普通民众具有较大的迷惑性和欺骗性。他们的观点在社会上被不少人认可。这反映了我们这些年来在意识形态管理问题上不敢“亮剑”，存在一些漏洞，值得我们深思。

总体来看，历史虚无主义的目的在于总结历史教训，而在于通过历史虚无主义消解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不仅颠倒了历史，而且搞乱了人们的思想。它混淆历史是非，引起人们历史观的混乱，丧失对历史的鉴别力。事实证明，这种是非判断标准的颠倒，必然会在社会上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使人们减弱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丧失对共产党的信任、降低对社会主义的信心、消解对人民民主专政的认同。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将严重影响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安全，影响到中国人民选择的历史道路，导致开历史的倒车和社会主义根基的坍塌。苏联解体前民众的冷漠态度，就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恶果，也是前车之鉴。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节选自《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9期）

不能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 采取历史虚无主义态度

——与左凤荣教授商榷

《居安思危》课题组（执笔人：周新城）

我们编辑、摄制的三集电视片《居安思危》公开发行以来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有关领导机关、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重视。2012年3月7日，中央纪委宣传教育室向各级纪委正式发文要求在县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范围内观看。中直机关、中央国家机关等50多个部委和全国30多个省市自治区2000多个县市、数万个基层单位以中心组学习、党课、读书班等多种形式观看了该片。这三集电视片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丰富的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科学地分析了苏联演变的过程、性质、原因以及后果，从中得出了值得我们吸取的教训。该电视片对于坚定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增强居安思危的意识起到了很好的教育作用。

但是，这三集电视片也遭到一些人的非议。最近我们看到一篇批评、指责《居安思危》第三集的文章，这就是中央党校教授左凤荣写的、发表在《学术争鸣》2013年第1期上的《片面解读苏联教训的又一“力作”——评〈苏联亡党亡国20年祭：俄罗斯人在诉说〉》（以下简称“左文”）。文章指责我们的电视片在文风上有问题：“选择的俄罗斯人不具有代表性”，“结论具有片面性”，“某些人的言论明显与事实不符”，“对改革时期人物评价片面”，“引用别人的话时断章取义”，歪曲事实，无中生有，“无限夸大苏联解体的后果”，等等。这类问题我们将在另一篇文章中逐一加以驳斥。这里我们仅对“左文”提出的理论性问题作一点分析。我们认为理论问题更加重要，因为有关苏联演变问题的理论分析以及得出的结论不仅同研究苏联演变这个历史性事件有关，而且直接关系到我国曾经

走过的道路究竟对不对、今后应该往哪里走的问题。国内某些人是借着苏联问题来说事儿的，他们对中国今后怎样发展有一套看法，但有的话不好直接说，因而用苏联解体、苏共解散这件事来间接地表达自己的愿望。苏联问题的背后是中国问题这一点明眼人是一看就明白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历来如此。

一 如何评价苏联社会主义模式 是分歧的核心问题之一

我们同“左文”的理论分歧是什么呢？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如何评价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即“斯大林模式”；二是如何评价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以及戈尔巴乔夫这个人。在这里我们只说第一个问题。

有一种相当流行的看法（这也是“左文”的看法）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失败的，它是苏联演变的根本原因，注定了苏联必然垮台。也就是说，苏联演变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不管戈尔巴乔夫是否推行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都会发生这样的悲剧。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必须否定，而且应该否定得越彻底越好。所以苏联演变是历史的进步，因为它摆脱了斯大林模式的束缚，走上了“人类文明的正道”。这一整套言论，说到底就是对社会主义的这一段历史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这种说法，听起来十分耳熟，国内外敌对势力都是借否定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来攻击社会主义、要求恢复资本主义制度的。戈尔巴乔夫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他把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攻击为“极权社会主义”，发誓要“根本改变整个社会：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要“炸毁过去的一切”。所以在1991年当苏共解散、苏联解体的时候，他表示“我一生的主要目的已经实现，我感到安宁”。

如何评价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这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许多分歧都是由此而来的。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最能够反映学者对待社会主义的基本立场。

在评价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之前，先要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根本性质和历史地位作一点说明。习近平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他还从六个时间段分析了社会主义思想从提出到现在的历史过程，即：“空想社会主义产生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列宁领导十月革命胜利并实践社会主

义，苏联模式的逐步形成，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探索和实践，我们党作出进行改革开放的决策、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①他是把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放到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考察的。这段话表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第一，它的根本性质是科学社会主义；第二，它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历程中的一个时间段。我们必须按照这一基本判断来分析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有人说，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根本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这是不符合实际的（下面我们将详细分析这个问题）。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运用到苏联具体实际的产物，它是在苏联如何具体实现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一种探索。把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性质和历史方位搞清楚了，下面的分析就方便了。

二 毛泽东提出评价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方法论原则

1956年8月底，毛泽东在批评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全盘否定斯大林实际上也就是全盘否定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就，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全盘否定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时候曾明确指出：“因为苏联发生了一些错误，这方面讲得多了，吹得多了，似乎那种错误不得了，这种观察是不妥的。任何一个民族，不可能不犯错误，何况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历又那么久，不发生错误是不可能的。苏联发生的错误，像斯大林的错误，它的位置是什么呢？是部分性质的，暂时性质的，虽然听说有些东西有二十年了，但总是暂时的、部分的，是可以纠正的。苏联那个主流、那个主要方面、那个大多数、是正确的。”所以，要加以分析，“他们的主要的、大量的东西，是好的，有用的；部分的东西是错误的”^②。从实际出发，全面地进行分析，同时分清主流和支流，这是评价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唯一正确、科学的方法。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次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以下简称《一论》《再论》）详细论述了斯大林的历史功绩和所犯的错

^① 《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月6日。

^②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1页。

误，指出：“斯大林尽管在后期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他的一生仍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的一生。”“从整个来说，斯大林始终是站在历史潮流前面指导斗争的，他是帝国主义的不可调和的敌人。甚至在他犯错误的时候，他的悲剧也在于，他相信那是捍卫劳动者的利益不受敌人侵害所必需的。无论如何，斯大林的错误虽然对苏联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但是在斯大林领导时期，社会主义的苏联还是大大地向前发展了。这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不但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力量，而且也说明了斯大林毕竟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因此，我们在总结斯大林全部思想和活动的时候，必须同时看到他的正面和反面，他的功绩和错误。”^①这一辩证的、实事求是的分析，是令人信服的。在世界形势发生很大变化的今天，重读这一段话，好像是在直接批判戈尔巴乔夫之流，因为他们正是打着“彻底抛弃斯大林模式”“彻底粉碎斯大林主义以及新斯大林主义的一切形式”“斯大林模式否定得越彻底越好”“告别过去”等的口号而反对和攻击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

那么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弊病以及斯大林一生所犯错误的根源是什么呢？《再论》对此作了全面的分析。第一，在基本制度适合需要的情况下，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仍存在一定的矛盾。这主要表现在具体的体制、运行机制的缺陷上。这种矛盾，虽然不需要根本改变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但仍然需要及时地通过改革和调整加以解决。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所出现的失误和弊病、斯大林所犯的 error，有许多是产生于具体体制和运行机制这一层面上的缺陷，即不适合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经济体制、不适合经济基础需要的政治体制。第二，有了正确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也及时调整了体制中日常性质的矛盾。也就是说，尽管对不适合需要的具体体制和运行机制及时地进行了改革，也不能保证不犯错误。有了正确的制度和体制，还需要正确地加以运用，这就需要有正确的政策、正确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斯大林的错误就在于主观不符合客观，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脱离了群众和集体，破坏了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这与他的思想方法部分地严重脱离辩证唯物主义，陷入主观主义、形而上学是分不开的。

《一论》《再论》对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以及斯大林个人的评价是全面

^①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9日。

的、客观的、符合实际的，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今天，在新形势下围绕如何看待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以及如何分析苏联演变的原因等问题进行的讨论中，我们仍应坚持《一论》《再论》所表达的这一基本方法论原则。

三 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角度来看，我们必须充分肯定苏联社会主义模式

所谓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指的是苏联人民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式、道路，包括所建立的社会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运行机制，所实行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和具体的方针、政策等。十月革命胜利以后，由于列宁领导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时间不长，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基本上是在斯大林领导下建立起来的，所以人们又把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称为“斯大林模式”。直到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推行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之前，苏联社会主义社会基本上沿袭了斯大林创建的模式。我们评价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实际上就是分析从十月革命胜利到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台这样一段历史时期里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并作出价值判断。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苏联的具体国情、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我们评价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必须分两个层次进行：一是根本性质的层次，即它坚持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这体现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上；二是这些基本原则具体实现形式的层次，即它们在苏联条件下是怎样实现的，这体现在具体的体制、运行机制上。

从根本性质的层次来说，苏联在政治上建立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通过共产党）、工农联盟为基础的苏维埃政权，对广大人民实行广泛的民主，而对敌对势力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在经济上建立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的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实行了按劳分配原则，消灭了剥削和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在思想上建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文化制度，无产阶级思想占据统治地位。用我们常用的话来说，也就是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这些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它们体现了《共产党宣言》中所阐述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这就是说，苏联搞的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这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最根本的内容。

对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中这一层次的内容，我们必须充分肯定。我们党曾把这些内容概括为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指出这些经验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长途中的一个特定阶段内的关于革命和建设工作的普遍规律”，是“每个国家的革命和建设的过程”的“共同方面”，即任何国家只要建设社会主义都必须坚持这些东西。^①就这一层次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相同的：两者都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值得注意的是，否定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人，往往把矛头指向这些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东西，指向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戈尔巴乔夫是这样，国内像左凤荣这样的学者也是这样。例如，他们把共产党的领导说成是政治垄断，把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说成是经济垄断，把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说成是精神垄断。他们提出，改革就是要消除这些垄断：在政治上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实行西方式的多党轮流执政、议会民主、三权分立；在经济上取消公有制，实行私有化，建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思想上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实行听任资产阶级思想自由泛滥的多元化。他们借口反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实际上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要求恢复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这是需要警惕的。

四 从具体体制、运行机制角度看，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需要作具体分析

对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第二个层次的内容，即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具体实现形式，我们需要作具体分析。这一层次的内容，在制度上就是具体的体制、运行机制。概括地说，苏联建立的是高度集中的体制：在经济上，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一切经济活动都由国家通过下达指令性计划进行管理，企业只是计划执行单位；在政治上，是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权力高度集中在执政党手里，而且主要集中在中央手里，如此等等。我们不具体地描述苏联各个领域的体制和机制，对其优劣、对错一一进行评价。我们只是说明一些评价的方法论原则，并从总体上作一评价。在评价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具体体制、运行机制这一层次时我们应该把握以下

^①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9日。

方法。

首先，应该全面地分析，既要看到其存在弊病的一面，也要看到其正确的一面。我们党在批评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错误时，曾经指出，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不仅基本制度应该充分肯定，而且对具体体制也应该作具体分析，其中有的是正确的，有的是错误的；有的则在苏联条件下是正确的，但不能搬到条件不同的别的国家去。对这些具体制度（即具体的体制、机制）不能简单地一概否定。我们举一些例子来说明这一点。经常有人把民主与集中对立起来，用民主来否定集中，以此为依据否定苏联的体制。

其实，现代社会的管理是不能没有集中的。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把权威原则说成是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则说成是绝对好的东西，这是荒谬的。权威与自治是相对的东西，它们的应用范围是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改变的。”他预见未来社会必须允许权威的存在。^①苏联的体制强调集中是有一定道理的，尤其是在当时的形势下，更是如此，但集中得过分了，搞得党政不分、个人专权，这是需要纠正的。有人着力谴责苏联的肃反扩大化，把苏联的政治生活描述得阴森恐怖，从而引申出完全否定苏联政治体制的结论，甚至进而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他们不顾事实地渲染肃反错杀了几百万、上千万、甚至五千万人。

而事实是，根据苏联内务部1954年报给赫鲁晓夫的材料，在1921年到1954年的33年时间里，因反革命罪总共判处了3777380人，其中判处死刑的642980人。^②这是赫鲁晓夫当政时期为了批判斯大林而要官方根据档案统计的，想必苏联内务部不会故意缩小这些数字吧。这些人为了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不惜捏造材料，欺骗群众。问题还在于，在国内外阶级斗争十分激烈的年代，为了巩固苏维埃政权，肃反是必要的。但正如我们党所判断的，苏联在肃反工作中，一方面惩办了很多必须惩办的反革命分子，基本上完成了这条战线上的任务，另一方面却冤枉了许多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和善良的公民，造成了严重的损失。^③这种错误显然是与在体制上缺乏民主程序、集权过多，以致出现违反甚至破坏法制的现象分不开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6页。

② 《参考资料》1992年1月27日。

③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9日。

然而绝不能抓住扩大化的错误完全否定苏联的肃反工作，甚至完全否定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制度。

其次，应该历史地分析，即把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各项制度、方针、政策放到当时的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环境中进行评价。切忌从现在的、已经变化了的条件出发来评价历史上发生的事情。社会主义社会是不断变化、发展的社会，随着出现新的形势、新的问题，需要不断调整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制度、方针、政策。有许多事情，如果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是不尽合理的，然而就当时的具体条件而言，却是必要的。

例如，有人谴责计划经济体制，把它说成是万恶之源，断言苏联就是因为搞了计划经济才垮台的。然而计划经济同市场经济一样只是发展生产的方法、调节经济的手段，用不用计划经济这种手段，要根据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来定。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苏联的经济技术十分落后，而在国际上帝国主义发动侵苏战争的阴影日益迫近，国内又面临着为社会主义社会奠定物质技术基础的艰巨任务，苏联不得不开足马力，加快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步伐。为适应这一战略的需要，苏联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起来，建设规模宏大的重工业企业，尤其是国防工业企业，开发新的地区。苏联仅仅用12年的时间就完成了资本主义国家花了50年到100年的时间才完成的工业化任务，凭借本国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打败了法西斯德国。这些历史性事件证明了当时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有其历史的由来，并起到过积极作用，不容否定。战后，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经济联系的复杂化，尤其是随着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发展转向集约型发展，计划经济体制逐渐不适应，甚至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了，改革提上了日程。

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大教训，就是在客观经济发展进程提出改革经济体制要求的情况下，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及时进行改革，以致从70年代中期以后经济发展速度下降、经济效益增长缓慢，引起了群众的不满，从而为敌对势力攻击社会主义提供了借口。然而这不能成为否定在历史上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必要性及其积极作用的理由。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这是马克思主义分析问题的基本要求。脱离具体历史条件抽象地对历史上的事物说三道四，那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错误做法。

最后，应该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作为人类历史上把社会主义理想变为现实的第一个试验来对待。马克思、恩格斯总结人类社会发展的—般规

律、特别是深入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矛盾，发现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他们对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设想，但如何实现这些原则，需要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进行探索。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建立什么样的体制、机制来具体实现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没有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只能根据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一些理论设想进行探索。在探索过程中出现一些错误是很难避免的。列宁曾经说过：“在这样崭新、艰难和伟大的事业中缺点、错误和失误是不可避免的。”“对这些缺点采取讥笑（或幸灾乐祸）态度的，除了维护资本主义的人以外，就只有那些毫无头脑的人了。”^①应该看到，这种探索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挫折的教训，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宝贵的财富，都为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革命和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借鉴材料。对前人在探索过程中出现的失误和弊病，我们应该采取宽容的态度。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成年人对青年时代犯下的错误，甚至看来是幼稚可笑的错误，不应苛求。重要的是总结经验，在前人的基础上纠正错误、继续前进。轻易地把第一个社会主义实验贬之为“失败”，予以否定和咒骂，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五 把两个层次综合起来评价，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三七开”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把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两个层次的内容综合起来，我们该怎样评价呢？在社会制度这个系统中，基本制度是第一位的，它决定一种社会制度的根本性质；具体体制、运行机制只是基本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它是第二位的、从属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中的基本制度是正确的，必须肯定；具体的体制、运行机制则是有对有错，不能完全否定，还有的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对的，随着条件的变化则需要进行改革。综合起来看，应该说，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基本上是正确的，局部是错误的。

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们党针对打着批判“斯大林主义”旗号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浪潮，曾经指出：“如果一定要说什么‘斯大林主义’的话，就只能说，首先它是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主要的一面；其

^①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0页。

次，它包含一些极为严重的、必须彻底纠正的、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① 我们对待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也可以这样讲：首先，它是社会主义，它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这是主要的一面；其次，它包含了许多弊病，必须纠正，决不能照搬。

如何评价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毛泽东是一个典范。毛泽东首先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指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反对照搬，主张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进行探索，走自己的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发轫于此；然而就在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时，又是他坚持实事求是地评价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提出应该“三七开”。这种全面的、辩证的分析方法，是值得学习的。过了近40年，我们党在分析苏联演变的原因时，又重申：我们对斯大林的评价是功大于过，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否定引起了全面的思想混乱。

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结论是正确的。苏联在70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根本改变了国家的面貌，在帝国主义包围并饱受两次世界大战蹂躏的恶劣条件下，经济发展速度远远快于资本主义国家，把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在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两个超级大国之一，并在希特勒法西斯的疯狂进攻面前，凭借自己的力量打败了德国法西斯，保卫了祖国，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格局。这些伟大成就是公认的客观事实，而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包括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正是取得这些成就的根本保证。试想一下，如果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失败的，如果像“左文”说的那样，苏联的制度导致“问题成堆、人民不满”，怎么能够把“老牛破车的俄国”变成一个“拥有原子武器”的国家？怎么能够在帝国主义包围、制裁和军事进攻面前捍卫国家独立并得到迅速发展呢？

习近平在评价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时明确指出：“苏联模式的形成，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巩固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曾经起到了重要作用，促进了苏联经济和整个社会生活的快速发展，也为苏联军民夺取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显然，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采取彻底否定的态度是错误的。

这里，我们还不得不说明一点。如何评价已有的社会主义实践，不仅是学术问题，而且是关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的政治问

^①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9日。

题。“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这是古今中外屡试不爽的规律。苏联演变的惨痛教训表明，敌对势力先是彻底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实践，把它说得一无是处，从而提出“彻底抛弃斯大林模式”，“形象地说要炸毁过去的一切”，“彻底告别过去”等，搞乱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进而制造政治动乱、乱中夺取政权，最后复辟资本主义。试问，在否定社会主义实践的舆论成为主流的情况下，敌对势力宣布解散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还会有谁能站出来捍卫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呢？这正是当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人宣布取缔苏联共产党、解散苏联的时候，几乎没有遭到任何有组织的反抗的根本原因。习近平在总结苏联演变的教训时说了一段令人深思的话：“苏联为什么会解体？苏共为什么会垮台？一个重要原因是理想信念动摇了。最后‘城头变幻大王旗’只是一夜之间。教训十分深刻啊！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一路否定下去，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有什么作用了。”他还说：在8·19事件中，“叶利钦站在坦克上发表讲话，军队完全无动于衷保持所谓‘中立’。最后戈尔巴乔夫轻轻一句话，宣布苏联共产党解散，偌大一个党就没了。按照党员比例，苏共超过我们，但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对苏联的历史、苏共的历史采取虚无主义态度，使得党员和广大人民群众丧失了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在精神上“缺钙”，得了“软骨病”，最终导致亡党亡国，这种惨痛的教训，难道我们能够忘记吗？所以，我们在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进行评价时，必须慎之又慎，应该严格依据事实，科学地进行分析和判断，不要轻易地断言“失败”。类似的“断言”不仅不符合实际，而且会带来严重的政治后果。

“左文”说：你们是在“为斯大林辩护”。仿佛“为斯大林辩护”这一句话就把别人驳倒了。在一些人眼里，斯大林就是罪恶的代表，他们把斯大林搞臭了，因而为斯大林辩护简直就是不可思议的荒唐事情。对能不能为斯大林辩护这个问题，毛泽东有过分析。他指出，毫无疑问，斯大林的一生中，犯过某些严重的错误，但是这些错误同他的伟大功绩相比较，毕竟是第二位的。科学地评价斯大林，肯定斯大林正确的方面（这是他一生的主要方面），也就是捍卫社会主义，捍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为斯大林的正确方面辩护，又有什么错？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丑化了无产阶级专政，丑化了社会主义制度，丑化了伟大的苏联共产党，丑化了伟大的苏联，也丑化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才是犯了大错。赫鲁晓

夫全盘否定斯大林，是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渊源，它成为苏联向资本主义演变的滥觞。如果将其放到国际大背景来考察，我们还可以看到，在世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立的情况下，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完全是适应了帝国主义的需要。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丑化斯大林，除了其他原因以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斯大林坚决同帝国主义斗争。他们把自己和斯大林区别开来，是要得到帝国主义的赏识。”赫鲁晓夫是“自己擦〔搽〕脂抹粉，送上门去”的。^①这倒是值得那些全盘否定斯大林的人深思。

六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中的弊病是苏联演变的一个因素，但不是根本的决定性因素

经常有人提出一个观点，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出现的政局剧变、社会制度演变根本原因是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的弊病和错误，社会主义搞得不好，所以被颠覆了。这就涉及另一个问题：苏联演变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究竟是什么关系。

毫无疑问，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存在许多弊病，诸如在经济上，经济结构没有及时调整，重工业比重过大，忽视了农业、轻工业的发展，经济体制没有根据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及时进行改革；在政治上，党政不分，机构重叠，权力过于集中，对领导人缺乏监督和制约，法制不够健全；在思想上，理论僵化，缺乏生动活泼的学术环境；在民族关系上，存在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等等。如果罗列起来，那是很多的。如何看待这些弊病和错误呢？第一，毋庸讳言， these 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孤立地看，有的问题极其严重。然而正如上面分析过的，如果从整体上进行评价，应该说成绩是基本的，问题是第二位的，不能说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失败的。这些问题只是说明了改革的必要性，即必须通过改革来消除弊端，进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不能证明苏联社会主义垮台的必然性。第二，这些失误和弊病是出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体制、机制、方针、政策层面上的，而不是由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产生的，因此纠正失误、克服弊端只需要改革体

^①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年印，第797页。

制、改进工作，不需要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应该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进行改革，而不是推翻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演变。戈尔巴乔夫正是把改革的矛头指向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从而葬送了社会主义事业。第三，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的失误和弊病与苏联的演变是有一定关系的，因为这些失误和弊病引起了群众的不满，为敌对势力利用社会矛盾、制造动乱提供了可乘之机。但是，这只是一种潜在的可能性，它能不能变为向资本主义演变的现实因素，取决于党的路线。如果执政的共产党有一条马克思主义路线，完全可以通过改革来纠正错误，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应该承认，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远比苏联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时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严重得多，然而我们通过改革开放，不仅克服了困难，而且出现了经济繁荣、政局稳定、社会安定的欣欣向荣的景象，在苏联剧变后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堡垒依然屹立在世界东方。在苏联，80年代中期存在的矛盾、困难和问题尽管比70年代末我国要少得多，程度也轻得多，却出现了向资本主义演变的悲剧。把我国与苏联的情况作一比较，我们可以看到，苏联演变的症结不在于社会主义是否有失误和弊病（这在一定程度上是难免的），而在于如何对待这些失误和弊病。在这里，路线是决定一切的。可见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的失误和弊病与苏联向资本主义演变之间虽然有一定关系，但不是一种必然的直接的因果关系，从逻辑上讲，相关性不能等同于因果关系；相应的，也不能从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被颠覆这一事实得出社会主义模式是失败的这一结论。

苏联演变的决定性的、根本的原因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集团推行一条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节选自《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年第7期）

三 抗战历史不容歪曲

中国抗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起点和终点

柳千岸

今年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回望历史，南京大屠杀、731细菌战、“三光”政策等一系列残酷暴行令人悲愤，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台儿庄大捷、仁安羌大捷等一幕幕战斗场景令人振奋，杨靖宇、左权、佟麟阁、张自忠等一个个英雄形象令人景仰。中国抗战付出的巨大牺牲、取得的伟大胜利值得永远铭记。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思索历史，如果把14年的中国抗战放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这个大背景下来审视，就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中国抗战的起点就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起点，中国抗战的终点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终点，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开始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

起点 中国抗战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起于何时？长期以来，由于受“西方中心论”的影响，外国学者大都认为起始于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近年来，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外国学者认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起点在中国。这其中又有三种主要观点：一种主张起始于1931年九一八抗战，认为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占领是全球战争冲突的开始；一种主张起始于1937年七七抗战，认为中国是第一个对抗轴心国的国家，比英法早2年，比美国早4年；还有一种主张起始于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认为这次会战

是中日双方主力部队第一次大规模正面作战。国内学者大多倾向于把1931年九一八抗战确定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起点。我们认为，把九一八抗战作为起点符合历史事实，是基于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法西斯性质得出的结论，也是基于日本自此以后持续扩大侵略的战争行为得出的结论，更是基于从那时起武装反抗法西斯侵略的中国军民的英雄壮举得出的结论。

以九一八抗战为起点，中国人民率先打响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反法西斯战争是一场正义反对邪恶、光明驱散黑暗的战斗，是世界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们同人类文明的凶残敌人进行的一场殊死搏斗。20世纪二三十年代，意大利、日本和德国法西斯先后粉墨登场，将这些国家推上法西斯侵略扩张的轨道。日本法西斯上台后，加速了对外侵略扩张的各种准备，逐步形成了灭亡中国、征服亚洲、称霸世界的狂妄构想。1927年形成的《田中奏折》，就是日本法西斯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总纲领。日本发动的九一八事变，绝不是单纯的偶发事件，而是按照《田中奏折》精心策划的“征服支那”“征服世界”棋局中的关键落子。以九一八事变为标志，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法西斯战争策源地，不仅早于意大利法西斯1935年侵略埃塞俄比亚，早于德、意法西斯1936年干涉西班牙内战，更早于德国法西斯1939年侵略波兰。从那时起，日本法西斯既是中国人民的敌人，也成为世界人民的敌人。历史把中华民族推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前列。面对日本法西斯的猖狂进攻，中国人民奋起反抗，打响了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以七七全国抗战为标志，中国开辟了世界上第一个大规模反法西斯战场。在法西斯国家侵略扩张节节升级的时候，一些强国不愿与法西斯正面抗衡，采取绥靖政策，企图牺牲弱小国家的利益与之妥协，导致法西斯的侵略野心日益膨胀。德意日等法西斯国家不断加强欧洲和亚洲两个战争策源地的战略配合，加快相互勾结、称霸世界的步伐。1936年10月，德国和意大利签订同盟条约。11月，日本和德国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1937年11月，意大利加入该协定，这标志着世界法西斯轴心国的形成。法西斯与反法西斯之间的矛盾上升为世界的主要矛盾。1937年7月，日本法西斯蓄意挑起卢沟桥事变，局部侵华战争演变为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展开了全国抗战，在世界东方首先开辟了大规模反法西斯战场。在日本战略进攻、中国战略防御期间，中日双方投入总兵力达400余万人，战火遍及中国10多个省区，战区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是当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规模最大、较量最激烈的战

场。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长达 10 年的时间里，中国一直单枪匹马对日本殊死作战，抗击着几乎全部日本侵略军，大大迟滞了日本法西斯以中国为基地侵略其他国家的步伐。美国学者弗兰克·迈克瑞分析认为，中国当时实际上扮演的是“同盟国代理人”的角色，是在为同盟国而战，也是在为世界而战。中国的坚决抵抗，为后来陆续遭受法西斯侵略的国家和民族树立了以弱抗强的光辉典范，极大地激励了他们奋起反抗的斗志。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继续发挥抗击法西斯进攻的战略支柱作用。中国战场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始终抗击和牵制着日本陆军主力和部分海、空军力量。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初期，英、美等盟军连遭挫折，日军不到半年就侵占了东南亚和太平洋上的许多国家和地区。而在欧洲战场和非洲战场，盟军也处处受挫，法西斯的嚣张气焰势头正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处于最困难的阶段。此时的中国，尽管已经疲惫不堪，但还是义无反顾地承担了抵抗日本侵略的重任，大大减轻了美英和其他盟国的压力。不仅如此，中国还顾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大局，抽调精锐之师远征国外，与盟军在东南亚战场共同对日作战。中国主动加强与美、英、苏等同盟国的战略协调，成为亚太地区盟军对日作战的重要战略基地，提供了大量战略物资和军事情报，有力支援了同盟国的反法西斯战争。1942 年，美国总统罗斯福指出，中国人民在十分不利的情况下，对于在装备上占极大优势的敌人进行了坚决抗击，所表现出的顽强，是对其他联合国家军队和全体人民的鼓舞。

在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的过程中，中国经历了从局部抗战到全国抗战，从阻击日本法西斯的前哨战发展成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完全融入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进程。中国不仅在为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而战，同时也在为整个人类的前途命运而战。正如毛泽东在 1939 年所指出：“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在这样的历史维度下认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与中国抗战的起点，就会感受到更加深沉的历史脉动。

终点 为什么中国抗战坚持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时刻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终点，以最后一个法西斯国家——日本战败投降

为标志。同时，这也是中国抗战的终点，是中国抗战胜利的标志。今天审视这个终点，应当深入思考这样的问题：最早开始的中国抗战，为什么持续最长时间，又为什么能坚持到最后胜利？

中国抗战之所以持续长达 14 年，最主要的原因是敌我国力、军力相差悬殊。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前，已经通过一系列的侵略和掠夺，特别是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攫取了大量资源和财富，成为一个实力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其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政治组织能力不仅在亚洲首屈一指，在世界上也处于前列。而此时的中国，仍然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十分薄弱。全国抗战爆发时，日本工业年产值为 60 亿美元，中国为 13.6 亿美元；日本年产钢 635 万吨、弹药 50 万吨，中国年产钢 50 余万吨，只能生产一些轻武器；日军是装备先进、训练有素的现代化军队，中国军队虽人数众多，但总体上体大力虚，装备和训练落后。实力对比悬殊，决定了中国抗战不可能很快取得胜利，不可能企求通过一两战役决战，迅速改变敌优我劣的战略形势，而必须通过持久抗战，持续地消耗和削弱敌人，从夺取局部的优势做起，逐渐扩展到敌我双方力量的平衡，再发展到夺取全局的优势。实力对比悬殊，意味着抵抗时间的漫长、条件的艰苦、战斗的残酷、牺牲的惨烈。据不完全统计，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民伤亡达 3500 万人以上。在很多情况下，中国军民几乎是以血肉之躯奋勇抵抗，以奋不顾身的精神弥补装备上的劣势，缓解战场上的危机。

同盟国实施“先欧后亚”战略，使中国争取抗战胜利的时间推迟到最后。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程中，同盟国确定了“先欧后亚”战略，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击败德国，在亚洲战场对日本采取防御战略。这意味着反法西斯的战争资源和军事力量优先投向欧洲战场；意味着中国要先配合盟国打败德、意法西斯，再争取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意味着盟国从其他战场腾出手来之前，中国不得不继续主要依靠自身力量与日本法西斯主力鏖战。在欧洲战场，苏、英、美等几大强国之间相互配合、相互支援，共同抗击德、意法西斯；而在东方战场，中国在三面受敌、外援几乎断绝的情况下独撑苦斗，以最大牺牲和代价继续将日军主力牵制在中国战场。战争期间，美国以租借形式向同盟国家提供了 460 亿美元的援助，中国只获得其中的 8 亿多美元，不到总数的 2%，是同盟国主要国家中得到外援最少的国家。中国的顽强抵抗，迫使日本无力与德国呼应，破坏了德、意、日

法西斯的军事勾结，为同盟国对其各个击破创造了有利条件。中国的浴血奋战，成功遏止了日本侵犯苏联的北进计划，消除了苏联卫国战争的后顾之忧。中国排除万难的相持和远征，打乱了日军的南下布局，从而为盟国最终战胜法西斯赢得了时间和空间。英国学者拉纳·米特说，“同盟国能在欧洲和亚洲两个战场同时作战，节节胜利，有相当大部分奠基于中国与日本缠斗不休”，西方社会不应该遗忘中国这个盟友。

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战略配合，是中国抗战坚持到最后胜利的坚固支撑。全国抗战爆发后，特别是在战略防御阶段，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组织国家主要军事力量从正面阻击日军进攻，形成了正面战场；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则深入敌后牵制和打击日军，形成了敌后战场。敌后战场实际上是日军占领区的腹地战场，也是内线战场，这是中国抗战的显著特征，堪称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观。在正面战场上，中国军队节节抗击，英勇作战，实施了一系列大规模的战役行动，遏制了日军的进攻势头。在敌后战场上，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广泛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将日本占领区变成了对日作战的重要战场，逐步成为坚持抗战、持久抗战的主力军。仅在战略相持阶段的前两年，敌后战场就抗击了60%左右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相互配合、内线外线相互支撑，构成了对日军的前后夹击战略态势，把日军死死拖在中国，使它既不能迅速灭亡中国，也不能把更多兵力投放到其他战场。而且，敌后战场的开辟还使日本始终没有在中国占领区建立起巩固的殖民统治，挫败了日本“以战养战”的罪恶图谋，使日本的战争能力日渐衰落，以致1943年下半年以后，敌后战场的侵华日军无力再发动大规模进攻。敌后军民则同心协力，不断积蓄力量，逐步具备了对日军进行战略反攻的能力。经过1944年持续一年的局部反攻，敌后战场的日军被迫逐步向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龟缩。到1945年4—5月间，随着德、意法西斯被打败，日本法西斯进入了苟延残喘的穷途末路阶段。

空前觉醒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意识，激励着中国抗战顽强地走向最后胜利。战争既是一场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的较量，更是一场民族精神和意志的较量。面对国破家亡、山河破碎的惨痛现实，面对日本法西斯的肆意蹂躏、残暴统治，中国民众在背井离乡、四处逃难的苦难过程中，切实增强了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增强了对国家统一和民族强盛的渴求。在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像抗日战争这样，民族觉醒如此深

刻，动员程度如此广泛，战斗意志如此顽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中华儿女冒着敌人的炮火共赴国难，千千万万爱国将士浴血奋战、视死如归，各界民众万众一心、同仇敌忾。曾经内战不休的各派系军队相继投入对日作战，曾经政见对立的各党派结束纷争，结成同盟抗战。广大海外华人华侨的无私援助以及世界各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也有力支援了中国抗战，坚定了中国人民必胜的信心。可以说，抗日战争的胜利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更是民族精神和意志上的胜利。日本史学家井上清说，日本不仅仅是败给了中国，正确地说，是败给了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提出并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开辟广大敌后战场，以自己的政治主张、坚定意志、模范行动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夺取战争胜利的民族先锋，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中流砥柱。

最早投入战斗意味着最早作出牺牲，战斗到最后意味着牺牲到最后。当意大利、德国法西斯先后灭亡时，日本法西斯仍然困兽犹斗、负隅顽抗；当其他国家人民迎来和平的阳光雨露时，中国人民仍然在战场上拼死苦战；当其他国家开始在战争废墟上重建家园时，中国大地仍然在经受战争的血雨腥风。试问，谁像中国这样扛住法西斯的疯狂进攻，一扛就是14年？谁像中国这样拖住那么多日本侵略军，一拖就是上百万？在这场中国近代以来规模最大、时间最长、范围最广、对手最凶残的反侵略战争中，中国人民用钢铁意志和血肉之躯坚持到最后一刻，也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推向最终胜利。

结语 东方主战场贡献永存史册

回顾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中国抗日战争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日本法西斯的彻底覆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在这场战争中，中国军队毙伤俘日军占其伤亡总数的70%以上。日本战败后，向中国投降的日军共128万余人，占当时日军海外投降总兵力的50%以上。曾参与战争指挥的盟国政要对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和贡献，有过客观公道的评价。时任英国首相丘吉尔说，如果日本进军西印度洋，必然导致我方在中东的全部阵地崩溃，而能防止上述局势出现的只有中

国。苏联元帅崔可夫说，在我们最艰苦的战争年代里，日本也没有进攻苏联，却把中国淹没在血泊中，稍微尊重客观事实的人都不能不考虑到这一明显而无可争辩的事实。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的重大贡献，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尊敬，赢得了崇高的民族声誉。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是和平力量、正义力量的胜利。战争期间，中国作为四大国之一领衔签署了《联合国宣言》，促成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从根本上改变了反法西斯与法西斯的力量对比，加快了战争胜利的进程。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的创建，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推动制定了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推动建立了以和平为中心的战后国际新秩序。战争胜利后，中国参与了对日本战犯的正义审判，使发动侵略战争、双手沾满各国人民鲜血的罪魁祸首受到应有的惩处，伸张了国际正义，维护了人类尊严。

抗日战争不但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反侵略战争，而且是中华民族由灾难深重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抗战胜利70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日益繁荣富强的中国、一个充满生机希望的中国已经昂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今天，我们纪念中国抗战的伟大胜利，就是要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坚定不移地捍卫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地维护世界和平，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

（原载《人民日报》2015年9月2日第7版，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9月29日转载）

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是中国共产党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

——兼论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两条路线、
两个战场的关系

李慎明 张顺洪

2015年7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要“着力研究和深入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意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等重大问题”^①。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这一指示，十分重要。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取得的第一场反侵略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任何重大结果总是有着多个原因，但根本原因只能有一个，这就如同任何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只能有一个一样，否则就是“二元论”。

现在，大家都已基本形成“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胜利的中流砥柱”这样一个共识，但追根溯源，这一结论是不是问题的最终答案或顶层答案的根本性因素呢？

在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第二个月，毛泽东在他的哲学名著《矛盾论》中指出：“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②当然，一个政党要引导一个国家和民族取得建设和

① 《人民日报》2015年7月31日。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3页。

改革的胜利，最为关键、最为重要的也必须依靠自身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的正确。

真正理解毛泽东的上述结论，不仅对于正确总结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的经验，而且对于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们丝毫不否认蒋介石及其政府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甚至在特定条件下的重要贡献。在这场事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战争中，国共两党有一些相同点，但也存在着不少根本性的差异。对国共两党和正面、敌后两个战场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一直有着不少的争议，本文试图结合对主题的阐发，对相关问题也顺便作出一些解读。

一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制定并执行了正确的政治上的路线

1. 中国共产党主张坚决抗战，彻底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立即发出了抗战宣言，动员全民抗战。1932年4月15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又正式对日宣战。而国民党政府却在日军侵华的前几年，不仅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反而坚持“攘外必先安内”，调动大军“围剿”红军。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简称“七七事变”）爆发，翌日，中共中央即向全国发出通电，呼吁全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国共两党合作抵抗日本的新进攻。同日，毛泽东等又致电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愿为国效命，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1939年6月，毛泽东发表《反对投降活动》一文，针对国民党的妥协投降倾向指出：“我们仅仅愿意和全国一切爱国党派、爱国同胞一道，巩固团结，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国共合作，实行三民主义，抗战到底，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而不知其他。”^①当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溃退之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却迎着喧嚣的日本侵略者挺进敌后，开辟敌后战场。这些事实不仅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坚决抵抗日本的侵略，还体现出中国共产党抗战的坚定性和全面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71页。

性，把抗战进行到底作为自己始终不渝的路线。而蒋介石政府却不时表现出严重的对日妥协投降倾向。

2. 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实行全民抗战。

七七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及其国民党对抗战胜利没有任何信心。蒋曾对身边亲信透露“可支持六个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周佛海也断言：“中国人的要素，物的要素，组织的要素，没有一种能和日本比拟，战必败。”

而早在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就指出：“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这是有目共见的真理。”^①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的《论持久战》，更是阐发了中国民众中蕴含的巨大能量，强调弱国要想不被消灭而且战胜强国，就必须让全民动员起来，进行人民战争，才能取得持久抗战的胜利。^②

3. 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推动建立并努力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忠诚的倡导者、推动者、维护者、组织者和执行者。中国共产党首先向全国人民宣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呼吁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积极协调、推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目的就是要“联蒋抗日”，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精心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虽然蒋介石政府实行“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政策，但毛泽东在1939年7月9日对陕北公学开赴华北抗日前线的同学讲话中仍指出：现在时局的特点是妥协投降分子要闹分裂，我们就以抗战的进步、全国的团结、坚持统一战线来对付。一定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长期合作。^③在抗日战争进行到中期的1941年，蒋介石及其国民党背信弃义，竟然对与之合作抗日的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发动围剿（即皖南事变），新四军9000多人被国民党80000多人包围，除2000余人突围外，3000余人壮烈牺牲，3600余人被俘或失散。即便如此，中国共产党仍然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5页。

②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研究室科研部编：《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上卷，中央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60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订本）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32页。

把民族存亡看作山重，对国民党以德报怨。皖南事变一发生，毛泽东在会见印度援华医疗队的巴苏华时即指出：中国共产党仍坚持把日本侵略者作为打击的主要敌人。如果国民党企图破坏这一全国的主要政治方向，它必将遭到反击，它的计划必将失败，但中国共产党绝不鼓励内战。^①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的整个历史时期，始终致力于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还努力团结全国各类抗日民主力量，发展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以结成最广泛的巩固的统一战线。

4. 中国共产党挺进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和有条件的运动战，建立敌后根据地。

这是中国共产党根据自身特点制定的正确的作战方针。抗战初期，当国民党的军队大步后撤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却挺进敌后，建立敌后根据地，开辟敌后战场，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和有条件的运动战。毛泽东指出：我们所谓独立自主是对日本作战的独立自主。战役战术是独立自主的。抗日战争总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一部。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战略上是统一的，游击战是独立的，即统一中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② 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在敌后牵制、打击日军，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友军作战。敌后根据地的广泛建立和敌后战场的开辟，坚定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分子。

二 正确的思想上的路线是正确的 政治上的路线的根基

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她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党的遵义会议后，逐渐形成了符合自己国情、党情的正确的思想上的路线。

红军长征到达延安之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带头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订本）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54页。

^② 同上书，第238页。

基本理论。毛泽东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强调，全党要普遍地、深入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反对教条主义。为了使党找到并统一到正确的思想路线上，全党开展了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此次整风使得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与思想水平不断提高，教育全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识问题、分析问题。整风运动加强了党风、学风、文风建设，使党变得更加成熟、更加强大。

正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很好地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分析当时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与发展变化中的国际形势，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及组织路线，才保证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

1. 中国共产党深刻地认识到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和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人类社会的发展不断从低级阶段走向高级阶段。作为无产阶级的先进政党，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人是生产力的决定性因素，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无产阶级要实现自身解放，必须要有代表自身利益的政党和党的革命理论；夺取政权是实现无产阶级解放的途径。党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和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深刻认识，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抗战的全民抗战路线；也决定了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始终坚持正确的战略策略，主导和领导统一战线。

2. 中国共产党紧紧抓住中国面临的主要矛盾——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急剧上升。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多次发表宣言，并且作出决议，号召工农红军和被压迫的民众开展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①工农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派遣军队奔赴抗日第一线。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1921—1949），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335页。

1937年3月，毛泽东指出：中日矛盾是主要的，国内矛盾降到次要的地位。^①1937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告全党同志书》，指出：“我们要求全党同志在任何曲折变化的形势下，紧紧抓住中日两国间的基本矛盾，作为自己一切行动的基点，认定中华民族的最大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并坚信这个敌人我们是能够战胜的。”^②而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就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3. 共产党人拥有先进的无产阶级世界观、价值观和勇于为国家、民族和共产主义事业而牺牲的精神。

中国共产党人有着崇高的革命理想，其最终目标是实现劳动阶级的解放和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因此，共产党人具有无私无畏的战斗精神和牺牲精神，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随时准备做出自我牺牲，甚至献出宝贵生命。在抗日战争中，无数共产党人冲锋陷阵，与日寇浴血奋战，英勇牺牲，成为全民族抗战的模范。在谈到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时，毛泽东说：“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③

反观蒋介石政府的高级官员，许多本身就是大资产阶级，有的甚至是官僚买办阶级。1939年10月，日本特务机关对国民政府官员在上海外国银行存款的一个秘密报告说，蒋介石拥有资产809万美元、宋美龄有377万美元、宋子文有637万美元、孔祥熙有635万美元。^④这在当时，都是天文数字。国民党许多高级官员及其军队中的高级将领，在抗战中不是身先士卒、浴血奋战，而是利用特权中饱私囊，大发国难财。靠这样的官员、将领，能够带领军队和人民打胜仗吗？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66页。

② 同上书，第671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9页。

④ 参见杨津涛《蒋介石究竟有多少财富》，《时代人物》2014年第11期，第116页。

三 从国共两党在两个不同战场上的不同作用 看中国共产党思想上政治上路线的正确

2015年7月30日，习近平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和记述历史，把历史结论建立在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的基础之上。要坚持正确方向、把握正确导向，准确把握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主流、本质，正确评价重大事件、重要党派、重要人物。”^①这一讲话十分重要。

从整体上说，共产党对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作用和地位是充分肯定的。毛泽东在1945年的《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中国是全世界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五个最大的国家之一”，“中国在八年抗日战争中，为了自己的解放，为了帮助各同盟国，曾经作了伟大的努力。这种努力，主要地是属于中国人民方面的。中国军队的广大官兵，在前线流血战斗，中国的工人、农民、知识界、产业界，在后方努力工作，海外华侨输财助战，一切抗日政党，除了那些反人民分子外，都对战争有所尽力。”^②其中所说的中国军队的广大官兵就包括了国民党军队。

近几年来，一些人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的作用提出质疑，又罔顾事实对国民党蒋介石政府进行“颂扬”。让我们从国共两党在不同战场所起的不同作用中寻求答案，看看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思想上、政治上路线的正确。

从大的方面讲，我们可以把整个抗战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从国民党的角度看，可以把抗战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的七七事变，即东北沦陷阶段。在这一阶段，共产党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而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对日寇采取了“不抵抗”的妥协退让政策。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留驻东北的有近20万人，而日寇在东北的各种军队包括警察，总共2万余人，人数相差约10倍，东北军的兵力明显占优势。^③但蒋

^① 《人民日报》2015年8月1日。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3页。

^③ 《中国抗日战争史》编写组：《中国抗日战争史》，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8—41页。

却将东北的大好河山拱手让给了日寇。

第二阶段，从七七事变到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在此阶段，国民党军队共投入80多万兵力，先后组织了淞沪、沂口、徐州、武汉等一系列大战役。虽然战斗十分激烈，但国民党军队却无一取胜。在此阶段，日本侵略者把国民党军队作为主要作战对象，是因为国民党军队占据着中国的各大城市和主要交通要道，日本急于占领整个中国并以此高压姿态逼迫国民党政府投降。在此阶段，国民党政府对日作战总体上是态度积极，同时也是抗击日军战略进攻的主力军。

第三阶段，从广州、武汉失守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在此阶段，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接连失败，而国民党却是积极反共。广州、武汉陷落后，日本十分清楚国民党的底牌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便对国民党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国民党也投桃报李，在1939年1月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成立了“防共会”，确立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并把坚持抗战的内涵解释为“恢复到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①。这年4月，山东国民党军残杀八路军团级以下干部400余人。6月，国民党秘密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规定“共产党活动最烈之区域应实行联保连坐法”。此后，共产党被称为“奸党”，人民军队被称为“奸军”，解放区被称为“匪区”，许许多多英勇抗战的共产党员和人民战士没有死在日寇之手，却惨遭国民党杀害。整个抗战期间，如果不是蒋介石及其国民党对共产党人的屠杀和对新四军的围剿，抗日战争的胜利会更早到来。总之，在此阶段，国民党政府也组织过桂南会战、枣宜会战等，国民党军队也对日寇进行过一定的抗击，但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成为国民党政府这一阶段的总基调。

相反，共产党积极创建敌后根据地，广泛开展游击战，牵制了大量日军，有力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并使人民抗日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到1940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从抗战开始时的5万多人发展到50万人。除陕甘宁边区外，在华北、华中和华南地区建立了16块抗日民主根据地，拥有近1亿人口，成为全国抗战重心。^②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订本）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07页。

^②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1921—1949），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548页。

第四阶段，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到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在此阶段，由于日本袭击珍珠港，使得美国宣布对日作战。这样，抗击日寇的力量就强大了许多。另外，在这一阶段，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已十分强大，再加上大片根据地民众的力量，使得这一阶段的抗日力量已优于侵略者，抗日战争进入到战略反攻——即取得最后胜利阶段。

下面我们举例来说明国共两党在抗战后期的作用。

1943年8月13日，毛泽东致电中共各中央局、中央分局指出：“据今年七月统计，全部在华日军三十六个师六十万人，国民党只抗击二十五万人，共产党抗击了三十五万人。全部汪精卫、王克敏的伪军六十二万人（大部分是蒋介石军队投敌伪化的），国民党只牵制了广东方面的六万人（但并不攻击他们），在华北、华中五十六万伪军，均为共产党所抗击，国民党对之一枪不打。”^①

1944年6月22日，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向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介绍中共抗战的一般情况时指出：中国抗战，一开始就分为正面和敌后两大战场；而自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以后，敌后战场就在实际上成了中国的主要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现有47万多人，在1944年3月以前，抗击了侵华日军的64.5%；国民党的军队有几百万人，只抗击了侵华日军的35.5%。如果把全部日军和全部伪军合计起来，则在1944年3月以前，共产党的军队抗击日伪军总数134万人中的110余万，即84%，国民党的军队只抗击了16%。

1944年9月18日，毛泽东在招待八路军战斗英雄代表的大会上讲话：“武汉失守以来，特别是最近二年以来，中国抗战形势发生了显著的巨大的变化。现在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人民部队抗击了在华的敌伪军六分之五，国民党只打了六分之一。豫湘战役，敌人如入无人之境，情形极为严重。中国不亡，是由于有了我们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主要地由我们支持了抗战局面。这就是今天中国的抗战形势。”^②

1944年10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社论《新四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订本）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65页。

^② 同上书，第546—547页。

军的胜利出击与中国的救国事业》。社论指出：今年一至六月，新四军作战一千余次，俘敌伪军一万余人，缴枪一万一千余支，攻克敌伪据点四百二十座。七月以来的三个月中，进行大战役十三次。总计今年新四军的胜利出击，解放国土十余万平方公里，人口五百万以上。

有人说，国民党军队打了几十场大会战，战死上百万，损失了上百位将军。抗日战争不是用游击战、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就能打赢的。它是用重兵集团与敌人浴血奋战才打赢的。国民党才是抗战的中流砥柱。让我们看看如下实际情况。

抗日战争中，蒋介石丧失国土共 275.3 万平方公里。当时全国城市 1200 余座，丢弃 1100 余座；当时全国人口 4.5 亿，遗弃同胞 2.8 亿。^①

据《剑桥中华民国史》记载：国民党军队“叛逃的将军 1941 年有 12 个，1942 年有 15 个，1943 年是高峰的一年，有 42 人叛逃。50 多万军队跟随这些叛逃的将军离去，而日本人则利用这些伪军去保卫其占领的地区，以对抗共产党游击队”^②。

日军开始时把八路军、新四军并不放在眼里，按 1:10 进行战斗配置。屡吃败仗后，改为 1:5 配置，后再改为 1:3 甚至改为 1:1 配置。日军对国民党军队的战斗配置却是 1:10，即以一连建制的中队或加强中队打国民党军队一个团，且几乎每每得手。

抗战期间，协助日军作战的伪军人数高达 210 万，超过侵华日军数量，使中国成为唯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伪军数量超过侵略军数量的国家。这些伪军的绝大多数，却是来自国民党军队。而整个战争期间，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对敌作战 12.5 万次，消灭日、伪军 171.4 万人，人民军队发展到 120 余万人，建立了约 100 万平方公里、近 1 亿人口的 19 块抗日根据地。

有人说，抗日战争中，共产党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是消极避战，壮大自己。开始抗日时，只有 5 万余人，抗战结束时，已多达 120 余万正规军。这是共产党消极避战的明证。

抗战胜利时，共产党军队组成部分都在与日寇短兵相接之处，而国民

① 参见陕西省《东方红》2005 年第 3 期，第 46 页。

② [美] 费正清、费维恺编：《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下册，杨品泉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567 页。

党的许多军队却在与敌相距千里的大后方。连日本陆军大将、侵华日军战犯冈村宁次都承认：“共军的确长于谍报（在其本国以内），而且足智多谋，故经常出现我小部队被全歼的惨状。”^①日本随军记者藤原彰也说：“八路军的战术是，如果看到日军拥有优势兵力就撤退回避，发现日军处于劣势时，就预设埋伏，全歼日本士兵，然后夺走他们的所有武器装备。”^②

再看看台湾史学家陈永发所说：国民政府向来自居民族主义的正统，指责中共乘其全力对付日军进攻之时，在日军未能占据的广大敌后农村地区活动，仅以一分的力量抵抗日军侵略，而以七分的力量扩大自己的实力，并以二分的力量应付反对中共“破坏”抗战的政府当局。国民政府这种指责，预先假定应付、扩大和抗日三事可以截然划分，而相互之间是此长彼消，此消彼长的关系。在抗战开始时，国民党的军队为二百万，到抗战胜利时，竟然膨胀到六百万。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才是靠消极避战获得的。而共产党的军队从5万余人到120余万人，却是在抗日战争的浴血战斗中成长壮大的。

据以上事实和数据，从总体和本质上说，国民党政府虽然也曾在抗日战争中处过“中流”的位置，但它往往动摇、彷徨、妥协、退让，结果是消极抗战、溃散甚至溃逃，并没有起过“砥柱”的作用。

从1937—1945年，国民党的正面战场共进行了22次重大战役，歼灭日军100余万，国民党军队伤亡321万。国民党军队的广大爱国官兵更是在前线与日本侵略者浴血作战，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这些，都很值得全民族尊敬与纪念。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节选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动态》2015年第101期）

① [日] 稻叶正夫编写：《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冈村宁次回忆录》，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5页。

② [日] 藤原彰：《中国战线从军记》，林晓光译，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5页。

正确认识东方主战场的伟大作用

陈谦平

“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为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争取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习近平同志的这一精辟论述，高度概括了中国抗战作为东方主战场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历史贡献。

首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以东北抗日联军为主体的东北局部抗战，拉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策源地，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正义战争有力遏制了日本军国主义奴役亚洲、太平洋地区各国人民的野心，中国战场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主战场当之无愧。

日本称霸亚太地区的图谋由来已久。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就借口英日同盟对德国宣战，占领了德国在胶州湾的租借地。1915年1月，日本秘密向袁世凯政府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1919年4月底的巴黎和会，又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省的一切权益让与日本。1927年4月，田中义一上台即制定了将“满蒙”从中国分离出去、武力干涉中国内部事务的政策，并派兵侵入山东，阻止国民革命军的二次北伐，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日本军国主义政府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将中国变成日本的殖民地。

1931年，日本关东军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四个半月内占领东北三省，并建立起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尽管南京国民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但从马占山的江桥抗战到东北义勇军的奋勇抗日，表明中国人民的局部抗战已经开始。从1932年起，中国共产党就成为东北局部抗战的领导力量。中共满洲省委先后将东北三省的各路抗日武装加以整合，于1936年2月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至全面抗战爆发前已达3万余人。

其次，七七事变的爆发是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标志着以国共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

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中国各党派和各民族人民，“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浴血抗击日本侵略军，使中国战场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主战场。

由于欧洲中心论的影响，欧美主导的国际学界一直不愿将日本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而是将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他们不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有两个策源地。众所周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欧美列强不仅不援助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正义战争，还对华实施武器禁运。当时只有德国和苏联向中国提供了军事援助。德国对中国抗战的军援主要是基于急需获得重要战略原料——钨矿；而苏联则是出于中国抗战对苏联国家安全的考虑，因为只有帮助中国抗击日本，让中国成为抗击日本侵略的主战场，苏联东部边界才能获得安全保障。

实际上，中国抗日战场从一开始就释放出巨大能量。从1937年7月至1941年12月，国共两党依靠以步枪、手榴弹、轻重机关枪、迫击炮和少量大炮为主的轻步兵军队，单独抗击拥有飞机、航母、坦克、装甲车、重榴弹炮的日军机械化部队达4年半之久。面对叫嚣要在3个月内灭亡中国的狂妄、不可一世的日本军队，中国军民同仇敌忾，浴血抗敌，让装备精良的日本侵略军付出了沉重代价。淞沪抗战历时3个月，中国动员精锐部队70万，让日本军队不断增兵，并付出了死伤4万人的惨重代价。参加平型关战役的八路军第115师重创日军板垣征四郎第5师团第21旅团一部，歼敌千余人，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1938年3—4月，中国军队采取阵地战的守势与运动战的攻势相结合的战术，诱敌深入，在台儿庄重创日军第5、第10师团各一个旅团，歼灭日军1万余人，极大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而历时四个半月的武汉会战，毙伤日军近4万人，极大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打破了日军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战略妄想。

日本侵略军由于战线过长，军力和财力已显不足，特别是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日本占领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有力地钳制着日军在正面战场的进攻，支援了正面战场的作战，迫使日本从1939年起将速决战改为持久战。这一时期，日军发动的两次长沙会战都付出了惨重代价，并以失败告终。而八路军在华北发动的百团大战，历时3个月，歼灭

日伪军2万余人，更是突显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反观此时的欧洲战场，面对德国纳粹军队的“闪电”攻势，英法联军无力抵抗，马其诺防线形同虚设，敦刻尔克大撤退标志着欧洲大陆的沦陷，而1940年7月1日维希傀儡政权的建立，更成为法国与英美的耻辱。

再次，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使中国战场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主战场，也是亚洲大陆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唯一陆地战场。

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军突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由此爆发。在随后的5个月内，日军接连攻占中国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菲律宾，进攻东印度群岛，进而威胁澳大利亚。英美军队依然兵败如山倒，倒是中国远征军在缅北孤军作战、力挽狂澜，但终因英国军队放弃缅甸而陷于绝境。

直到此时，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才赢得了世界反法西斯国家的广泛尊重。英国《泰晤士报》于1942年1月5日发表社论，盛赞“中国人民能忍受四年余之痛苦，并以全力挫败”日本的壮举；美国《纽约时报》则于同一天发表社论，高度评价了“中国战场之重要”，指出，在日本突袭珍珠港的“一个月以前，多数美国人尚很难了解中国战局与美国具有直接之关系，现在则尽人皆知，中国之战事，即为我们的战事，中国对日本施压之压力愈大，则我麦克阿瑟越有战胜之机会”。

从1943年10月开始，中国驻印军和远征军先后在缅北和滇西发起反攻，至1945年3月，收复缅甸北部和云南西部大量失地，歼灭日本驻缅甸军近5万人，打通了中印交通线。与此同时，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分别在华北、华中和华南敌后战场展开攻势，攻击歼灭日伪军47万人，攻克城市70余座，收复国土32万平方公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中国战场，拖住了包括中国派遣军、关东军、驻朝鲜军和驻缅甸军在内的日本陆军约200万兵力，迫使日军不得不终止从中国战场向东南亚战场增派援军的计划，有力配合了美国海军在太平洋的对日作战。

总之，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东方主战场，中国军民歼灭日军150余万人，以伤亡3500余万人、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约6000亿美元的代价，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8月11日）

东方主战场的不朽丰碑

曹大臣

第二次世界大战，由日德意发起，世界各地 60 多个国家相继卷入，形成东西方两大战场。中国的抗日战争居于东方主战场地位，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具有彪炳史册的历史功勋。

第一，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十年，中国孤军抗战，是消灭日军的唯一战场。1941 年珍珠港事件爆发以前，日本侵华分为两个阶段。1931—1936 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其后占领中国东北地区；1937—1941 年，日本发动七七事变，逐步占领华北、华中及华南大片地区。在第一阶段，中国军民在白山黑水之间，在古老的长城沿线，奋勇进行局部抗战，至 1936 年 7 月，日军在东北“战死、病死、受伤、冻伤者达 17 万人以上”。另据日本官方资料显示，日军在“满洲事变”中战死人数为 17176 名。在第二阶段，中国进入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组织兵力，与日军先后进行了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南昌会战、随枣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桂南会战、枣宜会战、豫南会战、上高会战、晋南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等数次会战。中国共产党开创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创造了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等战术，取得了百团大战等战役的胜利。粉碎了日军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增强了中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据（日本靖国神社资料）统计，1937—1941 年间，共有 191250 名日军死于中国战场。

第二，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中国仍是消灭日军的主战场。1941 年 12 月 8 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并向美英宣战。12 月 10 日，日本政府决定：对美英战争及今后可能发生的战争，包括“支那事变”在内，统称为“大东亚战争”，中国的抗日战争由此进入第三阶段。这一时期，中国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所抗击的日军兵力，超过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总和。

1941年12月，中国各地抗击日军（包括关东军）35个师团，计138万人，占日本陆军总人数的65%。1942年，日军在华北、华中的兵力达55万余人，其中用于巩固占领区的约有33.2万人。到1943年12月，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兵力由1941年12月的10个师团增加到23个师团，但中国仍抗击着日军39个师团，约128万人，占日军师团总数的55%。1944年4月，日军为打通大陆交通线，援助东南亚日军，实施“一号作战”，五六十万日军向豫湘桂地区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国民党军虽然节节败退，但仍坚持抵抗了八个月。据靖国神社资料显示，日军在太平洋战争期间（1941—1945年），共战死2133915人（包括中国战场）。另据战后日本厚生劳动省的统计，1931—1945年，死于中国战场的日军总数达711100人，其中东北245400人、其他地区465700人。可见，中国的抗日战争，对日军特别是陆军的彻底覆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第三，中国作为东方主战场，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1941年12月9日，中国政府向日德意宣战，与美英苏等国协同作战，成为反法西斯阵营的重要一员。从1942年4月起，中国先后为盟国提供昆明、成都、桂林、衡阳、衢州等空军基地，以轰炸沿海日军船舰及东京等战略目标，支援了盟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对日作战。中国还为美国提供了7.4785亿美元的桐油、锡矿和钨矿产品；为英国提供了1.148亿英镑的农矿产品。当时，罗斯福高度评价中国的抗战作用，他认为：“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日军因此可以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日军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夹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吞并埃及，切断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1942年3月，应英国政府要求，10余万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取得了仁安羌等战役的胜利。1943年11月至1945年3月，中国军队在滇西和缅甸北部与盟军共同对日作战，歼灭日军16万余人。中国政府在国内抗战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开辟了海外战场，在战略上策应和支持了盟国作战，打乱了日本和德意战略配合的意图。中国的抗日战争，还使苏联免除了后顾之忧，支援了苏联的对德战争。斯大林曾经表示：“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在苏德战争中，正是因为中国战场拖住了关东军主力，牵制了日军的“北进”，苏联才能放心地把远东百万兵力不断西调，西伯利亚成为对德作战的后方基地。

第四，中国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压迫最深，抗战损失最为惨重。日本侵华期间，中国大片地区沦为战场，人民惨遭战祸，生命财产损失甚巨。1932年3月，日本建立伪满洲国，对东北地区实行殖民统治。其后，又分别在1937年12月及1938年3月建立“临时政府”和“维新政府”，控制华北及华中地区，并最终于1940年3月扶植成立汪伪政权。日本对外侵略期间，在他国建立新的“国家”，仅“满洲国”一个，这个“国中之国”存在长达14年之久。日本统治东北期间，为“集村并屯”，制造了多起惨案；在华北，日军实施“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在华中及华南地区，日军实行“扫荡”与“清乡”，其中南京大屠杀惨案震惊世界。日本侵华期间，中国人民流离失所，陷入苦难深渊。据不完全统计，14年间，中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按1937年的比值折算，直接经济损失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多亿美元。苏联在1941—1945年卫国战争期间死亡约2700万人，美国共有40多万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丧生，英国有27万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亡。相比较而言，中国军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承受的损失最为惨重。

第五，中国的主战场地位，离不开盟军的支持。在抗战初期，中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1937年10月，250余名苏联空军赴华作战，到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前，在华苏军飞行员约2000人，其中约200人战死。苏联还向中国政府输送飞机、坦克等军用物资，并于1938—1939年先后三次提供约3亿美元的贷款。1941年3月，美国宣布《对华租借法案》，改变孤立主义政策，开始取代苏联成为中国抗战的主要援助者。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陈纳德以私人名义，在美国招募了100多名飞行员和机械师，组建“志愿航空队”赴华参战。1942年，中美共同开辟“驼峰航线”，向中国运输了大批战略物资。英国、法国等国家也以不同方式向中国提供了经济及军事援助。在中国的抗日队伍中，还有来自越南、加拿大、印度以及德国、罗马尼亚乃至日本的反战人士。1945年8月，苏联红军对日作战，以伤亡3.2万余人的代价，击毙日军8.3万人、俘虏日军60.9万人。8月6日、9日，美国在广岛、长崎投放原子弹，其后直接占领日本本土。1945年8月15日，裕仁天皇广播“终战诏书”，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9月2日，日本签署投降书。这里必须指出，美苏军队在抗日战争中消灭了大量日军，加速了日本的败降，功不可没，但美苏歼灭日军主要是在战争后期，此时日军已成疲惫之师、强弩之末，兵力大多是匆

匆拼凑而成，失去了战斗力，或无战斗意志，这与中国军民在战争初期消灭的日军精锐不可同日而语。

中国军民在东方主战场的顽强抗敌精神，还鼓舞了被侵略国家的民心士气。1942年2月7日，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致电蒋介石称：“中国军民不顾极端劣势，抵抗装备远为优越的敌人，进行了将近五年的自卫，给了其他盟国的人民及战斗人员一种鼓励。”日本侵华之时，中国居于弱国地位，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共赴国难，在万山丛中，于青纱帐里，浴血奋战，不畏牺牲，“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树立了一个以弱胜强的光辉范例”。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重新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使中国人民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尊敬”。一个民族的发展，犹如大河奔流，在不息的涌动中，暗藏着民族精神与大义，此种精神在浪花间闪耀，与天地同在，与日月同辉。在河流奔腾的过程中，我们不希求不会从山间突然落下巨石，只希求在巨石落下的时候，河流能够依靠自身力量，冲破一切阻力，依然滔滔向前。

中华民族在东方主战场的不懈抗争和艰苦奋斗，不但赢得了自身的解放，而且为世界的和平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人类文明史上铸下了不朽的历史丰碑。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边政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1月26日）

正视历史事实 深化抗战研究

——访中央党校教授李东朗

唐红丽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在70年前的那场战争中，中国军民团结一致、众志成城、浴血奋战，共同谱写出一部可歌可泣的抗战史。但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不能正确评价这段历史的言论和观点，比如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所发挥的作用和贡献、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等等。围绕中国抗日战争研究中的焦点问题，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李东朗。

一 以牺牲人数衡量抗战贡献失之偏颇

《中国社会科学报》：70年前的那场战争，中国军民团结一致，共御外敌。有一种观点提出，国民党军队在抗战中伤亡300多万兵力，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牺牲人数少，并以此判断双方在抗战中的贡献。如何看待这样的观点？

李东朗：应该说，从这样的角度去认识和评判国共两党的抗战贡献，不科学。

《中国社会科学报》：为什么这么说？

李东朗：所有在抗战中牺牲的将士都值得敬仰，中华民族应永远记住他们。但以牺牲人数评价抗战贡献，失之偏颇。作战的基本原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凡自己损失小而消灭敌人多的作战，其对战局的积极影响大，具有战略意义，贡献就大；而导致自己伤亡惨重甚至全军覆没的战役或战斗，其决策必然存在问题，对战争形势有着消极影响，绝不能简单地因其牺牲大就说它贡献大。当然，虽然也存在付出很大代价但有战略意义

的作战，但这是特殊现象，是少数。因此，对战争贡献应做具体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报》：是不是与双方的战略战术也有关系？

李东朗：对。这就要说起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不同特点。正面战场实行阵地战，在激烈战斗中伤亡可能就大，尤其是许多作战都是简单的硬防死守，结果在日军优势武器的进攻下，往往损失很大，甚至因为损失大而对战局产生很大的不利影响。敌后战场采取机动灵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避开敌人的优势，专门寻找敌人的劣势打，所以虽然也有重大牺牲，但总体上损失小，战果大。

另外，也要看到八路军、新四军的牺牲也很大，这是由敌后战场环境险恶、战争频仍造成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还有观点以共产党“牺牲的高级将领人数太少”来评判双方的贡献。

李东朗：有这种现象。我们要知道，由于国民党的严厉限制，八路军、新四军编组时，干部大都是“降职使用”。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团长在红军时期多是师长甚至军长，无疑是高级将领，而在其后因国民党拒不同意中共扩大编制，所以，许多八路军、新四军的将领也就享受不到将军的军衔。

据统计，国民党军队牺牲的将官有 240 多人，其中包括牺牲后被追授为少将的；八路军牺牲的团以上干部达 640 多人，新四军牺牲的团以上干部有 300 多人，还不包括东北抗联牺牲的高级将领。了解到抗战时期军衔制实行的实际情况，也就更清楚这种观点的偏颇了。

二 “游而不击”论和“坐大”论站不住脚

《中国社会科学报》：一直以来，都存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游而不击”“坐大”等言论。这些言论是怎么产生的？

李东朗：“游而不击”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在确定反共方针后污蔑八路军、新四军的一种说辞。“坐大”论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攻击共产党的一种言论。但两者都站不住脚。

《中国社会科学报》：“游而不击”和“坐大”论不符合哪些历史事实？

李东朗：从情理和逻辑上讲，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的大规模活动，特别是通过广泛的抗日游击战建立广大抗日根据地，是对日本占领秩序的破坏，更是对其掠夺占领区资源“以战养战”战略的沉重打击，这是日军绝不能容忍的。在敌后存在和发展是极其艰苦卓绝的伟业，必须用战斗来完成。中共抗日武装只有坚决抗战并打退日军的“扫荡”，才能在敌后坚持和生存下来。也就是说，只有“抗”，方能“大”，坚持敌后抗战绝不是“游而不击”和“坐大”能实现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有没有更多证据表明“游而不击”和“坐大”论站不住脚？

李东朗：中共武装英勇抗日的记述，不胜枚举。这里仅用日伪的记述和评论予以论证。

时任日本华北方面军副参谋长的武藤章大佐回忆，1938年秋，日本在华北占领区内的“治安恶化，每天都听到炸毁铁路的消息，连北平也受到威胁。尤其是共产党军队以山西省山区为根据地，向平汉线和津浦线之间、山东省山区地带，继而向冀东地区扩大组织，巧妙地开展游击战，在日军防守的缝隙中猖狂地扰乱治安”。所以，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部的文件说：“剿匪的重心必须指向共产党。”1940年1月，即将卸任的日本首相阿部信行就中共抗日武装威胁日本占领区的情况说，共产党势力伸展到400多个县，“共产党就是阻碍新中国（指伪政权）的发展，扰乱东亚新秩序的最大的元凶”。同年2月，河北省日本特务机关就管区内的治安状况称：“共产党八路军所取得的地盘，则占有保定道的全部、河北省80%的地区。如今，河北省成为中共独占的活跃舞台，这给扶植、建立新中央政权（即伪政权），带来致命的打击。”

1940年10月1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部在《对华北方面共产党势力的观察》中指出：“共产党军队极为巧妙而又坚决地采用机动的游击战法，为我治安最大之癌。”日本华北方面军第一课高级参谋寒川吉溢大佐回忆说，在1944年秋，日本所侵占华北的400多个县中，139个县已经为中共收复，295个县只有县城和几个村庄仍为日本所控制，其余广大农村地区已经为中共所控制，只有7个县才几乎完全为日本控制。

1944年6月8日，汪伪官员江亢虎在《反共方案》的文章中哀叹：“事棘矣！寇深矣！八路军已弥漫华北，新四军已遍布江淮，京沪一带，均受威胁。”1945年3月25日，汪伪政权的二号人物陈公博也惊恐地对属下

人员说：“现在共产党非常猖獗，新四军到处扰乱。”中共抗日力量积极作战，给日本侵略者沉重打击的事实，从日伪官员的惊恐描述中可见一斑。而这些绝不是“游而不击”“坐大”所能够产生的。

三 “八年抗战”与“十四年抗战” 两说并不矛盾

《中国社会科学报》：过去我们一直说“八年抗战”，现在我们一般称为“十四年抗战”。您如何分析这两种不同的表述？

李东朗：这主要涉及和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关于“抗日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的表述。普遍认为，作为中国人民或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史，即战争史、专史或中国人民抗日斗争史，应该从九一八事变开始。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一直在进行，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也一直持续不断。此即中国抗日战争“十四年论”。而作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特定时期、中国通史上的一个阶段的抗日战争史，即抗日战争时期，应以七七事变为起点。因为七七事变以前的对日抗战还不是整个国家政治生活的中心，国内阶级矛盾仍是主要矛盾；七七事变爆发后，抗战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中心任务。此即人们通常说的“八年抗战”。两说并不矛盾，而主要是从什么角度去考察中国抗日战争。

二是关于“抗日战争”概念的认识。有一种观点认为，抗日战争是中日两国之间的战争，而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是国家行为，必须由唯一能代表国家的政府主持领导，以国家的武装力量为战斗主力，这是一切国与国之间战争的本质属性。用之去考察中国的抗日战争，1937年以前的许多“抗战”不具有上述属性，因此就不属于中日战争、中国抗日战争。持此观点者因此认为中国抗战从1937年7月起，到1945年8月止，是“八年抗战”。

但是，我们要有这样一个明确的认识：6年局部抗战和8年全民族抗战一脉相承，共同组成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

《中国社会科学报》：为什么会产生这种不同的认识？

李东朗：症结在于中国抗日战争的特殊性。众所周知，中国抗日战争经历了曲折复杂的过程。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当局实行“不抵抗

主义”，其后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方针，直至七七事变后才决策抗日。而在此期间，中国发生了多次由民众也包括国民党正规军反对日本侵略的抗战，如东北义勇军的抗战、一·二八淞沪抗战、热河长城抗战、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抗战、东北抗日联军抗战、热河抗日救国军抗战、绥远抗战等。也就是说，中国的抗日战争经历了由“局部抗战”发展到“全面抗战”的过程。这种不同于世界现代历史上国家之间战争的特殊性，引发了对中国抗日战争认识的不同。

四 割裂两个战场、忽略敌后战场有违事实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抗日战争由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和国民党坚持的正面战场组成。但在两个战场关系的认识方面，存在一些误区。

李东朗：是的。这些误区表现在，一是割裂两个战场。近年来，我们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给予了充分肯定，但在一些人的认识中，仍存在突出一个战场而忽略甚至抹杀另外一个战场的现象。历史地看，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都是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同组成世界反法西斯的中国战场，并使之成为世界反法西斯的东方主战场。对此，中共中央早在1943年7月2日发表的《为纪念抗战六周年宣言》中指出：“整个中国战场上，六年来的作战，实际上是被划分为正面与敌后两大战场，这两个战场的作用，是互相援助的，缺少一个，在目前就不能制止法西斯野兽的奔窜，在将来就不能驱逐这个野兽出中国。因此，必须增强这两个战场互相援助的作用。”这段话十分清楚地论述了统一的中国抗战中两个战场的地位和作用。

二是突出和夸大国民党正面战场作用而忽略甚至贬抑中国共产党敌后战场的言论。一般观念上，大型战役引人注目，而游击战规模小，易忽略。但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游击战不能用一般的观念去看待。如八路军在华北的大规模游击战给予日本侵略军沉重打击，迫使日军集中重兵防堵。1940年日本军方报告称：“日军在华北有九个师团和十二个旅团的强大兵力被钉死在那里。”“华北治安的症结所在，并非国民党政府，而是中共。”

据统计，中共开辟的敌后战场抗击侵华日军的比例，1938年是58.8%，1939年是62%，1940年是58%，1941年是75%，1942年是63%。这5年中，还一直抗击着全部伪军。1943年抗击侵华日军的58%，

伪军的90%；1944年抗击侵华日军的64%，伪军的95%；1945年则抗击侵华日军的69%，伪军的95%。

相持阶段之后，经常有超过半数的侵华日军被牵制在敌后战场上。日军称：“中共游击战和地下工作非常巧妙”，日军被迫打“不分昼夜、连续不断，永无中止的战争”。由于遭受敌后军民的频繁打击和巨大威胁，日军就动用重兵疯狂“扫荡”敌后抗日根据地。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扫荡”，1939—1940年间，出动主力千人以上的大规模“扫荡”达109次，使用总兵力在50万人以上。1941年和1942年的“扫荡”，一次使用兵力在千人以上至万人的达146次，万人以上至7万人的24次，总计使用兵力达83.9万余人。1943年和1944年的“扫荡”，千人以上者177次，使用兵力66万多人，其中万人以上的大“扫荡”22次，使用兵力29.7万余人。

这些情况说明，在敌后军民与日军不断的斗争中，在承受了巨大危险、牺牲和损失的同时，给日本侵略军造成重大伤亡，使其消耗巨大。这足以证明中国抗日游击战和敌后战场的巨大作用。

五 继续为“攘外必先安内”辩护欲盖弥彰

《中国社会科学报》：抗战期间，国民党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为该政策辩护者认为，其具有合理性。您怎么评价这种观点？

李东朗：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大规模侵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央的应对方针是“攘外必先安内”。

近年来，一种观点再度流行，即国民党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方针，有争取时间准备抗日的一面。而事实上，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使日本大规模侵略阴谋得逞，其不断对日妥协退让，极大地损害了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其集中力量“剿共”和剪除其他异己，不仅不能“安内”，而且极大地破坏了抗日所需的民族凝聚力，丧权辱国的《淞沪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等，就是恶果。1933年的福建事变、1936年的两广事变和西安事变，证明“攘外必先安内”方针是错误的、行不通的。

最终，蒋介石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之下，只能改弦更张，接受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从集合一切抗日力量方面来做抗日准备。不能否认国民党在这期间的一些抗日准备，但它与严重损害全国抗日局面形成的负面作用相比，微不足道。

《中国社会科学报》：还有一些声音认为，国民党军队并未有过片面抗战、消极抗战的行为。事实究竟如何？

李东朗：全国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宣称要“举全国力量”抗战，表现出抗日的积极性。但也应该看到，1938年4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虽然有发动全国民众抗日等内容，但国民党并没有真正实施这些条文。它把抗战胜利希望寄托在美英苏等大国干预日本上，没有通过发动民众战胜日本的信心，因此，不愿也不能真正发动人民群众，结果只能是其政府和军队的抗战，即片面抗战的路线。片面抗战路线影响和阻碍中国潜在抗日优势的发挥，无疑对中国的抗日战争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影响。

在相持阶段，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党的抗日积极性发生很大变化，加之出现严重腐败，正面战场总体呈消极态势。1944年，在豫湘桂战役出现大溃败，日军在中美空军不断袭击下，居然能以每天30公里的速度向前推进，一直打到贵州独山。甚至国民党军方的《扫荡报》也批评说：“独山失守，表现了军方的无能。”这些情况，极大程度地损害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观感，影响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大局。

六 美式武器对中国战场的援助杯水车薪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抗日战争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援助。由此，一些声音认为，中国装备落后，不足以抵抗日军，整个抗战是靠美式武器打下来的。美式武器对中国战场有这么大贡献吗？

李东朗：首先，我们看美式武器到来之前中国战场的战况。抗战时期，中日国力、军力悬殊，这是日本敢于疯狂侵略中国的重要原因，也是中国抗日战争艰苦卓绝和必须实行“持久战”的主要原因。中国军民就是依靠简陋的武器与强大而凶狠的日本侵略者进行殊死搏斗，并使之深陷中国战场不能自拔。

在中国抗日战争中，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局部抗战特别是1937年七七事变后的全面抗战，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1937年7月至1941年12月四年半的独立抗战，使日军的精锐兵员与战略物资遭受严重消耗。

1941年2月23日，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在著名的“炉边谈话”中指出：中国“在将近五年的时间里，顶住了日本的进攻，歼灭了几十万日本

军人，消耗了大量的日本军需”。

1941年出任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的冈村宁次称：1941年前后，日军的“老兵所剩无几，只有现役兵和年青的补充兵”，缺乏训练和装备的新兵员大量补充，导致日军总体战斗力明显下降。号称日本中国派遣军“王牌军”的第3师团与第13师团，1944年时“再无钢筋铁骨之威”，而“其他兵团的装备、战斗力等均较前明显降低。全军建制已感力不从心”。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抗日战争始终牵制着日本陆军的大部分兵力。比如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日本陆军总兵力为51个师团，其中日本本土4个、朝鲜2个、中国35个（其中东北13个；不含20个旅团）、太平洋战场10个，用于太平洋战场的兵力还不及中国战场的1/3。

《中国社会科学报》：那么，美式武器进入中国战场后，呈现出什么样的战况？

李东朗：中国抗日战争确实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援助，但国际援助在很长时期里杯水车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自1942年1月起对中国提供兵器弹药，但在4月日军攻陷缅甸，通过缅甸运输的通道断绝，中国只能通过“驼峰”航运得到美国援助，所得武器装备非常有限。美国对中国的大量武器援助，是在1945年1月下旬中印公路通车后，通过这条公路运入的。所以，所谓中国装备落后、不足以抵抗日军，整个抗战是靠美式武器打下来的说法，是不准确的。

在太平洋战争后期，中国战场仍抗击着约半数的日本陆军。战争结束时，日本在太平洋战场的总兵力为1003783人，在中国战场的总兵力为1049706人，这还不包括战争结束前调到关东军的4个师团和中国军队在缅甸抗击的日军。中国战场的日军仍略多于太平洋战场。

正因如此，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1945年1月在致国会的咨文中指出：“我们也忘不了中国人民在七年多的长时间里怎样顶住了日本人的野蛮进攻和在亚洲大陆广大地区牵制住大量的敌军。”

日本历史学家伊豆公夫认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和投降，是有很多原因的，其中绵延14年的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报》）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6月26日）

中国抗战史真的需要重写吗

——评《中国需要重写抗战史》

荣维木

早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 60 周年之际，一篇《中国需要重写抗战史》的文章引起人们关注。针对为什么要重写抗战史和怎样重写，作者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离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不远了，重新讨论作者提出的问题，有助于人们客观地认识历史。

先说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要重写抗战史。我赞成作者所说，不能遗忘为抗日战争作出贡献的人，尽管作者只提到国民党抗日将领。这确实是重写抗战史的一个理由。但实际情况却是，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直到现在，已经有大量著作如实描述了国民党官兵的抗日事迹。尤其应该提到，2005 年 9 月 3 日，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0 周年的大会讲话中，明确地肯定了国民党军队对抗战的积极贡献。大会向参加过抗战的老战士颁发纪念奖章，当年的国民党抗日战士同样享有殊荣。此后，民政部明确规定参加过抗战的国民党老兵为抚恤对象。一些国民党官兵英勇抗日的重要战场遗址，重新得到修葺。

作者忧心的事情已经解决，何以还要愤愤？文章道出原因，他是对把曾经抗日的国民党将领当成战犯处理感到不公。这里，作者混淆了一个事实，即抗日战争与国共内战完全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战争。从历史宏观来看，抗日战争是不分党派的全民族对外反侵略战争，国共内战是中国内部进步力量与反动力量之间的战争。在前一个战争中，国共两党是战友，在后一个战争中，国共两党是对手。把战争对手作为战犯处理，符合常情。“胜王败寇”确实不是评判历史的科学标准，但是，作者在强调一个方面的时候却忽略了另一个方面，那就是进步战胜反动，这才是历史发展的根本规律。当然，对于进步和反动有不同的解释，这里确实有个立场问题。

比如，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后的十年内战，共产党称之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而国民党称之为“剿匪时期”；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破裂后的三年内战，共产党称之为“解放战争时期”，而国民党称之为“戡乱时期”。看看今天的中国，孰是孰非，已有明证；对抗日战争有过重要功绩却被共产党宣布为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战犯李宗仁，也以他的言行佐证了谁代表了进步。

作者还有一个纠结，那就是中国政府对日本战犯过于宽大，而国民党战犯却没有那么幸运。其实，中国政府改造日本战犯是非常成功的，很多被释放回国的日本战犯成立了著名的“中归连”，在与日本右翼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国民党战犯是否幸运，看看他们的回忆文章也不难找出答案。作者还以美国内战后处理南军的做法为人道的价值判断标准，其实，只要稍微了解关塔那摩的情况，结论将会相反。作者的愤愤与纠结，显然不是重写抗战史的理由。

再说第二个问题，怎样重写抗战史。从历史研究的规律来看，只有不断地以新的视角、新的史料、新的方法来检讨与修正既往研究成果，才能推动史学进步。抗战史研究也不例外，重写是为了使之更加客观、真实，从而推动人们理性、公正地评判历史，并从中总结出经验教训。因此，我不仅赞成重写抗战史，并且身体力行。其实，问题的症结不在是否重写，而在如何重写。

对于如何重写抗战史，作者没有具体的建议，但从他的感慨中，可以归纳出两个可以讨论的问题。这两个问题一直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

首先是抗日政策问题。作者提出，应该积极地看待国民政府1931年后的政策选择。简而言之，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在敌强我弱的情势之下，国民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是理性的选择，这并不表明它放弃了抗日准备。应当承认，九一八事变之后，尤其是一·二八事变之后，国民政府确实着手抗日准备。但是，作者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面对日本侵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央的主导政策是“攘外必先安内”。什么是“安内”？简单地说，就是“剿共”和剪除其他异己。这样的政策不仅无利于抗日局面的形成，而且极大地破坏了抗日所需的民族凝聚力。尽管到七七事变之前，国民党军队也有过抗日军事行动，但它的主力却用于“安内”了。这种做法违背了民族整体利益，因此遭到了全国多数人的反对。两广事变的发生，西安事变的发生，表明了“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行不通。最

终，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之下，蒋介石只能改弦更张，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从集合一切抗日力量方面来做抗日准备。事实上，即使到了七七事变的时候，中日之间敌强我弱的情况也没有发生变化，而变化了的是中国内部的抗日形势。

其次是抗日军事问题。中国抗战有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两个战场谁的作用更大，一直是热门话题，文章也专门论及。我赞成作者所说，即长沙会战的胜利与平型关大捷同样值得纪念。扩大开来，我以为两个战场的功绩都要肯定。甚至，对正面战场的溃退如何评价，如果抛开了具体的战役（如豫湘桂战役），我也赞成作者所说，在敌强我弱条件下，有进有退是不能避免的。但是，紧接着作者指向明确地说，“只有一支躲避会战的军队才不会溃退，反而会不断壮大”，就不仅有失公允，也违背了事实。第一，共产党的军队从来没有躲避过会战，如战争初期积极参加了太原会战，并以自己的战绩受到国民政府的表彰。第二，在中国抗战最困难的时期，八路军付出重大牺牲发动百团大战，积极配合了正面战场。第三，共产党军队是壮大了，但并非“坐大”，而是广泛地动员人民群众参加民族解放战争的结果。另外，通过游击战在敌后战场造成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其战略作用绝不逊于正面战场的大规模会战。我的观点是，两个战场虽然作战规模与形式有所不同，但它们之间有着重要的依存关系。在不同的时期，它们显示的作用大小不同，但都为中华民族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如果重写抗战史，不能只强调一个方面而忽略另一个方面。

作者以夸大的手法描述孤立的片段，而抽去了那些片段之间的逻辑关联，偏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立场。重写抗战史，要防止这种现象的出现。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9月30日）

四 反对毛泽东研究中的 历史虚无主义

毛泽东对中华民族至少有五大贡献

李 捷

一个时期以来，非议毛泽东同志的言论甚嚣尘上。这些人故意割裂历史、曲解历史、否定历史，肆意污损和丑化毛泽东的历史形象。我是长期从事毛泽东研究的，我感觉，毛泽东对于中华民族、对于新中国、对于中国共产党，至少有五个方面的重大贡献。

第一个重要的历史功绩就是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经过了长期的革命斗争，终于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创建了新中国，这是他的最伟大的历史性贡献。大家都知道，1840年以后，英、法等西方列强都来侵略中国、欺负中国、掠夺中国，中国变成了他们的半殖民地，国家主权被严重践踏。而此时中国的社会制度仍是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且已进入它的腐朽时期，社会矛盾重重，民不聊生，内忧外患交集在一起，中国人民受到了西方列强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所以无数的仁人志士，包括早期的林则徐、魏源、龚自珍，一直到洪秀全太平天国起义，再到康有为、梁启超，最后到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伟大的辛亥革命，都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作出了不懈努力。

但是真正能够给中国指明一条道路，找到正确方向，而且把它变成现实的是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奋斗了28年，浴血奋战，牺牲了上千万的烈士。包括毛泽东自己的家人，六位烈士。其中有五位都是在民主革命时期牺牲的；另外一位是毛岸英，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抗美援朝中牺牲的。毛泽东同志是一代伟人，为我们中华民族立下了不朽的功绩，就像邓小平同志说的，没有毛泽东，中国人民还将在黑暗中摸索很长一段时间。

第二个重要的历史功绩就是在创建了新中国后，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中国长期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农业国家。近代以后，西方进行了工业革命，实现了社会的近代化，而中国

却没有赶上世界的浪潮，被西方国家远远地抛在后面。这是我们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上百年来积贫积弱、被动挨打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从新中国成立以后，没有忘记要创建一个工业化的新中国。没有工业化，一切都谈不上。所以，在1953年国民经济刚刚恢复，抗美援朝战争刚刚接近尾声的时候，我国就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在苏联的援助下兴建了156个项目，初步解决了我国工业化的基础问题。从毛泽东同志开始，到邓小平同志第二代领导核心，再到江泽民同志第三代领导核心，再到以胡锦涛、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一代一代接续努力。到现在，我国正顺利实施第十二个五年计划。我们现在享受的工业化成就，不能忘记革命先辈们立下的丰功伟绩。

尽管在此过程中，毛泽东也犯过错误，也偏离过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特别是犯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是我国工业化建设始终没有停顿。即便在“文化大革命”那样艰难的十年中，我国排除各种干扰，还是在继续进行工业建设。最显著的就是1970年我国发射了自行研制的第一颗人造卫星，1975年又成功发射了第一颗返回式卫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建设，也是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成批、成套地引进西方的化工设备，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所以，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国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第一步，也就是已经初步建成一个比较完整的、独立的工业化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解决了整个工业基础的问题，解决了我们制造业从无到有的问题。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四个现代化目标的提出和战略部署，最初是在毛泽东主持下进行的。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提出了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这些目标虽然没有按期实现，但是已经打下了第一步的基础。学界经常讲，中国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完成了初始工业化阶段。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谈得到向全面的现代化迈进。而这个目标现在我们已经一步一步地接近了。也就是说，到21世纪中叶我们将基本上实现现代化，接近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历史性的进步。

第三个重要的历史功绩就是极大加强了我们的国防。大家都知道，在1840年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无数的仁人志士都慨叹中国“有边无防”。我国有漫长的边疆、广阔的海洋，但是没有设防，就是设防也经不起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侵略。所以甲午海战，一个小小的邻国日本，我们都败在它的手下，这对有识之士是极大的震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既没有财力，

也没有工业基础的极端困难情况下，白手起家，使我们的国防工业、国防现代化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毛泽东提出要建设强大的海军，巩固海防；建立强大的空军，巩固空防。到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又提出要加强国防工业的建设，要加强三线建设的布局。那时我国的主要工业（包括国防工业）都在沿海，内地很少有工业。20世纪60年代中期和整个70年代，我国的国防工业，特别是三线建设完成了合理的布局。从沿海到内地，一直到西部地区，到处都有工业基地，包括原子能基地、核试验基地等。这是了不起的成就。正因为如此，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世界上虽然不断地发生局部战争，不断有紧张的态势，但是我国的整个边防和国防是非常稳固的，没有谁敢轻易地来欺负我们。这也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

第四个重要的历史贡献就是毛泽东建设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政党——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首先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基础，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同时，还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并形成了深入人心的优良传统，这就是群众工作路线。特别重要的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肩负着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神圣使命，为完成这样一个使命，就必须有一套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改造我们伟大的祖国，使它真正能实现民族复兴。这个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毛泽东奠定的基础，这就是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的道路。这个法宝一直延续至今。当然，毛泽东在有生之年，并没有对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作过概括。这个活的灵魂是谁来概括的呢？是邓小平同志。邓小平同志把它概括为：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群众路线。这三大法宝既是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同时也是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

最后一个重要的历史贡献就是极大地提升了我国的国际地位。鸦片战争后，我国在世界上没有什么国际地位，只是到了抗日战争的时候，特别是抗战的胜利，作为中国近代史上反侵略的第一次彻底性的胜利，才扭转了这种状况。但在这之后较长一段时间里，国家陷入内战，经过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不懈努力，终于建立了新中国，为国家赢得了最后的和平，奠定了大国地位。

新中国成立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承认这个新生政权。当时美国提出一个理论叫作“尘埃落定”。什么意思呢？它认为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新中国维持不了几年，那就等着有朝一日中国共产党下台以

后再考虑建交的事，实际上就是不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也不承认新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信邪，也不怕各种各样的压力，中国共产党有骨气，坚持独立自主这个活的灵魂，顶住了压力，而且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美国人不得不和我们打交道。于是，1954年在日内瓦召开的解决朝鲜半岛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国际会议上，美国人不得不邀请我们参加，它在外交上不承认我们，但它又不得不承认，在国际会议上没有中国的参加，这两大问题解决不了。

1972年美国尼克松访华，是在和中国没有外交关系、美国还不承认新中国的国际地位的情况下进行的。尼克松来华谋求中美关系的正常化，签订了著名的《上海公报》，这个了不起的外交成就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地位，也打开了我们和西方国家的关系正常化的大门，才有了我们后来改革开放时对外开放的基础和前提。另外，在这个过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的合法席位，把国民党的代表赶了出去。这一点来之不易，也是我们要永远牢记的，这靠的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穷朋友”。所以，毛泽东、周恩来当年就一再嘱咐说，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穷朋友”，是这些人抬轿子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

综括这五个方面的历史性成就，我们完全可以说，毛泽东同志是一个不朽的民族英雄，为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独立、中国人民的解放，为了新中国的繁荣富强，为了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他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一生。当然他也犯错，甚至有犯严重错误的时候，对国家、对民族、对我们的党都带来了很大的损害，给人民也带来了损害。但是，人民仍牢记他，什么道理呢？总的来说，没有毛泽东，我们今天不可能有这样一个幸福的生活环境。所以，我们党在每一次回顾的时候都讲到这一点，就是当时毛泽东创建了新中国，还带我们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为后来新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基础。当然我们还要说一句话，就是如果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带领我们大胆地摆脱了过去的社会主义传统观念的束缚、长期以来的“左”的束缚，我们也不可能走到改革开放这条路上。这一点来说，是邓小平同志的功劳，也是后来从邓小平同志到江泽民同志，一直到胡锦涛同志、习近平总书记，我们中国共产党一代又一代人不断奋斗的结果。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9月23日）

改革开放时代毛泽东研究 要警惕历史虚无主义

吴克明

改革开放尤其是近段时间以来，历史虚无主义在我国思想文化界特别是毛泽东研究领域不时泛起，一些人借口“重新评判”历史，用种种所谓“历史细节”“还原历史本貌”等来歪曲近现代中国革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特别是“神化”“丑化”或“虚化”毛泽东的形象，造成了部分人的思想混乱，在社会上引发了不好的后果。因此，搞懂弄清历史虚无主义的本质与特征、改革开放时代毛泽东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的主要危害以及警惕历史虚无主义的应对措施，对当前正本清源、以史为鉴意义重大。

一 历史虚无主义的本质与特征

1. 从本质上看，历史虚无主义是一种否定历史规律和价值、解构整体历史观的思想体系。历史虚无主义往往基于一定价值预设而采用所谓历史“细节”来污化、丑化、虚化或神化现实政权代表性人物的合法性和现行制度的合理性，以达到其否定现存政治格局的价值目的，一般分为理论上的历史虚无主义与实践上的历史虚无主义，且二者之间具有内在一致性。从政治文化视角看，历史虚无主义既是一种“虚无主义”，“虚化”历史的规律性和进步性，抽掉人类发展的历史运行目标和追求的价值支柱，又虚无“历史”本身，往往避而不谈历史观的根本问题，陷入局部的、片段的、琐碎的所谓“历史事实”，将矛头直指现实政治的合法性。因而，历史虚无主义常常是文化精神虚无主义，它通过否定一个民族、国家、军队的英雄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的历史意义及其当代价值，否定孕育其中的文

化及其内在精神，进而摧毁其历史文化精神的家园，使这一民族、国家与军队丧失自尊和自信乃至失去凝聚力、向心力与软实力，进而使之趋于分崩离析和弱化解体。

2. 从特征上看，历史虚无主义否定历史规律性和整体历史观，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历史观和形而上学历史观。因而，历史虚无主义在内容和方法上，不是一般地否定民族历史和文化精神，而是否定某一阶段或某几阶段的历史，同时以主观随意的所谓“历史选择论”为指导，以无根据的“细节”假设为前提，不对历史事实判断进行全面深入了解，就把现象当本质，根据历史现象的表象进行主观臆想，推断历史发展的可能结局，得出所谓“新发现”“新解读”“新结论”，且往往把支流变主流、以偏概全，随意放大一些历史事实，以达到否定现实、整体再造的价值预设。在思维模式、表达方式和传播途径上，历史虚无主义动辄全盘否定，“断裂”历史事实，非此即彼，形而上学猖獗，且常常以学术研究的面貌出现，显示其观点是科学研究、理性思考的产物，是展示学术研究、观念创新的结果，或利用书报、电视、电影和网络等途径，影响社会舆情，诱导人们“全新认识”和“科学”判定某段历史或某个历史人物。所以，历史虚无主义所反映的是文化问题、精神问题，更是现实的政治问题；既是对历史的态度问题、立场问题，更是对现实的态度和立场问题。

二 改革开放时代毛泽东研究中 历史虚无主义的主要危害

改革开放时代，邓小平说过：“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多次反对对他本人的一些不适当不科学的评价，经常教育我们正确理解人民与领导人或领袖的关系。毛泽东思想不是在个别的方面，而是在许多领域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个体系，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所以他建议：“除了做好毛泽东著作的整理出版工作之外，做理论工作的同志，要花相当多的功夫，从各个领域阐释毛泽东思想的体系。要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教育我们的党，来引导我们前进。”然而，对毛泽东及其思想这样重大的政治问题，近年的研究中引发了种种虚化、污化甚至妖魔化毛泽东的历史虚无主义现象，有学者称之为“非毛化”思潮。在历史虚无主义者的“研究”中，毛泽东的“罪过”是一个重要领域。他们出

于其特定的旨趣——从历史维度来证明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和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是“背离了近代文明的主流”。他们着力发掘一些关于“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文化大革命”的“真实史料”，得出毛泽东塑造“个人崇拜”、热衷“暴力革命”、建立“集权政治”“为个人恩怨发动文化大革命”等结论，导致毛泽东无论是在公共政治领域还是在个人私生活领域，都被妖魔化。历史虚无主义者非常清楚，如同全盘否定斯大林导致苏联垮台一样，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崇高地位，只要给他定了“罪”，中国共产党就得为这个“罪”埋单。改革开放时代毛泽东研究中存在的种种历史虚无主义问题，的确具有很大的危害。

第一，消解主流意识形态，扰乱人们的视听。人所共知，在东西方文明的发展史上，毛泽东的光辉永远不会暗淡，因为他对中国乃至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影响极其深刻且长远。毛泽东不但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而且是一位世界公认的卓越的军事家、政治家、外交家。在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中，他也是一位具有战略眼光的经济战略家。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位优秀的文学家、史学家、哲学家、诗人和书法家。这在古今中外的杰出人物中，都是极为少见的。然而，历史虚无主义在毛泽东研究中要么神化、要么丑化毛泽东形象，极力消除主流意识形态、扰乱人们的视听，存在两个明显倾向：一是把毛泽东神化、偶像化，认为解决当代中国的问题只有回到毛泽东时代去，才有希望；二是把毛泽东丑化、妖魔化，认为只有全盘否定毛泽东，中国才能发展。其实，二者本质上都是虚化毛泽东，是“左”、右两种倾向的极端表现。实际上，一个民族国家总是停留在历史温床上故步自封是没有希望的，同样，一个民族国家总是丑化、矮化甚至虚化自己的领袖人物，这个民族国家也难以有什么真正内在的自信与自强。

第二，否认阶级分析方法，从根本上动摇社会主义中国的立国之本和治国之路。列宁认为，在阶级社会里，“必须牢牢把握住社会划分为阶级的事实，阶级统治形式改变的事实，把它作为基本的指导线索，并用这个观点去分析一切社会问题”。运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分析错综复杂、千变万化的社会历史现象，就是阶级分析的方法，这是唯物史观研究社会历史问题应采用的基本方法，也只有坚持运用这一基本方法，才能揭示隐藏在政治思想斗争背后的、最终起决定作用的阶级的物质利益。抛开了这一

基本点，就会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淖之中。改革开放时代毛泽东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往往采取否认阶级分析方法，不从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进行科学分析，力戒片面性和绝对化，而是相反，甚至作简单的历史类比和歪曲历史、裁剪历史。早在1956年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之时，毛泽东就敏锐地看到了历史虚无主义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在他看来，这绝不只是一个简单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更是涉及如何看待斯大林领导的近30年苏联社会主义的历史问题，如果历史被否定了，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就会失去存在的理由。后来的事实果然证明了这一点。现在，如果任由毛泽东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泛滥，也会从根本上动摇社会主义中国的立国之本和强国之路，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第三，迎合西方反共势力“西化”“分化”“和平演变”中国的战略图谋，企图阻挠中国的和平崛起和发展。“和平演变”战略图谋是国际帝国主义对我国采取武装干涉、军事包围和政治孤立遭到失败之后，以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渗透为主要形式，企图使无产阶级政权从内部演变，从而达到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防止“和平演变”，实质上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如何保持政权的问题。在这一国际国内复杂的社会背景下，毛泽东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与西方反共势力相呼应，全盘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进而全盘否定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现象时有泛起，值得警惕。例如，党的十八大召开前夕，西方媒体着实鼓噪“取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而且卖力造谣说“十八大上将不会再提毛泽东思想”，以至于围绕这个话题传得很具体，主要的话语也说了不少，诸如中国共产党的党章要全面修改、毛主席纪念堂要拆掉、党校开设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要停止”，等等。一段时间里，这些谣传确实不同程度干扰着一些人的思想和认识。对此，党的十八大报告和十八大修订的党章给毛泽东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观点、谣言以有力回击，也及时教育了思想认识上有所动摇和偏差的人们。

三 改革开放时代毛泽东研究中 警惕历史虚无主义的应对

邓小平指出：“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

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当前，面对毛泽东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所引发的种种危害，我们必须高度关注，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积极探寻出警惕历史虚无主义的应对措施。

1. 头脑清醒，旗帜鲜明。应当看到，改革开放时代毛泽东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有着明显的政治诉求和现实指向，即以毛泽东研究为切入点，根本价值预设就是要扰乱人心，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伟大成就。对此，我们必须头脑清醒、旗帜鲜明、敢于亮剑，看到毛泽东研究中警惕历史虚无主义的重要性、迫切性，认清这绝不是什么学术观点之争，而是改革开放条件下的一场必须面对的尖锐的意识形态斗争，是关于“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朝着什么目标前进”等根本性问题上的激烈复杂的斗争。这一斗争的结果，事关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这一点，正如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所指出的，在事关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帮助干部群众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和解决问题，坚定理想信念。同时，要科学理解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两大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内在关系，充分认清我们与毛泽东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斗争的复杂性、长期性、尖锐性，进一步增强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忧患意识，经常预判斗争状态，及时有效地加以应对。

2. 整合力量，壮大队伍。在毛泽东研究中，有人旧话重提，称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林彪在其政变纲领中咒骂毛泽东是独裁者；在海外出版的书刊中，称毛泽东独裁专制、独裁专断、独裁暴政者亦不在少数，现今舆论界也有人因袭这些说法。针对诸如此类的错误言论甚至造谣，必须整合力量，壮大队伍，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予以有力回击。一要组织毛泽东研究大家、专家精心细读毛泽东著作、思想和事件的来龙去脉，有针对性地回应社会大众对历史和史实的关切，通过各种手段把毛泽东研究中被历史虚无主义者颠倒的历史进行正本清源。二要加强力量、加大力度，认真梳理和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国近现代史、共和国史、党史军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重要历史人物的言论行为，将其实事求是地呈现出来。使专业学者能依据档案史实，反驳和抨击毛泽东研究

中历史虚无主义那些歪曲历史的言论，也使一些所谓“野史”“戏说”“新解”“揭秘”等等难行其道，警惕和防范蓄意制造和传播谣言。

3. 加强沟通，巩固阵地。对于改革开放时期毛泽东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的警惕和批驳问题，有人提出要加强交流，从长时段的历史反馈性来审视毛泽东的历史价值，认为毛泽东作为一个改变了20世纪中国和世界的历史人物，其影响不会仅仅止于其生存的时代。因而，改革开放时代对毛泽东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的驳斥，就不能静态地止于毛泽东时代或后毛泽东时代，而必须放眼于中国和世界当代及未来的发展大势。这种客观冷静的交流和分析态度，我们认为是较为科学的应对举措。同时，也要看到，改革开放时期毛泽东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之所以拥有一定社会基础，既源于改革开放时期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所导致的社会意识领域的变化，也折射出我国改革开放时代确实仍有一系列问题需要进一步予以认真解决，否则就会在客观上助长这一领域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因此，要下更大力气牢牢巩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阵地、努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须熟练掌握传统舆论工具，又应善于运用和管控新媒体，把新媒体作为传播正史信史、反驳错误历史言论的新阵地。对于蓄意编造和传播历史谣言的，要及时予以澄清并依法惩处，确保新媒体不为历史虚无主义提供阵地和渠道。而且，我们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全面深化改革，一心一意搞建设、聚精会神谋发展，积极地、创造性地做好当前的各项工作，因为只有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不断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面巨大优越性，才是真正铲除改革开放时代毛泽东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泛起的治本之策。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动态》2015年第83期）

毛泽东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评析

刘 仓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要创立者和精神支柱。毛泽东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通过丑化毛泽东的民族英雄形象和抛弃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来达到否定四项基本原则、走西方道路的政治目的。揭露和批判这种政治思潮，是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重要形式和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关键环节。

一 毛泽东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表现及其方法

毛泽东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抹杀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贡献；否定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把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说成是一系列事件的错误延续，进而否定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否定中国道路和中国制度的优越性。

二是丑化毛泽东的民族英雄形象。诬蔑毛泽东是“独裁者”“暴君”“希特勒”；是“五千年文明的最大最凶恶最疯狂最卑鄙最龌龊的亵渎者、破坏者、毁灭者”；抹黑毛泽东在中共领导集体中的地位，挑拨其与中央其他领导人之间的关系。

三是否定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和历史地位。把毛泽东思想歪曲为斗争哲学；丑化毛泽东的精神体系，诬蔑中共搞的是痞子文化运动；割裂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

毛泽东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采用断章取义、以偏概全、张冠李戴、伪造史料、史论存疑等方法，由此得出所谓“客观结论”，是经不起

实践和历史检验的。他们用唯心论代替唯物论，用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用不可知论代替唯物主义可知论。这是反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也反映了毛泽东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的破产。

二 毛泽东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的 危害和实质

抹黑毛泽东、党和新中国的历史，其目的是否定立国之本，否定国体和政体，走西方道路。如果中国放弃四项基本原则，背离人间正道，颠覆优越制度，自毁精神体系，那么，什么中国梦都将成为噩梦。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将再次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因此，同毛泽东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的斗争，是重大思想与政治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表现。

历史虚无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沆瀣一气。前者否定中国道路、中国制度和理论，后者用西方经济政治和文化制度来代替。丑化毛泽东，包藏着西方“和平演变”的战略图谋。从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精神体系上控制中国，是西方敌对势力的既定战略。

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古史钩沉论》）历史虚无主义已经“夷人之祖宗”“湮塞人之教”“败人之纲纪”“灭人之国”，这种赤裸裸的思想侵略、精神侵略和文化侵略，难道不是没有硝烟的战争吗？反击丑化毛泽东的历史虚无主义，是四项基本原则保卫战，国家安全保卫战，民族英雄保卫战，中华民族保卫战，人民根本利益保卫战，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保卫战。

三 反对毛泽东研究中历史 虚无主义的主要措施

反击历史虚无主义，毫不动摇地进行理论斗争、舆论斗争和宣传斗争，是须臾不可松懈的任务。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坚持有理、有力、有节的原则，采取不同方式。

把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纳入依法治国轨道。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明确载入了《宪法》。对于恶毒否定毛泽东历史功绩、丑化毛泽东形象的侵权言行，依照《宪法》和法律，根据情节状况，追究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对于党内诬蔑毛泽东者，根据《党章》规定，按照情节轻重，给予政治教育、纪律处分和组织处理。在学术研究领域，坚持学术批评、思想教育和行政审查相结合，对于不适合担任资政育人岗位的，调动其职位。

加强对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领导、管理和引导。对于恶意散布、传播侮辱毛泽东形象、歪曲毛泽东思想的媒体平台，应对其进行检查和处罚。建立微信等网络舆情队伍，及时发现违反党纪、国法的有害信息，根据性质不同给予不同的处理。推送宣传毛泽东历史功绩和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的信息。整合有关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的研究机构和队伍，为反击历史虚无主义做学术准备、力量准备。坚持“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的原则，建立学术品质和学术规范，不得散布丑化领袖人物、危害社会主义制度的谣言。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9月25日）

毛泽东是否说过“死 3 亿人没关系”

谢加书

1957 年 11 月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在莫斯科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中，曾作应对核讹诈的发言。沈志华主编的《中苏关系史纲》对此有过阐述。人民网文史频道于 2011 年 1 月 13 日发出《毛泽东讲核战争吓倒一大片：中国死 3 亿人没关系》一文（该文根据沈志华的讲座文字实录摘编，以下称“沈文”），指出毛泽东发表了“大不了就是核战争，核战争有什么了不起，全世界 27 亿人，死一半还剩一半，中国 6 亿人，死一半还剩 3 亿，我怕谁去”的言论。此论一出，即引起了较大的舆论反响，导致毛泽东说“死 3 亿人没关系”之类的观点在网上广泛传播。部分网友以此为依据进行二次创作，批评毛泽东，甚至将毛泽东类比本·拉登。在此情况下，胡新民发表了《“死 3 亿人没关系”的来龙去脉》一文予以反驳，其主要观点如下。

其一，首先分析了信息来源，澄清了谣言的部分内容。胡文指出，《中苏关系史纲》引用的有关资料主要来自赫鲁晓夫的回忆。考虑到《赫鲁晓夫回忆录》是在中苏关系破裂、赫鲁晓夫下台后写的这一特殊背景，有关毛泽东信息的可信度打了折扣。当然“在上述的赫鲁晓夫的回忆中，有的地方与毛泽东讲话的原文对照，还是基本如实的。例如‘如果帝国主义把战争强加给我们’这句话。这句话应该说是相当关键的一句话。这与中国网络上流传的‘毛泽东说，既然我们力量这么强大，我们还跟他谈什么，打就完了’，‘那打起来不是很好了嘛’等等说法是大相径庭的”。

胡文肯定了《中苏关系史纲》对毛泽东莫斯科讲话的解读，并进一步引述沈志华在 2008 年接受采访时所谈到的：“他（指毛泽东）说这句话的意思也不是说中国死 3 亿人没关系，而是表示一个态度，就是，中国不怕核威胁，你用原子弹吓不倒我。这是毛泽东惯用的讲话方式。后来西方媒

体根据这句话把毛说成是战争狂人，这是一个误会。”从这个解释来看，部分网友误读了沈文，误解了毛泽东。

其二，胡文核对了记载毛泽东莫斯科发言的《毛泽东外交文选》，相比之下，该书在记载毛泽东当时的讲话方面更详细、更权威。书中内容显示毛泽东的目标是要争取和平，“我们要争取十五年和平。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无敌于天下了，没有人敢同我们打了，世界也就可以得到持久和平了”。在东西方持续冷战、新中国面临着巨大战争压力的背景下，毛泽东进一步指出：“现在还要估计一种情况，就是想发动战争的疯子，他们可能把原子弹、氢弹到处摔。他们摔，我们也摔，这就打得一塌糊涂，这就要损失人。问题要放在最坏的基点上来考虑。我们党的政治局开过几次会，讲过这个问题。现在要打，中国只有手榴弹，没有原子弹，但是苏联有。要设想一下，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二十七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不是我们要打，是他们要打，一打就要摔原子弹、氢弹。我和一位外国政治家辩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打原子战争，人会死绝的。我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还要多。我们中国还没有建设好，我们希望和平。但是如果帝国主义硬要打仗，我们也只好横下一条心，打了仗再建设。每天怕战争，战争来了你有什么办法呢？我先是说东风压倒西风，战争打不起来，现在再就如果发生了战争的情况，作了这些补充的说明，这样两种可能性都估计到了。”这段话清楚表明了以下问题：面对战争压力，毛泽东指出中国一是要追求和平，这是目标，他一再强调这点。二是做两个估计，东风压倒西风，仗打不起来，这是我们希望。万一打仗，做最坏打算。毛泽东针对有人认为“如果打原子战争，人会死绝的”预言，说出了“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没有说“死3亿人不算什么”。作为新中国的领导人，作为当时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领导者，毛泽东追求和平的目标以及两个估计，是有道理的。

其三，为了进一步佐证毛泽东反核讹诈观点的一贯性，胡文又以毛泽东1958年9月5日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为证明：“这次谈话中关于对付核讹诈的看法，可以说是毛泽东在前一年莫斯科会议上讲话的继续。”胡文从史实方面证明了毛泽东在莫斯科的发言不过是他一贯反核讹诈的观点和态度的表现，绝非部分网民所称的战争狂人，更没有反

人类。

胡文在网络的广泛传播，引起了部分人反对，代表性的文章主要有彭小明的《“死三亿人”的假定也是反人类的言行》。他一是认为毛泽东没有人道主义常识，“为了一种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建设或反修防修’，竟然接受核大国的挑战，不惜‘极而言之’，牺牲三亿人民的生命？具有人道主义基本常识的领导人，绝不敢做出这样的决策”。在核战略武器产生背景下“议会道路、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等思想替代了原先的斯大林主义教条。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思维还远远没有醒悟到这样的层次，依旧在人民战争、暴力革命的层次上徘徊”。笔者以为，这涉及一个重要问题，以什么方式求得和平、谋求人道？是不是核大国一搞核讹诈，无核国家就要举手投降？历史已经多次证明，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长存；以投降求人道，难觅人道主义。二是看历史的方法。彭文认为“看历史，光研读档案恐怕也是不够的，还要了解社会舆情。毛泽东他是这样讲，也是这样打算的。我记得五六十年代听报告，就有过这样的内容。要把东南沿海腾出一片地方，让敌人打进来，然后接受苏联的核打击，同时也会牺牲我们人民的一半。国内党纪甚严，地方上的小领导绝不敢乱侃党的‘国际战略’，应该是层层下达的报告中转达了党中央的说法”。笔者认为，彭文从自身经历来证明“死3亿人没关系”的言论存在，这种通过个体体验，村庄、家族等个案来衡量复杂的整体，或从个体性的经验中对历史细节予以附会，只会与事实相距甚远。

从“死3亿人没关系”的传播过程来看，毛泽东在什么背景下说了什么，怎么说的，胡文已经从多角度进行了考证，应该说事实比较清楚。但何以部分人不认同呢？笔者认为，对毛泽东的认识有分歧可以理解，但对毛泽东的认识要以事实为基础；对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对他的言行研究，还是要以科学的方法为指引，这样才能找到真正的事实，得出正确的结论。

（作者单位：华南理工大学思想政治学院）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8月25日）

毛泽东没有阻碍民法典的 编纂和颁布

迟方旭

民法典的编纂及颁布，不仅表示民事立法技术的成熟，更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向兴盛发达的法律表征。在历史上，编纂并颁布一部民法典，是志向远大的政治家和学识渊博的法学家共同的愿望，不少政治家或法学家也因领导或参与制定某部民法典而青史留名；同时，民法典的编纂及颁布也往往成为人们评价历史人物的一项素材，有时甚至会上升为评价历史人物的一项标准。

学界对毛泽东关于民法典态度的评价即关涉对毛泽东本人的评价。有人认为，毛泽东直接反对民法典的编纂；有人认为，毛泽东虽同意民法典编纂，却借故阻碍民法典颁布，或者在发动政治运动时使民法典错过颁布的历史时机，由此导致民法典的编纂胎死腹中，即使编纂完毕也被束之高阁而无法面世。有了这样的评价，下面的结论就显得非常自然了：由于对民法典保持一种“敌意”的态度，可见毛泽东是一位抛弃法治、推崇人治的政治家。不过，在笔者看来，此种观点，既缺乏历史事实的依据，在逻辑上也难以自圆其说，有必要予以辩驳。

新中国成立前夕，由于国民党“六法全书”遭到废除，国民政府所制定的《民法》随之在大陆失效。于是，民法典的编纂便被提上立法机关的工作议程。实际上，民法典的编纂在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召开之前只是处于酝酿状态，还未进入编纂阶段。如果认为这一阶段未启动民法典的编纂是一种历史遗憾，并进而批评毛泽东轻视民法典，那就太过于忽视历史和苛求前人了。首先是忽视了编纂民法典的政治条件。新中国成立时，虽然大陆范围内的大部分国土已获解放，但四川、云南、贵州、西藏和广东（含海南）、广西部分地区仍处于国民党统治之下。在相当部分地区未获解

放、军事斗争的任务尚未完成且异常繁重之时，遑论民法典的编纂。新中国成立伊始，百业待兴，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才刚刚开始，经济政策的制定（当时就连土地改革的政策也才处于诞生过程中），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而言，宛如持篙试水，自然不具备编纂民法典的经济条件。新中国成立后实行“一边倒”外交方针，为尽快恢复国民经济，苏联经济和技术方面的内容成为我们学习的首要对象，而对于民法典编纂理论资源的学习，条件还未形成。这时如果要求社会主义民法典的编纂同时跟进，无异于一种奢谈。

1954年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召开之前，国民经济已有恢复，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即将开始，进一步加强政治建设的任务随之而来。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的召开，既是当时政治建设工作的高潮，又是后来其他政治建设工作的序幕。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颁布，为包括民法典在内的法典编纂工作指明了社会主义方向。颁布《宪法》的同年，民法典的编纂工作正式启动。虽然在文献资料中，难以找到毛泽东与这次民法典起草工作的直接联系，不过，有两点我们不应忘记：第一，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对民法典的编纂工作在逻辑和情理上，不闻不问的可能性很小。第二，《宪法》的颁布是民法典编纂的直接导引，毛泽东对《宪法》的贡献在法制史上早已有口皆碑，因此自然也可算是毛泽东对编纂民法典的间接贡献。

这次起草工作到1956年底宣告结束，法典文本以仿行苏联民法为主调。需要注意的是，此时苏共二十大已经召开，中苏两党分歧初露端倪，毛泽东对斯大林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破坏了苏联民法的思考也已开始。此种背景之下，仿行苏联为主调的第一部民法典草案文本被弃之不用，当然不难理解。将此次法典文本未及审议归责于毛泽东个人，实在是对当时历史环境的忽视。

第二次民法典的起草工作始于1962年毛泽东“刑法需要制定，民法也需要制定”的要求。这说明：第一，毛泽东要求制定民法典，并非一时兴之所至。当时三年经济困难时期逐渐过去，国民经济已有复苏，编纂民法典是形势所需。第二，毛泽东此次编纂民法典的提议，是1962年3月22日上午听取谢富治、汪东兴汇报公安工作时所说，更多的是基于规范基层公安干部执法行为的考虑，而不是出于发展商品经济的目的。毛泽东建议制定刑法典和民法典，是“慎刑”的、约束公权力的立法理念使然。因

此，对毛泽东 1962 年编纂民法典的提议，一方面不能突破具体历史条件，以现代民法的立法理念评判毛泽东提议编纂民法典的动因；另一方面，更不能将法典的编纂，归结于领导人的个人喜好，从而忽视了具体历史条件。

第二次民法典文本很快形成，但在毛泽东有生之年并未颁布。不少人认为，第二次民法典文本的天折，源自毛泽东不断地发起各种政治运动，致使民法典错失颁布的历史时机，故而毛泽东应对此负责。其实，自发出编纂民法典的提议后，民法典的编纂工作一直萦绕在毛泽东心头，只不过他对民法典颁布的历史条件有着更加苛刻的要求而已；或者说，毛泽东并不认为当时颁布民法典的历史条件已经成熟。1963 年 5 月 5 日晚，当毛泽东会见朝鲜法律工作者代表团时，他表示，社会主义的法律工作是一项新的工作，至今我们还没有制定出社会主义的民法和社会主义的刑法，原因是“需要积累经验”。1965 年 8 月 8 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介绍中国的经验时，又表示中国的很多工作尚处于“改造过程中”，如“还没有颁布民法”。他认为“大概还需要十五年”的时间才能“颁布民法”。遗憾的是，十五年的时间未到，一代伟人毛泽东便离开了我们。

毛泽东逝世十年后，《民法通则》颁布，但它所扮演的只是民事基本法的角色，仍不是规范意义上的民法典。直到今天，民法典还未出现，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顺利进行，牵绕着政治家和法学家的民法典之“梦”终会圆满实现，但对毛泽东阻碍民法典编纂和颁布的苛责或抹黑，现在就应该停止。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法学院）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 年 8 月 18 日）

毛泽东不是独裁者

金 仁

最近一个时期，关于毛泽东是否是独裁者的争论颇为激烈，双方各有自己的主张和理由。其实，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算是旧话重提。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林彪在其政变纲领中，咒骂毛泽东是独裁者。海外出版的书刊，称毛泽东独裁专制、独裁专横、独裁暴政者亦不在少数。现今舆论界的一些活跃人士，因袭以往说法，也给毛泽东戴上了独裁者的帽子。那么，毛泽东是否是真正的独裁者？回到历史的现场，还原历史的真相，答案自然是清楚的。

独裁者以专制政体为支撑，毛泽东致力于民主政体建设。独裁与专制相伴随，与民主相背离。在专制政体之下，个人拥有绝对权力而又缺乏有效制约，容易走向独裁；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存在所谓分权、制衡与监督机制，似乎难以形成个人独裁局面，但却是大资产阶级利益集团左右政局。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致力于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正式建立，成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国家的一切重大事项均由全国人大决定，使毛泽东在重大事项上独裁已无可能。就具体领导体制而言，毛泽东推崇集体领导，要求实行民主集中制。“高饶事件”之后，他明确表示“反对个人独裁”，要求中央和各级党委必须坚持集体领导原则。1958年1月，毛泽东提出的所谓“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如果仅从字面上来看，容易产生误解。其实，“大权独揽”是指主要权力集中于中央和地方的党委集体，而不是集中于毛泽东个人。1959年4月，毛泽东在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仍强调：权力集中于常委和书记处，表明党的核心权力掌握在集体手中。集体领导制度的推行，也就排除了在政策制定、权力配置、资源分配过程中毛泽东个人独裁的可能。应当指出，民主集中制所强调的集中是建立在多数人的想法或主流民意基础之上的集中，并不等同于独裁。

毛泽东曾有过集权的倾向，但集权并不意味着独裁。事实上，对于后发外生型国家来说，现代化起步阶段的集权是必要的，既有利于建构稳定的社会秩序，也有利于集中国家资源，以求短期内赢得较高的发展速度。

独裁者信奉权力至上，毛泽东并不留恋权力。独裁者之所以能独裁，就在于掌握了权力，失去权力也就再无独裁的可能，权力对于独裁者而言是命根子，紧握权力不放手是独裁者的生存之道。毛泽东十分珍惜权力，但该放下的时候能放下，该移交的时候能移交。第二届全国人大召开前，毛泽东多次向中央提出，希望不再继续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职务。中央全会经过充分考虑，决定同意毛泽东的提议，在第二届全国人大上不再提他作为国家主席的候选人。此后，刘少奇接任国家主席，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刘少奇去世后，1970年4月，林彪提出设国家主席，并建议毛泽东再担任国家主席。当中央政治局将林彪的意见向毛泽东报告时，毛泽东写下了“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的批语。这说明，毛泽东并不迷恋权力，在权力的让渡问题上理智的。历史的事实是，直至逝世，毛泽东仍担任中共中央主席，未能实现党的权力的正常移交，但这并非毛泽东握住权力不放，而是没有找到在毛泽东看来可以托付权力的合适人选。

独裁者通过继承制实现权力更替，毛泽东能从全局出发考虑接班人的选拔培养。独裁者不愿放弃权力，也不信任他人，往往从家族内部来选拔培养权力的接任者，通过继承的方式实现权力交替，使权力在家族内部循环。毛泽东晚年十分关注接班人的选拔培养，并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局出发来考虑接班人的标准和人选，超越了家族观念、宗族观念的局限。1969年1月，国务院秘书厅信访室收到河南省五三农场某人给周恩来的一封信，信中要求“提江青同志为‘九大’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并应成为常委”，同时希望“江青同志兼任中央组织部长”。对此，毛泽东做出批示：“徒有虚名，都不适当”，并认为李讷、毛远新二人不宜为中共九大代表。1971年7—8月，毛泽东在外地巡视期间与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时明确表示：“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应当说，毛泽东在选拔培养接班人的问题上，没有囿于家族内部成员，突破了独裁者的思维惯性与权力交接方式。

独裁者需要借助个人崇拜树立自己的权威，毛泽东对个人崇拜保持了冷静与理性的态度。独裁者往往难以赢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为树立权威、强化统治的合法性，需要通过个人崇拜制造对独裁者的迷信。毛泽东

的领袖地位和崇高威信，是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无须借助个人崇拜来维护自己的威信、实现对党和国家的治理。新中国成立后的较长时期，毛泽东为防止个人崇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也收到了理想的效果。“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泽东之所以在个人崇拜的问题上态度发生变化，有其客观原因。1970年12月，毛泽东与斯诺谈话时坦承：“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因此，“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但毛泽东并非个人崇拜的狂热追求者，当个人崇拜形成之后，毛泽东又深感不安，并力图加以制止。1967年12月，毛泽东对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的提法表示不满，认为“绝对权威”“大树特树”的提法不妥，并重申祝寿的禁令。1968年底，毛泽东在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时，删去了“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等用来形容毛泽东的副词。1969年6月，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其中规定：不经中央批准，不能再制作毛主席像章；各报纸平时不要用毛主席像作刊头画；各种物品及包装等，一律不要印毛主席像，引用毛主席语录也要得当，禁止在瓷器上印制毛主席像；不要搞“忠字化”运动，不要修建封建式的建筑；不要搞“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读语录、向主席像行礼等形式主义活动。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毛泽东与斯诺谈话时表示：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了，要降温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四个伟大”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这说明，毛泽东在个人崇拜的问题上，头脑是冷静、理性的，他本人并非个人崇拜的制造者和一贯支持者。

独裁者刚愎自用，毛泽东能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独裁者喜欢独断专行、我行我素，听不进他人的意见，决策与执行都具有强烈的个人意志与个人色彩。毛泽东尊重民意，在决策过程中善于吸收群众的智慧，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就是他的发明。1956年春，毛泽东听取了国务院34个部门的汇报，在此基础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1959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提倡多谋善断；批评有些干部不多谋，也不善断，是少谋武断。1961年1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并反省自己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做得很少了，并表示会后想去一个地方，做点调查研究工作。

为了推动全党开展调查研究，毛泽东同意印发中央博物馆重新发现、写于1930年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并将标题改为《关于调查工作》。他在介绍这篇文章时说：“文章的主题是，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亲身的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1964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讲话时也告诫诸位：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要听各种意见，要讲民主，不要“一言堂”。因此，毛泽东重视调查研究，善于听取群众意见，这种个性与处事风格，与独裁者截然不同。

独裁者漠视民生问题，毛泽东时刻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独裁者只关注自身利益的满足，置老百姓的生死于不顾，甚至以牺牲老百姓的利益为代价来满足自身的私欲。与此相反，为人民谋利益、为人民谋幸福，是毛泽东的最大愿望和追求。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秉持既要保证重点建设，又要照顾人民生活的发展理念，在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发展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体育事业、建立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制度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善于根据群众诉求调整民生政策，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来源。1956年4月，毛泽东在听取李富春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时强调，农民的收入每年必须有所增加，现在的危险是基建投资太多、非生产性的建设也多，忽视个人利益；如果不注意个人收入问题，就可能犯大错误。1959年3月，毛泽东在写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党内通信》中说：“我们的公社党委书记同志们，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毛泽东对人民利益、人民生活的关心，由此可见一斑。

不可否认，作为一个“打江山”的革命者，在长期血与火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逐渐成为具有超强个人魅力的领袖，说话一言九鼎，也在一定程度上滋生了独断作风。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了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虽然实现民主的具体机制不完善、不健全，法治建设有一定程度的忽视，但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独裁丧失了制度基础；独断终归是领导作风问题，与独裁有本质区别。当然，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仍然是当前需要着力解决的一项历史任务。

海外毛泽东研究中的 历史虚无主义*

韦 磊

1937年，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出版后，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逐步成为海外中国研究关注和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近年来，海外毛泽东研究除了严肃的学术研究成果外，还出现了多部历史虚无主义的作品。所谓历史虚无主义，就是构建虚假历史的各种研究理念、方法和成果的总称。鉴于历史虚无主义对中共历史和毛泽东形象的严重歪曲、丑化，鉴于其在海内外毛泽东研究中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深入地揭露其错误观点已经刻不容缓。本文选取张戎和乔·哈利戴（Jon Halliday）合著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以下简称《故事》）一书作为分析对象，具体剖析海外毛泽东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

一 认为历史发展不存在客观规律性， 而是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意识

1. 认为中共、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是莫斯科阴谋制造的产物。

海外历史虚无主义者认为，毛泽东以及中共所领导的革命根本就没有必要，是对社会发展的破坏。其论据主要是：中国革命是俄国、共产国际主观制造的结果，是莫斯科的“阴谋”。《故事》一书认为，中国革命不仅没有必要、不受欢迎，而且是一场灾难。他们将中共诞生、中国发生革命归结为俄国或共产国际的蓄意推动：“组建中共并不是陈教授（指陈独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1世纪以来美国中共党史研究评析”（11CDJ011）的阶段性成果。

秀——引者注)的主意——也不是任何一个中国人的主意。这主意来自莫斯科……在中国,一项庞大的秘密计划在八月付诸实行,旨在扶持起一个亲俄的中国政府。”^①这样,毛泽东所领导的革命就失去了历史和现实的合法性,成为没有意义的活动,从而也就从根本上否定毛泽东的历史作用和贡献。

不可否认,中国革命得到过苏俄、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但是,将中国革命的发生乃至胜利的根本原因归结为这一点显然是将历史简单化了,是错误的。事实上,早在20世纪50年代,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关于中国革命是莫斯科阴谋的产物的观点,就遭到史华兹(Benjamin I. Schwartz)等人的批驳。“阴谋论”实际上在西方学术界早已丧失了市场。革命的发生不是人们主观意识煽动、制造的结果,其根源在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当社会具备革命条件时,革命就必然要发生,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中国发生革命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所决定的。20世纪20年代后期,中国国民党虽然在形式上完成了中国的统一,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依然没有改变。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中期发生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就证明了这一点。既然如此,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就没有得到解决,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必然要求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共同富裕。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决定了实现这些目标的根本手段只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通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来进行革命斗争。这一点已经成为海内外的共识。1944年,费正清就认为:“中国的革命运动是中国现实生活中的内在产物,它决不是CC系和戴笠的军统特务们的高压政治所能扑灭的。”^②

2. 认为毛泽东成为革命领袖和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是偶然性因素、阴谋活动、玩弄权术的结果。

由于历史虚无主义否定中国革命发生的客观性、必然性,因此,他们无法从本质上解释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也无法解释中国革命领袖产生的原因。于是,他们只能将其归结为外部偶然性因素作用的结果,或者从主观方面寻找毛泽东成为革命领袖的原因,并将其归结为阴谋活

^① Jung Chang, Jon Halliday, *Mao: The Unknown Story*,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05, p. 19.

^② 《费正清对华回忆录》,陆惠勤译,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341页。

动、玩弄权术的结果。

《故事》一书主要从三个方面论述了中国革命胜利和毛泽东成为领袖的原因。其一，苏联等外部因素的援助。张戎等人认为：“莫斯科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军火，最终使毛领导下的中共得以夺取政权。”^① 这种论调实际上早已被海内外学界所否定。《剑桥中华民国史》指出，抗战时期“苏维埃俄国成了国民党人的第一个异常慷慨的朋友”；“实际上俄国援助没有一项是输送给中国共产党人的”^②。这说明，得到苏联援助的是国民党，而不是中共。因此，中国革命胜利的根本原因绝对不是苏联援助的结果。

其二，间谍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关键。张戎认为，毛泽东领导的革命之所以取得胜利，是得益于隐藏在国民党内的“红色代理人”。“红色代理人是莫斯科传给中共的无价之宝，大多是二十年代上半叶埋进国民党的……许多红色代理人还在国民党内官至高位，他们为毛泽东夺取中国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③ 这里姑且不论张戎的观点是否符合实际，其观点中存在一个根本问题：这些人充当“红色代理人”的动机是什么？张戎虽然耸人听闻地描绘了“红色代理人”的作用，但是，他们始终无法解释这些所谓“红色代理人”的动机。

其三，通过玩弄权术和搞阴谋活动，毛泽东才成为中共乃至中国的领导人。张戎认为，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共领袖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是因为毛泽东个人的不道德和他对付其同志及中国人民的恐怖手段。张戎将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以及新中国的全部历史，都描绘成毛泽东如何玩弄权术，进行阴谋活动，以维护自己的权力和统治。可见，在张戎等人的历史观中，中国革命的胜利、毛泽东成为革命领袖都是历史发展中主观意识的结果，没有任何客观性、必然性。张戎等人的这类认识本质上就是马基雅维利主义。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就阐述了“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思想。

不可否认，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党内在客观上确实存在意见分歧

① Jung Chang, Jon Halliday, *Mao: The Unknown Story*,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05, p. 19.

② [美] 费正清等：《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刘敬坤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57页。

③ Jung Chang, Jon Halliday, *Mao: The Unknown Story*,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05, p. 133.

和斗争。但是，如果完全以此来解读中共历史既是狭隘的，也是错误的。因为，在这种分析理念下，历史发展的内在原因和动力，以及时代的客观需求完全被排斥。事实上，领袖人物的产生并不是自封的，更不是依赖于阴谋或玩弄权术，而是客观现实的需要，是时代的需要。通过考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他们的威信、影响、经验等完全符合领袖的标准。因此，历史虚无主义者指责毛泽东依赖阴谋诡计、玩弄权术而获得权力，完全是违背历史实际的主观臆测。

历史发展本身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历史研究的主要任务就是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海外毛泽东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不仅不符合历史实际，而且存在严重的逻辑错误。其历史观的本质是典型的历史唯心主义。

二 根据歪曲历史的需要进行历史评价

历史虚无主义者在评价中共历史事件和毛泽东时，往往从主观需要出发进行评价，其评价标准根据其歪曲历史的主观需要而确定。其反科学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违背史实进行评价

历史虚无主义者对中共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和对毛泽东的评述，基本上都是建立在虚构史实基础上的。《故事》一书不仅大量虚构中共历史事实，而且虚构了毛泽东所经历的事件，在海外已经遭到严肃学者的批判。矢吹晋在《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文中，对《故事》中伪造、虚构的主要史实进行了比较充分的批判。英国威尔士卡迪夫大学历史系教授班国瑞（Gregor Benton）等主编的《毛真是怪物吗？海外学者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也对张戎等人虚构和歪曲史实的行为进行了系统批判。此外，许倬云、史景迁等也对该书歪曲和虚构历史进行了批判^①。

从客观的历史实际出发，依据史实进行评价，是科学评价历史事件或

^① 陈希林：《学者看张戎著作：史料证据不够完整》，《中国时报》2006年4月19日；Jonathan Spence, "Portrait of a Monster",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2005-11-03.

历史人物的前提和基础。历史研究要从史实出发，历史评价更应建立在史实基础上，唯有如此，才能得出符合实际的评论。显然，历史虚无主义者的评价方法是根本错误的。

（二）孤立、片面地评价历史

张戎在论述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所采取的游击战策略时，采取的就是典型的孤立、片面化的手法。其核心论点是所谓中共“游而不击”，借机扩张自己的地盘与军队。这种论调在本质上没有从中日两国实力对比的客观历史环境出发。从当时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实际情况看，绝对不允许与日军进行正面大规模阵地战。开展敌后游击战既是中共的传统优势，更是由中国、中共的实际情况所决定的。历史虚无主义者在这方面也更无视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的作用。有学者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在抗战时期“共对敌作战 12.15 万次，歼灭日伪军 171.14 万人，其中日军 52.17 万人”^①。

此外，张戎等人还危言耸听地说：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搞的第一个运动是杀人：镇压反革命”。在“镇反”和“土改”运动中，“被枪毙、被打死、被逼自杀的人大约三百万左右”^②。这里姑且不论其数据是否可信，其对“镇反”运动的评论就是片面的。因为，当时特务、土匪、恶霸、反动会道门等对社会安定构成的严重危害被张戎等人刻意屏蔽了。有学者指出：1949 年，国民党从大陆溃退时，留下的政治土匪武装达 105 万之多。这些土匪到处破坏交通、袭击基层政权，残害军民和干部，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安定。仅 1950 年头三个月，广东地区就有 2 个县城、6 个区政府被土匪围攻，86 个乡政权被土匪攻占；云南、贵州地区有数千名干部被土匪杀害；四川省遂宁、资中两县，在土匪的威胁下，上万名群众流离失所，无家可归^③。在这种情况下，“镇反”势在必行。

可见，历史虚无主义者的种种指责、种种评论采用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割裂相关的历史背景，脱离具体的条件和环境，进行孤立、片面地评价，从而达到误导读者，实现自己歪曲、丑化中共历史和毛泽东的目的。

① 李景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共党史研究》2005 年第 5 期。

② Jung Chang, Jon Halliday, *Mao: The Unknown Story*,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05, pp. 323 - 324.

③ 参见王善中《论镇压反革命运动》，《党的文献》1996 年第 6 期。

（三）情绪化、根据需要来评价

纵观历史虚无主义者的毛泽东研究，大多带有浓厚的个人情绪和个人偏见。《故事》一书从头至尾没有一句对毛泽东的正面评论，对毛泽东的评价全部用批判性的语言。对此，有学者明确指出，张戎歪曲、丑化毛泽东的直接动机是源自于自身遭遇而产生的报复心态：“对张戎而言，毛泽东尤其是他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仍旧是让她痛苦不堪的根源和产生报复心理的动机。”^① 意大利的弗朗西斯科·希士（Francesco Sisci）说：“在这本书中你感觉不到任何冷静的分析，你能感觉到的就是仇恨，这有助于提升其可读性，但是历史研究不应该是这种方式的。”^② 在历史研究中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应该尽量规避研究的主观情绪，防止情绪支配自己。因为在情绪支配下的研究不可能是科学的，也不可能准确。由于张戎等人仇视毛泽东的动机和情绪贯穿于论著始终，这就决定了他们不可能从客观公正的角度，以科学的态度来评价毛泽东。

他们评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标准出于诋毁毛泽东正面形象的目的。在海外毛泽东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者还采取了根据需要来决定评价的标准，即凡是有助于诋毁毛泽东形象的人物或者事件，就给予高度评价和肯定；反之，则给予贬低和否定。在《故事》一书中，凡是在历史上维护、拥护毛泽东的人，作者都给予否定和贬低；凡是反对、排挤、打压毛泽东的人，作者都给予高度肯定。作者之所以如此评价和处理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是因为贬低、否定毛泽东的支持者，抬高毛泽东的反对者就可以达到诋毁毛泽东形象的目的。所以，在党的历史上反对毛泽东的王明、张国焘等人都得到了作者无原则的全面肯定。

为了进一步达到虚构历史、歪曲历史，诋毁毛泽东等中共历史人物的形象，历史虚无主义者表现了严重的主观唯心主义倾向。在他们那里，对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评价没有任何客观的、科学的标准和方法，有的

^① Robert Weil, "To be Attacked by the Enemy Is a Good Thing", <http://chinastudygroup.net/2005/12/to-be-attacked-by-the-enemy-is-a-good-thing/>.

^② Hamish McDonald, "Throwing the Book at Mao", http://newsstore.theage.com.au/apps/view-Documents?page=1&sy=age&kw=Mao&pb=all_pubs&dt=enterRange&dr=1month&sd=6%2F10%2F2005&ed=10%2F10%2F2005&so=relevance&af=text&sf=headline&rc=200&rm=200&sp=adv&clsPage=1&docID=AGE051008277LPN718D1.

只是其主观的需要，评价的结果完全取决于这种主观需要。

三 伪造、剪裁、曲解、滥用史料

在历史研究中，研究者必须考证史料；必须完整、准确地理解、解读史料；必须客观、全面、准确地运用史料。伪造、剪裁、曲解、滥用史料是历史虚无主义者的基本手段。

（一）伪造史料

在《故事》一书中，作者大量使用了所谓“知情人”、“当事人”提供的资料。该书使用的访谈资料存在着严重问题：作者只给出访问的时间，给出受访者姓名，甚至很多受访者连姓名也未提供，导致这类访谈材料的真实性无法验证。目前已有多位受访者否认他们曾接受过张戎等人的采访，或否认他们曾与张戎等就相关问题进行过具体的、实质性的讨论，或否认他们为张戎等人提供了可以论证其观点的材料。弗雷德里克·泰沃斯（Frederick Teiwes）表示：他与张只见过一两次面，而且从未阐述过任何关于毛这个话题的具体观点^①。据纪思道（Nicholas D. Kristof）所言：章含之说，她确实与张戎有过两三次非正式的会面，但是她拒绝接受采访，并且没有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内容^②。可以确信的是，《故事》一书有诸多伪造的访谈。

（二）剪裁史料

张戎等人为论证毛泽东对于“大跃进”中出现死人现象是有心理准备的，其引用了1958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③。张戎等人在引用时，重新进行了剪裁、拼接，达到了断章取义的效果。毛泽东在讲话的原文中所要表达的“减少任务”“压缩指标”等意思，以及“不死人”等基本原则，经过作者的剪裁、拼接，被完全掩盖。可见，经过剪裁的史料所要表达的含义与原意完全相反，完全成为张戎等歪曲毛泽东的材

① Gregor Benton, Lin Chun, *Was Mao Really a Monster? The Academic Response to Chang and Halliday's "Mao: The Unknown Sto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pp. 120 - 121.

② Nicholas, "Mao: The Real Mao", *The New York Times*, 2005 - 10 - 23.

③ Jung Chang, Jon Halliday, *Mao: The Unknown Story*,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05, p. 439.

料。以剪裁史料的方式歪曲、丑化毛泽东充斥《故事》一书，限于篇幅，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三）曲解史料

主观故意曲解史料是海外毛泽东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者较为普遍的做法。这类做法往往与剪裁史料结合起来运用。在《故事》一书中，“大跃进‘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一章就大量使用了这一手法。张戎等人在该章结尾处，引用了上文提及的那段关键性史料。在这部分论述中，张戎等人通过裁剪史料，使读者将那段讲话解读的重点放在死了多少人的方面。这样，毛泽东所讲的“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这句话，被从上下文中割裂开来，被曲解为：“大跃进”中中国必须（或者“肯定要”“肯定会”）要死一半人，毛泽东对死人是无所谓。根据讲话全文，毛泽东所说“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实际上是前面所说的不断增加指标这种假设的结果，也就是说，毛泽东表达的意思是：如果不断提高指标，那么就会造成“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的严重后果；而“压缩指标”“以不死人为原则”则是毛泽东讲话的核心思想。

另一类曲解是对毛泽东的话语仅作字面解读，得出结论，从而曲解、误读史料。近年来，海内外历史虚无主义者为了诋毁毛泽东，在论证毛泽东好战、不惜发动核战争，对死人满不在乎的结论时，经常引用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如果联系毛泽东讲话的全文，同时深入研究毛泽东的语言风格就会很清楚，毛泽东的意思并不是要造成世界上“死掉一半人”这样的结果，他所要表明的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惧怕帝国主义国家发动核战争。同时，毛泽东也力图表明，社会主义国家是要避免核战争的。

（四）滥用材料

所谓滥用材料，是指海外历史虚无主义者在研究毛泽东的过程中对有关材料不加甄别地使用，或者使用明显带有偏见和未加证实的材料。这类情况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以孤证方式大量使用真实性存在问题的材料。海外历史虚无主义者在研究毛泽东时经常互相引用的是真实性没有得到证实，或者其真实性在学界被广泛质疑的作品，并且在引用中多数是以孤证方式出现的。在

《故事》一书中，李志绥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和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就多次以孤证形式被引用。

二是使用产生于特定背景下、可信度明显存在问题的材料。在特定政治背景下，根据相应政治需要产生的材料，其真实性、可信度往往值得怀疑。使用这类材料，必须鉴别真伪，但历史虚无主义者从来都不对这类材料进行鉴别。齐慕实（Timothy Cheek）就明确批判了《故事》一书的这类做法，张戎等人“不加甄别地使用回忆录数据和使用例如苏联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数据，众所周知，这是一个中苏之间相互抹黑的时期”^①。

三是将文艺、文学作品作为史料滥用。有关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文艺、文学作品与作为历史研究成果的人物传记、历史事件研究是有本质区别的。改革开放后，大陆出版了一系列关于中共历史人物的文艺、文学作品。这类作品也经常被海外历史虚无主义者所演绎、滥用，成为他们诋毁毛泽东的材料。

四是不加鉴别地大量使用如张国焘、王明等人所撰写的相关资料。不能说他们所提供的资料都不可信，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他们的特殊经历，导致他们在叙述有关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时往往不同程度地带有个人感情色彩或倾向，从而导致史料与历史实际存在背离的情况。

综上所述，由于历史虚无主义者将历史发展完全归结为人们主观意识的结果，否定中国革命的客观必然性，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毛泽东历史形象的基础；历史虚无主义者根据自己主观需要构建历史评价标准并进行历史评价，这就将研究进一步推向了主观唯心主义的境地，从而为诋毁毛泽东的形象进一步奠定了基础。最终，历史虚无主义者通过伪造、剪裁、曲解、滥用史料的方法，按照自己的预设彻底颠覆了毛泽东的正面形象。由于海内外民众对于有关毛泽东的史实不是很了解或者根本不了解，所以我们对于历史虚无主义的欺骗性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因此，我们认为，在民众中进行相关历史史实和历史学知识的教育，是消解历史虚无主义的根本途径。

（作者单位：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

（节选自《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6期）

^① Timothy Cheek, "The New Number One Counter-Revolutionary Inside the Party: Academic Biography as Mass Criticism", *The China Journal*, Vol. 55, 2006, p. 115.

妖魔化毛泽东可休矣

杨 军

在历史虚无主义者的“研究”中，毛泽东的“罪过”是一个重要的领域。他们出于其特定的旨趣——从历史的角度来证明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选择马克思主义指导和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背离了近代文明的主流”，着力发掘一些关于“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真实史料”，得出毛泽东塑造“个人崇拜”，热衷“暴力革命”，建立“集权政治”，“为个人恩怨发动文化大革命”等结论。结果毛泽东无论是在公共政治领域还是在私生活领域都被妖魔化。历史虚无主义者非常清楚，如同全盘否定斯大林导致苏共垮台一样，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只要给他定了“罪”，中国共产党就得为这个“罪”埋单。

20 世纪的中国历史证明，“毛主席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位巨人”（美国前总统福特）。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者，带领中国人民经过了长期的革命斗争，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使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带领中国人民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建立起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基础；带领中国人民克服种种困难，发展各项社会事业，扩大基础教育规模，培育大批专门技术人才，取得核技术、人造卫星和运载火箭等高精尖技术的突破，发展群众性体育事业，改善医疗条件，消灭或基本消灭烈性传染病，提高了人民的预期寿命；带领中国人民建立起强大的国防，使在近代屡屡挨打的中国拥有了捍卫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的钢铁长城；带领中国人民顶住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压力，以坚定的原则和灵活的策略，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和尊严，不断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构建有利于中国的国际环境；带领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努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优良品质和作风，使中国共产党在人民那里积累了厚重的信用。

这些历史功绩，不仅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为当代中国的改革发展创造了多方面的前提条件，而且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毛泽东由此赢得了中国人民的爱戴与怀念，也赢得西方秉持客观态度的政要和严肃学术态度的学者的肯定与尊重。

但是历史虚无主义者对此选择了失明。

毛泽东在晚年的确犯了错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发生，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但所有这些，都应该也必须在历史研究中给予关注，因为人始终是一定社会环境中的人。科学的历史研究要求，对历史人物的考察必须“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根据历史人物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来分析其思想行为，评价其功绩与错误，这样才能做到公正客观。杰出的历史人物及其历史功绩，除了个人主观因素外，归根到底是时势所造。但同样，他们也会受到特定历史环境的制约，并因此犯错误。20世纪50年代美国对中国的经济封锁，当家作主后的中国人民普遍存在图强求富的热望，新中国的建设在短短几年里取得的成功，也使人确信中国走向富强只在朝夕，当时的国际形势显示出维持15年到20年世界和平的可能，这一切都促使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产生抓住历史机遇，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的美好愿望。而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敌视以及推行“和平战略”的企图，中苏关系因苏共“修正主义”而恶化，党内普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化理解，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以及用群众性运动解决问题的习惯，都在客观上影响着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抉择。当时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削弱和破坏，党内工作机制的不完善、不科学，中国社会因历史原因而普遍存在的个人崇拜等，使毛泽东的错误可以在没有防犯和约束中放大为全局性的错误。

固然，毛泽东要为发起“大跃进”、发动“文化大革命”负责任。但是，历史活动“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不同的人带着各自的情感和意志参与历史活动，也塑造着历史活动的过程，使历史活动的结果往往“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大跃进”中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文化大革命”中的大规模武斗、林彪江青集团的活动等，超出了毛泽东的预想，也非毛泽东能够控制。因此邓小平讲，不能把“大跃进”等问题上的错误都归毛泽东一个人负责；对于“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也不能由他一个人负责。

研究历史人物，当然可以分时期、分方面进行。但评价历史人物，则

应综合其一生的作为，对比其功过是非，把握主流，作出判断。毛泽东一生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和人民解放幸福而奋斗，即使是在晚年犯错误的阶段，还推动中国在经济建设、国防科技和外交方面取得了新的进步，其历史功绩远远大于过失，因此历史功绩是主流，是第一位的。

“毛泽东的一生不仅是他个人的一生，而且是中国整整一个历史时期的象征。”（英籍华人作家韩素音）研究、评价毛泽东，不仅关系到他个人，更是关系到对20世纪中国历史和21世纪中国未来的认识。如果按照历史虚无主义者的实用主义态度和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以偏概全、以点带面的方法，必然在诋毁毛泽东的同时，否定了几代中国人的艰辛探索和奉献付出，实际是对中国历史的戏弄和对未来的不负责。

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有段值得深思的话：在毛泽东身后的时代里，对毛泽东时代的历史记录的污点吹毛求疵，而缄口不提当时的成就已然成为一种风尚——深恐提及便会被视为对毛泽东时代的辩护。在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国梦”不断探索的今天，在中国发展面临诸多困难和问题的现在，珍惜毛泽东时代留下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日显重要。客观公正地研究评价毛泽东，为毛泽东时代辩护，是为了中国在未来的发展中少走弯路。对错误吹毛求疵、对成就缄口不提的风尚，可以休矣！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6月14日）

五 其他

文学不能“虚无”历史

张 江

一个时期以来，历史虚无主义作为一种文化情绪，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书写中均有表现。在一般的文化观念中，文学、历史和哲学被看成是共生交融的文化形态。哲学是所有学科的思想基础，任何进入载体和介质的文学作品，也都在书写历史，文学与历史互文互证。

具体到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虚无历史是指对“过去时态”的解构和否定。这个问题之所以被严重关切，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历史是民族文化记忆的载体，它不仅包括已经发生的成为符号的人与事，也进入到当下的现实之中。现实生活中它无处不在，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引导社会生活。有关历史的文学叙事，通过对历史的一次次重新梳理，审视现实，面向未来，获取进步的智慧并凝聚文化共识。这种特殊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对于一个以悠久历史著称，又饱经沧桑的民族来说更加重要。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当下一些文学对历史进行“虚无”的行径更加放肆和轻佻，几乎丧失了底线和“节操”。许多文学作品，对历史的轻侮和傲慢丝毫不加遮掩，有意阉割历史的意图显露无遗。

文学不能“虚无”历史。虚无和歪曲历史，不能公正地分析和认识历史，不能客观地描述和表现历史，任意践踏、随意评说、肆意消费历史，凡此种种，反映出在有关文学与历史的一些根本性问题上产生了错误倾向。文学中的历史虚无主义，意味着在文学叙事中，对一切有过正当价值判断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进行否定，颠覆人类实践过程中积累和沉淀的意义和价值，导致对当下生活价值和精神标准的解构。

文学“虚无”历史，否认了历史的客观存在。文学上历史虚无主义的种种表征，从根本上说，来自错误的历史观的影响，源于对历史客观性解构的冲动。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事实上包含了完全不同的两种含义。其

一是在过往时段内真实发生过的“原生态历史”，也就是哲学上的“历史本体”。这种历史，包括具体的历史过程、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真实存在，具有不容置疑的客观性。其二是以文本形态呈现和存在的“被叙述的历史”，也即“历史文本”。我们日常所见的各种人物传记、文献资料、史书典籍，等等，均属此类。这种“被叙述的历史”，经过史家在一定历史观和价值观支配下的选择、提取、过滤、描述，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性。但必须注意一点，这种主观性是在客观历史事实限制下的“有限主观性”。换言之，主观因素的介入在“被叙述的历史”中尽管不可避免，但也并非可以毫无限制，不能被过度放大，必须以依据和尊重历史本体为前提，最大程度地逼近客观历史本体。抛开这一点，“被叙述的”就已经不再是历史，而完全沦为了个体化的臆造和想象。说到底，“被叙述的历史”也包含着一定程度的客观性，只不过是一种被主观性包裹着的客观性。历史文本是在历史本体客观性和史家主观性二重因素的交融互动中形成的辩证综合体。这就是“历史的文本性”和“文本的历史性”。

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及其文学追随者，对历史的客观实在性进行彻底怀疑和否定，认为历史不过是一种语词建构起来的文本，历史学本质上是一种历史诗学，是一种“语言的虚构”，德里达甚至放言，没有文本之外的世界。其偏误在于，第一，他们混淆了历史本体和历史文本之间的区别和界限，把历史文本等同于历史本体，用历史文本的主观性取代历史本体的客观性；第二，片面放大了历史文本主观性的合理限度，无视历史本体客观性对历史文本主观性的制约，只讲“历史的文本性”，规避“文本的历史性”。其结果，就是将客观性从历史叙事中完全驱逐出去，只剩下肆意妄为的虚构和想象。

正是在这种错误历史观的蛊惑下，主观化倾向在文学的历史书写中发展为不可遏止的浊流，最终酿成对历史的致命伤害。所谓的历史题材创作，有些见不到丝毫历史的踪影，笔之所及，天马行空，纵横穿越。历史上本来没有的事，可以随意杜撰出来，确有的事，可以任意改写、涂抹、移植。用主观概念切割历史，用虚拟想象来表达他自己的历史倾向，甚至政治倾向。

有些作家惯于以文学允许虚构为托辞，逃避历史客观性对文学叙事的规约。文学创作的确允许虚构，但是，“虚构”和“虚无”是完全不同的叙事行为，“虚构”不等于“虚无”，更不能成为文学消解历史的理由。

从性质上说，虚构和想象都仅仅是一种文学手法。在历史叙事中，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加逼真、形象地表现历史，捍卫历史本身和历史规律的客观性。比如，《三国演义》这部历史小说，与历史著作《三国志》相比，其中不乏虚构成分，但我们看到，无论如何虚构，它都没有超越客观历史的边界，主要事件与《三国志》相同，就连人物性格也是在《三国志》留下的固定形象上发挥完成的。虚构的介入，不但没有虚无历史，反而更加有力地证明了那段历史，成为后人了解历史的生动文本。正因为如此，这部作品才世代相传，成为经典。

文学“虚无”历史，否定了历史和现实的连续性。历史和现实不是孤立分离的，两者之间具有深刻的连续性。历史有革命性的变革，但变革前后，同样具有密切的逻辑关联。表面看来，历史和现实分别代表着人类社会演进的“过去时态”和“当下时态”，各有所属，泾渭分明。一种存在一旦被归入历史范畴，似乎就意味着彻底终结。但事实上，历史和现实都处在一个既定的时空当中。从时间上说，时间流淌绵延不绝，像河水一样川流不息，交融汇合成一个连续的、不可分割的过程。没有绝对的历史，也没有绝对的现实。历史是昨天的现实，现实是明天的历史，两者处在永无止境的推进、转化之中。从空间上说，历史与现实共存于一个空间，这个空间是人类历史和现实活动的共同背景与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历史遵循自己的规律循序演进，不能随意颠倒和切割。一切现实存在，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等，都不是随意或无序产生的，而是历史选择的结果，是历史动因在当下的辐射和延伸其中，人类的创造性实践对社会发展发挥主导作用，但是，创造也是历史基础上的创造，蕴含着历史的智慧和思想。没有历史就没有现实。一切现实的存在，从某种程度上说，都是历史的存在。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

文学“虚无”历史，是在历史和现实的关系上预设了一个前提，即认为历史以脱离现实而存在，如何处理历史与现实无关，将历史视作可以随意消费的娱乐资源，肆意调侃、戏说、恶搞；或者将它当作表达自己特殊意图的工具，可以根据主观意图任意改写、涂抹。这种行为的危害就是，它拒绝了历史提供的各种文化经验进入现实的可能。历史被封存、消费，它所携带的经验和智慧也随之消散，人类的发展进步就失去了根据，一个国家和民族由此陷入集体失忆，进而迷失前行的方向。更关键的是，现实失去历史的逻辑支撑，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成为悬而无着、摇荡无

根的浮萍。例如，近年来，在“重写文学史”口号的策动下，一些文学史家对当代文学前后两个三十年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在文学史书写中，对前三十年文学一概否定，将其批驳得一无是处；对后三十年，尤其是对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则极尽溢美之词，称其为文学的黄金时代。事实上，没有前三十年，何来后三十年？以诗歌为例，如果没有贺敬之、郭小川、李瑛等在诗歌上的赓续积淀和“文革”期间地下文学的悄然流行，又如何会有顾城、舒婷、北岛的出现？我们又该如何解释朦胧诗字里行间依稀尚存的政治抒情诗色彩？只看到前后三十年文学的断裂，而不见彼此之间的承续，这是对历史和现实内在关系的疏离和背叛。

文学“虚无”历史，颠覆了以历史为载体的文化价值体系。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价值体系，它构成了这个国家或民族最鲜明而深沉的精神底色。这种文化价值体系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也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它的生成和发展始终与历史扭结在一起，同质同构。在历史演进过程中，民族的本身就是历史的。文化价值体系处于动态调整之中，与社会发展同步前进、一起成长，不断丰富、完善、更新，淘汰野蛮，趋近文明，从而彰显着历史的理性选择。因此，千百年来积淀而成的文化价值体系，是一个民族付出巨大代价换取来的优秀的文化遗产。漫长的历史长河，每一个载入史册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甚至留存下来的各种历史器物，最终都演化为一个个承载文化价值意义的符码，意义符码的过滤、筛选、认定，或褒或贬，构成国家和民族文化价值体系的核心。历史的传承，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价值的传承。对历史的尊重，也就是对一个国家或民族价值和信仰的尊重。

对历史的叙述和评判，包含着鲜明的价值取向。任何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都是在已有的历史存在中发现价值，在形象化的阐释中重新作出价值判断。文学“虚无”历史，本质上是“虚无”价值，是否定和解构在历史中形成的民族文化价值，用悖逆、虚妄的价值观取代经过历史检验的进步的价值观。时下文学创作界最流行的是从所谓“还原历史”“人性发现论”出发，对已有定论的历史人物进行重塑。其极端者，甚至将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汉奸打造成正面角色，寻找所谓的人性，给予无原则的同情。在这里，对汉奸形象的颠覆只是表象，真正颠覆的是这个形象符号所承载的、人们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忠诚与背叛、坚强与怯懦、光荣与耻辱的价值判断。声称寻找历史演进和历史行为的真实内在逻辑，但他们所

找到的无非是突破民族理性底线的所谓“普适人性”。一切有价值代表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都被以“人性”的名义重估，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价值判断被粗暴地颠倒过来。似乎只有“人性”才是历史的真实和度量一切的标准，除此别无其他。民族传统价值观的积极因子和合理内涵被无视，或者成为被嘲笑和解构的对象。

一个民族作为稳定的共同体而存在，维系它的核心是内在的价值认同。文学“虚无”历史，以相对主义的态度从文化源头进行拆解，剔除了彰显历史趋向、代表文明进步的文化价值。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所体现的政治价值、伦理价值、审美价值，是经过历史积淀和检验所形成的结论，这些结论构成了具有稳定性的价值坐标。一旦这一价值坐标被铲除夷平，也就没有了野蛮与文明、落后与进步的分野。历史付出巨大代价，经过漫长求索才得到的基本的是非之辨、善恶之分、美丑之心，也统统混淆了界限、失去了意义。历史留下的价值遗产成了被随意践踏的瓦砾。它只会导致文化价值进一步碎片化，造成种种精神乱象，影响民族文化认知的深度和广度。人们的精神世界无所附丽，形成巨大的价值空白。文学“虚无”历史，终将解构在历史长河中建立的文化共识，破坏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价值认同由此涣散无存。

历史是文学的丰富矿藏，为文学提供了大量创作素材和广阔书写空间。它自身固有的传奇性和内部所蕴含的深刻哲理，让文学家一直对它钟爱有加。古今中外，也的确产生了一大批历史题材的经典名著。但是，以历史为表现对象并不能先天地提升作品的品位和质量。相反，对文学而言，历史是一把双刃剑。表现得当，可以为作品增加厚重感，使之成为壮美的史诗；表现失当，则会让作品陷入轻佻、浅薄，丧失文学应有的力量。这里的决定因素就是作家的历史观，即作家用什么样的姿态面对历史。只有对历史抱有敬畏之心，深刻、清醒、客观、理性地认识历史、表现历史，文学才能在历史的书写中展现出独特的思想魅力和艺术魅力。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原载《文学评论》2014年第2期）

延安窑洞真是“特权染缸”吗？

郝琦

不久前，有学者在网上发表《延安窑洞中的特权——读萧军〈延安日记1940—1945〉之一》（以下简称《特权》）一文，被广为转载。这是一篇歪曲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抹黑圣地延安形象的历史虚无主义之作，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进行有力反驳。

学界普遍认为，当前历史虚无主义的主要表现之一是“党史诟病论”，即用某些片面的材料歪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否定或掩盖党史的主流和本质，否认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并最终否定党领导地位的必然性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可以说，《特权》一文是历史虚无主义在这方面的又一代表作。

首先，从总的研究方法上讲，《特权》作者仅用延安时期大批青年知识分子中的一两个人的看法和记述，去解读和反映全部历史，这是一种非科学的个体主义方法论。个体性叙事强调对个案的展示，并习惯用个体来演绎全部，这很容易产生以偏概全、以点代面的问题。

延安时期的知识分子群体是非常庞大的，他们奔赴延安的个人背景和动机也很复杂。不能否认当年确实有像王实味、萧军这样的文人，带着完美的理想主义心境奔赴延安，遇到一些不如意的现实，就产生某些看法、情绪，甚至牢骚。但是这样的人毕竟是当时知识分子中的极少数，更何况王、萧二人当年在延安就是知识分子中的“另类”！所以，我们为什么只把眼睛和研究视野放在少数特殊人物身上，而不去关注和研究他们中的大多数和整个群体呢？退一步说，要研究个体，我们也不能只知道“内心一直在挣扎，渴望离开”的萧军，还要知道1939年离开延安，1940年又返回，一住就是六年的陈学昭；不仅要研究写《野百合花》的王实味，还要研究写《三八节有感》的丁玲，还有艾青、何其芳、舒群、塞

克、柯仲平、冼星海，等等。显然，《特权》作者研究历史的方法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所要求的客观性和整体性原则，不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历史，不是全面和系统地掌握历史的相关信息，而是根据自己的好恶和需要选取和使用史料，研究和解读历史。

其次，从具体论点来看，《特权》作者仅以萧军日记中一些似是而非和道听途说的现象为论据，就认为延安时期存在不平等和领导者的特权，这样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这是用片面的、割裂的态度对待历史中的某些细节，而不是把这些细节放入整个历史的宏观发展当中去考察，不是在历史活动的总和及全貌中找到历史的主要方面，并以此来区分主流和支流。

延安时期的陕北社会经济非常落后，加之又是特殊的战争环境，共产党和边区政府不得不实行供给制，但是供给制又不能变成绝对平均主义，所以只能根据革命事业需要和实际可能，实行有差别、分等次的生活必需品供应制度。这种制度在实行过程中难免出现萧军等人看不惯的事情（笔者要指出的是，萧日记中所记述的现象未必全是事实，有很多道听途说的成分），即便如此，这也只是极个别的现象。笔者查阅的有关陕甘宁的史书和资料，可以说明历史的全貌和真实有别于此。当时的供给制主要在机关、部队、学校及一些事业单位实行，供给的项目包括办公费、伙食费、津贴费、粮食、被服及其他费用。边区政府根据当时各种组织成员条件的不同，订出了各种不同的供给及分配的条例、规定和办法。从伙食费标准看，当时确实有大灶、中灶和小灶之分，但绝对不是只有党的领导人及其家属子女可以吃小灶，政府规定残废军人、保育院与托儿所儿童及政府批准的文化技术人员均按照小灶标准发给。在津贴和其他生活用品的供应上也有差别，但绝对不是党政部门和机关工作人员最高，有关文件规定对国际友人、非党人士、文化技术知识分子和老、弱、妇、孺、病员等供给予以优待。对此，有不少当年在延安生活过的中外人士都有相同的回忆。徐懋庸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曾说：“红军出身的各级领导干部，一般每月的津贴费最高不过4—5元，而对一部分外来的知识分子，当教员或主任教员的，如艾思奇、何思敬、任白戈和我这样的人，津贴费每月10元。1938—1939年间，延安的物价很便宜，猪肉每斤只值二角，鸡蛋一角钱可买十来个，所以，这10元津贴费，是很受用的。”

可见，要说延安时期有特权，应该说是知识分子和文人有特权才对。

那么作为文人的萧军等又为什么会有不满和抱怨呢？学者朱鸿召在《延安文人》中有精彩的分析：“应当说引起文人们关注的并不单纯是供给制本身的等级与差别，而更多的是供给制带来人们精神心理上的偏狭与势利，这便带来了延安文人的两难：一方面他们受惠于生活供给制，一方面又被人理解为他们反对供给制的等级与差别，要求绝对平均主义。”

最后，从研究目的来说，《特权》一文表面上是歪曲延安历史，抹黑圣地形象，实质上是否定革命，进而否定今天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这正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所在。《特权》一文不但公开恶毒地攻击和否定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认为“革命并不一定消除这样的不平等，也可能加剧这样的不平等。依靠革命并不能限制特权，不能从制度设计上加以解决，革命只是权力更迭的手段，而无法达成革命许诺的一切美好目标。多少青年的热血因此被榨干，多少青年的理想因此被出卖，革命成为个别人及其子孙占有并享用最多社会资源的途径”。而且还特别强调，“毫无疑问，今日之现实与延安窑洞之间是一条直通车道，没有任何的障碍”，一语道出了作者写此文的目的。在他看来，我们今天的国家政权是共产党延安时期的革命造就的，这个革命也只是王朝更迭，而王朝更迭是不可以解决公平、公正问题的，“最终特权还是特权，等级依然等级，在古老的土地上，平等、公正这些名词始终停留在字面上，无法为我们日常生活所拥有……享有特权和没有机会得到特权的大多数人，在价值观上是同构的，都是在这个染缸中泡大的，底色在很大程度上已变得一致”。按照《特权》作者这样的看法和逻辑，今天共产党执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存在也就失去了合理性和必要性。所以，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深刻揭示《特权》一文历史虚无主义的本质和要害，用事实告诉人们，什么才是历史的真相，什么才是真正的现实。

（作者单位：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3月17日）

解放战争不是悲剧

宋月红

解放战争胜利距今已过去 60 多年，然而有一种观点认为这场战争是“中华民族的一场悲剧”。所提出的主要理由为：这是一场“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战争”；“三民主义依然有其强大的生命力”，而这场战争则是“共产主义战胜了三民主义”。其所谓的“悲剧”根源在于，“中华文化中缺少一种现代民主政治的元素”。很显然，这种观点把内战的责任归咎于信仰共产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不承认中国共产党所争取建立的新中国的民主政治属性，并把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对立起来而否定二者之间的历史与逻辑关系，由此得出解放战争“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结论。然而，对解放战争果应如此评价吗？笔者以为，非也！

首先，谁发动了内战，就应该由谁来承担内战的责任。对于内战的双方来说，如果都不要打、不愿打，自然就打不起来。抗日战争胜利后，作为合作抗日的国共两党，却是“一个要打，一个不要打”。中国共产党主张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采取的方针是坚决反对内战，并以极大的努力和耐心制止内战。1945 年 9 月，毛泽东在回答英国路透社驻重庆记者甘贝尔的书面提问时就指出：“在无论什么情形之下，中共都将坚持避免内战的方针。”正是中国共产党在重庆谈判中的诚意、让步和促进谈判成功的努力，才最终使国共双方达成了“双十协定”。当中共代表与国民党政府代表签订《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并于 1946 年 1 月 10 日公布后，中共中央当日即发布通告，要求各部门“均须切实严格遵行，不得有误”。然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则坚持一党专制独裁统治，加之美国对其加以援助和扶持，不仅不愿意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而且一直在准备内战，并不断挑起冲突，至 1946 年 6 月下旬，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大举进攻，全面内战由此爆发。要追

究内战的责任，首先要追究先发动内战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责任。

其次，中国共产党以人民民主为己任，将内战转化为解放战争，努力建立“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人类社会自有民主以来，民主从来就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历史的。与以往民主有着本质区别的是，中国共产党追求的民主是中国最大多数人的民主。在近代中国，实现中国最大多数人的民主，首先需要解放工农大众，也就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对于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中国的建国问题，中共中央在纪念抗战五周年时曾指出：战后的中国应当是“民主的中国”“各党派合作经过人民普选的民主共和国”。抗日战争一胜利，中国共产党就在1945年8月25日发表时局宣言，提出了独立、和平、民主的战后建国方针，并以此开展了与内战、独裁的斗争。然而，随着内战的爆发，一方面是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一党专制独裁”，一方面是美国的“扶蒋”“援蒋”政策，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共产党才不得不把内战转化为解放战争，努力争取建成“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最终推翻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一党专制独裁统治，为实现人民民主扫除了制度性障碍。在这个过程中，一些论者眼中的“现代民主”代表——美国不仅没有制止内战，还与内战的发动者绑在了一起，武装了国民党军队，派兵帮助国民党军队运兵抢占城市和重要交通线，纵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打内战。

最后，解放战争的胜利，不是共产主义战胜了三民主义，而是彻底实现和超越了三民主义。这里所说的三民主义，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国民党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对三民主义的重新解释，发展为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核心内容的新三民主义。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在民主革命时期是并行不悖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比较全面地阐述了什么是革命的三民主义及其与新民主主义的关系。他指出，只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才称之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才宣布“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看来，中国抗战胜利后是要彻底实现三民主义的。1945年8月30日，毛泽东在同国民党谈判的意见中提出：“在和平、民主、团结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现三

民主义。”在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反对国民党政府一切丧权辱国的协定和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广泛开展了土地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也就是彻底实现了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社会生产力。在解放战争即将胜利、新中国筹建之际，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除了谁领导谁这一问题以外，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是和我们所说的人民民主主义或新民主主义相符合的。只许为一般平民所共有、不许为资产阶级所私有的国家制度，如果加上工人阶级的领导，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了”。因此，简而言之，新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可以理解为新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主义与工人阶级领导的一种结合。

历史地看，解放战争的胜利是争取“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的力量战胜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一党专制独裁统治。在这一过程中，不是共产主义战胜了三民主义，而是三民主义的彻底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成立。以此而论，解放战争不是“中华民族的一场悲剧”，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民族追求正义的事业。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1月18日）

抗美援朝的意义不容低估

张顺洪

最近，北京卫视播放了《档案》特别节目《伟大的抗美援朝》。该片用丰富的档案材料和生动精辟的语言，讲述了抗美援朝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的抉择、进程、影响和国内外历史背景，再现了60多年前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画面，给人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也澄清了学界和社会上一些人对这场战争的误解和误读，有力回击了“抗美援朝是个错误”等观点。笔者认为，要准确认识抗美援朝的意义，以下四点有必要重申。

第一，抗美援朝是美国逼出来的。党中央做出抗美援朝的决策是个非常艰难的过程。朝鲜战争爆发时，中国大规模内战刚刚结束，整个国家百废待兴，面临着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以及清剿匪特、维护社会安定的重要任务。但是，1950年6月25日朝鲜北南双方爆发战争后，美国立即做出了武装干涉朝鲜内战的决定。而与此同时，美国派第七舰队入侵我国台湾海峡，插手中国事务。9月中下旬，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仁川登陆后迅速向三八线推进。中国政府面对朝鲜战争局势，出于和平愿望，通过外交途径警告美军不要越过三八线。但是，狂妄的美国政府根本无视中国警告，不仅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向中朝边界，还一再侵犯中国领空，对中国境内目标进行轰炸。唇亡齿寒，户破堂危，在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朝鲜向中国提出援助请求后，中央决定派遣志愿军入朝作战，这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不得已作出的决策。

第二，志愿军的战斗精神惊天地泣鬼神。抗美援朝是人类历史上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志愿军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相比，不仅在武器装备上有巨大差距，在后勤补给上，更是不能与美军相比。但是，志愿军将士奋勇拼杀，视死如归，涌现了无数惊心动魄、荡气回肠的感人场面。在上甘岭战役中，孙占元身负重伤坚持战斗，最后时刻冲向敌群，拉响手

雷；黄继光身负重伤，爬上前用身体堵住敌人的机枪，掩护冲锋的战士。此役结束，在战场上随手抓一把土，就可数出许多弹片。在第二次战役中，为了切断敌人后路，38军113师连续14小时边打仗边行军，靠双腿前进了72.5公里，先敌占领三所里，成功阻击敌人大部队的撤退，创造了世界步兵攻击史上的奇迹。在长津湖战役中，许多志愿军战士为了伏击敌人，坚守在冰雪中，直到冻死仍然保持着战斗姿态。在战争相持阶段，由于没有制空权，志愿军沿三八线构筑了一条坚不可摧的地下长城，展开了艰苦卓绝的坑道战，创造了世界坑道战奇迹。许多战斗中，往往连长牺牲了，排长接着指挥，排长牺牲了，班长接着指挥；在战斗最艰难的时刻，炊事员也成为顽强拼杀的勇士；即便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坚守阵地，战斗下去。

第三，抗美援朝极大地鼓舞了全民族团结奋斗的精神。广大青年踊跃报名参军，全国人民积极为抗美援朝出力，各行各业捐款捐物，支援前方将士；不少文艺工作者亲临战场进行慰问，有的甚至牺牲在前线。而与此同时，国内顺利完成了艰巨的剿匪反特任务，保障了全国的和平与安定，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国内亿万民众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从1949年10月到1952年底三年时间，顺利地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平均递增率达到21.1%，国有工业产值增长了2.6倍。抗美援朝的胜利和国内建设取得的成就，充分展示了一个新生社会主义国家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展示了一个历经百年磨难的民族期待实现伟大复兴的坚强意志。

第四，抗美援朝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正如彭德怀所讲，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英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威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了持久、有利的国际环境。在抗美援朝期间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苏联给予了中国很大的支持，在苏联援助下完成的156个重点建设工程项目，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基础。抗美援朝的胜利还推动了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一系列亚非拉国家摆脱殖民统治，成为新兴的发展中国家，整个世界格局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

正如《伟大的抗美援朝》所展示的：前方将士不畏牺牲，浴血奋战；后方人民万众一心，积极支援前线战斗，热情建设社会主义家园。抗美援朝

朝战争激发了中国人民无限的爱国情怀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一座丰碑！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6月9日）

英烈岂可被“虚无”

侯西安

最近，一些历史虚无主义者，对中共领导人和共产党进行攻击和诋毁，对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烈士展开了污蔑和嘲弄。

随着网络新媒体的异军突起，加之西方“文化侵略”步步紧逼，历史虚无主义者以还原历史真相为幌子，利用自媒体公共账号、论坛水军以及弄虚作假刻意包装炒作的“大V”，对在中国人民心中有重要影响的近现代以来的几乎所有的英烈进行戏说、质疑和抹黑。例如，把雷锋与一位女同志正常书信往来硬往“姐弟恋”上贴；把小英雄潘冬子扭曲成终日做明星梦、希望挣大钱的“地产巨商子弟”；与恶霸地主胡汉三之间的阶级斗争恶搞成“参赛歌手”与“评委”之间的脑筋急转弯游戏等。为了制造噱头、吸引眼球，网络上存在大量诸如“经不起推敲的邱少云”“焦裕禄的事迹是两个人拼凑起来的”“‘英雄战士’刘学宝的骗局”等段子、笑话，这种戏说和抹黑在网络上已经形成泛滥之势。任由这些公知、“大V”们通过戏说和臆想，质疑、否定英烈，用数典忘祖的做法抹黑英烈，只能使中华民族陷入自我迷失的深渊。因此，我们有必要也必须坚定地对这种历史虚无主义进行抵制和回击。

简单回顾一下中国的近代史就知道，从1840年到1945年的百年间，西方列强强迫中国政府签订了1100多个条约和章程，并通过这些条约、章程，强占了我国大片领土，攫取了各种名目的巨额赔款和特权，更制造了惨绝人寰的抢劫、毁灭和杀戮。如英法联军对“万园之园”圆明园的劫毁焚烧，八国联军对古都北京的疯狂烧杀和洗劫，累累罪行罄竹难书。深重的灾难使得清醒的中国人痛彻肺腑地认识到，不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在中国的反动统治，中华民族就无法改变悲惨

的命运。正是基于对民族解放越来越深刻的理解，一百多年来无数优秀的中华儿女矢志不渝、赴汤蹈火，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用钢铁般的意志和敢于奉献生命的勇毅，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虎门销烟的林则徐、甲午海战中壮烈牺牲的邓世昌，爬雪山、过草地的英雄红军，八年抗战的无数英烈……英雄烈士的丰功伟绩数不胜数，追忆起来无不让人潸然泪下。正如毛泽东讲的，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

正是英烈的英勇牺牲，推翻了阻碍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启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前三十年，我们有过曲折，但经过党和人民的艰苦努力，为国家的现代化奠定了雄厚的物质、技术、制度基础。如果没有前三十年所奠定的坚实基础，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多年就不可能实现人民生活翻天覆地的变化，也难以取得共和国的辉煌成就。在这六十多年的峥嵘岁月中，涌现出了邱少云、黄继光、雷锋、钱学森、邓稼先、王进喜等许许多多的英烈，他们以及近代以来无数英烈以智慧和血肉之躯成就了中华民族自立的脊梁。正是他们的无畏牺牲和贡献，才使得中华民族一步步走上了伟大复兴之路，才使得今天的中国人过上了越来越幸福的生活，并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

今天，我们不能再任由历史虚无主义对英雄烈士进行随意歪曲和戏说，否则中华民族的脊梁都有可能被他们虚无掉！

我们要坚持不懈地在全体人民中间进行科学的英烈观教育。我们的英烈，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而是和普通血肉之躯一样有七情六欲，甚至还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不足。但英烈之所以为英烈，是因为他们在关键时刻、在历史重要关头，在个人利益和民族国家利益之间，毅然决然地做出了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以小我成就大我的壮烈抉择。这才是我们真正的英雄。因此，科学的英烈观教育要让我们的英雄成为英雄，也成为人。他们身上所具有的普通人属性，不仅无损其高大形象，反而更使人敬仰和感动。

我们要把对青少年的科学英烈观教育作为重中之重。青少年群体是国家建设的新生力量，青少年时期是他们“三观”形成的关键时期。由于复杂的社会环境，玷污、抹黑英烈的历史虚无主义往往具有迷惑性和误导性。因此，强化对青少年的科学英烈观教育，是当前和今后一项长期的重

大战略任务，必须抓紧、抓实。同时，还要根据青少年的生理、心理和年龄特点，不断创新宣传教育的方式、方法，把对英烈的学习从抽象的原则要求具体化为日常生活的言行规范。同时，要不断揭露西方国家对于我国英烈的造谣、污蔑行为，坚决抵制可能造成的恶劣影响。当前，宣传美式英雄“拯救世界、拯救人类”，歪曲、丑化中华英烈的形象，已经成为反华势力的一个重要手段。揭开所谓美式英雄的真面目，并澄清其对我国英烈的造谣污蔑，是我们在全球意识形态领域必须打赢的一场硬仗。

现在，互联网已经成为青少年获取资讯的最重要方式。因此尽快掌控互联网话语权，肩负起对于全民族科学英烈观教育，是一项重大的国家工程。要尽快制定严格的法律法规，建立专业规范的网络管理部门，对互联网上抹黑英烈的言行，无论有无海外背景都要依法进行严格的整治。这是我们维护英烈崇高形象、弘扬英烈精神的重要任务。我国文艺工作者要以强烈的使命感，在文艺创造和表演中向全体国民、特别是青少年传播正确的英烈观，杜绝戏谑和娱乐化。

只有通过一代代中国人不断的努力奋斗和奉献，才能实现中国梦、实现国家现代化。这不仅需要英烈精神的感召与激励，更需要追随时代前进方向推出新的英雄。比如那些在各条战线勇于奉献、作出非凡成就的杰出人物，就像孔繁森、罗阳、杨利伟，也包括历届感动中国人物。这些人既有万众瞩目的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特殊贡献的人物，也有在平凡岗位上为他人、社会作出巨大牺牲的普通人。传播英雄精神、学习英雄品质、树立英雄形象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中华民族的文明素养和精神境界不断提升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伟大中国梦必将无比壮美、动人心魄地展现出来。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2月12日）

“饿死三千万”的来龙去脉

孙经先

最近三十年以来，国内外广泛流传着我国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三千万”的巨大谣言。最近，我们对“饿死三千万”的来龙去脉进行了全面梳理。通过这一梳理，可以清楚地看到“饿死三千万”说法的极端荒谬性。

一 “饿死三千万”的事实真相

（一）1981年以前国内外都没有“饿死三千万”的说法

在三年困难时期结束后直到1981年的这二十年间，国内外都没有“饿死三千万”的说法。

1975年1月，美国经济联合委员会发表了《对中国经济的重新估计》，其中公布了美国商务部和有关学者估算的中国人口数据。

美国商务部和利奥·奥林斯对中国人口的估计（单位：万人）

	美国商务部的估计数	利奥·奥林斯的估计数
中国1959年岁末人口数	67905.8	66280
中国1960年岁末人口数	68996.2	67410
中国1961年岁末人口数	69915.7	68560

上述数字是代表美国官方意见的。由此可以知道，直到1975年，美国官方意见仍然认为中国人口1960年比1959年、1961年比1960年都是增加的，而且增加幅度都在900万人以上。这实际上表明了美国的官方意见并没有认为三年困难时期中国人口发生了重大异常变化，也不认为中国

发生了“大量饿死人”的重大事件。

那么“饿死三千万”说法究竟是怎样出现的呢？

（二）国家统计局人口数据的公布和重大矛盾

1983年国家统计局公布了1949—1982年期间我国的户籍统计人口数据。这一数据显示我国人口1960年比1959年净减少1000万人。这在国内外引起重大反响，共同社说这是“和平时期最大的人口事件”。

这些数据存在着令人难以解释的重大矛盾。从理论上讲，在不考虑国际移民的情况下，一个国家某一年的人口数据应当满足“人口平衡公式”：

$$\begin{aligned} & \text{这一年年底人口总数} - \text{上一年年底人口总数} \\ & = \text{这一年出生人数} - \text{这一年死亡人数。} \end{aligned}$$

由于我国这一时期国际移民人数很少，可以不考虑国际移民的影响。国家统计局人口数据中的重大矛盾就是：在1954年到1982年期间的大多数年份中，“人口平衡公式”中应当相等的这两个数字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差异。这一重大矛盾突出表现在：在1960—1964年期间，在扣除了由人口出生和死亡造成的人口增长后，我国户籍统计人口总数出现了连续五年大幅度异常减少合计2644万人的情况。

上述重大矛盾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始终没有得到科学的解释，由此诱发了“饿死三千万”的说法和一系列“研究”。

（三）对上述重大矛盾作出的解释

我们在研究中得到的基本结论是：

（1）在1954—1959年（主要是1956年到1959年）期间，由于工业发展的需要和“大跃进”运动的发动，我国出现了从农村到市镇的空前规模的人口大迁移活动，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迁移重报人口（截止到1959年年底为止）1162万人，即这些人已经迁移到市镇并在市镇办理了户籍登记手续，但是他们并没有在原籍农村注销户籍。

（2）我国在三年困难时期进行了实施《户口登记条例》的工作，1964年开展了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上述迁移重报户籍人口1162万人的户籍在1960年到1964年期间被注销。

（3）我国在1960年下半年到1964年期间开展了大规模精简市镇人口的工作，在这一过程中产生迁移漏报户籍人口数（截止到1964年年底为

止)的数量为1482万人,即这些人从市镇被精简并注销户籍,但他们没有及时在农村办理户籍迁入手续(这些人在1965—1982年期间重新登记了户籍)。

上述基本结论对国家统计局人口数据中的重大矛盾作出了完整的、合理解释。由于上述(2)(3)所叙述的原因,造成1960—1964年期间我国户籍统计人口减少了2644万人(1162万人重报户籍被注销+1482万人迁移漏报户籍)。这就是我国这一期间人口统计数据大量异常减少的真正原因。这些减少都仅仅是统计数据数字的减少,不是实际人口的减少,更不是由于人口非正常死亡造成的。

二 美国几个学者的“研究”—— “饿死三千万”的总源头

国内外一些人对上述重大矛盾始终没有作出科学的解释,他们断言上述户籍统计人口数据的减少是由数量级达到数千万的人口非正常死亡造成的,这样就出现了“饿死三千万”的说法,以及支持这一说法的一系列“研究”。

国家统计局人口数据1983年公布后,国外一些人口学家对我国三年困难时期的人口非正常死亡问题产生了异乎寻常的特殊兴趣。美国人口与人口学委员会主席科尔(Anstey J. Coale)在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下,于1984年出版了《从1952年到1982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一书,宣布我国1958年至1963年期间的超线性死亡人口数约为2700万。1984年7月10日,美国有关部门为科尔上述著作的出版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合众社、美联社和西方其他大通讯社都报道了科尔所说的上述数字。此外,班尼斯特(Judith Bannister)和艾德(John Aird)也用与科尔基本相同的方法得到了类似的结论。由于这三个所谓的“研究”,关于我国三年困难时期有数量级达到三千万人左右的人口非正常死亡的说法就在西方产生并且流传起来。这三个人的“研究”就成为“饿死三千万”这一说法的总源头。

(一) 科尔等人使用的基本数据是不可靠的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1982年9月进行了一次千分之一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这次调查的数据公布以后,科尔等人以此为基本依据对我国三年困

难时期人口变动问题进行了研究。

我们从数理统计学的角度对这次抽样调查进行了全面分析，发现这次调查存在一系列的重大缺陷，从而可以认为这次调查得到的数据是不可靠的。由于这涉及数理统计学的专门知识，这里不再详述。

我们把这次抽样调查得到的数据与同一年进行的人口普查得到的数据比较一下。

1982 年生育率抽样调查的误差 (单位：人)

妇女年龄	生育人数 (普查数据)	生育人数 (抽样调查数据)	相对误差
15—19 岁	377150	724138	92.00%
20—24 岁	5276210	7336945	39.10%
25—29 岁	10565740	9564531	-9.50%
30—34 岁	2994050	2311330	-22.80%
35—39 岁	841970	760591	-9.70%
40—44 岁	320480	285714	10.80%
45—49 岁	69330	43350	-37.50%

由此可以知道，以 1982 年人口普查数据为基准，由这次妇女生育率抽样调查所获得的妇女按年龄生育率在 15—19 岁、20—24 岁、30—34 岁、45—49 岁这四个年龄段中，其相对误差（绝对值）都超过了 20%，其中两个年龄段接近 40%，一个年龄段达到 92%。而在其余年龄段中，均为 10% 左右。这样巨大的误差无论如何也是无法让人信服的。

1982 年抽样调查的数据存在如此巨大的误差，科尔等人却认为这些数据是准确的，并且以这些数据为基本依据进行他们的所谓“研究”，这样的研究究竟具有多高的可信度就可想而知了。

(二) 关于科尔估算的我国死亡漏报人数

按照科尔的估算，我国在 1953 年 7 月 1 日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到 1964 年 7 月 1 日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期间出现的死亡漏报总人数为 5549 万人。我们对科尔的研究进行了仔细的分析，发现上述 5549 万人是由以下几部分组成的：

1. 我国在这一期间婴幼儿死亡率比较高，相当数量的婴儿出生后不久（几天、十几天、几十天、几个月或者稍长的时间内）死亡，这些夭折婴儿大多数是既不登记出生，也不登记死亡的。这样的死亡漏报人口大约在2100万人左右。

2. 科尔是根据1982年生育率抽样调查数据计算我国这一期间出生人数的，这些数据是不可靠的，科尔把我国这一期间的出生人数多计算了大约2100万人左右，这些人口根本没有出生，但是被科尔计算到死亡漏报的人数之中了。

3. 我国在1960年到1964年开展的市镇人口精简中出现迁移漏报人口大约1400万多人，这些人口也都被科尔计算到死亡漏报的人数之中了。

这就是说，在科尔提出的我国该期间死亡漏报5549万人中，有大约3400多万人是虚假死亡人口，是根本不存在的，而另外的2100万则是婴幼儿死亡人口。科尔把这些根本不存在的虚假死亡人口和婴幼儿死亡人口同三年困难时期我国人口非正常死亡人数问题混淆在一起，得到了他的错误结论。

国外其他几个人口学家的基本思路同科尔的思路大致是一致的，因而都是错误的。

科尔等人的“研究”严重误导了国内外学术界和国际社会舆论，直接导致了“饿死三千万”这一重大谣言的产生和广泛流传。

三 蒋正华的“研究”——“饿死三千万”在国内开始传播

国外几个学者的研究结果公布以后，我国有关部门希望国内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西安交通大学蒋正华承担了这一课题。他在研究中估算我国“在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总人数约为1700万”，由于蒋正华的特殊身份，他的这一结果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蒋正华的研究在数学上是完全错误的

蒋正华研究的核心是建立了一个数学模型，他在文章中大量使用了现代数学的学术术语、符号和公式。

作为长期从事数学及其应用研究的专业数学工作者，我们对蒋正华的

“研究”进行了逐字逐句的认真分析，发现这一研究存在着一系列重大的、根本性的数学错误。其中最大的错误是：蒋正华居然对负数做起了开平方的运算。

蒋正华在他的论文中令

$$R_j(a+j) = \ln[SR_j(a+j)]$$

这里 $SR_j(a+j)$ 是留存率，是一个小于 1 的正数，任何一个中学生都知道小于 1 的正数取对数后是负数，即 $R_j(a+j) = \ln[SR_j(a+j)]$ 是一个负数。由

$$T(a) = \sum_{j=0}^{n_1-1} R_j(a+j)$$

可知 $T(a)$ 也是一个负数，但是蒋正华竟然对负数做起了开平方运算：

$$\bar{A}_{1j}^T = \frac{1}{\sqrt{T(a)}} [R^*(j), R^*(j+1), \dots, R^*(j+100-n_1)]$$

$$\bar{A}_j^T = \sqrt{T(a)} A_{1j}^T$$

$$\bar{A}_{1j}^T = \frac{1}{\sqrt{T(a)}} \left[\left(\frac{j}{100} \right) R^*(j+1), \dots \right]$$

$$\bar{A}_{2j}^T = \sqrt{T(a)} A_{2j}^T$$

经过我们逐字逐句地进行检查，蒋正华的数学论证中的几乎每一步都是错误的。

(二) 蒋正华没有也不可能公布他的计算过程

蒋正华 2005 年 10 月在给杨继绳的信中谈到他的结论是怎样计算出来的时候说：“因我手头没有详细资料，许多计算结果都压在手稿等资料堆中，要待我有机会再来整理。”蒋正华在 1986 年就已经公布了他的结论，并且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是过了近二十年后，他居然宣布，他的这一结论的计算过程“都压在手稿等资料堆中”，他根本没有进行整理，还需要等他有了机会以后“再来整理”。事实上直到今天蒋正华也没有公布他的计算过程。只要认真分析一下他的“数学模型”，人们就会发现从他的

“数学模型”出发是根本无法进行计算的，因此他不可能进行所谓“计算”，这就是他没有公布计算过程的真正原因。

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最近指出，蒋正华的研究“是在国家统计局的要求和支持下进行的，但国家统计局经过反复考虑，认为这一问题研究的难度较大，当时的研究成果尚不成熟，所以并未将此项研究列为正式科研课题，没有拨付课题经费，没有正式的‘课题研究报告’及其‘鉴定书’。蒋正华教授研究的初步成果始终是作为学者个人的学术论文，在本校学报和自行联系的有关书刊上发表的”。

（三）蒋正华对我们的质疑采取了不回应态度

我们对蒋正华的研究进行了公开的学术批评。一些老同志建议我们和蒋正华就这一问题当面交换意见，我们接受了这一建议，在2011年11月向蒋正华发去邀请信，内容如下：“尊敬的蒋正华先生：

最近我阅读了您关于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变动问题的几篇论文，发现其中存在着许多数学错误。很多人建议我能够和您当面就这一问题进行讨论。我愿意在您认为适当的时间和地点，与您就这一问题进行学术上的讨论，以搞清这一重大事件的真相。”

我们还通过可靠途径把我们的质疑文章交给了蒋正华。

但是时间已经过去快四年了，蒋正华始终没有对我们的学术批评做出回答。他应当本着对历史负责的精神对我们的学术批评做出公开的回应，讲清这一件应当在历史上澄清的重大问题。

蒋正华的这一“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欺骗了和严重误导了我国国内的社会舆论。正是由于他的“研究”，从1988年开始，我国国内一些正式出版物就公开宣传“饿死三千万”，“饿死三千万”开始在我国传播。

我们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应当本着对历史高度负责的精神，成立由数学家和人口学家组成的学术审查委员会，对蒋正华的“研究”进行学术审查，以搞清这一重大事件的真相。

四 以杨继绳、曹树基为代表的“研究”

1991年以后，国内外又先后出现了以杨继绳的《墓碑》、曹树基的《大饥荒》为代表的，包括丁抒、金辉、王维志、洪振快、冯克等一批人

的一系列所谓“研究”。随着网络的广泛普及和各种媒体的反复宣传，“饿死三千万”在舆论上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在全社会范围已经达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并且被一些人看成是“历史的定论”。

第一，杨继绳、曹树基等人的第一个根本性错误是：把由于各种错综复杂原因所造成的三年困难时期全国性，或者各个地区人口统计数据数字的减少，都归结为人口非正常死亡。

为了说明这一逻辑的荒谬性，我们看一个典型的例子。我国1999年年底的人口统计数字为125786万人。2000年11月1日我国进行的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得到的我国人口总数为124356万人，比1999年年底净减少1430万人（这一数字大于1960年比1959年净减少的1000万人）。如果按照杨继绳、曹树基等人的思维逻辑，由上述这一净减少的数字（1430万人），再加上这一期间“超过正常死亡人口的自然增长人口”，就可以推出我国在2000年前10个月至少有2300万人以上的人口非正常死亡。不会有任何人（包括杨继绳、曹树基等人）认为我国2000年前10个月有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那么他们为什么非要把我国三年困难时期人口统计数据的减少都说成是人口非正常死亡造成的呢？杨继绳、曹树基等人就是用这样的荒谬逻辑任意编造饿死人数的。

第二，他们的第二个根本性错误是：他们所称的许多“饿死”人数是通过错误的“杨继绳公式”计算出来的，不是实际统计的结果。

我们已经多次发表文章指出了这一点，并希望杨继绳、曹树基、洪振快等人做出答复，但他们始终没有作出回应。

我国不少地区的地方志中记载了三年困难时期这些地区水肿病的发病、治疗和水肿病死亡人数的情况。这些记载都说明了“杨继绳公式”计算得到的“饿死人数”比实际数字一般要大十几倍、几十倍，甚至几百倍。

第三，他们的第三个根本性错误是：他们大量篡改、伪造、隐瞒原始档案、地方志和其他资料中的记载，篡改和伪造对一些人的采访，肆意编造非正常死亡人数。

例如，杨继绳在《墓碑》以及“美国之音”、《炎黄春秋》等媒体上反复宣传：1961年年底，陈国栋、贾启允、周伯萍“三人受命”，进行了一次关于“饿死人的数量”的“全国性的调查”；调查结果“经汇总后，全国饿死人几千万”；周恩来总理看了以后下令“立即销毁”。杨继绳称这

是他对周伯萍先生进行采访，周伯萍向他确认的事情。周伯萍先生已经去世，这件事似乎已经死无对证。

但是经过我们对这一问题进行的仔细查证：杨继绳的以上说法是他制造的一个重大谣言。对此我们已经发表文章作了揭露。

为了对杨继绳、曹树基、洪振快、丁抒等人编造的我国各个地区（省、地、市、县）的“饿死人数”进行揭露，我们花费了巨大精力，全面查证了四川（含重庆）、贵州、云南、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广东（含海南）、山东、安徽、江苏、浙江、江西、福建、河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的全部县志、地区志、市志和省志的相关卷，以及黑龙江、吉林、辽宁、山西、内蒙古、新疆、北京、天津、上海的一部分地方志。

很多地方志对三年困难时期浮肿病这一类疾病的发病情况、地方政府采取的各种措施，以及由于水肿病这一类疾病造成的死亡人数都作了记载，是研究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变动问题的重要资料。由这些记载可知，杨继绳、曹树基等人编造的数字往往比实际数字大几倍、十几倍、几十倍，甚至几百倍，还可以看出杨继绳等人所极力渲染的党和政府不顾人们死活的说法是根本不符合事实的。

经过反复查证，我们也发现一些地方志中所记载的所谓非正常死亡人数（包括信阳事件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并不是实际统计的结果，而是使用错误方法“计算”出来的。对这些错误记载应当予以纠正。

杨继绳的《墓碑》是“饿死三千万”的最重要的代表性著作。我们已经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墓碑》进行了揭露和批驳，并且同杨继绳在报纸、刊物、网络和学术会议上就“饿死三千万”问题进行了辩论，引起了学术界和社会上的广泛关注。在辩论中杨继绳理屈词穷，最终发表声明退出了辩论。

曹树基的《大饥荒》是“饿死三千万”的另一部最重要的代表性著作。这部书打着地方志记载的名义（该书引用地方志大约1000余种），宣称我国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3250万人。我们通过查证大量的地方志（曹树基引用的地方志我们都逐一进行了查证），发现曹树基在书中大量隐瞒许多地方志中的关键性记载，大量肆意改变地方志记载的重要数据，并用错误的思维逻辑任意编造全国各个地区的所谓“非正常死亡”人数。他书中的几乎所有的非正常死亡人数都是错误的。

对曹树基《大饥荒》中的一系列错误，我们正在撰写文章予以揭露和

批驳。

通过对“饿死三千万”的来龙去脉作简要的梳理，可以看出，导致“饿死三千万”的三类关键性“研究”都是根本错误的。

五 “饿死三千万”是在中国进行 “颜色革命”最危险的武器

在一个国家实行“颜色革命”，最常用的手段就是通过制造重大谣言来彻底否定一个政权执政的合法性。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做了秘密报告以后，苏联出现了以否定斯大林、否定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为基本目的的“斯大林大清洗杀害几千万人”的重大谣言。这一重大谣言动摇了全体苏联人民、特别是苏联年青一代对社会主义的信念，这是在苏联实行“颜色革命”、导致苏联亡党亡国的基本原因之一。在这一谣言蛊惑下成长起来的年青一代中的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均出生于1931年，1956年均为25岁）葬送了苏联的党和国家。最近，苏联的有关档案解密，证实了“斯大林大清洗”杀害几千万人不是事实，但是苏联亡党亡国已经成为无法改变的历史事实。

在中国，“饿死三千万”的重大谣言起着同样的作用，这一谣言是某些敌对势力在中国实行“颜色革命”最危险、最致命的武器。“饿死三千万”就是要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前三十年说成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黑暗、最悲惨的时期，从而在根本上彻底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杨继绳自己就明白无误地说，他之所以要把他的书定名为《墓碑》，就是要为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提前立下”一个“墓碑”。

“饿死三千万”这一重大谎言严重欺骗和误导了国内外的社会舆论，毒害了亿万不明真相的人们，极大地削弱了亿万群众，特别是年轻人对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的信念。从三年困难时期过来的老人中的绝大多数都不相信这个谣言，但是历史虚无主义和我们争夺的是年轻的几代人。在我国三年困难时期以后出生的几代人，由于不了解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很容易被这一谣言所迷惑的。如果我们任凭“饿死三千万”这一重大谣言泛滥，那么在这一重大谣言蛊惑下成长起来的年轻几代人，就会彻底动摇对社会主义的信念。这样“饿死三千万”就会成为某些人发动“颜色革命”、推翻我们党和国家的最具杀伤力的重磅炮弹，其所起的作用无

论怎样估计也不过分！如果这样，中国将会发生比苏联更加惨痛的事情，将会出现历史的大倒退，出现国家和民族的大分裂。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江苏师范大学）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2014年总第124期）

“五朵金花”成就不容否定

张 越

史学界的“五朵金花”，指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史坛广受关注并引发大规模讨论的关于中国古代史五个重大历史理论问题，即中国古代史分期、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农民战争、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和汉民族形成。除此之外，当时讨论的关于中国古代史的历史理论问题还有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亚细亚生产方式、历史人物评价等。“五朵金花”在今天已经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间所讨论的那些重大历史理论问题的代名词。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如何运用唯物史观认识、解释中国历史。“五朵金花”中的各个问题，实际上就是在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过程中出现的、也是绕不过去的重大历史理论问题。这些问题伴随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和发展先后出现，如古史分期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期间就是讨论的焦点之一，农民战争史研究在抗战时期的延安地区被中共领导人高度重视，与资本主义萌芽和与汉民族形成相关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也有很多研究和讨论。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确立的情况下，“五朵金花”很快以其强烈的问题意识而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广受关注，在当时亟待充实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情况下，“五朵金花”竞相绽放，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时期”史学中令人瞩目的现象。

20世纪80年代中期，有关“五朵金花”的讨论热度逐渐降低。经过一段时期的沉寂，80年代末至90年代，陆续出现对“五朵金花”研究进行回顾、反省、总结的文章。进入21世纪以来，反思、研究“五朵金花”现象的文章逐渐增多，对“五朵金花”中诸问题的不同看法、对“五朵金花”现象的不同评价也相继出现。

一 “五朵金花”现象整体评价

较早从整体上对“五朵金花”作专门论述的是王学典在2002年发表的《“五朵金花”：意识形态语境中的学术论战》。该文将“五朵金花”归结为“战时史学”体系的产物，看作是“欧洲中心论”的影响所致。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上曾经“占据史坛主流地位的巨大历史存在”，本文率先对“五朵金花”做整体性的学术史考察，反映了作者敏锐的学术意识。尽管作者刻意强调“五朵金花”中“蕴含着不可抹杀和轻忽的学术意义”，并且试图从多个角度阐发其“学术内核”，但是，文中用于解读“五朵金花”的诸如“战时史学”等观点，仍然引起极大争议。无论如何，这对于客观评价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史学、对于深入认识唯物史观指导下的中国历史研究的经验教训，都具有积极意义。

近十几年来，对包括“五朵金花”在内的20世纪重大历史理论问题学术论争的学术史梳理的著述相继问世，如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的“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论辩书系”、河南大学出版社的“新中国学案丛书”等。这些成果对“五朵金花”诸问题的形成展开、各种不同观点的来龙去脉都做了较为详尽的梳理阐发，为更为客观地评价“五朵金花”现象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近几年来，对“五朵金花”现象的研究明显受到重视，“五朵金花”盛开时的亲历者赵俪生说：“今天回过头来看‘五朵金花’，全部否定我是不赞成的；全部肯定我也不赞成。应该批判地保留，而且保留的部分应当偏多一点，甚至基本上应予肯定。把‘五朵金花’看作是‘五朵病梅’的，我觉得是一种新的‘左倾’、教条主义。我认为将来写学术史，对‘五朵金花’不应当采取否定态度，它的五个内容都有相当的成绩。”人们试图对“五朵金花”的绽放过程做出分析与评价，对“五朵金花”现象进行更深刻的反思。如蒋海升的《“西方话语”与“中国历史”之间的张力——以“五朵金花”为重心的探讨》，是迄今唯一以“五朵金花”为整体研究对象的专著，意在考察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相结合过程中带给中国史学的新视角、新方向以及所存在的距离与分歧，较为全面地梳理了关于“五朵金花”的论争历程，于审视“五朵金花”学术脉络、深层蕴意等方面又有明显推进。卜宪群、杨艳秋、高希中认为，虽然“五朵金花”具有

意识形态的属性，并且在理论运用与方法上存在着某些教条化与“左”的倾向，但毕竟绽放在学术领域内，在不同见解的交锋中蕴藏了许多崭新的观察视角、理论方法，开辟了诸多新的研究领域，客观上刺激并促进了文献学、考古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的进一步发展，为此后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一大批新的生长点。张越对“五朵金花”花开当年与花落今天的不同境遇作了对比，认为“五朵金花”都是在试图探索关乎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特点和道路的问题，试图回答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深层次问题。尽管在讨论中存在着各种不足与失误，但是中国史学在此讨论的基础上收获甚丰则是不争的事实。邢铁、夏一哲认为，“五朵金花”按照其问题本身可分为论题有价值且认识有意义、论题有价值而研究方法有偏差、论题本身欠妥而研究方法也有失误等三种情况，由“五朵金花”引出的新问题是中国古代史研究“由分散走向整合的努力”过程。

越来越多的对于“五朵金花”的不同评价及各种观点，充分说明人们对如何看待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这一重要问题的重视程度。在反思“五朵金花”的同时，其中的中国古史分期问题和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尤其被人们重点关注。

二 探索和追问中国古史分期问题

被视为“五朵金花”之首的中国古史分期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从热议西周封建说、战国封建说、魏晋封建说等不同观点渐渐发展为对如下问题的思考：人类社会是否只能按照一种单线的发展模式行进？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是否能作为世界各地社会发展过程的通用模式？

在奴隶社会是不是人类发展的必经阶段、中国历史上是否经历过奴隶社会的问题上，形成了明确的不同意见。主张奴隶社会并非是人类历史发展必经阶段的学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奴隶制的理论主要是以分析古希腊、罗马社会为基础总结出来的，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典型或特殊情况，这样的发展模式并不能代表所有人类社会的普遍发展规律。具体到中国历史，他们大都认为中国没有经过奴隶社会发展阶段，因为中国古代社会有着明显不同于古希腊、罗马的发展途径。但仍有学者坚持认为不能轻易否定奴隶制在历史上的存在现象，尽管不能绝对地理解为一切国家民族

都必经这个阶段，但是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奴隶社会的存在还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他们也不能认同“无奴论”者宣称的中国无奴隶社会已“深入人心”并成为“定论”的说法。

进入 21 世纪后，讨论的焦点由“奴隶社会”转向了“封建社会”。问题始于对“封建”一词的循名责实，即中国先秦时期的封邦建国、封建制等的“封建”与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里的封建社会中的“封建”并非同义，近代中日学者以中国固有的“封建”概念对译西欧中世纪社会制度的 *feudalismus* 一词，并将秦至清称为封建社会，使得在概念的古今转换、中西对接过程中，“封建”的含义发生了“泛封建化”的“偏误”。部分学者据此对于中国秦汉以后至明清时期的历史是不是类似西欧中世纪的社会形态、中国究竟有无封建社会提出质疑，或提出中国的这段历史应该有自己的特殊表达。但也有学者认为，“封建”概念是历史地变化着的，不应该用凝固的老概念去“匡正”人们鲜活的历史认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提出“封建地主制”理论，被中国革命的胜利证实是正确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封建观的继承和发展。把它贬为“泛封建观”，指责它“与马克思封建社会的原论相悖”，是站不住脚的。更多的学者主张应该对秦至清朝的历史阶段做出更加符合中国社会特征的理论分析和概括。

对中国古史分期不同阶段社会性质的追问与回应，从根本上看，反映的还是对用社会形态学说解释中国历史所持的不同态度，而“封建”名实之争却已触及长期以来成为定论的革命史话语体系。对问题的讨论目前虽暂时处于停滞状态，但是从宏观视野探索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进程仍然对学者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事实上，在 20 世纪末至 21 世纪初的十几年间，已有不少学者对中国古史分期和中国古代社会性质问题提出自己的新见解，如以“上古”“中古”的进化时段分期，以洪荒、邦族、封建帝制分期，以氏族、宗法、地主封建分期，以酋邦、王国、帝国分期等。各种观点是否较为合理地解释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演进特征尚需时间的检验，各种观点之间还存在着较大分歧，各种观点在短时期内尚难被学界普遍接受或认可。不过，根据中国历史发展的自身特点和中国古代社会的内部结构考察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不仅是历史学者的共识，也是努力的方向。

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从 20 世纪 30 年代社会史论战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到新中国成立后成为“五朵金花”之首并形成众多分期观点，从努力结合五种生产方式解释中国历史发展阶段，到着力依据中国历史发展特点“重

构”中国古史体系的尝试，尽管其研究与讨论过程潮起潮落、跌宕起伏，却无处不见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的深刻影响。正如马克垚所说，“社会形态学说是一种认识社会历史发展的正确理论和有效方法”。结合社会形态学说探讨中国古史分期问题所形成的诸说并起、互相辩论的局面，实际是对中国近现代史学以整体、宏观看待历史为特征的研究范式的全面实践。李振宏认为，凡是涉足这些重大历史理论问题的史学家，不论持何种分期观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已经“变成了一种思维理性和思维习惯”。

三 深入考察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五朵金花”中，学界对中国古史分期问题持续关注，对农民战争问题少有问津，而汉民族形成问题已经延伸、演变为一系列重要问题：包括中国古代民族和国家起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认同等兼具学术与现实意义、事关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重大热点问题。至于资本主义萌芽和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则以其充实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和土地制度史研究成果而成就了相关专门史研究的繁荣局面，其中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更引起学界的特别关注。

李伯重提出“资本主义萌芽情结”说，即在弄清什么是“资本主义”的情况下，就简单地将商品经济、雇佣劳动、私人企业看作是资本主义，把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商品经济、雇佣劳动、私人手工业作坊都作为资本主义萌芽，且坚信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过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可能，这只能是一种愿望、一种情结，这种情结又与近代以来中国人与西方争平等的强烈愿望，即“别人有，我们也要有”的争气心态相符合，也与长期以来我们相信各民族都必然遵循一条共同道路的“单元一直线进化”史观有关系。李伯重、王学典等都认为“欧洲中心论”的影响是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受到重视的原因之一。仲伟民在回顾20世纪30年代至今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过程后，强调资本主义萌芽讨论的主要缺失在于绕过什么是“资本主义”而直接讨论“资本主义萌芽”。黄宗智则把中国大陆学者的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归结为“规范认识危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与中国古史分期、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等问题关系密切，后又与近代社会转型、现代化问题、摆脱“欧洲中心论”等互有关联。对该

问题的深入反思，成为当今对“五朵金花”评价牵一动全的一个关键问题。

如同当年讨论“五朵金花”问题有着各种不同观点一样，今天回顾、评价“五朵金花”大讨论的过程与得失，依然存在着较大分歧。对于这样一个集结若干重大历史理论问题、持续长达十余年的时间并伴随着大量的具体研究和争论、汇集了几乎所有知名史家积极参与其中的学术现象，需要在充分了解“五朵金花”发生前后实际语境的基础上，进行认真梳理与分析。“五朵金花”问题不是采取讥讽或不屑的态度就能轻易否定得了的，也不是简单地肯定就能说清楚的，而许多先入为主、人云亦云的观点我们却不能同意。如何在新的学术语汇环境中，更好地借鉴和发展这一大笔学术遗产，而不是让新中国史学的发展历程出现断裂，是值得史学界思考的重要问题。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1月10日）

李鸿章卖国还用质疑吗？

彭秋归

时下，为历史人物翻案似乎成了一种时髦。即便是以前公认的卖国贼，在这些翻案者的笔下，也有可能摇身一变成为“民族英雄”。对晚清重臣李鸿章的评价即是显例。

最近几天，网上流传一篇署名端木赐香的文章，标题即是“李鸿章卖国容易么？”在文中，作者声称，“中国历史上最冤的替罪羊当数李鸿章。大清的卖国贼只有一个，那就是掌握大清实际权力的老太后”。在其笔下，李鸿章俨然已由“民族败类”变脸成“国家忠烈”，由“卖国贼”变脸成“爱国者”了，于是乎，李鸿章的“卖国”终究是“为国”，是事出有因，是情有可原，所谓“和戎”也只是为了“变法”，成了一个不计个人得失、为国家忍辱负重的悲情英雄。作者甚至在文末声称，“过去的人没有史识，不知道该骂太后。当代人还这样，心智就值得怀疑了。历史学者如此，革命群众更是如此”。

事实果真如此吗？

以端木赐香为代表的历史翻案者为李鸿章开脱的第一个最常见的理由是：作为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者，李鸿章是代清政府受过，代慈禧老太婆受过。李鸿章参与外交谈判，受制于清廷的软弱和列强的强硬，自己没有选择余地，不应当承担历史责任，要怪就怪清政府任人宰割的无能。事实是，李鸿章自1870年出任直隶总督并掌管晚清外交以来，中外重大条约交涉几乎都与他有关系，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为数众多，如《中法新约》《马关条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等等。这些条约的不平等性，对中华民族利益的侵犯，李鸿章不可能不知，但他还是签了字。为什么列强屡屡指定他为谈判代表？因为他平时的表现一贯地符合列强的利益要求。中华民族历来不乏视死如归的将士，不乏毁家纾难的民众，不乏据理力争的谈

判者。即使放在李鸿章类似的处境下，也有在沙俄威逼利诱之下，仍屡次严词拒绝签订不平等条约的驻俄公使杨儒。李鸿章选择卖国，最终要保全的是他自己和他所代表的阶级的既得利益，所以他不惜出卖国家利益，与慈禧太后一起“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成了列强眼中“一个真正的政治家”。

为李鸿章开脱的第二个理由是：李鸿章“卖国为国”，“和戎”只是权宜之计，“变法”才是根本之图。即便这是历史事实，也不能认为“和戎”是应该得到褒扬的。如果一次割地赔款可以换来国家长久安宁，如果这是他争取时间励精图治的策略，那么一次“和戎”还情有可原；然而当侵略者一而再、再而三地蹂躏中国，由侵犯周边国家而至于边疆，又至于内陆，进而至于京城时，李鸿章还一味求和、割地赔款，就只能说这是他一以贯之的投降主张，是他明知故犯的卖国行径。在与沙俄签订《中俄密约》时，李鸿章曾收受沙俄几百万卢布的贿赂，从而把中东铁路的修筑权、经营权以及沿线采矿权等卖给沙俄。正如俄国外交部前副司长沃尔夫在其未发表的回忆录中所说：“李鸿章带着这个签了字的条约和袋子里两百万卢布返回北京，在东方，良心有它的价钱。”也正因为他的贪婪，民间才有“宰相合肥天下瘦”的讥讽。

为李鸿章开脱的第三个理由是：李鸿章主观意志不愿意卖国，充其量只是误国。问题在于如果李鸿章主观上不卖国，那么在他一生对外的政治行动中，为何只要列强一跺脚，一威胁，一喊打仗，李鸿章就主张议和，就要割地赔款呢？1874年，日本出兵侵略台湾，李鸿章命令负责台湾防务的船政大臣沈葆楨“只自扎营操练，勿遽开仗启衅”，同时主张开放台湾，对日赔款了事。在他的操纵下，中日签订不平等条约《北京专约》。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当抵抗的主张在清政府占据优势时，李鸿章则充当“失败主义和投降论的宣传者”，“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即使“一时战胜，未必历久不败，一处战胜，未必各口皆守”，恫吓清政府说中国“兵心民心摇动，或更生他变”，要求早日收束。正如御史刘恩溥的奏折所说：“李鸿章办理海防二十多年，耗费数千万两，曾杀过鬼子一名否！他一味献媚于洋人，固宠求荣”，而反观“刘永福奋力杀贼，中国统兵大员在他面前应当愧死，无地自容”。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写的《中国近代史稿》在总结甲午中日战争时所写的那样：“在整个战争过程中，李鸿章的所作所为，都表现出他始终坚守一条方针：彻底的投降主

义，卖国主义。”

还有一个为李鸿章开脱的理由是：李鸿章在其他方面有贡献，只提卖国太片面。有些学者抓住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的某些成绩，从而认定李鸿章是“改革家”，却闭口不谈本质问题，不谈主要方面，偏要把边边角角的东西视为中心问题，企图一美遮百丑，混淆视听，金蝉脱壳，将他的污点撇得一干二净。在洋务运动中，我们不否认李鸿章起到过某些客观的积极作用，但他的这种作用不能无限拔高，不能构成他一生活动的主要方面。我们也不否认清政府的卖国责任不应由李鸿章一人承担，但至少他是其中重要的一员。在历史研究中，研究者被研究对象所征服，虽然是常见的现象，但我们要始终牢记，评价历史人物，必须要看他对历史的主要影响、主要作用。就李鸿章的卖国行为以及这些行为对中华民族的伤害相而言，李鸿章的贡献是微不足道的。

因此，那些为李鸿章开脱的理由，没有一条站得住脚。无论是从其一生从事的政治活动的客观后果，还是从其主观意愿来看，无论是作为清朝统治的代言人，还是作为私人利益的攫取者，李鸿章的卖国行径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巨大灾难，是无论如何也抹杀不掉、洗刷不净的。李鸿章头上的卖国贼骂名，摘不掉！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研究室）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3月21日）

为国学学术热降降温、消消毒

苏全有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民国学术史研究风行，相关成果正如罗福惠教授所道，“多得无法统计”。甚至学术界之外的社会各界，也热捧不已。伴随着电影《黄金时代》上演，学术界与普通民众舆论呼应、话语互动，社会影响巨大。

民国学术热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该时段学术成就被夸张、放大了。不少学人缺乏对所研究对象的深入探究，雾里看花，颂扬有加，几至顶礼膜拜。一时间，不以国学见长者被捧成了国学大师，一些不时流露出稚气的作品则被奉为经典……

在今天看来，民国学术的确被高估了。对“民国学术热”的追捧，并非是建立在客观、宏观审视基础之上的科学结论。

目前学术界研究存在的最大问题是，相对于微观领域中丰富的点式成果，宏观领域中的研究则有失欠缺。研究者习惯于就事论事，缺乏宏大视野与长远眼光。尽管具体问题的研究是学术推进的基础和常态表征，不过，只有宏观把握与总结才能得出更有高度、更全面和更具指导意义的见解和结论。纵横寰宇内，像汤因比、韦伯那样着意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宏观整体描述的哲人型学术巨匠太少了，多的是剥茧抽丝、精雕细刻、管窥蠡测的小工。如此境况、氛围之下对民国学术的力挺，多多少少显得有失盲目。毕竟，学术界缺乏宏观审视民国学术，并予以纵向准确定位的努力。

其实，若能拉长视距，新见地将次第而生，正所谓“草色遥看近却无”。从解释学的意义看，学界需要新式解释框架，比如适当借鉴年鉴学派之长程历史观式。民国学者廖泰初曾批评民国时期治学“太狭隘，太专门，躲到牛角尖里去”，“见树木不见森林”。

纵向对比来看，与清代相较，民国时期的学术显得无根。清代承继我国历代学术传统积淀，研究成就达到了历史上相当高的水准。以乾嘉学派为例，可谓是人才济济，成果累累。但在某些方面，却被人为地否定甚至妖化，直接导致其学术成就被矮化、被淡化。再以《红楼梦》为例，实乃中国小说之最。试问，民国时期的小说，有哪一部可与之媲美？至于《四库全书》，涉经史子集，至今罕有其匹。民国时期引入西学，风生水起，反传统之声震耳欲聋，结果是西学远未参透，传统又丢了不少，显得无根。

纵向对比新中国时期，民国时期只是西学引入中国后的咀嚼期，而非消化期。比如学科创设等，只是搭建了初步的框架而已。又如中西医，竟然流行取消中医，中西医不是取长补短的融合，而是非此即彼的不共戴天。西方的东西在我国被真真切切地消化吸收乃至发扬升华，则是数十年之后的事情了。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自我定位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在很多方面不还在西学吗？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为国人所额手称庆，而美国有的大学就拥有数十位获奖者。无论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民国时期的学术地位都不容高估。

1936年12月3日《申报》刊载何炳松之文《中华学艺社的责任和前途》称，“我们一面要商量旧学使之更加邃密，一面要涵养新知使之格外深沉，工作既繁，责任亦重”，“我国事事落后，学术的研究亦然。学术的研究本为各项事业进步的基础，所以我们非急起直追不可”。民国学人当局者清，有自知之明，后人焉能旁观者迷，草率造次？

今天我们回首民国学术，其所取得的成就当然应该予以认同、尊重，只是超越事实之上的夸大其词、无中生有，不仅仅不是认同，不是尊重，而是相反。

民国学术热真的该降降温了！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民国学术热之所以盛行，评价失真，与部分学人的极端趋向及误导有关。处于清代、新中国之间的民国时期，政治腐败、民生凋敝、战争连绵、社会动荡，处于失序状态。一些学人基于对所谓“民国自由”的推崇，借他人酒杯浇心中块垒，拿民国学术说事，错解失序形态，一叶障目，刻意美化、歌唱，在微博、博客等载体中更是极尽渲染之能事。在他们看来，民国无奴才，文人贤达堂堂正正，敢做敢当；民国自由，极端言论可以公开发表。在这里，客观、全面、中立的学术研

究立场被抛诸脑后，心中只有“小我”，只有所谓精英文化圈的狭隘的自由，而民众疾苦则不过是一片可以漠视的灰色的云。在他们眼里，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黑铁时代”，成为逝去的“黄金时代”。甚至还有一些人公然主张，希望回到民国去。以至于民国好还是现在好这个让人发笑、多此一举的伪命题，渐渐成了争议之题。知识界的这一灰色群体，直接助推了民国学术热，“民国”也借此成了热词。

为民国学术热降温，就是为了消炎，为了消毒。

（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2月8日）

附录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虚无主义批判 部分文章目录(2005—2015)

2005 年

沙健孙：《关于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再评价》，《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 年第 1 期。

梅荣政、杨军：《历史虚无主义重新泛起的透视》，《马克思主义研究》2005 年第 5 期。

朱佳木：《史学理论建设三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5 年第 6 期。

田居俭：《历史岂容虚无——评史学研究中的若干历史虚无主义言论》，《高校理论战线》2005 年第 6 期。

逢先知：《按照历史决议的精神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 年第 6 期。

陈之骅：《苏联解体前夕的历史虚无主义》，《高校理论战线》2005 年第 8 期。

2006 年

田居俭：《必须尊重中华民族的历史渊源——评历史虚无主义的一种表现》，《求是》2006 年第 3 期。

陈祖武：《谈谈史学工作者的责任和素养》，《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 年第 3 期。

韩亚光：《“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说考辨》，《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 年第 4 期。

2007 年

高翔：《正确对待社会形态研究的历史地位》，《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 年第 2 期。

程中原：《读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高校理论战线》2007 年第 3 期。

张海鹏：《〈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高校理论战线》2007 年第 4 期。

陈奎元：《国史研究要以科学、敬谨的态度对待》，《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 年第 6 期。

朱佳木：《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求是》2007 年第 18 期。

2008 年

朱佳木：《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历史性质及其相互关系上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 年第 1 期。

郑科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警惕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三股思潮》，《政治学研究》2008 年第 1 期。

于沛：《历史科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史学理论研究》2008 年第 1 期。

郑瑁：《国史学理论问题研究述评》，《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 年第 2 期。

曹守亮：《改革开放以来国史研究的理论发展及其趋势》，《高校理论战线》2008 年第 7 期。

朱佳木：《警惕在中国近现代历史断限问题上的“理论陷阱”》，《高校理论战线》2008 年第 10 期。

马砚：《近年来关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论争》，《中国社会科学院报》2008 年 12 月 18 日。

2009 年

朱佳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 年第

1 期。

陈奎元：《开创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的新境界新水平》，《史学理论研究》2009年第3期。

本刊记者：《要充分认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严重危害性——访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梁柱》，《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3期。

张顺洪：《关于当前的意识形态斗争》，《政治学研究》2009年第3期。

朱佳木：《关于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的几个问题》，《史学理论研究》2009年第4期。

杜继文：《关于五四运动的评价问题》，《高校理论战线》2009年第5期。

王伟光：《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党的建设之本》，《前线》2009年第7期。

张海鹏：《新时期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求是》2009年第7期。

吴恩远：《历史虚无主义的破产——俄罗斯对苏联历史从全盘否定到公正评价》，《红旗文稿》2009年第7期。

朱佳木：《改革开放30年基本经验的核心》，《红旗文稿》2009年第11期。

陈奎元：《继承优秀传统创造新的辉煌——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60年的成就与启示》，《求是》2009年第14期。

邹诗鹏：《现时代的历史虚无主义及其成因》，《中国社会科学院报》2009年6月2日。

2010 年

曹守亮、曹小文：《唯物史观与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发展》，《史学理论研究》2010年第1期。

齐德学：《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反细菌战是中国方面的造假宣传吗？》，《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3期。

马社香：《毛泽东“停、缩、发”讲话历史真相探源》，《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3期。

徐海燕：《步入歧途：苏联解体进程中的意识形态蜕变》，《政治学研究》2010年第3期。

吴英：《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编纂不能离开唯物史观的指导》，《史学理论研究》2010年第4期。

张树华：《20年来俄罗斯社会历史观的嬗变》，《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0年第4期。

杨艳秋：《唯物史观与党史研究》，《北京党史》2010年第4期。

周新城：《历史在这里沉思——苏联解体近20年的思考》，《政治学研究》2010年第5期。

周新城：《“十年论战”留下的若干启示——在中国共产党即将成立90周年之际》，《政治学研究》2010年第6期。

许恒兵：《历史虚无主义：用理论假设取代历史现实》，《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0月21日。

2011年

宋月红：《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国化与国史研究的初兴》，《武陵学刊》2011年第2期。

李慎明：《理论要接受人民和历史的评说》，《红旗文稿》2011年第3期。

李根蟠：《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方法与路径的思考——学习毛泽东“古今中外法”札记》，《史学史研究》2011年第3期。

朱佳木：《中国共产党的90年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的90年》，《当代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4期。

李志军、邓鹏：《当代主要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批判——基于划清“四个重大界限”的思考》，《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5期。

步平：《在时空背景下理解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4期。

穆艳杰：《当代历史虚无主义批判》，《政治学研究》2011年第5期。

李志军、邓鹏：《当代主要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批判——基于划清“四个重大界限”的思考》，《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5期。

张海鹏：《怎么看待辛亥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党建》2011年第10期。

2012 年

- 杨俊：《20 世纪中国历史进程的事与理——驳历史虚无主义》，《政治学研究》2012 年第 1 期。
- 张金才：《〈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意义》，《当代中国史研究》2012 年第 3 期。
- 田居俭：《历史知识、历史经验与历史智慧》，《党的文献》2012 年第 4 期。
- 张星星：《书写无愧于历史和时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北京党史》2012 年第 6 期。
- 朱佳木：《加强国史研究和宣传，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历史依据和借鉴》，《当代中国史研究》2012 年第 6 期。
- 赵玥：《中国共产党与两大历史任务的实现——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兼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李捷》，《理论视野》2012 年第 6 期。
- 李捷：《研究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的代表性著作——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导读》，《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2 年第 7 期。
- 陈东林：《评价毛泽东三线建设决策的三个新视角》，《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2 年第 8 期。
- 谢添：《抗战时期延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与发展》，《人民论坛》2012 年第 8 期。
- 李捷：《尊重历史，敬畏历史，才能从中汲取足够的智慧》，《高校理论战线》2012 年第 12 期。
- 欧阳雪梅：《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历史贡献——以科学认识和维护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为视角》，《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2 年第 12 期。
- 梁柱：《历史虚无主义评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年版。
- 杨俊：《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及产生原因》，《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 年 6 月 13 日。

2013 年

戴茂林：《“毛泽东让高岗查刘少奇档案”一说辨析》，《当代中国史研究》2013 年第 1 期。

张启华：《正确看待改革开放前后历史的辩证关系》，《当代中国史研究》2013 年第 2 期。

任贵祥：《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科学贯通》，《当代中国史研究》2013 年第 2 期。

梁柱：《以毛泽东时期为视角考察新中国“两个历史时期”》，《当代中国史研究》2013 年第 5 期。

杨金华：《深刻认识历史虚无主义的反历史性》，《当代中国史研究》2013 年第 5 期。

逢先知：《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当代中国史研究》2013 年第 6 期。

宋月红：《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研究述评》，《当代中国史研究》2013 年第 6 期。

于沛：《历史不容虚无》，《求是》2013 年第 6 期。

张树华：《俄罗斯为何打响“历史保卫战”》，《党建》2013 年第 6 期。

《居安思危》课题组（执笔人：周新城）：《不能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采取历史虚无主义态度——与左凤荣教授商榷》，《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 年第 7 期。

朱佳木：《坚持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前线》2013 年第 8 期。

周晓东、卫静春：《唯物史观视阈下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教育研究》2013 年第 8 期。

李慎明：《正确评价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红旗文稿》2013 年第 9 期。

宋月红：《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是学习党史国史的重要前提》，《前线》2013 年第 9 期。

梁柱：《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泛起、特点及其主要表现》，《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 年第 10 期。

李捷：《毛泽东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的历史性贡献》，《前线》

2013 年第 12 期。

田居俭：《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求是》2013 年第 19 期。

李捷：《怎样认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求是》2013 年第 24 期。

陈之骅：《意识形态自由化的恶果：历史虚无主义搞乱苏联》，《人民论坛》2013 年第 27 期。

杨军：《历史虚无主义虚无了什么？》，《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 年 1 月 25 日。

杨军：《妖魔化毛泽东可休矣》，《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 年 6 月 14 日。

徐刚：《“文学性”不是虚无历史的借口》，《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 年 6 月 17 日。

韩炯：《破解历史虚无主义的理论陷阱》，《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 年 7 月 5 日。

杨俊：《中国历史进程不容否定》，《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 年 7 月 15 日。

杨金华：《深刻认识历史虚无主义的反历史性》，《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 年 7 月 19 日。

孙经先：《“饿死三千万”不是事实》，《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 年 8 月 23 日。

孙经先：《“饿死三千万”的谣言是怎样形成的？》，《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 年 9 月 9 日。

李捷：《毛泽东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绩不容抹杀》，《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 年 9 月 16 日。

李捷：《毛泽东对中华民族至少有五大贡献》，《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 年 9 月 23 日。

荣维木：《中国抗战史真的需要重写吗？——评〈中国需要重写抗战史〉》，《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 年 9 月 30 日。

李捷：《驳〈晚年周恩来〉对毛泽东的丑化》，《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 年 10 月 14 日。

李慎明：《1928 年是在误传杨开慧已牺牲的情况下毛泽东与贺子珍联姻的》，《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 年 10 月 23 日。

金仁：《毛泽东不是独裁者》，《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 年 10 月 28 日。

林家有：《到底谁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背叛者》，《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

年11月4日。

张浚：《历史地看待新中国的对外援助》，《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1月8日。

宋月红：《解放战争不是悲剧》，《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1月18日。

薛广洲：《毛泽东不是闭关锁国论者》，《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1月18日。

吴波：《思想不能无底限地向现实让步——从两个30年的讨论说开去》，《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2月20日。

陈雪薇：《全面科学历史地评价毛泽东》，《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2月27日。

方为：《不朽的毛泽东》，《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2月27日。

2014年

陈雪薇：《历史视阈下毛泽东的功绩和错误》，《历史研究》2014年第1期。

张顺洪：《警惕近年意识形态领域的错误思潮》，《政工学刊》2014年第1期。

张江：《文学不能“虚无”历史》，《文学评论》2014年第2期。

孙经先：《“饿死3600万”的重大谬误是怎样产生的？——对杨继绳先生两篇文章的答复》，《红旗文稿》2014年第2期。

谢加书：《简析毛泽东“亿元稿费”谣言的传播》，《当代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2期。

卜宪群、杨艳秋、高希中：《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兼评历史虚无主义》，《求是》2014年第4期。

韦磊：《海外毛泽东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6期。

张全景：《实事求是地研究和宣传党史、国史》，《当代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4期。

韦磊：《海外毛泽东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6期。

姜迎春：《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成因、表现及其危害》，《当代中国史研

究》2014年第6期。

龚云：《谁是真正的历史虚无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9期。

卫建林：《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改革》，《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2014年第14期。

张江：《“虚无”历史就是“虚无”价值》，《求是》2014年第14期。

张海鹏、龚云：《马克思主义是历史虚无主义吗？》，《红旗文稿》2014年第16期。

王伟光：《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专政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札记》，《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2014年第57期。

宋月红：《论国史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中华魂》2014年第21期。

夏杏珍：《建国初期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历史必然性》，《红旗文稿》2014年第21期。

姜辉：《正确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2014年第136期。

欧阳雪梅：《毛泽东对新中国文化建设的贡献不能抹杀》，《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月3日。

董振平：《长征原因分析要经得起历史检验》，《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月20日。

郝琦：《延安窑洞真是“特权染缸”吗》，《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3月17日。

彭秋归：《李鸿章卖国还用质疑吗？》，《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3月21日。

杨艳秋、卜宪群、高希中：《“五朵金花”的影响和地位不容抹杀》，《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3月31日。

靳晓霞：《清末立宪改变不了近代中国命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4月4日。

李维武：《“五四”评价关涉中国向何处去》，《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4月11日。

陈宇翔：《清末立宪的失败不可避免》，《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4月21日。

- 耿雪：《历史虚无主义“重写历史”有何诉求？——访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教授梁柱》，《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4月23日。
- 洪峻峰：《“五四”：倒退还是进步？》，《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5月5日。
- 迟方旭：《毛泽东是典型的慎刑主义者》，《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5月12日。
- 赵郎：《揭开日本对华鸦片侵略的面纱》，《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5月16日。
- 赵社民：《中国历史上真的没有农民起义吗？》，《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5月19日。
- 刘书林：《理清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三条主线》，《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5月23日。
- 龙剑宇：《驳对毛泽东生活起居的质疑》，《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5月26日。
- 张越：《正视“五朵金花”的当代价值》，《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5月30日。
- 张顺洪：《抗美援朝的意义不容低估》，《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6月9日。
- 霍文琦：《不能任由历史虚无主义虚无我们的历史根基——专访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李殿仁中将》，《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6月25日。
- 尚庆飞：《毛泽东晚年错误岂可归咎于“两论”》，《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7月7日。
- 林璧属：《别拿“弱国无外交”为李鸿章开脱》，《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7月14日。
- 陈瑛：《对民国文化不可一概仰视》，《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7月14日。
- 武力：《中国改革走的是正确道路》，《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8月4日。
- 迟方旭：《毛泽东没有阻碍民法典的编纂和颁布》，《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8月18日。

- 谢加书:《毛泽东是否说过“死3亿人没关系”》,《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8月24日。
- 宋月红:《岂能以历史“碎片”颠覆历史逻辑》,《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9月3日。
- 何建明:《历史虚无主义在学理上不成立》,《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9月5日。
- 梁柱:《再谈蒋介石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答杨天石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9月5日。
- 梁柱:《奉劝走出历史虚无主义的研究误区——再答杨天石先生》,《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1月24日。
- 北原:《对“三年困难时期”人口非正常死亡问题的若干解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9月22日。
- 武力:《怎样看待“三线建设”的历史遗产?》,《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0月13日。
- 左玉河:《追根溯源:历史虚无主义的认识论误区》,《光明日报》2014年10月26日。
- 许俊达:《用唯物史观揭露历史虚无主义的虚假本质》,《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1月17日。
- 孙经先:《驳洪振快〈有关大饥荒的新谬说〉》,《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2月5日。
- 周良书:《坚持历史自信终结历史虚无主义》,《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2月5日。
- 苏全有:《为民国学术热降降温、消消毒》,《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2月8日。
- 侯西安:《英烈岂可被“虚无”》,《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2月12日。
- 李殿仁:《改变中国、影响世界的伟人——读〈毛泽东年谱(1949—1976)〉》,《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2月26日。
- 张江等:《文学不能“虚无”历史》,《人民日报·文学观象》2014年1月17日。
- 张江等:《文学不能消解道德》,《人民日报·文学观象》2014年1月28日。
- 张江等:《文学不能成为负能量》,《人民日报·文学观象》2014年2月

14日。

张江等：《文学呼唤崇高》，《人民日报·文学观象》2014年8月29日。

张江等：《文学书写中国梦》，《人民日报·文学观象》2014年11月28日。

张江等：《文学的筋骨和民族的脊梁》，《人民日报·文学观象》2014年12月30日。

2015年

卢黎歌、程馨莹：《如何认识和分析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当代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1期。

樊建新等：《2014年意识形态领域十个热点问题》，《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年第2期。

刘艳、王涛：《〈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形成与历史地位》，《当代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2期。

卜宪群：《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琐谈》，《历史研究》2015年第3期。

于沛：《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和历史虚无主义》，《历史研究》2015年第3期。

郑师渠：《当下历史虚无主义之我见》，《历史研究》2015年第3期。

武力：《唯物史观视角下的历史虚无主义辨正》，《历史研究》2015年第3期。

周一平：《如何深入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当代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4期。

吴英：《驳历史虚无主义中的几个主要观点》，《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

武力：《历史研究需要细节但不能碎片化》，《当代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4期。

李艳艳：《当前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新特征》，《思想教育研究》2015年第7期。

袁良骏：《张爱玲神话——历史虚无主义的文学版》，《文化学刊》2015年第9期。

张海鹏、龚云：《马克思主义岂是历史虚无主义》，《求是》2015年第10期。

逢先知：《应当澄清意识形态领域一些混乱观念》，《思想理论动态》2015年第13期。

孟威：《抵制“英雄诋毁说”——“历史虚无主义”的网络逆袭及其克服》，《人民论坛》2015年第15期。

吴恩远：《警惕否认二战成果的历史虚无主义》，《人民论坛》2015年第16期。

梅荣政：《当前四种“去马克思主义化”的错误观点》，《思想理论动态》2015年第30期。

梁柱：《正确把握时代特征 自觉抵制历史虚无主义》，《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2015年第57期。

梅荣政：《对当前几种错误观点的评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2015年第69期。

吴克明：《改革开放时代毛泽东研究要警惕历史虚无主义》，《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2015年第83期。

李慎明、张顺洪：《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是中国共产党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兼论抗日战争中共两党两条路线、两个战场的关系》，《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2015年第101期。

朱佳木：《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做斗争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任务》，《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2015年第105期。

王伟光：《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推进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发展》，《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2015年第113期。

孙经先：《“饿死三千万”的来龙去脉》，《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2015年第124期。

李永胜：《袁世凯：“窃国”大盗洗不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月12日。

邬自强：《美国的“民国风”能吹起来吗》，《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月16日。

吴英：《马恩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月16日。

梁柱：《历史虚无主义是对社会主旋律的消解》，《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

年1月16日。

何秉孟：《从“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谈开去》，《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月16日。

田居俭：《同错误思潮斗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月16日。

龚云：《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具有复杂国际背景》，《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月16日。

童力：《哈耶克是历史虚无主义者的教师爷》，《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月16日。

杨艳秋：《普及历史研究成果应对历史虚无主义》，《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月16日。

郑师渠：《历史虚无主义既诬古人又误今人》，《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月16日。

左玉河：《革命与现代化：正确看待近代中国两大历史任务》，《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月16日。

宋月红：《存史资政育人护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月16日。

高希中：《从学理上批判与克服历史虚无主义》，《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月16日。

曹守亮：《警惕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新动向》，《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月16日。

唐正芒：《抹黑“江姐”意何为》，《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2月2日。

霍文琦：《再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2月11日。

苏全有：《美化张灵甫太任性》，《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2月16日。

李方祥：《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事关全局》，《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2月27日。

陈紫竹：《“阴谋论”是一种什么样的叙事框架？——评胡适〈史达林策略下的中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3月6日。

陈瑛：《敬畏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战士》，《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3月9日。

张剑平：《中国近代史“重写”之论可以休矣》，《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3月9日。

- 李方祥：《被禁锢的民国“学术自由”》，《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3月13日。
- 高晓燕：《侵华日军进行化学战铁证如山》，《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3月20日。
- 李冰：《日本是“败于两颗原子弹”吗？》，《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3月23日。
- 李维武：《割裂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有违史实》，《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4月3日。
- 李方祥：《警惕历史虚无主义的“时尚”表现》，《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4月10日。
- 李治亭：《“新清史”：“新帝国主义”史学标本》，《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4月20日。
- 李维武：《以学术展现前所未有的新型社会理想和人生理想——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新文化运动的学术贡献》，《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4月20日。
- 汤重南：《应该强调中国抗战对世界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贡献》，《专供信息》2015年5月28日第355期。
- 陈瑛：《“二周兄弟”的本质差别》，《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6月5日。
- 王伟光：《意识形态，共产党人必须坚守的阵地——纵论意识形态问题》，《要报》2015年6月19日第291期。
- 唐红丽：《正视历史事实深化抗战研究——访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李东朗》，《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6月26日。
- 李方祥：《革命先烈名节不可抹黑》，《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7月9日。
- 唐红丽：《全民抗战民族荣光——岳谦厚教授谈抗战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7月14日。
- 刘昫献：《以道德和法律捍卫英烈尊严》，《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8月4日。
- 陈谦平：《正确认识东方主战场的伟大作用》，《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8月11日。
- 唐红丽：《走向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转折——对话武汉大学资深教授、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会长胡德坤、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

- 教授卢毅》，《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8月11日。
- 李佑新：《〈论持久战〉有抄袭之嫌？——重估〈论持久战〉的历史价值》，《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8月25日。
- 楷杰：《虚拟空间是虚无主义的乐园吗？——从梁柱教授被围攻一事说起》，《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9月8日。
- 宋月红：《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专供信息》2015年11月10日第642期。
- 唐红丽：《高举唯物史观旗帜向历史虚无主义亮剑——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首届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论坛》，《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9月21日。
- 钟社文：《历史虚无主义的破产》，《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9月21日。
- 王定毅：《历史虚无主义的前世今生》，《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9月25日。
- 王征：《评当代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9月25日。
- 陈元明：《关于共产党抗战的历史虚无主义言论评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9月25日。
- 刘仓：《意识形态领域的卫国战争——毛泽东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评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9月25日。
- 李方祥：《抗战期间中共对外宣传夸大战果吗？》，《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9月25日。
- 胡宇哲：《历史虚无主义的关键概念是历史偏见》，《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9月25日。
- 高希中：《从多方位多角度反对与抵制历史虚无主义》，《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9月25日。
- 王增智：《历史虚无主义的根源、传播及克服》，《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9月25日。
- 尚松蒲：《人民群众是战胜历史虚无主义的根本》，《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9月25日。
- 张剑平：《中国近现代史领域的历史虚无主义》，《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9月25日。
- 程恩富、詹志华：《确立历史人物评价的若干原则》，《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5年9月25日。

刘雄伟：《中国语境中的历史虚无主义批判》，《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9月25日。

吴英：《唯物史观是历史虚无主义的克星》，《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9月25日。

文世芳、王瑾：《历史虚无主义论争演变及启示》，《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9月25日。

陈瑛：《〈陈寅恪的晚年姿态〉说明了什么？》，《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9月26日。

柳千岸：《中国抗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起点和终点》，原载于《人民日报》2015年9月2日，《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9月29日转载。

侯惠勤：《网络意识形态的属性及其应对》，《专供信息》2015年10月8日第673期。

苏全有：《什么人“活在民国也不错”》，《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0月8日。

周良书：《批判极端“西化派”的历史虚无主义——早期新文化运动领导者的反思》，《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0月15日。

钟社文：《我们应当怎样拾取历史的“碎片”》，《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0月19日。

王广：《历史虚无主义是政治思潮》，《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0月22日。

李方祥、郑崇玲：《揭开历史虚无主义的“学术”伪装》，《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0月22日。

陈瑛：《梁漱溟：同共产党时相龃龉的朋友》，《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0月27日。

陈之骅：《历史虚无主义怎样掩人耳目》，《人民日报》2015年11月2日。

李方祥：《严明党纪，抵制历史虚无主义》，《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1月5日。

张君荣：《国际共运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坚强的政治基石——访深圳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姜安》，《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1月17日。

张越：《“五朵金花”成就不容否定》，《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1月10日。

尹韵公：《2016年意识形态热点领域与对策建议》，《专供信息》2015年11月10日第774期。

曹大臣：《东方主战场的不朽丰碑》，《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1月26日。

张江等：《家国情怀与文学书写》，《人民日报·文学观象》2015年2月13日。

张江等：《文艺是民族精神的引擎》，《人民日报·文学观象》2015年3月31日。

张江等：《文艺要与时代同频共振》，《人民日报·文学观象》2015年4月17日。

张江等：《从高原到高峰，障碍何在》，《人民日报·文学观象》2015年7月21日。

张江等：《在人民的创造中实现文艺的创造》，《人民日报·文学观象》2015年9月11日。

张江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人民日报·文学观象》2015年11月3日。

张江等：《怎样讲述中国故事与中国经验》，《人民日报·文学观象》2015年11月27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虚无主义批判文选



扫一扫
获得更多新书信息

ISBN 978-7-5161-7476-0



9 787516 174760 >

定价：58.00元